致穷

1720年南海金融泡沫

孙骁骥 著

Deceit and Scandal behind the South Sea Bubble in 1720

政府和国企是如何让百姓一夜赤贫的？

《致穷》：泡沫经济时代的醒世恒言

梁小民 ■ 作序

赖建诚 苏小和 ■ 推荐

中国商业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致穷

1720年南海金融泡沫

孙骁骥 著

Deceit and Scandal behind the South Sea Bubble in 1720

政府和国企是如何让百姓一夜赤贫的？

《致穷》：泡沫经济时代的醒世恒言

梁小民■作序

赖建诚 苏小和■推荐

中国商业出版社

目录

说不完的南海泡沫

引言　回望18世纪的英国股市

第一章　股票市场在英国的兴起

——报纸、咖啡馆与公共空间的形成

第二章　杀人犯、赌徒与经济学家

——约翰·劳其人其事

第三章　一场战争打出一家公司

——南海公司背后的政治与军事角力

第四章　债务问题让国王头疼

——乔治一世时期的英国经济与公债

第五章　来自巴黎的金融炼金术

——纸币系统开始在法国运转

第六章　拿什么“拯救”英国经济

——“南海计划”在议会的通过

第七章　投资的激情与消费的疯狂

——“繁荣”背后的非理性行为

第八章　股市最后的泡沫

——伦敦的泡沫公司与《泡沫法案》

第九章　1720年大崩盘

——从股市崩盘到对南海公司的审判

第十章　泡沫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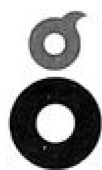
——泡沫经济的历史依然在延续

结语　从致富到致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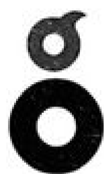
■孙骁骥

1984年生于重庆。新锐青年学者。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系。现供职于媒体，从事新闻业之余研读英国政治经济史。著有《英国议会往事》。





铁葫芦 | 历史馆



铁葫芦

致穷
1720年南海金融泡沫

孙骁骥　著

Deceit and Scandal behind the South Sea Bubble in 1720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穷：1720年南海金融泡沫／孙骁骥著．—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044-7872-6

I．①致…　II．①孙…　III．①资本市场—经济史—英国—近代　IV．①F835.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7285号

责任编辑：王　彦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010-63033100　www.c-cbook.com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　*　*　*　*

787mm×1092mm　1/16　18.25印张　271千字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80元

*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说不完的南海泡沫

梁小民

有人类社会，就有投机活动。不过投机活动几乎全民卷入，并给社会带来重大灾难，还是在市场经济形成之后。最早的大规模投机活动是1636年荷兰的郁金香事件，最早的大规模金融投机则是1720年英国的南海泡沫。从那以后，投机活动不断花样翻新，但实质并没有变。因此，南海泡沫成为许多人研究的对象，所出的著作，车载斗量，汗牛充栋。不过，读了孙骁骥先生写的《致穷》，觉得仍然有许多新特点，值得一看。

首先，这本书是通俗的、有趣的，适于所有人阅读。写这类著作，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研究性的专著，严肃而认真。这种书学术意义是重要的，但离普通读者远了一点。另一种是通俗的，所有人都可以读。许多学者不屑于写这类书，但我觉得，这两类书都不可少，各有自己的读者群与目的。这本《致穷》，让一般读者可以读懂，还很有趣，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应该畅销。

其次，这本书不是就事论事，只讲南海泡沫，而是写出了它的大背景，即当时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状况，从而让读者更深刻地了解这一事件的背景，从而更好地理解出现南海泡沫的原因。对这一段经济史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从中获益。过去的不少类似著作，集中于南海泡沫本身，而忽略了当时的经济与社会状况，这本书改变了这种写法，更有可读性。

最后，这本书是通俗的，但每章后面列出了相关的参考书，这就有利于想进一步研究这一事件的读者照图索骥。既以普通读者为对象，又兼顾了专家，这就使这本书对不同层次的读者都有意义。

作者孙骁骥先生是一位“80后”的海归学者。他的研究是扎实的，但表述是平民式的。有这样的新一代学者出现，我感到十分高兴，写几句读后感作为序言。

2012.7.18

引　言

回望18世纪的英国股市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具有一个良好的传统。每年，他们都会由专门的编辑操刀，约请世界各地知名的财经记者和学者，共同编写一本对来年世界经济展望和预测的特辑。最近两年特辑的主题，不外乎展望刚刚从经济危机中走出的世界如何向前迈进，以及中国和美国在今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孰轻孰重之类老生常谈的话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依照时间顺序逆流而上，往前翻看历年的特辑，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那一辑里，我找到了这样一段话："目前，由于急于刺激消费支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肆宣扬股票市场。1999年夏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号召投资者购买股票的社论……如果上升的股票价格使经济活跃，一段时间以内，中国政府将不得不保持对股票市场的支持政策。中国的股票市场资本总额只占GDP的25%，而且只有3,500万股东。"

写下以上句子的，是芝加哥苏黎世金融服务公司的首席分析员大卫·黑尔（David　Hale）。黑尔的话被刊登上《经济学人》杂志那年，我尚在念高中，既没有听说过这本杂志，也不大清楚股票市场的确切含义。不过，就个人而言，我当时对"股市"二字还是有一些囫囵的理解。这种理解一方面因为我的父母曾经购买股票，更重要的感情影响则源自上世纪90年代一部名为《大时代》的香港电视剧。我至今仍记得刘松仁饰演的股票经纪人在剧集里被黑社会大佬用枪指着脑袋，威胁他操纵股价上涨的场景，这个角色后来亦被股票所累，下场十分凄惨。拜电视剧所赐，股票市场给我留下的直接印象是：这是一群恶棍和赌徒操纵的金钱游戏。

以今天的视角来回顾十几年前的一篇文章和当时的中国股市，会让人顿生物换星移、恍若隔世之感。在2011年6月的某期《中国日报》上，刊有一篇名为《20年的过山车之旅》的文章。撰文的记者访问了多位中国老股民，他们大都有多年前在证券公司门口彻夜排队购买股票的经验，不少人依旧对这些经历的细节回忆得活灵活现，更有人难掩激动，手舞足蹈地夸耀着他们在中国证券市场挖到的第一桶金。据统计，

从1996年开始至2000年终止的牛市中，股票经纪人的收入是普通公职人员的四倍，而一般股民的获利，更是无法给出确切数字。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历史记忆已属绝无仅有。因为就在黑尔发表那篇文章后数月之内，中国股市迎来了长达五年的熊市，上证指数从2,000多点跌至998点。不少人赔得血本无归。

2005年股改之后，中国股民们乘坐的这辆A股过山车又开始由谷底向上匀速爬升。2007年10月，上证指数突破了历史性的6,000点，然而短短一年以后，股市行情又急转直下，跌落到1,664点。中国股民们的心跳，这些年来也随着惊险刺激的股市过山车之旅而七上八下，饱受折腾。股票价格上涨时，人们会趋之若鹜、疯狂购买；价格下跌时，股票顿时又成了人们握着的烫手山芋，顷刻间被纷纷抛售。而在这个全民投机的过程中，吃亏最大的当属占股票持有者绝大多数的散户们。

为什么中小散户的利益最容易受损？无疑是因为股票市场并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就在十几年前黑尔那段文字见诸报端后不久，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发表了著名的“股市赌场论”。他在接受央视的访谈时说道：“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很快就在中国的股票市场找到了一个最佳注脚。被称为“中国版安然丑闻”的银广夏事件于2001年浮出水面，依靠虚报财务报表推动股价疯狂上涨的银广夏公司被媒体曝光，公司很快遭到调查，原本飙升的股价立即一路倾泻。在连续15个跌停版之后，银广夏停牌，无数股民的血汗钱人间蒸发。将宝押在这只潜力股上的赌徒们输了个精光，但真正的大庄家，在事情败露以前却早已套现离场。

客观地说，在缺乏必要市场监管的情况下，发生这类事件其实并不值得人们过于诧异。毕竟，对于股票经纪人和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而言，虚造的利好信息无疑能帮助他们更快地获取利益；而且他们想要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困难。但对于处在专业金融圈之外的投资者，由于对真实信息的了解渠道不足，唯一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就是沦落为内幕交易者的“储钱罐”和“提款机”。

经济学领域存在着一个争议，究竟内幕交易好还是不好？此话得分两头来说：肯定者认为，内幕交易能使基金经理和公司规避风险，更有效率地从事投资活动，正因为有了内幕交易，资本的增值变得更容易

了；而反对内幕交易者的理由是：内幕交易带来的信息不对等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不公平，损害了普通股民的利益，长期来看，这其实会减少人们的投资意愿。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海恩·利兰（Hayne E. Leland）曾在《政治经济学杂志》的一篇论文中提及这两种争论。他在用经济学模型进行分析之后得出了悲观的结论，内幕交易对中小投资者而言，并不会增加他们的收益。即使短期市场的流动性可能会有增加，但如将眼光稍稍放长一些，人们会发现所有处于内幕交易圈之外的人最后都成了输家。

众所周知，股票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预期的左右，而人们对市场的预期又往往是依靠相关信息来判断。谁更快地得到准确、有效的信息，就意味着谁在股票市场中占得了先机。所谓信息，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上市公司的内幕消息。一位学者曾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1980年到1989年间正式立案的三百余起内幕交易犯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她发现，在有内幕交易进行的交易日里，股票持有者的收益回报会比信息向大众公布后的交易日里高出很多。换言之，内幕交易确实让一部分人赚到了额外的金钱，不过，这群人永远不可能是股票市场里彻底与“内幕”绝缘的普通投资者。也难怪连上海证交所大门外扫地的大妈也时常冒充股界人士，逢人便称自己有最新内幕消息。个中道理不难理解，因为股票说到底不过是一场允许作弊的赌博，若有内线情报，扫地大妈亦为证券专家。身在“圈里”还是在“圈外”，这对于我们的股市来说无异于一张准入证。

这或许足以解释，为何在某些时候明知股市的黑幕和阴谋在上演，人们仍然会奋不顾身地纵身从“圈外”跳进他们臆想中的“圈里”，加入到这场“群魔乱舞”的股市嘉年华。尤其当全民陷入疯狂，人人都渴望一夜暴富的时候，这样的行为就更加屡见不鲜。投资者们集体行动的逻辑源于一种从众的心理基础。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论述股票价格波动时，曾用“选美理论”来比喻投资者的集体行为。简言之，如果在一场选美比赛中，获胜标准由观众投给候选人的票数而定，并且投票给最终冠军的观众都可以得到大奖，那么，人们为了获得奖品，并不会投票给自己认为最漂亮的女性，而会投票给他认为多数人都会选的那位女性。这样的策略完全是出于权宜之计，至于最后选出来的冠军到底是不是真美女，反而无关紧要了。

把票投给并非真美女的参赛者，如此诞生出来的选美皇后，头上顶

着的就不再是金子打造的皇冠，而是一顶泡沫皇冠。同理，投资者并不会单纯地购买自己认为最有发展前景的股票，而往往会购买他认为大多数人都看好、都会购买的股票。因为股票的涨跌决定于整个市场的预期，而不是个人预期。当股市内外的各类小道消息满天飞，内幕交易频繁进行的时候，人们的市场行为就更容易被这样的心理所左右。在博傻理论的作用下，投资者们追涨杀跌，“合谋”把股价炒得老高，根本不顾股票是否如实地反映出自身的价值。如此，市场最终向人们隆重推出的，很可能并非真正具有发展前景的公司股票，而是一堆金融泡沫。

阅读历史，不难发现这种荒谬的“选美比赛”时常在股票市场上演。不说远的，财经杂志《巴伦周刊》在2011年7月的封面文章就表达了对今日股市的一种担忧。鉴于人们对社交类互联网媒体的普遍看好，这篇文章认为，Facebook这类社交网站一旦上市，其掀起的投资狂澜会让人条件反射似的联想起十年前那场著名的“互联网泡沫”。但泡沫最终注定破灭的结局，又会将人们的金钱与迷梦无情地击碎。犹记得2000年左右，伴随着美国政府多次提高利率，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那些价格虚高的网络公司股价纷纷跳水，一年时间内，不少披着“互联网”与“IT技术”的公司被剥下外衣，有的甚至从此销声匿迹。人们对此难免惊诧：在破灭之前，泡沫看上去总是那么光鲜亮丽，而一旦它因经受不住震荡而破灭，现实又总是向投资者们迅速展示出极其残酷的一面。金融泡沫不断被吹大然后又瞬间破灭，投资者就是那瓶为它提供给养的肥皂水。但是，人们会一直甘愿充当经济泡沫的牺牲品，不断重复过去犯下的错误吗？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并且，我想说的是，这个错误，自从现代金融系统和股票市场诞生以来，就不断地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重复着。

1602年，荷兰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Amsterdam Stock Exchange）成立，主要业务是经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从那时起，股票市场和一国的经济发展就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通过现代金融系统的建立，政治圈和证券市场之间的桥梁被架构起来。随着时间的推进，二者的关系也愈加暧昧。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诞生一百多年后，金融和政治的纠缠不清终于引发了人类历史上两次早期的股市大泡沫——英国的南海泡沫和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这是大约发生在近三百年前的历史。然而，即使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三百年前那些伦敦、巴黎的股市淘金者本质上也和今天中国的股市散户们没有二致。我们依然能处

处看到凯恩斯的“选美理论”在起作用：投资者依然像我们所熟悉的那样短视、投机、欺骗、轻信、盲从，一门心思渴望从股票市场空手套银。他们无意于当股票市场的聪明人，他们只是祈求自己不要成为最后那个埋单的傻瓜。

当然，本书并非旨在从学术角度分析市场上的投资行为，书中谈及经济理论及作出数据说明的部分，目的是希望能更严谨地展现和解读这一颇具代表性的经济史段落。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总是以不同的方式重复自身。1720年发生在英国伦敦的南海泡沫事件，无非是人类漫长经济史的一个微小的横切面，有趣的是，这个横切面透露给人们的某些关键信息，却总能在此后的岁月长河里找到它的回声。

集体心理往往容易被位居幕后的决策者加以操弄，如果没有内幕人士的“策划”和大众的“合谋”，经济泡沫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史研究者彼得·加伯（Peter Garber）在一本著作里对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评论道：“两次泡沫事件均是由政府高层官员发起和协助的场面壮观的宏观经济阴谋，它们得到了英国和法国整个政治机构的支持。”金融泡沫的产生，直接源自人性的贪婪。投机与贪婪就像市场的海洋中一个潜伏的旋涡，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随时可能将投资者的财富卷入其中，碾得粉碎。而在这个旋涡的下方，却是由政府以及国有股份公司、国债、国有银行等等现代金融概念构成的一个硕大黑洞。对于南海泡沫这段早已远离人们记忆的经济往事，重新梳理其来龙去脉与种种细节，不无裨益于今人理解所谓股票市场乃至股份制公司的运作，以及其在最坏情况下与国家利益的合谋。奥威尔有言，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站在今日的上交所、深交所大楼门前，从全民炒股的中国回望近三百年前同样是全民炒股的英国，历史原本模糊的纹理会逐渐在现实的映照下折射出自身的原貌。我想，这或许是本书，乃至经济史在当下的一个写作理由。

本书文字得以野人献曝，侥幸之余，也得益于外界的襄助。首先我应该感谢几家为本文写作提供大量材料的机构，它们是：哈佛大学商学院“南海泡沫”（The South Sea Bubble Project）的网络项目以及贝克图书馆（Baker Library），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国际金融中心（ICF）网站，英国历史在线网站（British History Online）。

感谢为本书写作提供资料的圣安德鲁斯大学经济系Gary Shea教授、蒂尔堡大学经济系Rik Frehen教授、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Julian

Hoppit教授、圣母大学经济系Philip Mirowski教授、南安普顿大学经济系Helen Paul博士、英国开放大学Anne Laurence博士。此外，台湾政治大学的贾士麟先生也为本书提供了部分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知识贬值的时代，雕虫余事，人弃我取，除了尽到一位著述者的责任，本书的写作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以上诸位的诚挚之心与慷慨之意。特为零墨，以志文缘。

作者谨识


THAMESIS



伦敦全景图，1616年

第一章　股票市场在英国的兴起

——报纸、咖啡馆与公共空间的形成

重回18世纪的伦敦

对于非本地居民来说，伦敦的街道结构精巧得有些匪夷所思。当你行走在一条看起来平淡无奇甚至是有些破败的老街，内心充满了乏味和厌倦，此时，千万不要放弃对下一秒的期待，也许在这条街拐角处不经意的一次转身，就会给自己的眼前带出一片别样的景致。例如，你可以从伦敦地铁红色线或蓝色线的“银行站”下车，夹杂在熙攘的人流中间，习惯性地随着众人的脚步向前走去。在经过一段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地铁甬道后，你终于挤出了低矮的地铁口。此时，你会发现自己正站在一条蜿蜒狭窄的街道中央，马路有些斑驳，路灯略显陈旧，但这条被两旁高大的建筑夹在中间的小街却散发着一种令人难以言传的历史戏剧性。矗立于街口的那尊百余年前建造的威灵顿公爵塑像，说明了这一切。

这条街，是伦敦城著名的针线街（Threadneedle　Street），威灵顿公爵身后那栋宏伟的银灰色建筑物，便是被人们称为“针线街老妇人”的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自从18世纪迁建于此，至今已逾三百年历史，以“老”字冠之，当属妥当。如果稍微考察一下这条街的历史掌故，你会发现，能称之为“老”的并不仅限于英格兰银行，还包括伦敦证券交易所、波罗的海交易所等曾经在国家的金钱游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金融机构，甚至连这条最早可以追溯自罗马人统治时期的街道自身，亦可以一个“老”字来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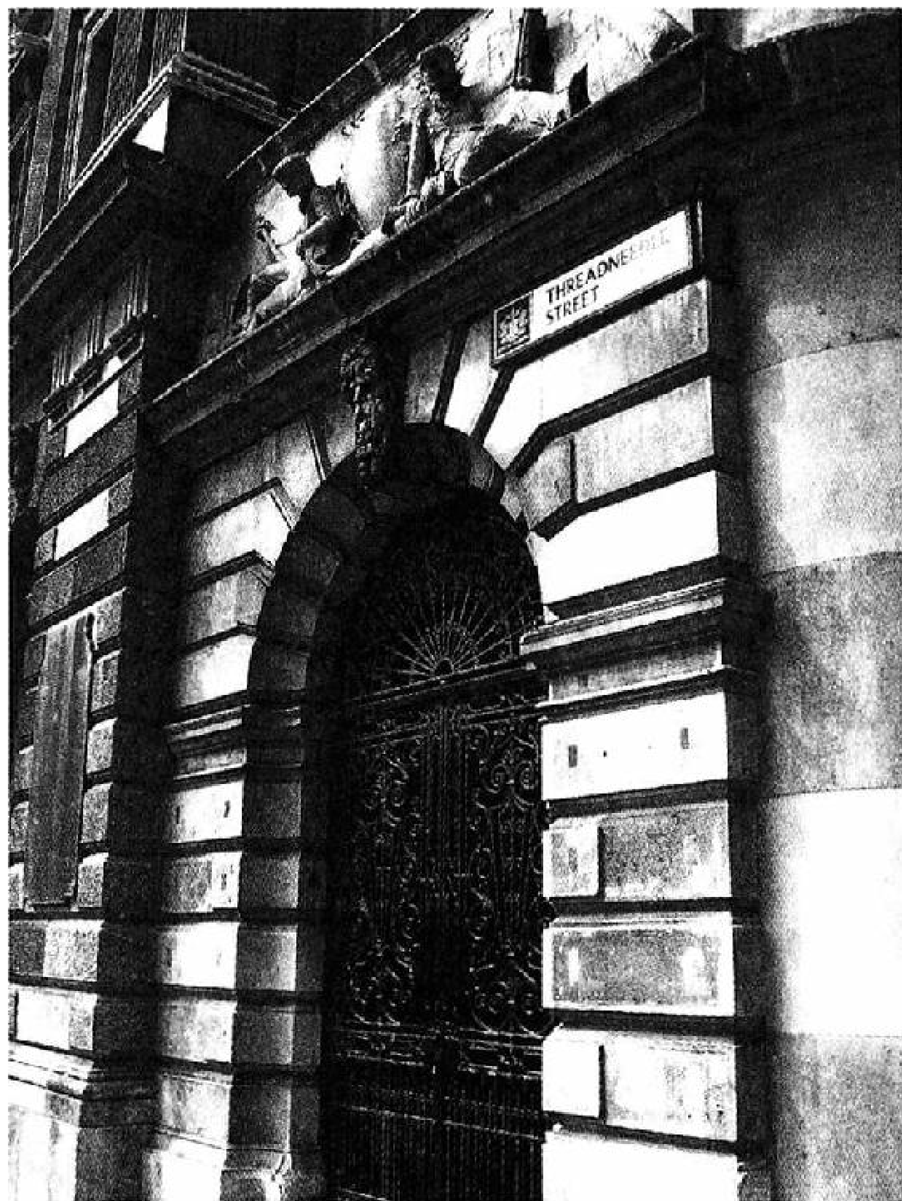
不过，当人们在今天踏入这条像是直接从历史深处延伸出来的街道时，已经很难捕捉到旧日的金融城遗留于彼处的踪迹了。除了英格兰银行之外，过去坐落在针线街的那些叱咤风云的金融机构或搬迁，或消失，相继在历史的一个个倏然转身中化归于寂寥，只留下喧嚣过后的余尘残留在难以被时间磨灭的那些古雅建筑之上，供后世来此的人们凭吊、怀想。

在伦敦城外围时尚而挺拔的摩天大楼映衬下，这条上了年纪的针线

街和低伏于它两旁的建筑物似乎显得有些没精打采，而这种表面上的“没精打采”抑或正是这座城市最让人着迷之处。有了外围那些玻璃样的现代建筑物的掩映，来访此地的人们才会惊喜地发现，原来伦敦城现代化的躯壳包藏着的，却是一颗古朴安泰的内核。这座金融之城所拥有的魅惑与张力，数百年前就被巧匠们砌进了街道的一砖一石。踏着段段连通古今的路石，人们往往为针线街的缄默与黯然所感染，而忘了打破沉默去询问，那一段在历史尘嚣中得以完好保存的城市往事，将对今天的人们述说些什么。

对于英国的经济史而言，这条街道实在拥有太多值得讲述的部分。而对于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而言，针线街之于金融，恰如舰队街之于新闻、唐宁街之于政治。针线街曾经会聚了英国最富有的公司和顶级金融机构，它们共同构筑了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运转的核心，并承载着整个帝国的财富。而由于英格兰银行在此的建立，世界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新开端，也可以说是起步于针线街。

但本书主要着笔的，却是关于一间曾经坐落于此的公司——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的往事。这间公司的旧址，在今天这条被现代科技翻修一新的针线街已难再寻觅。要想一探南海公司的究竟，我们就不得不把视野拉回到18世纪初期的伦敦城……



今日伦敦针线街上南海公司大楼原址。

假设一位生活在现代的人，有幸能够回到18世纪初期的伦敦街道上徜徉一番，那么他对这座城市最直观的感受会是如何？我想，用一个词总结应该十分确切，那就是：重生。

何出此言？当时的伦敦，早已位居英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宏伟的伦敦桥、威斯敏斯特教堂等建筑在中世纪时代就已修建完毕，繁荣的商业让整座城市透露出一片现代都会的欣欣向荣，“重生”二字和这座几近完

美的城市又有何瓜葛？然而，翻阅历史，就会了解到当时伦敦的真实情况可谓命途多舛。18世纪初叶，这座劫后余生的城市刚刚艰难地挨过了从14世纪到17世纪蔓延整个欧洲的瘟疫侵袭。17世纪的黑死病瘟疫大流行让医疗条件落后的伦敦人口急剧减少，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瘟疫。而在瘟疫肆虐最严重的1655年，由于死者过多，确切死于瘟疫的人数根本无法精确统计。[1]包括国王、贵族在内的不少人为了活命，便挈妇将雏，举家逃离死亡之城伦敦。而城市建设以及各种商业活动，更是受到瘟疫非常明显的影响，几乎全部陷于停滞状态，整座城市透露着一片死灰般的沉寂。

丹尼尔·笛福在《瘟疫年纪事》中用灰暗的笔调描写当时的伦敦：城市的商业彻底陷于停滞，因为当时几乎不会有商船愿意冒险在伦敦港靠岸，也没人敢在靠岸后下船。因此，所有在海关供职的人员，水手、海员、码头工人，几乎都面临失业，而城市里那些为商人们卖力的劳动者，也因此丢了饭碗。那些以建筑为营生的人们，也完全没有工作可做，因为“数以千计的房屋在一夜之间都失去了主人”[2]。可以说，伦敦的商业、航运业、建筑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已经彻底被黑死病扼住了咽喉。

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瘟疫的死亡阴影正笼罩着伦敦上空时，另一场灾难也悄然降临。1666年，伦敦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火灾。在那一年的9月2日凌晨，伦敦普丁巷（Pudding Lane）的一间面包铺突然失火，偏偏在那个季节，伦敦地区的气候恰好多风，大风很快将火焰吹遍了好几条街道。如前所述，伦敦城的街道并不宽敞，狭窄处，几乎只能称得上是小巷子，而17世纪伦敦的房屋建造主要还是采用容易着火的木质结构。那么，狭窄空间和木质结构这两个因素相叠加，大火迅速蔓延伦敦城的情状，也就可想而知了。

大火延烧了整个城市，连续四天，夜晚的伦敦天空被熊熊火光照成血色。据统计，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在内的87间教堂、44家公司以及13,200多间民房尽被焚毁，城市的80万人居民中，大约有70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3]为了帮助伦敦城露宿的灾民迅速搭建帐篷，政府甚至动用了海军的物资和人员。可是，各种补救手段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大火面前效果究属寥寥。一片烧焦的瓦砾堆宣告着过去时代的伦敦已彻底死亡。为防止此类灾难重临这座多灾多难的城市，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下令所有在伦敦建造的房屋必须一律使用石头和砖瓦为建筑材料，摒弃之前

所主要使用的木材。这场由于人为错误而造成的大火几乎烧毁了伦敦的全部木质建筑，整座城市，一片枯槁。

举世闻名的伦敦大火，对于城市的居民来说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然而，换个角度思考这一问题，结论就会全然不同。大火固然残忍地吞噬了过去的伦敦，但同时也杀死了瘟疫病菌，火灾后的重建更是给这座古老的城市一个新生的机会。都市的重建开始在余烬中酝酿，一个新的伦敦城将在缓慢的建设中出现在世人面前。

一位学者用颇为浪漫的笔调描述了大火之后的伦敦："就像凤凰，这座城市再次崛起。城市自身的生产力又开始复苏，原本支离破碎的一切都被人从灰烬中重新拾起。城市工业像水泵一般将生命力源源不断地注入城市的机体，而商业活动就像是血管里面的血液，在城市的身体里循环流淌着。"[4]逝者长已矣，但来者犹可追。过去的一切虽然被烧得一干二净，但是伦敦的工商业底子并没有被大火彻底吞噬掉，反而是凭借着火灾后的城市重建，获得了一次颇为意外的发展。

1666年10月1日，建筑师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向政府提出了关于伦敦城灾后修复的详尽方案。其中，修建圣保罗大教堂的浩大工程从1675年开始，直到1710年才告完工，共花费了75万英镑。他参与的建筑工程还包括皇家肯辛顿宫、汉普顿宫、大火纪念柱、格林威治天文台等。雷恩爵士督办的这些城市工程建设，使得经历灾难的伦敦得以从死灰中奇迹般地焕发新生。笛福说过，如果没有那场大火，伦敦乃至整个英国经济日后不会有那么快的起色。跨进新世纪门槛的第一年，即1700年，伦敦的进口总额已经占到了整个英国的80%以上，出口则占到了69%以上，这座城市似乎又从令它遭受伤害的瘟疫与火灾中重新活过来了。[5]并且，现在的它已经成为了一座比以前更繁荣的商业城市，来自英国和欧洲各地的移民再次涌进这里寻找职业与商机。一位18世纪的英国海关官员甚至得意地说，伦敦永远不会缺乏劳动力，除非这个国家里的人已经悉数死去。[6]



17世纪一位匿名画家描绘伦敦大火的油画。

尽管18世纪的这座伦敦城已经在和全世界的商人做生意，承担了英国出口总值的四成和进口总值的近八成，但是普通民众要想真正能够从商业活动中赚到钱，其实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自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手工业者行会制度，严格限制着零售业在城市的发展。当时的任何一个伦敦商人都不大可能像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随心所欲地出售商品、扩大自己店面的规模。关于谁能卖什么货、允许卖多少货，商业行会都有自古流传下来的明确规定，违者将受严厉制裁。此外，一般人的经济贫困也制约了消费，从而限制了零售业的发展。在18世纪以后的很

长一段时间，有钱购买工业制成品的人仅限于社会上的少数富裕人群，其余大部分穷人的生活消费品依旧靠手工制作，商品买卖也仅限于非常便宜的一些货物。因此，商店的营业额通常都很低，店主们也不敢贸然大量进货，他们担心这些货品会在店里积压几个月而卖不出去。[7]

不难看出，商业活动对于此时的伦敦来说，虽然令城市重获繁荣，但并不是解决这座城市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第一次工业革命在科技上的进步昌明，还要等到18世纪中后期乃至19世纪初叶才逐渐开始被用于扩大再生产，从而制造出前所未有的新奇产品。财富的流动，目前主要还是发生在富人以及有权势的人之间。与此同时，人们的内心仍难以避免受到诸多外来因素的干扰，例如城市里不断发生的犯罪，英国正在进行的对外战争，饥饿、贫穷的折磨，等等。但给人们内心烙下深深疤痕的一段记忆，仍旧是瘟疫和灾难带来的可怕阴影。它们像幽灵一般在伦敦人的内心深处中潜伏着，不时会出来侵扰人们一番。

事实上，18世纪初期伦敦人口的平均寿命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处于历史上较低的一个时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糟糕的城市卫生。伦敦，在当时可以说是一座公共卫生设施几乎为零的城市。苏格兰文学家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在造访伦敦时，曾写信给自己的朋友抱怨这座城市恶劣的卫生条件："如果我想饮水，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饮用沟渠里的那种令人作呕的水，这种水公开暴露在各种污染之下。要么，我可以选择饮用泰晤士河里的水，但是河水完全被伦敦和威斯敏斯特排进河流的污秽所污染。人类的排泄物在这些污染源里边，危害程度还算是最轻的。毒性更强的，是从工厂里排泄出的含有毒素和矿物的废水，混合着人类或者动物的腐烂尸体以及从下水道冲刷下来的污秽在河水中飘荡。"[8]

斯摩莱特的这番抱怨不仅是个人牢骚，也是当时无奈的现实情况。由于抽水马桶以及与之配套的城市排水卫生系统要在数十年以后才被人发明出来，因此，18世纪初期尚不具备公共卫生意识的伦敦可以说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一座城市。糟糕的卫生条件，使得各类致命的传染病依旧在伦敦蔓延，即使在精英人士聚集的金融城，惶恐不安的情绪也并没有因为城市的重新建设而销声匿迹。而在下层阶级（cockney）聚居的伦敦平民地区，随处可见肮脏而绝望的乞丐、流浪汉、卖艺人、扒手和各色闲杂人员，这似乎又暗示着伦敦城繁荣表象下贫困人口所面临的重重危机。[9]对于生活在伦敦的每一个居民来说，那幅关于瘟疫的骇人

图景依旧是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便士大学：咖啡馆

怀着对过去的惶恐与对未来的不确定，英国人，尤其是伦敦的居民体会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初始阶段所带给普通人的伤害。工业化所造成的城市膨胀，让数量惊人的人口从乡村涌进城市寻找新的就业机会，这让伦敦陈旧不堪的老城背上了足以将其压垮的重负。果然，随着疾病和火灾爆发，伦敦成了一座悲伤之城。然而，当原始的资本主义在不知不觉间侵害着它庇护下的每个个体的利益时，人们也发现，航海、经商、资本流通等等新兴的事物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种种前所未有的、令人兴奋的变化。

这些变化最终汇集在了一个狭窄的空间——咖啡馆。

咖啡在伦敦的流行，实际上也是商品贸易繁荣的直接产物。17世纪英国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往来已非常频繁，成吨的咖啡豆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伦敦港。不久，伦敦的第一间咖啡馆设在1652年的圣·米歇尔大道，店主是一个亚美尼亚人，专门出售土耳其产的咖啡。在此以前，包括在牛津等地已经陆续有人开设咖啡店。尽管这种新颖的饮料直到1680年还被一部分英国人视为“极端无用，因为它既不能滋养身体，又不能使人堕落”[10]。但更普遍的情况是，因为好奇而进入咖啡店一探究竟的顾客越来越多。他们逐渐发现，在这种小店消费一杯带有特殊香味的饮料，其间与周围三朋四友说话聊天、交流思想，实在是一件很惬意的事，至少，人们可以暂时逃离外部世界的诸多不如意。

伦敦人给当地的咖啡馆起了一个有趣的外号——便士大学。这个诨名的意思是说，当时的咖啡馆消费不高，一杯咖啡平均才花费大约一便士价钱。[11]然而，人们在此小饮一杯所得到的知识上的收获，价值却远远高于一便士。在这所“社会大学”里坐上一天，一个人所能接触到的来自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士会带着各地最新的消息、最时髦的思想与这位踱进咖啡馆的人进行交流，早期的新闻业就这样在飘散着咖啡豆香的咖啡馆里诞生了。英国《观察者报》的主编艾迪生（Joseph Addison）在该报1711年3月的卷首语中有以下名言：“有人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了地上与人共居，我的野心是希望有人说我把哲学引出私室、书房、学校、大学，让它进了俱乐部和会议厅，停留在下午茶

桌上和咖啡馆里。”[12]咖啡馆很快成为了新思想的前沿阵地，人们在咖啡馆里所接受的知识碰撞和洗礼，真可以称得上是“胜读十年书”。

此等好去处，伦敦人怎肯轻易放过？18世纪初，一位来到伦敦的旅行者对咖啡店曾有一番细致的观察。他吃惊于咖啡馆里人们对于新闻和报纸的热情：“在这些咖啡店里边，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公共报纸。每一个英国人都是新闻的热心读者，工人们每天上班前的第一件事是走进咖啡馆阅读当日最新的消息。我甚至经常在咖啡店里边看到几个擦鞋匠花钱购买一份报纸，然后尽情阅读。没有什么事情比聆听这种阶层的人谈论政治更有趣的了。你可以经常看到一个英国绅士谈论某个和平协议比谈论他家里的事情还要熟悉。”[13]据统计，在1702年，伦敦尚且只有一份英文日报，而到了1709年，伦敦每日发行的报纸种类已经达到了近二十份。[14]报纸和新闻业在伦敦的发展，不可谓不迅速。



英国19世纪的一幅油画，描绘了在咖啡馆里兜售股票的早期证券商。

除了新闻业在咖啡店里的蓬勃发展，这里的政论小册子也是铺天盖地。由于18世纪初的英国议会还不允许自由的新闻报道，因此，对言论限制较少的咖啡馆成为普通人论政议政的最佳场所。[15]政治话题和新闻业的碰撞让这里逐渐成为了一个“公共意见的集散地”。人们在咖啡馆传递、分享信息的过程也逐渐塑造了公众对他们所关心话题的意见与共

识。这种公众意见包含了文化、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所有这些话题全都被塞进了咖啡馆这一方狭小而喧闹的空间。

咖啡店在伦敦人日常生活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已无须赘言，舍掉这个场所，人类文明此后的发展进程将不可想象。为此，剑桥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马丁·琼斯曾在一本著作里不无感慨地说，欧洲的城市咖啡馆具备了未来饭店的许多特点，那些农民工的小酒馆逐渐变成了由书、小册子、最新的报纸构成的一个公共空间。商人、旅行者、政客和知识分子们啜饮着“醇厚的、有益健康的液体”，在咖啡馆里小憩。咖啡馆因此可以称得上“国际文化文本交流的网络节点”。16

商业化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可以在伦敦的咖啡店内找到其共同的缩影。在咖啡店之外，人们在为这个城市脏乱的卫生环境、满是灰尘的街道和恶劣的浓雾天气而皱眉的同时，他们的眼前也出现了一幅混乱却又繁荣的街景图：这里玻璃门面的商店鳞次栉比，停满了大型商船的海港，数以百计的声色场所、旅社、酒馆，里面满是挤在一起观看斗鸡、掷骰子、打扑克牌和玩双陆棋的游手好闲的人们，吟游歌手和竖琴师在这里表演，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着这座城市近来发生的一切。17在众人聚集的这些狭窄空间之外，是三百座尖顶高耸的教堂，以及包括著名的比林斯盖茨（Billingsgate）鱼市、兰特霍（Leadenhall）肉市在内的大大小小的集市。此外，公共展览会、图书馆纷纷现身于18世纪初期的伦敦，而在所有当中最能象征伦敦崛起的，莫过于那座拥有巨大穹顶、高耸入云的圣保罗大教堂。18

这幅18世纪伦敦有些自相矛盾的街景图在向整个世界宣示着英国的崛起。居住在欧洲大陆的人们似乎隔着海峡望见了圣保罗大教堂那直插云霄的尖顶，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聚集到伦敦城里的咖啡馆。在这片烟雾缭绕、觥筹交错的领域，除了活跃于此的新闻记者、商人、店主、绅士、旅客这一干人等之外，还有一种人，也是咖啡店的常客。他们经常泡在咖啡店里，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地向一旁那些听得似懂非懂的外地人解释一件本地的新鲜事物——乐透彩票。

Numb. 3126

The London Gazette.

Published by Authority.

From Thursday October 24 to Monday October 28. 1695.

Madrid, October 13. N. S.

WE have advice from Cadiz, that the Galeons failed from thence the 13th past for the *West Indies*, except four Merchant Ships, who not being ready by reason they stayed to take on Board the Goods of another Ship that proved Leaky, followed the 17th. On the 3d of this Month Admiral *Russel* arrived in the Bay of Cadiz with the Fleet under his command. The Campagne is ended in Catalonia; The French have demolished *Palamos*, and the Spaniards re-fortifie *Ostalrich*. The Moors continue before Ceuta.

Venice, October 14. On *Thursday* last failed hence a great Convoy for the *Levant*. And two new Galleys, and two Galeasses with several other Vessels, will be ready to depart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to joyn likewise the Venetian Fleet.

Turin, Octob. 17. The Forces of the Allies continue encamped near *Rivalta*; but 'tis believed they will separate in few days, and go to their Winter Quarters; The French lie still at Orbitello.

Vienna, Oct. 15. By Letters from [illegible] in *Transylvania* of the 8th Instant 'tis confirmed, that the Ottoman Army was marching back towards Orsova, where the Sultan intended to repass the *Danube*, and to quarter his Troops in the Neighbouring Provinces. [illegible]

Cologne, Oct. 23. The Letters from the *Upper Rhine* tell us, that the Forces on both sides are gone into their Winter Quarters; The [illegible] who are to [illegible] are on their march thither.

Paris, Octob. 28. The Mareschal de Boufflers is come hither from Melun, where he took a review of several Companies of the Guards, and will suddenly return to his Government of Flanders. The Mareschal de Villeroy, who is now visiting the Frontier places, is expected here the next week. The Duke de Vendosme having put the Forces he Commands in Catalonia into their Winter-quarters will go to Provence, whereof he is Governor, and from thence return to Court. The Letters from Toulon continue to say, that all the Men of War in that Port are laid up except such as are designed for Convoys. There are several new Edicts preparing to raise Money.

Brussels, Octob. 30. The French have begun to send away their Foot, which were encamped about [illegible] into their Winter Quarters; They are now working on their new Lines between the *Sambre* and the *Maes*; and are making an advanced Work at Charleroy. [illegible]

Hague, November 1. N. S. The States General have given new and very strict Orders to hinder the supplying the French with Horses; as has been already done by the Elector of *Bavaria* and the Elector of Cologne. The Letters from *Flanders* of the 30th past say, the Mareschal de *Villeroy* was still at *Ipres*, and that the French are working with great diligence on the new Outworks they are adding to the Fortifications of [illegible] and Charleroy.

Kinsale, October 23. On Wednesday last arrived here His Majesties Ships the *Lark*, Capt. Guy, The Ruper Capt. *Fellow*, the Cygnus Capt. *Wade*, and the Owners-Love Fireship; and on Thursday came in the Norwich Capt. Crow, with the *Katherine* Storeship Capt. *Atkins*, from *Plymouth*. The [illegible] of *London*, Richard [illegible] Master, and the Johanna and Anne of London, both bound to *Limerick*; as also the [illegible] of this place from *Ostend*.

Dublin, Oct. 17. The two Houses of Parliament proceed in the dispatch of the Business before them. The Commons having resolved to continue the Additional Excise on Beer, Ale, and other Liquors till the 25th of *December* 1698, they appointed a Committee to attend his Excellency the Lord Deputy with the said Vote, and humbly to desire that a Bill may be prepared in due form pursuant to the same, and transmitted into England. Heads of several other Bills have in like manner been laid before his Excellency to be transmitted into *England*. And this day the Commons were again in a 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 to consider of further Ways and Means to raise the Supply, and having agreed on an Estimate of what the Poll and continued Excise would amount to, they resolved to lay a Duty upon Tobacco to raise the rest of the Supply. Upon the News of His Majesty's safe arrival in *England* here has been

great

自17世纪末，新闻报刊在伦敦兴起。图为发行于1695年10月的《伦敦公报》。

说起来，乐透彩票对于英国人而言并不陌生。据史料的记载，古罗马人是彩票的发明者，但英国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把“运气”和“财富”（Fortune）联系到一起的国家。[19]官方记录中，英国最早的一次彩票活动是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的1567和1568年，当时英国政府为了筹集资金，向公众发放彩票，每一位购买彩票的人据说最后都能中奖。政府在伦敦街道的墙壁上贴满了关于彩票的告示，告诉人们购买彩票的好处和其他相关信息，这些招贴，算得上是早期的广告。而在1612年和1630年，詹姆士国王和查理一世都公开发行过国家彩票。[20]其目的，与过去一样，也是为政府筹集资金。

当时由国家发行的彩票，和现在人们概念中的彩票，根本不是一回事。国家彩票（National Lottery）以国家的信誉为保证，向购买者承诺一定数量的年金作为回报。年金的多少，根据彩票的购买数量而定。英国政府在1694年发行的国家彩票，以10英镑为一个单位，向公众出售，同时，在保证一定的年金回报率之外，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购买彩票，政府还向人们承诺，在今后的十六年内，每一年都有巨额的奖金会馈赠给彩票的购买者。第一年的奖金数目就高达1,000英镑。[21]

明眼人看得出来，所谓的国家彩票并不像官方所宣传的那样，是为了英国大众走向共同富裕而设立，它的真正目的是吸引公众把钱乖乖交出，实际上是政府敛财的一种手段。但是，英国大众对于政府的国家彩票计划，并没有表现出反感，反而是像吃了迷幻药一般疯狂购买受到政府支持的彩票。德国学者冯·奥芬巴赫（Yon Uffenbach）在1710年访问伦敦时，曾经亲眼目睹了英国人在购买彩票时所展现的疯狂，当时的他，完全被民众的狂热和彩票事业的蓬勃所震撼。一次，在伦敦一个公开的彩票发行场合，奥芬巴赫看见现场来了二十多名防止人们作弊的监督人员，以控制闹哄哄的抽奖现场。放置在抽奖现场的那台用作混合彩票并抽出中奖者的奇妙机器，也让作为德国人的他感到难以理解，为什么英国人要费这么多人力物力来进行一项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的活动？[22]

奥芬巴赫恐怕不知道这项他难以理解的活动，已经在英国存在了一两百年，而作为衣食无忧的学者，他也很难体会到在伦敦生活的贫穷的人们是多么渴望幸运女神的垂青，好让自己抽中彩票，摆脱贫穷，甚至一夜暴富。当越来越多的人眼看着那些从兑奖处领取到不菲奖金的人脸上洋溢的狂喜之情，从而把更多的希望寄托于国家发行的彩票、寄托于运气的时候，集体的投机心理也就在人们高亢的兴奋情绪当中，默默地

开始酝酿起来。

何谓投机？概言之，其实就是和上帝玩骰子。在17世纪和18世纪相交的英格兰，由于咖啡馆、酒吧等等勾栏瓦肆场所在伦敦城的勃兴，此类活动也找到了最佳的繁衍土壤。扑克牌、斗鸡等各类形式的赌博逐渐成为伦敦的一桩颇为繁荣的“地下产业”，从这类活动中，人们通过实践逐渐建立起一种经验上的共识：人不一定需要通过费时费力的劳动才能合法获得金钱，仅仅通过赌博和投机，也能够致富。而且，这种致富的方法通常比前者来得更迅速和直接。

如此的投机心态当然招致了卫道者反对，尤其是宗教人士。他们反对投机活动的原因是：依靠无法确定的随机运气获得财富，无疑是挑战了过去上帝安排一切的传统思想。因此，18世纪初叶的一位传教士托马斯·谢泼德就撰文告诫人民：“安静地生活在上帝的管辖之下，不要期望任何偶然的运气发生。在这个伟大的王国，一切事情皆在主的伟大意愿下得以发生。”[23]而在政府的层面，鉴于赌博等行为的不良社会影响，英国议会也设置了立法，对赌博行为进行限制，尤其是对于那些位居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如果连他们也纷纷投入赌博事业，不再劳动，那么试问依靠他们供养的贵族和上层阶级吃什么？为此，早在1541年的法律中，英格兰就有规定，只有绅士才能参与赌博，而包括劳动者、仆从等地位较低的人群，是禁止赌博的，甚至连足球、网球等可用作赌博之用的体育游戏，也被一律明文禁止。[24]到了1664年，鉴于人们赌博情绪的高涨，政府再次出台限制赌博的规定：对于任何一种形式的赌博来说，单局的输赢上限为100英镑的货币或有价证券，超过上限则视为违法。[25]

然而，尽管存在着道德上的诘难和法律上的限制，人们一旦在现实中找到了一条可以不劳而获的道路，那么想让人们集体从那条路上掉头而回，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相反，与上帝玩骰子的营生理所当然地在社会上愈发流行。但问题是，这难道又有什么不对吗？当贫穷、瘟疫、灾难的阴影尚未从人们心头消除彻底之前，几乎没人能活得有安全感。欧洲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改革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人心早就变了。现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抱有这个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追求现世生活的一时之快要比向神明企盼来生的“幸福”要实际、重要得多。颇有象征意味的是，雷恩爵士在伦敦大火后重新修建的一系列建筑工程中，开销仅次于圣保罗大教堂的，便是耗资62,000英镑的皇家交易所（the Royal Exchange）。[26]1669年，新交易所正式开放，人们在赌

博之外，又多了一条新的投机生财之道。

诚如英国当代历史学者朱利安·霍比特（Julian Hoppit）对18世纪的评价，“这个时代的焦虑在于，人们难以建立宗教与政治之间联系的共识”[27]。在那个政党政治兴起，商业贸易蓬勃的时代，传统的宗教信仰似乎成了与现实彻底脱离联系之物。19世纪的利物浦大主教J. C. 莱尔在评价距他一百年前的英国人的信仰状况时，言辞更为激烈：“这个国家上世纪中期的信仰状况令人失望得难以想象……从1700年到将近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似乎没产生过任何好东西。在一片可以自由拥有圣经、自由承认新教信仰的土地上，出现这种情景，令人难以理解。基督教似乎已经僵死，你完全可以说它已经死了。尽管讲坛上大肆鼓吹道德，道德却被街上的人完全践踏在脚下。”[28]

读罢这段话，你也许会问，宗教的改革不是资本主义在西方得以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吗？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宗教改革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确立。他注意到欧洲进行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禁欲、保守、封闭的伦理思想逐渐让位给了新教的伦理体系。与罗马天主教相反，新教伦理崇尚追求现世的幸福，视通过劳动获取金钱为正当的利益和权利，无为与懒惰反而被教徒视为一种“不道德”的品质。

因此，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互为表里，使人们“表现出一种指向经济理性主义的特定倾向”[29]。韦伯的话，似乎并没有错，但为什么历史的实际记录又如此丑陋，与他理论中描绘的美景格格不入呢？我想，韦伯的话是以当年乘船前往北美新大陆的清教徒为基础，观察长时段内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衍变。这好比远观一幅画，省去了中间好些细节，得出的结论当然乐观。而我们如果手持放大镜观察这幅早期资本主义“清明上河图”，将会看见画卷的每处细节及其在不同时代的变迁。18世纪的头几十年，无疑是这幅图画上的景物变化最为剧烈繁复的时期，妍媸美丑，一一暴露于前，透过“放大镜”所见之景也会与韦伯的“准宗教论”显得横岭侧峰、相去甚远了。道德与宗教堕落带来的信仰真空，即是韦伯未曾细察的时代细节之一。[30]

经历了大火和瘟疫的英国伦敦，传统意义上的上帝，早已被这把世俗的欲望之火烧得荡然无存，但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似乎并没来得及迅速确立，信仰的黑暗降临了劫后的英国。那么，当现世的生活并不能得到神灵实际的祝福和庇护时，茫然不知所措的人们于是选择以运气相

博的方式，用掷骰子来“侍奉”自己心目中那个披金戴银的世俗上帝。

有一种东西叫股票

在交谈声此起彼伏的咖啡店，那群向人们代理出售国家彩票的“票贩子”，这时也在向人们兜售另外一样叫做股票（stock）的东西。当然，与彩票比起来，英国人对于“股票”这个词并不感到陌生。一想到股票，英国人就立刻转头从咖啡馆的窗户向外望去。他们透过窗户，看见了靠近海港处低矮楼房未能完全遮挡住的桅杆，他们的想象力立刻沿着桅杆而下，来到了停靠在伦敦港的一艘艘航船上。正是这些经历了恶浪滔天、疾风暴雨的海船，为英国人带来了现代意义上的股票概念。

但要说起股票，它最早的发明者，却并不是17、18世纪的英国人，而是远古时代的罗马人。早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罗马共和国（Republic of Rome）时期，罗马的疆域内商业活动发达、资本流通自由，商人们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因此，将多余的金钱放贷并收取利息，成了当时比较普遍的投资方法，票据的雏形于是出现了，这让商品交易之外的金融交易有了存在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时期还出现了一种被称为“publicani”的投资者集团。这些集团通常要求成员们花钱购买债务票据，每隔一段时间按照投资者购买票据的比例分红，并且还集资聘请职业的管理者进行统一治理，掌管大家的集体资本，以达到投资回报利润的最大化。罗马的这种投资者集团，也就是公司的雏形。[31]

公司的含义，可以从这个古老词汇的词源结构窥知一二。把“公司”（company）一词拆开来看，“Com”在古拉丁语里的意思是“共同”，而“Panis”的意思则是面包。[32]二者合在一起，意即共享面包，进而言之就是共享所得、共同分担风险的联合体之意。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组织以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家族”为起始单位，能够“共享面包”的人，自然也不出同一家族成员的范畴。以此推知，公司的概念大约也应该起源于家庭了。的确，早期的公司组成形式，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合作模式，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入伙”，进而成为公司的完全所有人或部分所有人，其决定因素在于此人是否为该家庭的成员。[33]这个“家族制”的特点，与日后按照合约以及股权分配公司所有权的“有限公司制”相去甚远。家族内部较为稳定的血缘关系让公司的股权结构维持在恒定的形态，经营规模和商业运作的能力均受到很大限制。可以说，古代公司在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都处于比较原始的“近亲结婚”状态。公司所有权机制的普遍转变，还要等到整个欧洲的经济形态发生彻底改变以后，才得以迅疾地发生。

自地中海贸易在中世纪晚期重新活跃以来，数百年间，欧洲各国的货币流通有一个最大的局限，那就是铸币的贵金属一直数量稀少，跟不上交易规模的增长。货币的供应量受到天然的限制，这导致金融市场的规模非常狭小。直到15世纪新航路开辟之后，大量从非洲、拉丁美洲抢夺来的贵金属流入欧洲，价格革命和金融市场现代化变革的导火索才被真正触燃。[34]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萌芽之后到新航路开辟之前的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为了筹集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金属货币，欧洲各国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迫切希望寻找到居住在世界另一头的新贸易伙伴。但令人绝望的是，当时雄踞于欧罗巴之东的奥斯曼帝国控制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陆上通道，欧洲商队难以逾越其广阔的疆域。红海、黑海等海上交通枢纽，皆置于土耳其人的控制之下，由欧洲通向东方的古老贸易之路，就此变为天堑。而对于西欧诸国来说，地中海地区的贸易长期处于异族人的武力威慑之下，也变得愈发不安全。[35]于是，从15世纪开始，欧洲沿海各国只好派出船队驶向外海，寻找通往更广阔世界的贸易海路。在当时，令欧洲人心驰神往的“古老的新世界”主要有两个——中国和印度。

跨越凶险万状的大洋寻找“贸易新世界”，这完全是给颟顸的土耳其人逼迫出来的无奈之举。除此以外，激起欧洲人对古老东方好奇心的，是一本叫做《马可·波罗游记》（Travels of Marco Polo）的书。13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辗转中东等地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十余年，亲见了元朝统治下城市的繁盛景貌。返回意大利后，不幸因战祸被俘，被关押在监狱中的马可·波罗写下了这部关于中国见闻的书稿，书中尤以详细描写中国遍地黄金的段落最引西方读者入胜，并让他们产生了去往东方淘金的遐想。

但准确点说，《马可·波罗游记》并非一部严谨的地理著作，其不同内容和语言的版本相加竟有一百多种，而马可·波罗在书里的记述也杂糅了个人见闻与传说，与真实的历史颇有差距。[36]即使如此，欧洲人迫于土耳其人霸占着东方贸易之路的要冲，也只得强把传说当事实，采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办法，避开陆路，一探东方海上航线的究竟。毕竟，在马可·波罗生活的时代，受地理距离和航海术的限制，从欧洲去一

趟印度或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在听信关于富饶东方的传说之余，难有机会亲往验证。但15世纪以来更为发达的航海术，已经让欧洲人有足够的信心能够打开连接东西方贸易的海路。于是，商船队在君主们的鼓动与支持下，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航海仪器和战争武器，急不可待地启锚出航，满世界寻找令他们魂牵梦绕的富庶之地——中国和印度。麦哲伦、哥伦布、达伽马……一代代先驱型航海家率领他们的船队，不断为君主们探索、开辟着大洋上的新航线。然而，沿途一路误打误撞下来，真正令他们感到惊喜的“意外收获”，既不是中国，也不是印度，而是与中国和印度相去甚远的南美洲、北美洲以及俄罗斯。

葡萄牙、西班牙、尼德兰等国依靠跨大洋的海外贸易所积攒起来的巨额财富，让英国人建立起了海外贸易的最初概念，并且推断说，让国家财富以最快速度增长的方法，莫过于发展英国的海外贸易活动。[37]由是，海上贸易得到了英国皇室的鼎力支持，不仅出钱，还出军队提供武装保护，这使得荷兰等国的商人更愿意同英国进行海上商贸，因为和英国人的一切生意，都被置于强大的帝国海军保护之下。[38]这个帝国，历来就将纺织业视为“the staple trade, the great staple trade of the kingdom”（主要的工业，王国中的主要工业）。[39]如此，坐拥欧洲最大的呢绒出口国，英国商人在16世纪初就打造出了“伦敦—安特卫普—欧洲大陆”这条成熟的贸易线路。英国通过这条黄金航线集聚了大量财富，仅伦敦一港，就占据了全国呢绒出口贸易总额的八成以上，不啻为英国“中心的中心”。[40]出口贸易的繁荣，为立志于开拓由英国通向世界各地商业航道的有识之士，培育出了最佳的土壤。早在15世纪，英国的海外贸易扩张就已由伦敦悄然开始，但由于缺乏长期资本的保障和政府的扶持，收效一直甚微。到16世纪中叶，公司的概念被英国人接受并竞相仿效，此时，海外扩张的策略才算是初见成效。1551年和1552年，五名伦敦商人筹建了一支先遣队前往已宣布脱离葡萄牙统治的摩洛哥海港，英国与摩洛哥的贸易由此建立。没过多久，又有一支全副武装的船队从伦敦远赴几内亚，沿途做起了贸易。[41]但这些船队大多由私人筹资，以合伙方式经营，尚不具备股份公司的资本运作方式，而非洲几内亚沿岸属于葡萄牙势力范围，英国在这一地区的贸易，也迫于葡萄牙的政治力量而大受掣肘。

1553年，三位筹划开辟通往东方新航路的英国探险家理查德·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塞巴斯蒂安·卡伯特（Sebastian Cabot）以及

休·威洛比爵士（Sir Hugh Willoughby）联合其他一些商人的资金，组成了一家公司。这家在两年后获得了英国君主所颁发的特许证、致力于开辟从英国通往中国商业航路的公司，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

在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已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东西航向的航海线进行了充分开发，莫斯科公司的执掌者自忖贸易上不是伊比利亚国家的对手，因此只好重复了早期欧洲航海家绕开土耳其人的策略。他们另辟蹊径，把船开往地球北部的航线，以寻找通往中国的贸易新航道。这个决定不仅是因为当时的科学发展已经让人们了解到地球的形状是圆的，从任何一个方向一直往前走理论上说都能回到出发点，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北方是英国人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因为在那里英国同西班牙或葡萄牙没有政治纠纷的畏惧”[42]。为了不和西班牙、葡萄牙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莫斯科公司的船队一路向北，越过巴伦支海，来到了一片冰天雪地的冻土，但他们靠岸后发现，那片神秘的大陆并不是他们臆想中的中国，而是更靠北方的俄罗斯。经过几次艰难的登陆探寻之后，船员和探险者们冒着寒冷彻骨的大风雪，一路深入腹地，来到了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钱塞勒甚至还见到了沙皇伊凡四世。在征得了沙皇的同意之后，这家莫斯科公司，从此开始代理英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商品贸易。[43]

然而，经营如此庞大的生意，仅靠公司内部几个合伙人的财力显然是不堪使用的。虽然刚成立时莫斯科公司股东达到两百多名，但是对于一家经营远洋贸易的公司而言，似略嫌不足。船只的建造、维修，水手的雇佣，武器和设备的购买，以上列举之种种，哪一样不需要大笔金钱？维持商船队在英、俄之间的长期往来，必然需要一种更稳固持久的公司股权形式。为了找到更高效的集资方法来支持在俄国的贸易活动，公司的建立者决定，把原本只在公司内部发行的股票凭证额外印一些数量，分批卖给公司以外的商人。

但该如何说服别人购买公司的股票？这时，英国皇家颁发的特许证派上了用场。外地的商人们一看见公司特许证上的皇家印章，信心大增，立刻把手里的金钱投资给莫斯科公司，换得在他们眼里只会增值而不可能贬值的公司股份。每一年，根据公司盈利的状况，大小股东们会按持有股份的比例分红。这种公司结构，也被称为股份公司（joint-stock company）。莫斯科公司为了扩大融资规模，不仅向伦敦的商人出售股份，也向英国许多地方市镇的商人出售股份。为此，公司不得不

专门设置严格的制度来对公司的贸易和股份进行监管。在公司的总部，主要的股东们设立了理事会，而在英国的各个城镇，地方理事会也相继成立。[44]

即使以现代的眼光衡量，莫斯科公司在16世纪的融资方式和经营手段，也已经相当具有专业水准了。实际上，早期的海外贸易公司大多是通过募集股份资本而建立，它们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实行有限责任制，成立董事会并且按股分红。这一系列成功的制度迅速被其他公司效仿，随着商业活动的频繁，股份公司的经营模式也得以在整个英国的范围内深入人心。然而，仅如此还远远不够。在莫斯科公司这样的股份公司的经营流程里，根本不存在银行、公用股，以及公共代理人这些概念的位置。也就是说，并没有人在为整个公司进行买卖活动，相反，公司的每个成员都通过私人的代理人或仆从进行股份买卖，用各自为战的办法来使自己的资本得以自由流动。[45]

那些由公司股东们私人雇佣的股票代理人，百年之后就演变为成天泡在伦敦的咖啡馆里面巧舌如簧、向人们推销股票的证券商。不过，18世纪初期活跃在伦敦的证券商和16世纪莫斯科公司刚刚发迹时他们的同行们相比，区别还是非常显著的。早期的证券商数量稀少，且通常受雇于私人，从事的股票买卖范围，也仅限于雇用他的公司或个人，可谓不折不扣的“小商人”。[46]而到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海外贸易的持续发展，股份公司的数量在英国明显增多，人们对于经营海外贸易的股份公司信心倍增。

例如，在1671年11月新重组的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进行第一次股票认购时，股民表现出的投资热情使得实际认购的股票数量超过了原计划的11%。[47]这其中，不能不说有证券商的功劳。正是他们对投资者的游说与宣传，让人们在英国与荷兰争夺非洲霸权的战争中失利的情况下，仍然愿意把钱投资给经营非洲贸易的公司。此时的证券商，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一门颇为主流的职业，并且，他们手里操持的，不再仅限于某一个人的股票，而是任何一个潜在投资者的股票。换句话说，证券商已经成功地将自己从股份公司的“附属品”当中单独剥离出来，成了职业的股票代理人。

这些股市中的职业代理人，之所以能够在英国端稳股票的饭碗，不得不提到一场革命和一位国王，那就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和威廉国王。

英国从此有了“散户”

那么，168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688年11月，在英国托利党（Tory）和辉格党（Whig）的谋划下[48]，荷兰奥兰治王国的王子威廉率领15,000人的部队在英国南部登陆，目的是为了不让他信奉天主教的老丈人（独裁者詹姆士二世）同样信奉天主教的男性后裔继承英国王位。消息传到伦敦，原本应该抵御“荷兰入侵者”的国王军队来了个阵前倒戈，转而支持渡海而来的威廉王子，逼得当时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来不及宣布退位就狼狈逃窜到法国。1688年12月，威廉兵不血刃进入伦敦。在次年一月召开的议会全体会议上，议会宣布威廉和他的妻子玛丽共同统治英国，称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并且，议会向威廉提出并让他接受了限制国王权力、增强议会政治地位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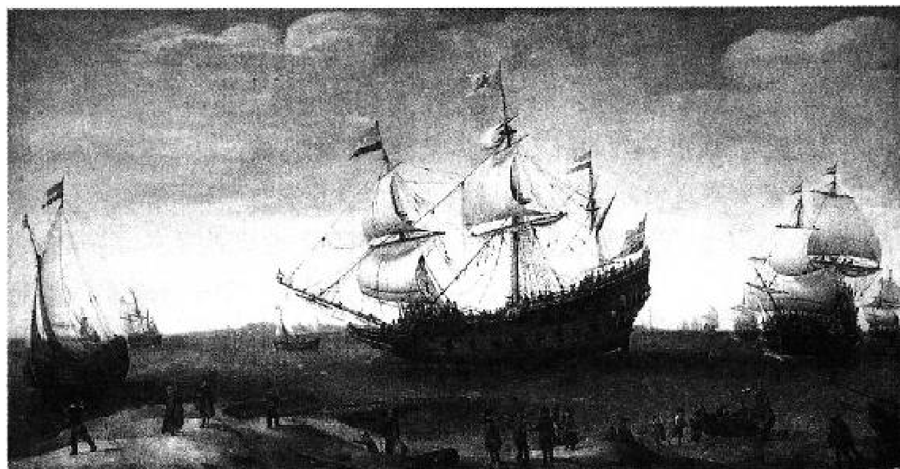
这段英国政治史上的佳话，英国人自称为“光荣革命”。所谓光荣者，意为革命的成功没有以暴力和战争为代价，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次不流血的“革命”，英国“议会至上”的民主政治体制，从此建立了起来。19世纪的政论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英国宪法》一书里论述光荣革命的话，颇能代表英国人看待这段历史的心态：“英国人‘赶走’了一位神圣的君主，于是他们试图制造一位新的君主。”因此，光荣革命之后，英国“保留着英雄时期的国王们赖以统治他们的草昧时代的那种情感，又在这种情感中加入了某种东西，凭借着这种东西，后来希腊的宪法在更文明的时代行使着统治权”[49]。

当英国人正在为自己这场“托古改制”的革命感到光荣自豪之时，他们或许尚未留意到，光荣革命除了使英国的政治体制为之一变，还为英国带来了另一种影响力同样深远的事物——股票市场。股票的概念自古有之，这在前文也曾经提到过，但把股票交易做成一个庞大的全民市场，这件事情，英国对岸的荷兰人算是集了大成。英国人对于股份公司以及股票市场的概念，就是直接建立在荷兰人的经验之上。[50]一夕间，荷兰人威廉忽然成为了英国国王，英国人学习这位邻居的步伐，自然就迈得更快了。

当英国莫斯科公司的航船还在寒冷的白海上冒着风雪艰苦航行的时候，荷兰人已经和亚洲的富庶之地做起了生意。英国航海家到达亚洲的时间比荷兰人更早，但在贸易方面，他们确实是落后于荷兰人一大截。

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人为制造的贸易壁垒一度让欧洲的胡椒等香料供应大幅下降，从而拉高了香料价格。荷兰人瞅准了这个商机。在1592年，长期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打交道的荷兰探险家林斯科顿（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取得了葡萄牙关于亚洲航线的一份绝密航海图，并将其公之于众。[51]林斯科顿描绘的亚洲贸易路线图令所有的荷兰人心驰神往，于是商人们很快组建了一支探险船队，起航前往盛产香料的亚洲，试探连通欧亚之间的“香料之路”。在航海图的辅助下，荷兰人的远征获得了成功。两年后，荷兰商人和航海家开始大规模与印度进行贸易往来，阿姆斯特丹很快就涌现出了十几家去往亚洲的商船队。商人们都想从亚洲这片前所未有的市场中，种下专属自己的一棵摇钱树。又过了八年，这些商船队的拥有者为了避免相互间的过度竞争，决定合资建立一个股份公司，把他们的船队与生意联合起来，做大做强。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就在这样的愿望下诞生了。[52]

荷兰东印度公司捕捉商机的眼力与能力，让他们迅速累积了财富。随着贸易的深入，荷兰的贸易网络也延伸到了东印度群岛以及远东地区。这个事实让英国人开始眼红，他们忌妒地自言自语说：“荷兰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装载如此丰富的船只返回。”[53]于是，英国的有识之士再一次仿效起荷兰人的经营手法，也建立一个专门与亚洲人做贸易的公司，甚至连名字都想好了，干脆照搬荷兰那个公司名称，称作“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于17世纪欧洲大航海时代，以与东印度

地区的贸易为重点。

不得不承认，英国人的学习能力是惊人的，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为英国带来了巨额利润。自1600年获得了英国皇家颁发的特许状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支撑国家海外贸易的重要力量。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托马斯·芒（Thomas Mun）曾奋笔疾书道："对外贸易是增加王国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54]这种"重商主义"的思维，在很长一段时期主导了英国官方的贸易政策，也进一步让东印度公司这类受到政府支持的贸易公司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势。到17世纪中叶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明显感到了来自英国对手的竞争力。[55]

在紧跟荷兰向亚洲探寻贸易机会的同时，聪明的英国人还发现，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所以能够有雄厚的财力支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公司融资渠道的多元，让他们从来不愁钱花。在公司刚成立的时候，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公司的主管决定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一个专门买卖公司股票的市场，这个市场慢慢演变为后来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在股票市场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买卖股票，股票成了一种不仅向商人，而且向全体国民开放的新奇商品。

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里，股票交易的门槛实际上已经很低。一个人如果想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那么他只需要在登记簿上注册自己的姓名，然后按自己希望持有的数量认购股份。在投资者支付了认购股份所需的金钱以后，他会得到一张官方收据，从此，他就正式成为了这家上市公司的股东之一。据统计，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初的1,143名股份拥有者当中，有四百余名都是自己到证券交易所注册的普通老百姓，包括医生、律师、木工、编织工、桶匠等等职业。[56]他们购买的股票量很小，并且自负盈亏，数百年后，中国人称这样的民间自发股市投资者叫"散户"。

但是，在詹姆士二世统治的年代，英国境内还没有"散户"一说。股票市场依然还是小规模的"莫斯科公司模式"。换言之，股票经纪人是由股票持有者私人雇佣，而且英国国内根本不具备一个统一的股票市场，每个股份公司都属于"股份个体户"，在小圈子里进行股票买卖。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股份公司、股市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



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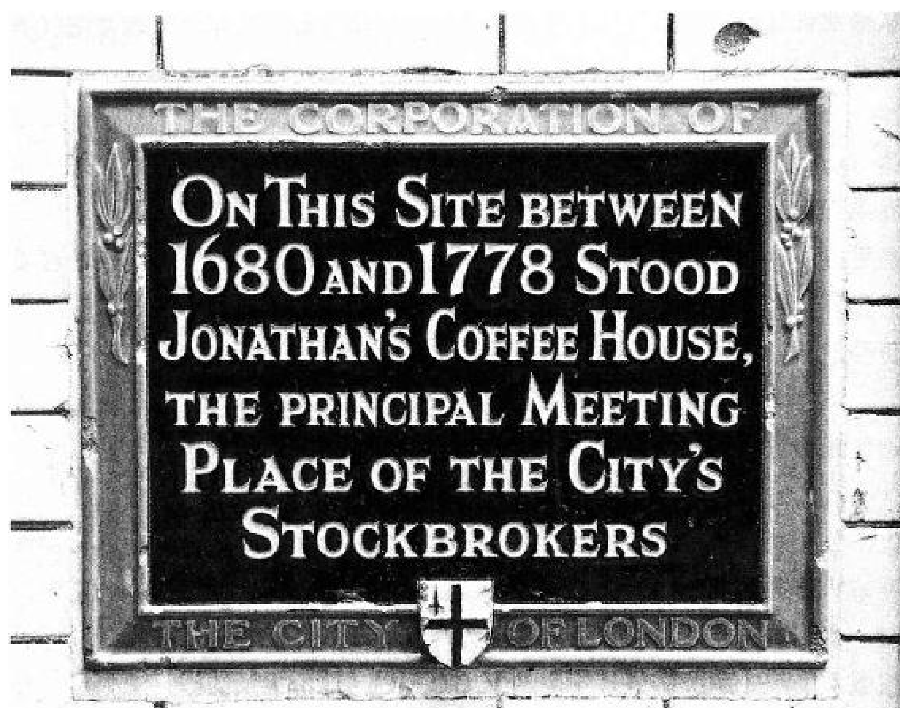
而在光荣革命之后，随着荷兰王子威廉的入主，英国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与荷兰变得越来越像。尤其是金融方面，威廉的登基使得在英国进行一场金融革命成为了可能。用经济史作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话来说：“荷兰的奥伦治王子威廉，可以说实际上成为了英格兰的新任行政长官。与此同时，荷兰的商人也开始持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股票。”[57]在一股“师法荷兰”思潮的影响下，英国开始大举引进荷兰的金融模式，从商业银行到证券交易所，统统照搬，一场改写整个英国历史的金融改革就此上演。

1697年3月，一位从法国逃到伦敦的胡格诺派教徒约翰·卡斯塔（John Castaing）敏锐地预感到英国市场将会在未来急剧扩张，于是，他开始在乔纳森咖啡馆（Jonathan's Coffee-House）进行股票交易活动，为了让交易更方便，他还为咖啡馆里的投资者们发行了一份名为“交易与其他事项的过程”（The Course of the Exchange and Other Things）的股票与商品价格清单。[58]

这便是伦敦最早期的有组织证券交易活动，也可以说是现在人们所

称的股份挂牌交易。最初，这份清单是以30厘米长、21厘米宽的报纸形式出现的，每两周出版一期，上面印刷的信息涵盖了英国国内和国外一些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债券价格、国家彩票的价格，等等。这份以贩卖证券市场信息为己任的报纸很快受到了伦敦人的欢迎，人们在咖啡馆里面传阅、谈论卡斯塔的报纸，尤其是那些持有股票的投资者，更加需要从这份报纸中了解股票价格的最新信息。久而久之，这份报纸的印行成为了一种习惯。在接下来的三十年时间里，卡斯塔的报纸一直未曾间断，投资者们也一如既往地时刻关注这份报纸。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份报纸的价格清单几经改良，成为今天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每日官定牌价。[59]除了卡斯塔的报纸之外，咖啡馆里的新闻业成了一件令伦敦人耳目一新的事物，或者说，咖啡馆已经成为经济新闻的桥头堡。当时，伦敦发行的不少报纸竟然是以咖啡馆的名字命名的。[60]

这就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伦敦，数不胜数的股份公司和遍及咖啡馆的股票掮客构成了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想象。交易所街（Exchange Alley）两旁生意红火的咖啡馆是他们翻动两片嘴唇、向投资者施展自己口才的最佳场所。这条用一分钟时间就可以走完的小街，竟然是当时全英国的财富汇聚的一条“金色大道”。



乔纳森咖啡馆的原址。提示牌上写着“1680—1778年间，乔纳森咖啡馆坐落于此。这里是证券商的主要聚集地”。

有人曾如此描述短小的交易所街：“您在乔纳森咖啡馆门前站定，面向南方，往前走几步，然后向东转弯，您就到了加拉维咖啡馆。您从那儿再走向下一个门面，就到达……别尔辛街……您把您的指南针放回盒子，投机世界已走完一圈，您又回到乔纳森咖啡馆门口了。”[61]千万别小瞧这条短狭的街道，当时的英国大约有140家股份公司，数十倍于此数量的证券商在伦敦交易所街的咖啡店里进行着忙碌的股票交易，除了买卖股票，他们也代理经营国债、国家彩票等等业务，这里的热闹非凡是伦敦任何其他地方所无法比肩的。股票交易如此流行，以至于不少原本并不从事金融业务的人，也纷纷转行加入到股票经纪人的行列。随着入行的人渐多，这个行业也变得鱼龙混杂起来，因此在交易过程中，欺诈的现象以及操纵市场的行为也就初露端倪。

为此，在169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部法案——《限制证券商以及证券从业者数量和违法行为的法案》。该法案开篇就提出，证券市场上人们违规操纵价格和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已经威胁到了英国的贸易传统、国家信誉，乃至政治稳定。[62]因此，违规行为必须明令禁止。但由于这部粗糙的法案很难具体定义什么是违法的操纵价格以及何为内幕交易，所以它执行起来相当困难。在当时的伦敦证券界，人们的交易守则和规范，主要还是依靠行业的道德自律。

一个人可以选择相信很多东西。但如果他要相信“良心”，尤其是商人自律的良心，恐怕他就应该三思而行。唯利是图乃是商业活动的根本动机，那些奔走、游说于伦敦各个角落的证券商，他们当中的某些个体，或许具有一定的“私德”，但从整个行业来看，此时显然还缺乏一种道德共识，人们之所以参与股票活动，目的基本上仅在于赚取眼前的金钱。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股票的价格开始被人为地炒高，甚至证券商还允许自己的客户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认购股票。就这样，英国股票市场最初的泡沫，开始泛起了。

居住在伦敦的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1696年的日记中记录道，即使伦敦金融市场看似繁荣，但人们手中实际拥有的货币仍然十分稀缺，这是因为人们根本没有在用钱来进行交易和买卖，“交易都在依靠信用进行，正常的铸币，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了”。当时，英国

稀少的铸币量甚至还引发了一场通货紧缩。63然而，当股票交易的风潮在这个国家不断升温的时候，那些失去了信仰、对现实充满焦虑，并且醉心于赚钱的人们根本不会留心伊夫林的担忧，也更不可能意识到，危机的脚步声在以难以被人察觉的方式逼近他们。

注释

1　根据英国早期人口学者John Graunt统计，1592年伦敦有11,503人死于瘟疫，1603年第二次瘟疫大爆发时，有30,561人死于瘟疫，1636年有10,400人死于瘟疫。见John Graunt, From Reflections on the Weekly Bills of Morality and 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 upon the Bills of Morality，转引自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1992, p. 199.

2　Daniel Defoe,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1992, p. 79.

3　Adrian Tinniswood, By Permission of Heaven: The Story of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London: Jonathan Cape, 2011, p. 101.

4　Jacinta Maria Matos，“Defoe and the Utopian City”，原载Spaces of Utopia, 4, Spring, 2007, p. 65.

5　Ralph Davis，“English Foreign Trade 1660-1770”，原载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o. 2, 1954, p. 160.

6　Roy Porter, London: A Soci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32.

7　劳拉·伯恩·帕克特：《西方购物简史》，夏金彪译，企业管理出版社，2010, p. 134.

8　Tobias Smollet, The Expedition of Humphry Clinker, Vol. 1, London, 1832, p. 141.

9　18世纪的英国诗人、剧作家约翰·盖伊（John Gay）的诗作“Trivia: or the Art of Walking the Street of London”对伦敦街头乞讨的情况有细腻描写。转引自Walking the Street of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 Edited by Clare Brant & Susan E. Why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74.

10　屈勒味林：《英国史》（下册），钱端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p. 561.

11　见Nestle官方网站“History of Coffee”词条，http://www.nestleprofessional.com/uk/en/SiteArticles/Pages/History_of_Coffee.aspx.

12　转引自王佐良：《英国散文的流变》，商务印书馆，1998, p. 55.

13　Richard Dale, The First Crash: Lessons from the South Sea Bubb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0.

14　Christopher Reed, "The Damn'd South Sea", Harvard Magazine, May-June,

1999, http://harvardmagazine.com/1999/05/damnd.html.

15 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Verso, 1991, p. 24.ZS~16 马丁·琼斯：《宴飨的故事》，陈香雪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p. 300.

16 马丁·琼斯：《宴飨的故事》，陈香雪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p. 300.

17 彼得·伯克：《欧洲早期的大众文化》，杨豫、王海良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p. 131.

18 Kirstin Olsen, Daily life in 18th-Century England,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9, p. 18.

19 John Ashton, History of Gambling in England, Ayer Publishing, 1969, p. 222.

20 见William Nicholson编写的The British Encyclopedia: or,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 Comprising an Accurate and Popular View of the Present Improved State of Human Knowledge，第4卷“Lottery”词条，Whittingham, 1809.

21 Malcolm Balen, A Very English Decei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First Great Financial Scandal, Fourth Estate, 2009, p. 16.

22 见London in 1710: From the Travels of Zacharias Conrad von Uffenbach一书，转引自Malcolm Balen, A Very English Decei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First Great Financial Scandal, Fourth Estate, 2009, p. 17.

23 Thomas Shepherd, A Discourse on Lots, Shewing that All Use of Lots, in a Sportive Way, is Utterly Unlawful, London: John Clark, 1720, p. 20.

24 C. L' Estrange Ewen, Lotteries and Sweepstakes, London: Heath Cranton, 1932, p. 66.

25 在1664年的立法之后，1710、1739和1745年英国政府陆续有关于限制赌博的法律法规出台。详见John Disney, The Laws of Gaming, London: J. Butterworth, 1806, p. 55.

26 Nuala Zahedieh, The Capital and the Colon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82.

27 Julian Hoppit, A Land of Liberty?: England 1689-172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

28 莱尔：《英国复兴领袖传》，梁曙东等译，华夏出版社，2007，p. 3.

29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苏国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p. 20.

30 关于新教信仰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关系，马克斯·韦伯的观察更多是基于个人的有限经验，而并没有进行经济学的计量研究。哈佛大学的经济史研究者Davide Cantoni用计量方法统计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天主教地区、新教的加尔文宗地区以及路德宗地区，通过比较不同宗教信仰区域内的经济增长，他发现新教地区并未表现出更高的增长水平。详见Davide Cantoni,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Testing the Weber Hypothesis in the German Lands, Job Market Paper, Oct, 2009.

31 B. Mark Smith, A History of the Global Stock Market: from Ancient Rome to Silicon Valle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 10.

32 见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的“company”词条．

33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顾良译，三联书店，2002, p. 471.

34 Larry Neal, The Ris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in the Age of Rea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

35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p. 164.

36 Mike Edwards，“Marco Polo”，见《国家地理》杂志网站：http://ngm.nationalgeographic.com/ngm/0105/feature1/index.html.

37 Thomas Mun,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 Adegi Graphics LLC, 2005, p. 5.

38 迈克尔·布雷迪克：《国家形成与社会变革，1400—1750年》，原载《英国史新探》，钱乘旦、高岱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p. 59.

39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p. 30.

40 Ralph Davis, English Overseas Trade, 1500-1700, Macmillan, 1973, pp. 52-53.

41 Andrew Neil Porter, Atlas of British Overseas Expansion, Routledge, 1994, p. 18.

42 R. Hakluyt, The Principle Navigation,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8vol., London, 1932, pp. 212-216.

43 Russia Company, Guildhall Library Manuscripts Section, http://www.history.ac.uk/gh/russia.htm.

44 W. E. Lingelbach, The Merchant Adventures of English, London, 1927, p. 20.

45 J. Wheeler & G. Burton Hotchkiss, A Treatise of Commerce,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2004, p. 102.

46 在14世纪末期的英语中，证券代理（broker）一词原意是指“小商人”。见“在线语源学词典”（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的“broker”词条。

47 K. G. Davies, Joint-Stock Investment in the Later Seventeenth Century，原载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 No. 3, 1953, p. 288.

48 辉格，原意是“马贼”，英国内战时期指宗教狂热的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托利，是爱尔兰语“歹徒”之意。二者原指议会中就“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是否应该成为英国国王”这一问题形成的两个政治派别。1688年7月30日， 两个派别的七位政要起草了邀请荷兰执政威廉成为英国国王的信件。光荣革命后，成为议会中的两个政党。详见钱乘旦、许洁明著《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p. 183.

49　沃尔特·白芝浩：《英国宪法》，夏彦才译，商务印书馆，2010，pp. 84-87.

50　Niall Ferguson,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 Basic Books, 2004, p. 19.

51　Donald F. Lach, Edwin J. Van Kley, Trade, Missions, Literature, Vol. 3,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p. 435-436.

52　与英国的莫斯科公司一样，荷兰东印度公司也获得了政府颁发的特许证。凭借这一特许证带来的信誉，公司向股东承诺10年期间的5%年回报率。即使公司的业绩不错，但公司的主管也发现向股东支付5%的年息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这造成了公司后来的高额负债。见Femme S. Gaastra, War,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转引自H. V. Bowen, Margarette Lincoln以及Nigel Rigby主编的The world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Boydell & Brewer, 2002, p. 50.

53　Jacob van Neck, Amsterdam Admiraal en Regent, Amsterdam, 1950, p. 72.

54　A. E. 门罗：《早期经济思想》，蔡受百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p. 170.

55　Femme S. Gaastra, War,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转引自The World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Boydell & Brewer, 2002, p. 55.

56　见“阿姆斯特丹档案馆”电子资料：An orphan's share, http://stadsarchief.amsterdam.nl/english/amsterdam_treasures/money/voc_aandeel_van_een_wees/index.en.html.

57　转引自Erik Stern & Mike Hutchinson, The Value Mindset: Returning to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Capitalist Enterprise, John Wiley and Sons, 2004, p. 334.

58　John McCusker, Essay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World, Routledge, 1997, p. 168.

59　John McCusker, Money and Exchange in Europe and America, 1600-1775: A Handbook, UNC Press Books, 1992, p. 30.

60　例如，《外汇行情报》隶属于伦敦的乔纳森咖啡馆，而劳埃德咖啡馆直接发行了一份名叫《劳埃德新闻》的报纸。详见Mary Poovey, Genres of the Credit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 31.

61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二卷，顾良译，三联书店，2002，p. 93.

62　Fiona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Law, Vol. 2, Hart Publishing, 2003, p. 11.

63　Natasha Glaisyer, The Culture of Commerce in England, 1660-1720, Boydell & Brewer, 2006, p. 7.

第二章　杀人犯、赌徒与经济学家

——约翰·劳其人其事

一桩非典型的英国式谋杀案

在光荣革命结束的六年后，约翰·卡斯塔的证券报问世的三年前，即1694年，伦敦的街头发生了一桩谋杀案。对于治安状况本身就十分糟糕的伦敦来说，这桩微不足道的案件实在没有必要写进官方的档案记录。不过，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料到，这桩刑事案居然间接影响到了英国及其近邻法国，在日后造成了这两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泡沫。这桩谋杀案的嫌疑人名叫约翰·劳（John　Law），是一位居住在伦敦的苏格兰人。

1694年4月的一个清晨，刚刚起床梳洗完毕的约翰·劳命令他的仆人为他穿戴上了盔甲和宝剑，乘坐马车来到了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的居所门口，此时，威尔逊先生已经配备好武器，在此等候多时了。两个人见面之后，经过几句寒暄，立即一道动身，向伦敦海布鲁姆斯伯里广场的方向走去。那是他们二人早已定好的约会地点。当然，他们此行的目的并非去公园散步或者遛鸟，而是为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



约翰·劳（John Law，1671—1729），极富争议的苏格兰经济学家和银行家。鼓吹“货币万能”，法国密西西比金融泡沫的始作俑者。

一路上，这两位情敌还不忘斗嘴。约翰·劳首先打开话匣：“威尔逊先生，但愿你最近有好好进行你的手部练习。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对一会儿我们俩的遭遇战结果就会毫不怀疑了。”

“我可没在剑术学校待过，私底下，也没玩过击剑。”威尔逊回答，“不过，对于运剑的方法，我并没有忘记。”他不甘示弱，接着说，“我参加过多次决斗，并且，还曾经赌咒发誓说，自己以后再也不参加任何决斗了。不过，这一次我是被逼无奈，我得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位粗鲁无礼的花花公子。”威尔逊所说的花花公子，是指他即将迎战的敌人约翰·劳。

以上情节出自19世纪出版的小说《约翰·劳：设计者》，在之后的决

斗中，获胜者是威尔逊。但遗憾的是，可怜的威尔逊恐怕只能继续活在小说里了，因为在真实的历史里，决斗确实发生在他和约翰·劳之间，只是最后的胜利，属于约翰·劳而不是他。和通俗小说里惯常的情节一样，二人决斗的由头是因为女人。约翰·劳先生和威尔逊先生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人，这桩三角恋情让两人一时间难以取舍，最后只好选择通过血腥决斗的方法来打开爱情这个难解之结。[1]

决斗的结果对于约翰·劳来说是幸运的，他用手中的利剑刺穿了对手威尔逊的胸膛，自己却毫发无伤。但“胜利”的代价也意味着侥幸活下来的约翰·劳不得不开始长达半生的流亡生涯。决斗和杀人，两件事情都触犯了当时的英国刑律。并且，民间还有传言说，这位被刺死的威尔逊先生，其实来头颇大。他不仅过着富裕奢靡的生活，和伦敦的上流社会来往密切，并且，他还有一位叫伊丽莎白·维利尔斯（Elizabeth Villiers）的情人。这位名叫维利尔斯的女士，也是当时的英国国王的情妇。[2]因此，在国王的亲自过问下，约翰·劳的案子也就追查得很紧。约翰·劳对此看得很清楚，自己一旦出庭受审必将被依法严办，等待他的，只能是绞刑架。所以，赶紧逃离伦敦这个是非之地吧，一刻也不要停留。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筹划如何逃跑，当局已经把他拘留起来。不过，约翰·劳还是凭借过人的胆色和智慧，成功越狱。并且在官方下达通缉令之前，就通过私人关系，秘密让人将那通缉令上对他的描述，作了南辕北辙的修改，将原本白皙、挺拔的他描述成了一个皮肤黝黑、高瘦而驼背的逃犯。[3]

就这样，杀人犯约翰·劳逃过了官方的追捕，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但英格兰对于他来说，无论如何也待不下去了。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跳上了一艘驶往荷兰的航船，并毫发无损到了目的地。来到荷兰的地界，他长舒一口气，英国的刑律已经无法制裁他了。在约翰·劳的面前，一种全新的人生开始展开。按照乔治·奥威尔的定义，典型的英国式杀人者都出身于社会的中产阶级，犯罪动机大多与女人和性有关。[4]约翰·劳的作案动机当属此列。但是，约翰·劳并不像奥威尔所言的那样，“所选择的手段应该是毒药”，他的杀人手段是光天化日下的赤裸裸决斗，从手法上来看还不够“典型”，因此只够称得上一桩“非典型的英国式谋杀”。但这一谋杀案所引发的，不仅是约翰·劳人生历程的彻底改变，还包括在不久的将来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发生的一场金融海啸。

当然，约翰·劳的主要身份并不是杀人犯，他是一位银行家，也是一

位职业赌徒。约翰·劳1671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市的一个金匠家庭，他的父亲威廉·劳通过经营金匠的生意和从事银行业，挣得了丰厚的财富。因此，约翰·劳的家族在苏格兰可以算得上有头有脸的殷实之家，在劳瑞斯顿（Lauriston）以及兰德尔斯顿（Randleston）等地拥有多处地产。作为家族的男嗣，约翰·劳自幼便跟随父亲学习数学和财务，和他的两位兄弟一样，刚满14岁，他就进入了父亲经营的银行账房，辅助进行记账。约翰·劳在账房里工作直到成年，当他成功地"毕业"于这所自家开的"大学"时，数学、会计以及银行业的基本规则，他已经烂熟于心了。[5]

17世纪末叶，英国的金匠主要经营的业务已经不再是"手艺人"式的传统铸币，他们在货币的流通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像银行。金匠们开始向顾客开具可以用于支付的信用凭条。[6]约翰·劳的父亲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地方的银行家，子承父业似乎也是这种家庭的固有传统。不过，约翰·劳并不甘心做一个籍籍无名的银行从业者，他的内心还有更多的欲望。在孩童的时候，约翰·劳的父亲就发现，自己的儿子在数学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与天赋，于是决定让他接自己的班，送他到银行的账房学习金融。约翰·劳在银行里，并不仅仅学习记账这门"手艺"，而是广泛地接触了当时的金融、会计、经济知识，以及数学和几何学。[7]经过在银行里数年"寒窗"之苦以后，约翰·劳终于学成离开银行的账房。当时，除了在专业上更为精进，他的外形也越发俊朗，智慧亦十分出众，故深得当地女士的钦慕。约翰·劳本人当然也善解风情，经常和女人们打成一片，因此，人们送他一个外号"花花公子劳"。

但这位花花公子在爱丁堡没能过上多久逍遥快活的日子。光荣革命那年，他的父亲病逝了。约翰·劳继承了父亲的一大笔遗产，不过，由于亲人的故去，此时的他也对故乡失去了往日的眷恋，逝者长已矣，存者则应往前看。这位苏格兰人决定南下前往伦敦开眼界。对于不到20岁的年轻人而言，来到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施展自己的才能，无疑是一件让人一想到就会激动的事。

与任何一位家境殷实的公子哥一样，约翰·劳也有他堕落的一面。来到繁华的首都伦敦后不久，他很快就被当时伦敦遍街都是的咖啡馆和酒吧吸引住了，而且，在那里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件事物——赌博。约翰·劳将大把的时间和金钱花在了赌博上。然而，像约翰·劳这样的赌徒，相比于其他平庸的赌徒还是有显著的区别，那就是智慧出众的赌徒在享受赌钱带来的快感之余，还会潜心研究在赌局中获胜的方法。约翰·劳的

方法大致上说就是凭借自己的数学知识和统计学训练，对赌局的概率进行计算分析，然后依照获胜概率下注。至于具体如何操作，后世并没有详尽的文字记载，不过，从有限可寻得的记录来看，约翰·劳的确通过赌博活动赢得了大笔的金钱，这让伦敦的职业赌徒们忌妒不已。

这位叱咤伦敦赌坛的后生小辈，很快吸引了伦敦年轻女性们钦慕的目光。这些“风流娘们儿”纷纷向约翰·劳献殷勤，他本人自然是来者不拒，流连忘返于不同女人的石榴裙间。[8]俗话说红颜祸水，不久，约翰·劳的风流倜傥果然闯下祸事。伦敦的街头有传言说威尔逊先生的情人维利尔斯小姐与风度翩翩的约翰·劳关系暧昧，流言传来传去，终于传进了威尔逊的耳朵。眼里揉不下一粒沙的他顿生醋意，醋意又迅速转化为强烈的仇意。于是，怒不可遏的威尔逊决定拿起武器，和自己的情敌斗个你死我活。他只是没料到，约翰·劳不仅赌术高明，而且剑术了得，自己却技不如人，成了约翰·劳的剑下亡魂。

在二十三岁的年纪上，犯下命案的约翰·劳被迫成了一名逃亡者。在辗转逃到欧洲大陆以后，惊魂甫定的他又从事起自己的老行当——赌博，区别在于，这时他的赌博技巧比在伦敦时更高明了。欧洲流亡的那些日子里，他一共通过赌博聚集了价值十万英镑的财富。[9]正因为拥有大笔金钱，他才能依旧延续着昔日在伦敦那样的优裕生活，他在阿姆斯特丹、巴黎、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居留过，和当地的上流社会过从甚密。约翰·劳与不少欧洲政商界高层人士建立了私交，尤其是法国的奥尔良公爵。奥尔良公爵是一位爱才之人，非常赏识头脑敏捷、思维活跃的约翰·劳。[10]与奥尔良公爵建立起密切的私交，这为他将来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金融界的叱咤风云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命运像是在和这个赌徒开玩笑。约翰·劳并没有认栽，而是决定奉陪下去。

作为经济学家的约翰·劳

前文说到约翰·劳在数学方面的天赋自幼年时就已展现，当他进入父亲的银行账房学习的时候，这种天赋更是显露无疑。不过，促使约翰·劳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经济学思维模式的契机，还是他青年时期那趟刻骨铭心的伦敦之旅。他在流连于伦敦的咖啡馆和酒吧的时候，除了做好“赌博”这份“本职工作”，也是新闻报纸的一名忠实读者。在当时的伦敦报纸

上，已有不少类似于今天专栏作家的人士撰文纵论英国的经济形势，而讨论英国经济改革的出版物亦是络绎不绝地推出。其中，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英格兰的经济困境应该归结为信贷扩张造成的货币短缺。[11]

伦敦人对于股票、国家彩票、赌博的痴迷有目共睹，约翰·劳看在眼里，进行了一番思索。他吃惊于国家发行的彩票那惊人的敛财能力。到底是什么让人们把致富的希望寄托于侥幸和运气？约翰·劳看到了“不劳而获”是促使人们买彩票的直接诱因。作为一名职业赌徒，他对人性的贪婪有着充分的洞察。因此，约翰·劳对于国家彩票有过这样一番评价：“公共彩票比起私人彩票来说，没有那么坏，但是对于国家来说，仍然是有伤害的。彩票会伤害到人民。彩票夺取人们的劳动所得，让人对自己的运气充满抱怨。并且，它会助长人们依靠赌博和运气不劳而获的心理。仆人甚至会偷走自己主人的钱去进行这种无益的抽奖游戏。”[12]

除了彩票之事，英国的各种政治、经济问题也时常萦绕在约翰·劳的心头，例如相对滞后的金融体系、金属铸币的短缺，以及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政治纷争，这些都是他在渡海来到欧洲大陆以前深入思考过的话题。[13]他认为，英格兰的邻居荷兰的金融系统无疑比英伦三岛更加先进，也是当时世界的一流典范，所以，无论英格兰还是苏格兰都应该以荷兰为目标，进行一次彻底的金融改革。只是，约翰·劳万没有料到，自己居然会为了躲避一桩人命官司，不得已逃亡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他深深为这座城市精巧的金融系统所折服。荷兰这个小国，无论是人口、面积、自然资源均比不上英格兰或苏格兰，但为什么荷兰的经济发达程度却超过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甚至长期控制着这个世界的海上霸权呢？当约翰·劳认真地研究了阿姆斯特丹银行以及证券交易所的运作方式以后，他心中的答案开始逐渐清晰起来。

在流亡荷兰的日子里，约翰·劳作了大量的阅读，内容大部分与政治和经济理论相关。托阿姆斯特丹的福，这座城市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印刷和海外出版中心，思想气氛活跃，信息交流频繁。约翰·劳得以比在英国的时候能更迅速地阅读到最先进的经济思想和理论。在那里，他花了几年时间，自己发展出一套详尽的货币理论。

1703年，约翰·劳料想自己这桩案子的风头已过，就带着自己智慧所凝结的这套货币理论和随身细软，乘船悄然回到了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他希望把自己的这套理论推销出去，卖给苏格兰的政府高层人士，从而推动苏格兰陈旧僵化的经济齿轮向前运转，引发一场他希望看到的金融

改革。约翰·劳能够在这个时候回到苏格兰，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苏格兰和英格兰1707年的《合并法案》（Acts of Union）在议会获得通过之前，苏格兰和英国格兰仍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地区，虽然二者拥戴一个共同的国王，但是苏格兰在宗教、行政和司法方面完全不会受英格兰干涉。[14]因此，回到苏格兰的约翰·劳并不会因为自己曾在伦敦犯罪而被捕。再者，作为土生土长的苏格兰人，约翰·劳的内心也希望把自己的这套理论贡献给故乡，此乃情理之中的事。

苏格兰成为约翰·劳选定的“经济试验田”，还因为当时的苏格兰在金融体系上，五百年以来完全独立于英格兰，而且其金融系统的先进程度一点也不输给它的这位邻居，某些方面或许还更为先进。[15]1136年，苏格兰国王大卫一世（David I）命令抓获的诺曼底铸币匠为自己铸造钱币，自此，苏格兰取得了不受外界干涉的独立铸币权力，整个贸易体系也在货币自铸权的基础上，渐渐发展起来。但一直以来，苏格兰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其实并不限于本地铸造的钱币。据统计，当苏格兰银行在1707年准备重铸货币时，人们发现当地所使用的货币实际上杂糅了苏格兰本地货币、英格兰货币以及来自法国等地的异国货币。即使在苏格兰失去了政治独立性与英格兰成立联盟以后，市场上依然流通着占货币总量三成的外国货币。[16]苏格兰在历史上特殊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处境，使得苏格兰人对于货币本质的理解和同时代其他国家的人有所不同，在他们的观念中，货币从来都不具有稳定性，因为各种货币混用的缘故，人们在商业活动中需要频繁使用不同的货币进行交易，货币对他们而言更像是一种“可议价资产”。这种情况，客观上令一部分善于思考的苏格兰人开始深入探索货币和商业的本质，久而久之，苏格兰这片土地就孕育出了像约翰·劳这样优秀的经济学者，更在18世纪中晚期产生了亚当·斯密这位一代经济学宗师。

让我们回到约翰·劳的经济理论。历经数个世纪的变迁，今天的人们应该怎么理解他这套颇有影响的经济思想呢？简言之，约翰·劳希望苏格兰仿效荷兰，建立国家中央银行，以土地以及金银等贵金属作为信用担保，发放纸币。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一举解决苏格兰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并且能让无所事事的人得到工作。[17]另外，他建议银行向以政府信誉为担保的海外贸易公司发放贷款，这些公司在充裕资金的支持下，则会直接为苏格兰抢夺回真金白银，这又为纸币的再一次发放提供了必要的储备金。约翰·劳认为，只有充足的货币，才有可能为一国带来充分的

就业和发展贸易的机会，从而拉动经济发展。总之，约翰·劳的货币理论已经超越了当时流行的“铸币”观念，他把货币视为本身无价值，其价值由政府赋予的一种商品交换的媒介，这个观点超越了当时的许多人。[18]

当然，约翰·劳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位提出“纸币”观念的人。在很早以前的意大利和荷兰，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纸币。在英语世界，最早提出建立一套“国家纸币系统”的货币论者也并非约翰·劳，而是威廉·波特（Wlilliam Potter）。他在著于1650年的《财富之关键》（The Key of Wealth）一书中就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越丰富的货币对于一个社会越有益”。那么，如何让货币的供给源源不断呢？波特设想出了一套建立在土地基础之上的纸币系统。简言之，就是“土地银行”的雏形。以土地作为银行纸币的储备金，发放纸币，这必然会提高土地价格，而储备金的“升值”无疑又会为进一步发行纸币提供信用。在波特看来，这是个能够良性循环、不断增值的纸币系统。[19]威廉·波特的纸币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约翰·劳。

然而，约翰·劳绝非闭门造车的书呆子型经济学家。他的货币理论除了受益于前人的著述，更是直接来自于他对荷兰政府、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阿姆斯特丹银行三者之间关系的观察和分析。而他对于银行如何发放和管理货币的概念，也是直接来自于他对意大利威尼斯的圣乔治银行（Bank of San Giorgio）近距离的观察。[20]银行的放贷业务为荷兰、意大利经济带来的繁荣，给渴望新知的约翰·劳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还敏锐地观察到，无论是荷兰还是意大利政府，它们实际上都以各种方法占有了数量不菲的贵金属资源，这使得它们有能力在短期铸造大量的货币，从而为自己弥补债务亏空，改善糟糕的财政状况。当时的苏格兰，恰恰亟需能够拉动当地商业发展的大量货币。早在1660年，苏格兰人已经学会使用票据进行商品交换，不过，这并不是商业繁荣的征兆，而是由于苏格兰的金属货币供应量不足而被迫造成的选择。苏格兰国内所能生产的产品从数量到品种都很有限，大量的商品只能依靠进口，这造成了苏格兰的金属货币向外国流失。在货币短缺的恐慌下，当地的商人们为了囤积货币和贵金属，不惜大量将产品倾销到国外，将换回的金银掌控在自己手里，并且，不再用这些金银购买任何东西。这个恶性循环让市面上流通的金属货币越来越少。到1681年，苏格兰已经非常明显地具有了一场“贸易收支危机”的征兆，这个国家此时已经“处于严重的货币供应不充分，以及信贷不足所造成的经济抑制”[21]当中。苏格兰

想要摆脱经济的困境，此时恐怕只能借助一些经济之外的非常方法。

约翰·劳看到了缺少充足的货币给苏格兰经济带来的危害，没有充足的货币，也就不可能有足够频繁的商业活动以支撑国家经济的发展。在荷兰流亡期间，他见识到了让欧洲其他国家忌妒的荷兰繁荣的真相，那儿有完整的金融系统、活跃的商业活动，以及依靠贸易和直接从殖民地掠夺而来的大量金银。约翰·劳得出结论说，荷兰的繁荣是因为货币量的充足，因此他建议苏格兰当局立即仿效荷兰，建立信用、发行纸币，通过扩大货币供给的方法，解决就业问题，进而拉动苏格兰的经济发展。[22]

这套经济思想不禁让人联想到20世纪初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时期，英国人凯恩斯所提出的解救之法。那就是政府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就业，进而对国家经济进行干预。由此看来，如果要认祖归宗，那么凯恩斯绝对算得上约翰·劳的高足，而且是所有学生当中成绩最好的一个。虽然凯恩斯本人很少在著作中提到约翰·劳的货币理论[23]，但是二人之间或明或暗的传承关系，还是让人不得不把约翰·劳奉为国家干涉理论的一代祖师。

约翰·劳认为，在一个经济体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信贷和纸币，二者通过现代银行金融系统进行有效的组合与运转，而传统的铸币，根本不应该继续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任何重要角色。[24]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曾给予约翰·劳很高的评价："约翰·劳是第一位把银行家的角色加于企业家身上的人。"[25]熊彼特认为约翰·劳将银行系统和信用货币的作用纳入到国家经济增长的考虑范畴，具有超越世人的先见之明。但是，约翰·劳以这套具有"先见之明"的理论为依据，给18世纪的苏格兰经济把脉，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他犯了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

约翰·劳发现荷兰的繁荣多亏了充足的货币，这是不假，但荷兰货币充足的真实原因是因为早期资本主义在荷兰等地萌芽，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当地工业制成品产量的迅速提高。通过商品出口贸易，荷兰从购买它产品的国家那里获得了大量的金属货币。这是荷兰货币充足的直接原因，而所谓的"货币充足"现象只不过是荷兰繁荣的出口型经济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罢了。但是约翰·劳却未经深思熟虑，置果为因地从表面现象推断说，是大量发行的货币直接导致了荷兰的经济繁荣，并试图把他心目中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硬往苏格兰身上套。

在发行纸币的计划上，约翰·劳走得太远。在实体经济未足够成熟时

使用强制性的纸币，最终带来的只会是通货膨胀和财富掠夺。按照经济学家许尔斯曼的说法，这样的货币系统显然“从道德角度看是不洁的”[26]。约翰·劳原本是一个思维缜密的人，出现这种误判，我们只能解读为是强烈的苏格兰爱国情结让他一时蒙蔽，完全忘记了当时的苏格兰国情“不过是一个充满了牧羊人和渔民，多山地且贫穷的国家”。因此，他的货币政策“顶多能给这个国家带来货币的单纯增加，但却不能为这里带来工业、商业或者农业……因为这一切都需要人们的刻苦劳动才能获得”。[27]

但约翰·劳本人显然并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不愿去考虑他货币理论的这个缺陷。在回到苏格兰的两年后，满怀雄心壮志的他向苏格兰议会提交了一份金融改革的计划书，该计划书被称为“向国家发放货币的提议”（Money and Trade Consider'd with a Proposal for Supplying the Nation with Money）。在提议中，他把自己的理论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并且向议会拍胸脯保证说，如果采纳这份意见，那么苏格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在短期内翻一倍。[28]因此，他希望苏格兰议会尽快采纳他的建议。当约翰·劳在7月13日得知议会决定将这份提议排上讨论日程时，他的内心别提有多激动了。无论古今，任何一位经济学者预感到自己的经济理论即将成为政府的经济政策时，大概都会产生类似的激动。

然而，约翰·劳的兴奋和期待没持续多久就变成了失望。苏格兰议会最后并未通过他的这份提案。更可悲的是，他这份淹没于众的提案甚至算不上在议会里得到过充分讨论。在1705年召开的苏格兰议会里，议员们的注意力完全被另一项更为醒目的议题所吸引。那项议题的内容是关于苏格兰是否需要接受英格兰的提议，成为新成立的英联邦的一员。面对苏格兰境内正在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议员们认为并入英联邦会更有助于苏格兰走出经济困境。

苏格兰人并非没有进行过努力，试图复苏疲软的国家经济。自17世纪末以来，关于苏格兰前途命运的激烈讨论一刻未停地进行着，不少苏格兰知识界人士都认为，发展商业、推动自由贸易乃是苏格兰经济的出路。[29]于是，苏格兰人试图仿效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苏格兰自己的国有海外贸易公司。1695年，在一位名叫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的银行家建议下，苏格兰成立了由坚船利炮和彪悍的水手所组成的达瑞安公司（Darien Company），计划让该公司派出舰船，在巴拿马建立殖民地和航路中转站，从而促进苏格兰在远东的贸易。[30]1698

年该公司率领五艘舰船进行了一次前往中美洲的远航，并且成功占领了巴拿马海峡。这个获得苏格兰政府支持的公司想当然地以为，从他们来到美洲的那天起，除了传统的欧洲列强之外，苏格兰也能从全球贸易链中分得一杯羹。此外，达瑞安公司主要持股的人有许多来自英格兰地区，但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哪里容得下卧榻之侧由苏格兰人酣睡？在大股东们的一再要求下，英格兰议会通过法令，禁止英格兰资本流入苏格兰的达瑞安公司。[31]此举迅速枯竭了达瑞安公司的资金来源。但苏格兰人对自己的这家股份公司寄予的希望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在英格兰的资本撤走之后，不惜以举国之力，充实这家公司的金库。据统计，大约占整个苏格兰总资本半数的投资进入了达瑞安公司，每个苏格兰人平均投资了5英镑给达瑞安公司。[32]

但天真的苏格兰人哪里知道，殖民者岂容易做。他们的财富之梦未醒，各种不幸就已经接踵而至。达瑞安公司的船员刚刚登陆不久，流行病随即爆发，造成大量船员死亡，而在达瑞安公司立足未稳之际，西班牙的舰队也逼近了巴拿马。西班牙人认为苏格兰占领巴拿马海峡之举侵犯了他们在美洲的利益，因此率重兵气势汹汹前来进攻。面对刚受到疾病侵袭的苏格兰人，强大的西班牙海军没费多少工夫就夺取了苏格兰人在美洲所占领的这唯一一小块地盘。达瑞安公司损兵折将，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一艘舰船灰头土脸地逃回了苏格兰。据统计，这次失败至少直接让“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苏格兰损失了50万英镑，苏格兰经济元气大伤。[33]自此之后，苏格兰人对于通过复制“荷兰模式”把自己从经济泥淖里解救出来，再也提不起兴趣。

除了在经济上接连遭受损失之外，英格兰也在以政治力逼迫苏格兰并入新设立的政治联盟。[34]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历史上常有龃龉，为了制伏“不服管束”的苏格兰人，英格兰议会在1705年决议通过了《外国人法案》（Alien Act），该法案规定，英国女王指派委员和苏格兰商讨联盟事宜，如果苏格兰不同意派代表进行联盟谈判，那么英格兰将会对其进行一系列的贸易惩罚，包括禁止进口苏格兰产的牛和其他牲口、煤和亚麻布等产品。苏格兰原本就千疮百孔的经济，根本经不起这种折腾。所以，尽管《外国人法案》在苏格兰民间引起了非常强烈的不满，但是迫于经济利益的需要，苏格兰人最后不得不接受加入英联邦的建议。[35]两年之后，英格兰与苏格兰实行合并，两个地区的国旗合并为“米字旗”，称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议会让苏格兰合并入联合王国的决

定，让约翰·劳顿时从希望的山峰直接跌落谷底。他实在太失望了，不仅是因为苏格兰议会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且在结为联盟以后，英国的司法也将同时适用于苏格兰。这就意味着，曾经在英格兰受到谋杀指控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家乡苏格兰，否则，等待他的将是一段漫长的铁窗岁月。

万般无奈之下，约翰·劳在1707年年底乘船来到了法国。他明白，这一走，此生怕是再难踏上英伦三岛了。

一家名叫“刀锋”的公司

约翰·劳悻悻然再次乘船从英伦逃亡到了欧洲大陆，失望与懊恼包裹着他。从某种意义上说，约翰·劳恐怕是18世纪苏格兰最报国无门的一个人了。不过，他这次为期不长的苏格兰之行也并非毫无用处，最起码，他发表的经济学见解受到了不少人的注意。在苏格兰逗留期间，他和社会显要人士来往甚密。例如，在苏格兰地位颇高的第一任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以及他的家族成员就是约翰·劳的密友，并且还直接资助他将自己的货币理论撰写为提案，交送至苏格兰议会。[36]约翰·劳有一项本领，那就是无论他生活多么不顺利，面临何种困境，甚至是遭受通缉的时候，他依然能够与各国的贵族阶层和上流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在当时，任何政治纲领和愿望的达成，无一不需要将这帮把持着政治的贵族阶层作为渠道。这种独树一帜的社交能力，让受挫于苏格兰的约翰·劳并没有彻底绝望。他确信自己的理念迟早会在欧洲得到贵族统治者的赏识，成为改造国家经济的实践。

正当约翰·劳蛰伏于欧洲，等待下一次机会的时候，在海峡对岸的伦敦，这座当年让他被迫逃离出境的城市，人们依旧延续着那些令人憎恶的习性：贪婪、投机、对财富有着一种近乎畸形的渴望。在那里，股票市场在历史上第一次经营得那么繁荣，股份公司的数量也随着人们的热情而膨胀，经营的业务也是五花八门。一切就那么理所当然地在这座城市发生了。在后起的一系列股份公司当中，有一家公司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这家公司拥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叫做“刀锋公司”（Sword Blade Company）。

这家名称听起来有些奇怪的公司，实际上和任何一家普通的公司一样，有自己专属经营的正当业务。1691年9月，史蒂芬·埃文斯

（Stephen Evans）为首的一些商业人士发起请愿，称将要在英国建立一个专门从事生产“镂空短剑”的公司。他们的理由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技艺之前在英国还从未出现过，因此埃文斯等人认为这是一桩没有竞争对手的好生意，市场潜力巨大。他们很快决定自行从国外雇佣一批专门从事制造这种短柄剑的工人，并且在坎伯兰（Cumberland）以及周遭的地区修建了许多制造刀剑的厂房。为了开发这一门新兴的产业，埃文斯在请愿中还提出要对这项技术申请专利，并且由政府来保护和支持他的刀剑生意。[37]

很快，政府为这家公司开具了一份名为“政府与公司在英格兰北部共同制造镂空短剑”（Governor and Company for making Hollow Sword Blades in the North of England）的特许状，成立了由十二人组成的协助委员会和五名法定代表人，公司具有了发行股票的权力。作为交换，政府从刀锋公司处得到了一笔贷款。除了一般公司通常都会具有的一些特权条件以外，英格兰政府还特许这家公司能够在他们制造的武器产品上，特别印制带有英格兰标记的商标符号，以区别于国外生产的同类产品。[38]

由于有政府的支持和对外宣传的独特制造技艺，刀锋公司开始在伦敦地区活跃起来。埃文斯凭借这家与政府关系亲密的公司，成为威廉三世国王身边的红人。在1692年到1704年期间，人们在伦敦街头经常见到这家公司的广告。为了保证自己的行业地位并打击对手，刀锋公司还派人对任何试图从国外进口镂空刀剑产品的商人进行侦查，甚至不惜花钱购买商业情报，打击行业竞争对手。

然而，即使如此，公司的经营状况仍然不如预期。1703年，公司被指控从德国走私刀锋的半成品，然后进行转手加工，这使得刀锋公司被卷进了法律官司的旋涡，最后只得变卖资产了事。[39]虽然公司很快恢复了正常运作，但是最开始的刀剑生产业务在丑闻曝光以后已经变得难以盈利，埃文斯本人也在威廉三世去世以后变得一蹶不振。刀锋公司毫无疑问逐渐成为一家“空壳”公司。[40]

但是，这家日益“空壳”化的公司并没有因为经营不善而立刻关门大吉，反而继续存活了很多年，活得还颇为滋润。说起来并不奇怪，刀锋公司经营的生意，早就不再是所谓的“镂空刀剑”，谁都知道刀具生产这个行业竞争激烈，而且利润非常薄。领导层在公司成立后没多久就开始涉足房地产，甚至是金融行业。因此，即使刀锋公司的刀剑根本卖不出

去半把，业绩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出色，公司的股东们依然获得了4%的分红。[41]

这家公司1703年从德国走私刀剑制品的前一年，它购置地产的行动悄然在爱尔兰等地开始了。光荣革命后，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仍然频发军事冲突，爱尔兰不少领地被英格兰人夺取。1702年7月，英格兰议会宣布，爱尔兰在战争中被迫放弃的土地将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拍卖出售，卖地的收入用来填补用于战争的开支。这则消息一出，响应者寥寥，因为这个时候，英国与法国的战事尚在进行当中，再加上詹姆士二世党人不时在英国国内煽动叛乱，让人们忧心战争和骚乱随时可能再次降临英国，因而不敢贸然出手购买爱尔兰这片政治敏感区域的土地。[42]这时，敢于冒险的刀锋公司看准了机会，他们的负责人抬出了皇家特许执照的金字招牌，以近乎特权的身份，在爱尔兰境内大举购买土地和房产。在当年秋天，刀锋公司以每年两万英镑的地租价格，从政府手中获得了这批地产。

值得一提的是刀锋公司认购土地的方法。18世纪初叶的英格兰，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海外贸易的发达程度都远在苏格兰之上，但是它们面临着同一个问题——货币短缺。不过，英格兰货币量短缺的原因不像苏格兰那样是因为贵金属的流失，而是因为商业活动的频繁使传统的金属货币不敷使用。所以，人们在大宗商品交易的时候，一般都会用股票或者债券作为支付手段。名头响亮但囊中羞涩的刀锋公司也是透过这种方法“购买”爱尔兰的土地。

英格兰政府以军队债券（Army Debenture）为支付手段，通过委托的中间人把土地出让给刀锋公司，而刀锋公司自身则需支付给中间人等价的公司股票，再通过中间人认购相等价值的军队债券，以达到支付的目的。据统计，在1703年6月，已经有价值15万英镑的军队债券被人认购，而新的认购计划即将展开。[43]这是个赚钱的绝佳机会。公司的内部人士预计英国境内会出现长期的稳定与和平，土地的价值会因此上升。鉴于此，刀锋公司彻底放弃了并不盈利的刀剑生产，转而依靠土地不动产和手里持有的军队债券做起了地产业务。公司的盈利方法很简单，在对外公开宣布出售公司股份之前，他们先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认购军队债券；在公司计划公之于众之后，由于市场的普遍乐观，军队债券的价格会被人为炒高，二者之间的差价，便落入了公司的钱袋。依靠着这次小规模的“换股计划”，刀锋公司一次性获利达25,000余英镑。

刀锋公司的管理层尝着甜头以后，便开始盘算由“刀具公司”转变为“土地公司”再到“银行”的宏伟计划了。他们发现，爱尔兰的土地购买者当中，有不少人和自己一样，手头没有足够的金钱，不少人只能支付1/3的金额。[44]于是，刀锋公司又以它所掌控的土地作为信用金，开始向这些人经营起放贷、储蓄的业务，并印行自己的银行券。此时的刀锋公司，俨然成了一所约翰·劳希望在苏格兰建立的那种土地银行，它的金融业务甚至直接对英格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行形成了威胁。[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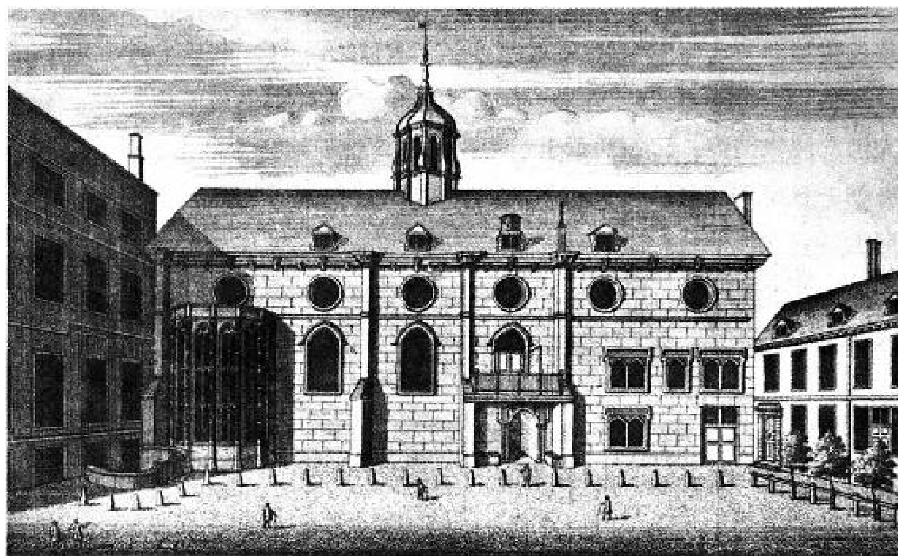
英格兰银行自然对刀锋公司的存在甚为不满。很快，它就向英国财政部抱怨说，自己获皇家授权的金融专营权受到了刀锋公司的损害。这时的英格兰银行，已经开始对赚钱“越过界”的刀锋公司树立起了敌意。转眼到了1707年，刀锋公司的特许状快要到期，需要进行更新，而这时英格兰银行也需要向政府申请延长他们特许状的时限。令英格兰银行恼火的是，当他们许诺政府一份价值100万英镑的贷款时，他们发现刀锋公司居然向政府提出了一份150万英镑的贷款。在为政府贷款的问题上“狭路相逢”，令双方此时不得不撕破脸皮，刀锋公司提出的条件迫使英格兰银行扩大对政府的信贷额度并且降低利率。不过，在1708年英格兰银行还是设法获得了对于英国所有股份公司的贷款特权，取得了这场金融战争的胜利。[46]而像刀锋公司这样的“非国有”金融机构，则失去了为股份公司贷款的资格。

刀锋公司受挫于与英格兰银行的竞争后不久，公司股价下跌，不少人因此倾家荡产。公司的董事们将这笔账算到了英格兰银行头上，寻思着有朝一日定要“复仇”。不过，这场失败并不是刀锋公司故事的结局，实际上，它引出的另一段精彩故事才刚刚开始。

“刀锋”上的彩票

在刀锋公司开始进行大宗的土地交易之前，它的特许状已经落到了约翰·布伦特（John　Blunt）的手里。[47]这位名字也叫约翰的先生和约翰·劳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布伦特出身于罗切斯特一个鞋匠家庭，早年从事“代笔人”（scrivener）的营生，专门负责为房地产买卖双方起草文书，虽然日子过得也算殷实富足，但也仅限于此，他绝对没有沾染半点约翰·劳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息，而是处处显露着一种小商人式的实用主义。

早在当学徒的时候，工于心计的约翰·布伦特就开始细致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他通过自己的双眼了解到商人、地产所有者、银行家这三者是如何思考和行事的，也了解了不少交易中罕为人知的行业“潜规则”。1689年，当布伦特履行完自己的学徒生涯后，他决定前往伦敦淘金。当布伦特动身前往伦敦的时候，股份公司在这座城市已经大行其道。很快，在1703年，他凭借自己从事“代笔”和商业的经验赢得了刀锋公司的好感，公司决定聘用他为文书，和他一起为刀锋公司工作的还包括另外三人：出身于金匠家庭、后来成为公司主管的伊利亚斯·特纳（Elias Turner），后来成为公司副主管的雅各布·索布里奇（Jacob Sawbridge），以及出身于议员世家的公司副主管乔治·卡斯沃尔（George Caswall）。[48]



18世纪初的英格兰银行。

从人员结构开始，刀锋公司在经历着一场巨变。从事行业生产的人逐渐离去，银行家和金融业者进入了公司的管理层。布伦特的周围，大多是史蒂夫·蔡尔德（Steven Child）之流的银行家。[49]刀锋公司就这样逐渐与“刀锋”脱离了关系，与伦敦的金融圈走得更近，而经济结构上过分的金融化，则可以称得上是那一时期伦敦股份公司的通病。在刀锋公司位于伦敦伯青街（Birchin Street）新总部外的咖啡馆里，经常可以见到獐头鼠目的股票经纪人在劝说他的客户们购买某某公司的股票，而这些经纪人向顾客讲解购买股票好处的时候，根本不会如实告诉他们这家

股份公司的经营业务、每年的业绩，以及该行业的发展前景。他们非常理解投资者的心态，人们不过只是想通过买股票赚一笔“快钱”，至于上市公司的生意具体是什么，并不重要。所以，原本应该如实呈现的财务报表变成了经纪人们一句直接而简单的承诺：赶紧买这只股票，它的价格一定大涨，现在不买，今后会追悔莫及。从1680年到18世纪的头二十年，伦敦的大街小巷炒作股票的热情日趋高涨。[50]

这时，在伦敦的证券市场，经营各种业务的公司像是忽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让人目不暇接，例如保险公司（Insurance Company）、珍珠公司（Pearl Company）、玻璃瓶公司（Glass-Bottle Company）、明矾公司（Alum Company）、布莱斯煤炭公司（Blythe Coal Company）、挂毯公司（Tapestry Company）……总之，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业务。最为有趣的是一家自称经营“潜水”业务的公司（Diving Company）。请别误会，他们可不是准备把潜水运动做成一桩生意。这个潜水公司对外宣称的“业务”竟然是：他们专门派人潜入发生了沉船事故的水域，打捞沉船里无人认领的值钱财物，以此盈利。为了说服人们投资他们的公司，潜水公司甚至专门派人到泰晤士河上，身着可笑而笨重的“潜水服”，潜入河中，并在众目睽睽下表演从水底“打捞”上来一大笔“财物”。[51]

实际上，当时英国的股份公司看似数量繁多，但除了东印度公司这一类资金雄厚、由国家力量支持的殖民贸易公司之外，许多在伦敦上市的股份公司业绩可以说非常糟糕，像刀锋公司那样干着“挂羊头卖狗肉”勾当的公司不在少数。这些昙花一现的股份公司，在通过短期的内部交易把股价炒高以后，很快便会把投资者的钱悉数卷走，然后宣布破产。可怜的伦敦股民们最后通常连负责人都找不到，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据统计，从1690年到1695年从事股票交易的93家公司中，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的占了一大半，到1698年，只剩下20家公司还在运营。1696年英国贸易协会（the commissioners of trade for England）发布报告甚至悲观地宣告，股份公司已经“完全堕落。他们把股票卖给对公司一无所知的人们，这些人被编造出来并故意散播的股票声誉所吸引，所关心的只是股票的市值是否在持续增长”[52]。

这种情况持续到了18世纪的头几年，此时，伦敦的投资者们对于烂大街的股份公司早已心怀戒备，再也不敢轻易相信股票经纪人的侃侃而谈。对于刀锋公司这样还“幸存”于伦敦股票市场的公司而言，如何取得

人们渐渐淡去的信任，重新吸引他们把大笔金钱交给自己操作，为他们赢得许诺中的“利润”，这是公司管理者们整天挠头琢磨的头等大事。约翰·布伦特也为这件事动过不少脑筋。最后，他“因地制宜”地想出来解决问题的妙招：彩票。

彩票在英国已风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将其视为从公众手里聚敛财富的有效手段，而且发行彩票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全民的富裕。当时，政府的彩票发行量不可谓不大，面值100英镑的彩票共发行了38,000份，面值十英镑的彩票共发行了520,000份。[53]彩票俨然成了普通人投资和政府“创收”的一个共同手段。

当时的人们对于股票和彩票疯狂到了什么程度呢？从一个例子可知。据记载，1712年的时候，伦敦有一位名叫约翰·布鲁克斯（John Brookes）的商人，他租赁有两处房产，但实际的资产却是首饰珠宝、玻璃器皿等物品。这些财产大约只占到这位布鲁克斯先生总财产的30%左右，他剩下两万多英镑的资产，全部用来购买股票和国家彩票。他仅在皇家非洲公司、东印度公司和刀锋公司的股份就高达12,000英镑。而他投资于国家彩票的大笔资产，每年至少会为他赢得4,600英镑的年金回报。[54]约翰·布鲁克斯是当时英国中产阶级中典型的一员，布伦特深知，赢得了这群人，就等于为公司赢得了未来的财富。

布伦特看中了伦敦人热衷于投机的特点，从政府方面争取来了彩票的发行权。刀锋公司开始向狂热的人们发行他们自己设计的彩票。布伦特在传统国家彩票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彩票的总面值和奖励金额。从20英镑到12,000英镑，彩票的奖励数额被不断加码，中奖次数也在增多。

例如，布伦特推出新彩票时，规定每次抽奖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人，都能获得500英镑的额外奖励。这当然极大地激发了人们购买彩票的热情。据统计，光是这一次彩票的发行，数额就达到了678,000英镑。这笔金额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在1700年，整个英国的财政总税收也不过4,540,000英镑。[55]刀锋公司第一次发放彩票的总数额，竟然相当于1700年国家税收的14.9%，这个额度，不可谓不高。大规模的彩票发售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反响，在布伦特和刀锋公司以书面形式正式宣布彩票认购之前，事先得到消息的人们就带着金钱来到布伦特面前，要求认购彩票。到了正式认购的那天，布伦特和他的同伴们发现，涌进来的资金如此之多，以至于超出了原定认购金额30万英镑。[56]

然而，在这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彩票发售之后，布伦特并未就此收手，而是趁热打铁，紧接着进行了第二次规模空前的彩票发售。这次被称“为两百万冒险”（the Adventure of Two Millions）的彩票发售中，所有的彩票面值都被提升到了100英镑以上，最高奖励则被提升到了20,000英镑。布伦特为了进一步吸引人们购买彩票，还极具创造性地把彩票分为五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彩票价格和奖励程度依次递增。最高的一个等级，每份彩票的面值高达130英镑，这个数字，超过了当时普通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半年总收入。[57]

如此昂贵的彩票，有资格购买的人自然也是属于社会地位较高、财富更为充裕的阶层。尽管价格不菲，但是彩票的购买仍然炙手可热，个中原因，只能解释为人们渴望“以钱生钱”的贪婪本性无法遏制。通过两次史上绝无仅有的彩票发售，大量钱财通过刀锋公司的运作而聚集到了政府手中。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在1710年对布伦特的彩票计划赞不绝口，他本人对这样分等级出售的彩票设计感到“极为满意”，因为“人们得奖的机会被设计为翻了一倍，而在彩票游戏中，人们对于得奖的期望才是吸引他们购买彩票的诱因。如果能够把人们对彩票的期望和想象范围扩大，那么他们就会更为确定地被吸引进来”[58]。

看来，布伦特吸引人们购买彩票的事情做得很得力，政府对此也很满意。然而，布伦特让刀锋公司接手彩票发行的业务，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私利，整件事情另有隐情。欲将这一段故事和盘托出，还要从英国当时的一位贵族政治家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说起。

注释

1 关于决斗的起因有多种版本的说法。其中一种是，作为邻居的威尔逊忍受不了约翰·劳和他情人的放荡，因而拒绝和他们住在同一栋楼里。见Niall Ferguson,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Penguin, 2009, p. 128.

2 Malcolm Balen, A Very English Decei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First Great Financial Scandal, Fourth Estate, 2009, p. 21.

3 A. W. Wiston-Glynn, John Law of Lauriston: Financier and Statesman, Founder of the Bank of France, Originator of the Mississippi Scheme, Newton Page, 2010, pp. 8-9.

4 George Orewll, Decline of the English Murder, George Orwell Essays, Penguin Classics, p. 346.

5 Charles Mackay, 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Vol 1.,

Project Gutenberg,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24518/24518-h/dvi.html#fnm1.

6 Antoin E. Murphy, John Law: Economic Theorist and Policy-Mak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5.

7 John Philip Wood, Memoirs of the Life of John Law of Lauriston, Printed for A. Black, 1824, p. 3.

8 同上，p. 5.

9 Richard Dale, The First Crash: Lessons from the South Sea Bubb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58.

10 Adolphe Thiers, The Mississippi Bubble: A Memoir of John Law, Greenwood Press, 1969, p. 81.

11 Janet Gleeson, Millionaire: The Philanderer, Gambler, and Duelist Who Invented Modern Finance, Simon and Schuster, 2001, p. 44.

12 同上，p. 45.

13 Emerson Hough, The Mississippi Bubble, Blackmask Online Edition, 2004, p. 22.

14 John Child, etc., Understanding history, Heinemann, 1992, p. 108.

15 Murray G. H. Pittock, "John Law's Theory of Money and Its Roots in Scottish Culture"，原载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Scotland, 2003, p. 392.

16 同上，pp. 395-396.

17 Mark Blaug,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0.

18 Murray N. Rothbard, "Law: Proto-Keynesian"，节选自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 1,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 Joh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http://mises.org/daily/4800.

19 Murray N. Rothbard,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 1,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 Joh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1995, pp. 327-328.

20 James MacDonald, 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91.

21 Murray G. H. Pittock, John Law's Theory of Money and Its Roots in Scottish Culture，转引自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Scotland, 2003, p. 396.

22 Murray N. Rothbard,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 1,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 Joh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1995, p. 330.

23 Steve H. Hanke, "From John Law to John Maynard Keynes"，原载Globe Asia, February, 2009, http://www.cato.org/pub_display.php?pub_id=9899.

24 Antoin Murphy, John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vii.

25 Esben Sloth Andersen, Schumpeter's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Engine of Capitalism, Anthem Press, 2009, p. 236.

26 J. G. 许尔斯曼：《货币生产的伦理》，董子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p. 17.

27 Charles Rist, History of Monetary and Credit Theory from John Law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A. M. Kelley, 1996, pp. 47-48.

28 James MacDonald, 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92.

29 Roger Emerson, "The Contexts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原载Alexander Broadie主编的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1.

30 Rev. James Mackenzie,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T. Nelson and Sons, 1867, p. 652.

31 William Bonner, Financial Reckoning Day, John Wiley and Sons, 2004, p. 74.

32 “The Darien Scheme-The Fall of Scotland”，见Historic-UK.com网站，http://www.historic-uk.com/HistoryUK/HistoryofScotland/The-Darien-Scheme/.

33 同上。

34 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格兰和苏格兰共同拥戴一位君主。1703年，苏格兰通过《和平与战争法》（Act anent Peace and War），规定在英格兰的安妮女王去世以后，苏格兰的王位继承制度将与英格兰彻底分开，此举激怒了英格兰。英格兰此后开始对苏格兰实施贸易禁运等制裁，迫其入盟。在外交上，当时的英格兰也亟需与苏格兰结盟，以对抗法国。详见钱乘旦、许洁明著《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p. 195，以及Bill Jones, Dictionary of British politic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

35 Karin Bowie, Scottish Public Opinion and the Anglo-Scottish Union, 1699-1707, Boydell & Brewer Ltd, 2007, p. 79.

36 John Philip Wood, The Life of John Law: Including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Ris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Mississippi System, Newton Page, 2009, p. 10.

37 见State Papers, Domestic, Petition Entry Book, p. 182以及Anderso, Annals of Commerce, p. 121，转引自The Constitution and Finacne of English, Socttish and Irish Joint-Stock Companies to 1720, Vol. 3, CUP Archive, p. 435.

38 William Robert Scott, The Constitution and Finance of English, Scottish and Irish Joint-stock Companies to 1720, Part 2, The University press, 1912, p. 435.

39 见Swordsmiths in England, Pooley Sword Limited官方网站，http://pooleysword.com/en/Evolution_of_Swords_-_Swordsmiths_in_England.

40 John F. Chown, A History of Money: From AD 800, Routledge, 1994, p. 139.

41　The Constitution and Finacne of English, Socttish and Irish Joint-Stock Companies to 1720, Vol. 3, CUP Archive, p. 436.

42　John Gerald Simms, David Hayton & Gerard O'Brien, War and politics in Ireland, 1649-1730,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1986, p. 167.

43　The Constitution and Finacne of English, Socttish and Irish Joint-Stock Companies to 1720, Vol. 3, CUP Archive, p. 437.

44　同上，p. 438.

45　Bruce G. Carruthers, City of Capital: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53.

46　Charles P. Kindleberger, 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Taylor & Francis, 2006, p. 76.

47　John F. Chown, A History of Money: From AD 800, Routledge, 1994, p. 139.

48　Malcolm Balen, A Very English Decei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First Great Financial Scandal,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imited, 2008, p. 32.

49　John Carswell, The South Sea Bubb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31.

50　Kirstin Olsen, Daily life in 18th-Century England,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9, p. 190.

51　John Francis, 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ts Times and Traditions, New York, 1862, p. 345.

52　Tom Hadden, Company Law and Capitalism,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7, p. 14.

53　Richard Dale, The First Crash: Lessons from the South Sea Bubb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4.

54　N. S. B. Graf, Business and Capit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History, Beard Books, 2003, p. 151.

55　详见Ronald Max Hartwell在“Taxation in England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文中对英国18世纪以来的税收进行的统计。原载Cato Journal, Vol. 1, No. 1, Spring 1981, p. 136.

56　David Hayton etc., The House of Commons, 1690-1715, Vol.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37.

57　Malcolm Balen, A Very English Decei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First Great Financial Scandal,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imited, 2008, p. 35.

58　Ewen C. L' Estrange, Lotteries and Sweepstakes, Ayer Publishing, 1932, p. 135.

第三章　一场战争打出一家公司

——南海公司背后的政治与军事角力

战争与债务

罗伯特·哈利，第一任牛津伯爵（the first Earl of Oxford），1661年出生于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的一个贵族家庭。他从小所受到的是非常传统的英国式教育，因此，他在成年后顺理成章地成了辉格党的成员。光荣革命期间，他的父亲爱德华·哈利（Edward Harley）举兵支持渡海来英国的威廉三世。[1]后来革命成功，威廉顺利成为国王，他授予哈利家族一大片位于拉德诺郡（Radnorshire）的领地作为表彰。国王的垂青，让原本还是地方贵族的哈利家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老爱德华在生前将自己的政治资本倾囊传给了两个儿子，罗伯特·哈利和爱德华·哈利。小儿子爱德华·哈利在“光荣革命”期间是父亲的左膀右臂，为他们家族的义军筹办武器和人马，并且还负责与各地诸侯联络举义事宜，称得上一名帅才。相反，大儿子罗伯特·哈利不谙武事，却更具有政治头脑，这个特点在革命之后的英国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正是这位罗伯特·哈利，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让哈利家族真正登上了英国政治金字塔的顶点。



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 1661—1724），第一任牛津伯爵，南海公司创始人之一。曾任英国王室财政大臣。

罗伯特·哈利的政治影响力开始于他的婚姻。1685年，24岁的他迎娶了伊丽莎白·福利（Elizabeth Foley），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一位资深议员的女儿。[2]凭借这桩婚姻，哈利家族与自己相邻郡县的地方势力联姻，扩大了家族的政治影响，并且，1695年至1698年之间的下议院议长（Speak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保罗·福利（Paul Foley）也因为这桩婚姻成了哈利的叔父。这对于罗伯特·哈利日后的飞黄腾达，帮助不可谓不大。1689年到1701年，罗伯特·哈利进入议会下议院担任后排议员（backbench MP），这与保罗·福利担任议长的时间有所重合；1701年至1705年，他重涉保罗·福利的步伐，担任英国议会下议院的议长。1710年，哈利的权力之路走上了一个标志性的节点，那一年，他作为领导人组成了自己的一届政府，后来又成为英国的财政大臣，直到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哈利的政府主导了英国政治四年多的时间。[3]

不过，这位在英国政界地位显赫的牛津伯爵罗伯特·哈利又是如何与刀锋公司一个小小的负责人约翰·布伦特扯上关系的呢？其中原因，与英国在18世纪初遭受的政府债务危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细说这次英国历史上较为严重的债务危机之前，我们必须梳理清楚几个问题。首先，什么是政府债务？其次，政府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借债，向谁借债？最后，政府借债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被称为一场债务危机？

政府债务（government debt）也称为公共债务或国家债务。提到所谓的债务，人们很直观地联想到的概念就是借钱和还钱。一个人出于某种需要向另一个人提出请求，希望对方借给他一笔钱，并承诺会按时归还，如果对方最终答应借出这笔钱，那么这笔钱就成了得到借款那个人的债务。事实上，债务行为也就是这么简单。只是，借贷双方为了确保对方日后不会赖账，会在借钱的同时开具一份借据（IOU），立此为证。如果这份借据上写有规定借款人对债务持有人负有债务责任的证明，并且规定了偿还时间以及在贷款到期之前需要定期支付的利息比率，那么这份借据也叫做债券（bond）。[4]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个人的债务，那么我们理解起政府的债务来，也就不会太困难。与个人借债者一样，政府有的时候也需要向人借钱，特别是当它缺钱花的时候，政府找人借钱的脸皮也会变得异常肥厚。这笔借款，由于其债务人是国家政府，通常被称为国债（national debt）。

政府借钱并发行国债的目的是为了筹集资金，同时，政府债券的发行必须遵循“有借有还”的普适信用原则。政府有义务偿还债务，这一点和个人的债务是没有区别的，而且，正如个人债务是靠个人信用作为担保，政府如果单方面拒绝还债，受损害的将是政府信用。相反，良好的信用更能吸引人成为政府的债权人。[5]

但政府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借债筹钱呢？原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只要有大规模的公共开支，就必然会产生政府的借债行为。以下的事情都能造成政府的大规模开支，例如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造桥修路、建设国家福利系统等等，当然，这些项目是就现代国家的政府而言。在过去几个世纪，当人们的头脑中还没有所谓的国家福利系统和社会公共产品这些概念的时候，通常来讲，政府有大把花钱的机会都只会因为一件事情——战争。

罗伯特·哈利生活的那个时代，正赶上打仗。讽刺的是，在以没有打仗而著称的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立即卷入了多场战争：与爱尔兰的战争、与法国的九年战争（Nine Years' War）、奥格斯堡同盟战争（War of the League of Augsburg），以及一次发生在18世纪初的至关重要的海外殖民地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当时的英国无疑是一个深深陷于战争泥淖中的国家。

西班牙的王位继承原本和英国八竿子打不着。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查理二世偏偏死后绝嗣，他生前曾立下遗嘱，要把西班牙的统治权交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利普。此举引起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反对，认为破坏了哈布斯堡王室纯正的血统。英国也开始担心起来，但英国担心的并不是西班牙王室的血统问题，而是它在美洲的殖民地。法国原本签署过一项条约，规定如果西班牙王位发生变故，那么法国将会获得那不勒斯、西西里、洛林等地区的治辖权。条约对于各国如何划分原属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已有明文落于白纸黑字。但随着西班牙王位落入法国手中，之前签署的这份《第二次分割条约》（The second treaty of partition）等于作废。1700年11月16日，得知这个消息的英王威廉三世写下了这样的字句：“我从来也不是特别相信法国的承诺，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考虑到他们会在世界面前，将一个未完成的庄严条约撕毁。”[6]瞎子都看得出来，英国人的不满溢于言表。

对于逐渐走向衰落的西班牙，英国和法国长期垂涎于它在美洲的势力范围，威廉三世本人对于加勒比海地区的贸易甚至比欧洲大陆的贸易

看得还重。[7]如果西班牙王位传给法国国王，那么法国就等于自动获得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和强大的海军，而不仅仅是之前的条约所限定的几个地区，如此，海上霸权的天平无疑会倒向法国一边。在希望获得更多海外殖民地的英国政府看来，过于强大的“西班牙—法国”联盟对英国的利益有损无益，因此是绝对不可容忍的。[8]偏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1701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单方面承认那位当年被英国人逼走，眼下正流亡法国的詹姆士二世之子为英国国王。这无疑触犯了英国的外交底线。英国借机率领欧洲的反法联盟，向法国宣战。

战争一共打了十二年，英军开始占据着一定程度上的优势，随后的战斗陷入了四五年的僵持局面。1713年，英国以胜利者的姿态与法国签订议和的《乌得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根据这个条约，路易十四名义上成为西班牙国王，但西班牙不得与法国合二为一。另外，英国作为战争的受益者，得到了美洲大量的殖民地，并获得了三十年从西属美洲殖民地贩卖黑奴的特权。尽管身份上是战胜者，但英国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英国作为反法联盟的“带头大哥”，负担了整个联盟的大部分战争费用。在这场战争之初，英国的公债大约在1,600万英镑，到战争结束时，债务已逾3,000万英镑。[9]从政府财政的意义上说，打了胜仗的英国却比战前更穷了。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说过，1800年之前的战争领导者大多不是职业军人，而是贵族、雇主，甚至是商人。军队也大多为雇佣军。这让血腥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更像是一桩“生意”。[10]这帮“非职业军人”带兵打仗的目的只有一个：钱。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对于由这条军事产业链养活的每一个人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只是苦了战争的埋单者。在任何一场战争中，国家的开支毫无疑问会比和平时期要高出许多。按照最普遍的方法，战时的财政负担只有依靠提高国家税收才有可能解决，最终实现收支平衡。但是，当战争的巨额负担突然降临于一国之上，而该国的资源和物力在短期内根本无法负担这项开支的时候，该国的政客们就会想方设法把这个沉重的负担分散到此后很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的方法就是借来一笔钱充当战争支出，然后分期归还。等到和平时代再次回归，国家公共开支下降、收入上升的时候，就到了还债的最佳时机。[11]


TRATADO
DE PAZ,
AJUSTADO ENTRE LAS CORONAS
DE ESPAÑA,
Y DE INGLATERRA,
EN UTRECH.
Año 1713.
CON LICENCIA
DE LOS SEÑORES DEL CONSEJO DE ESTADO.


TRACTATUS
PACIS & AMICITIÆ
INTER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most Serene and most Potent Princess ANNE, by the Grace of God, Queen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Ireland, Defender of the Faith, &c. and the most Serene and most Potent Prince PHILIP the Vth, the Catholick King of Spain, Concluded at Utrecht the [illegible] Day of July, 1713.
By Her Majesties Special Command.
LONDON,
Printed by John Baskett, Printer to the Queen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And by the Assigns of Thomas Newcomb, and Henry Hills, deceas'd. 1714.

1713年英国与法国签订的《乌得勒支条约》影印本，它动听的官方名称是“和平与友好条约”。

这个理论当然可以从历史数据上找到佐证。根据“英国公共开支”网站所做的统计，从17世纪末至今，英国政府的借债三百多年来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1692年，政府的借债是3,300,000英镑，占到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61%，到1710年的时候，这一比例上升到34%。在随后的时间里，英国政府的公共债务总额及其与GDP的比率越来越高。到了1820年的时候，政府的债务高达8.4亿英镑，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60.3%。而在一百多年后，也就是1947年，英国政府债务已累积达到256.3亿英镑，占GDP总值的237.9%。[12]

在1820和1947这两个年份，政府债务的数额如此突出，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巨额的战争开支。1820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驾崩，在他在位的六十年里，英国战事不断，与北美殖民地人民以及法国的拿破仑都有过旷日持久的激战。1815年拿破仑折戟于滑铁卢，反法联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然而，多年的战争已经使得反法联盟的“带头大哥”英国债台高筑，累积的政府债务几乎创下了英国史上最高比例的记录。

而在二战刚结束不久的1947年，英国政府由于巨额的军费和战后重建开支，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这造成了英国政府负债比率在历史上的第二个高峰。相反，在远离战争影响的和平时期，即使经济不景气，政府

的负债比率也远低于战争时期的负债率。一个离我们较近的数据显示，2010年英国经济增长遭遇瓶颈，政府的公共债务高达1.105万亿英镑，数字看起来很高，但实际上这无非占到了英国GDP总量的76.1%，仅相当于战争时期的1/3不到。[13]

了解到历史上战争与政府公共债务二者之间的联系，再回过头来看1710年左右的英国政府的军费开支，一切就一目了然了。18世纪初的英国政府“每年需要花费5,500万英镑，去支持部署在欧洲大陆的九万人的军队，以及四万人的海军部队。在1710年的时候，军费开支已经占到了政府财政总收入的9%……政府的财政问题还在持续，因为在18世纪早期，英国政府至少有超过1/3的收入被它所需偿还的利息给消化了，到了1714至1717年，这个比例至少上升至50%”[14]。

英国走到了一个历史的两难境地。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海外贸易特权，英国必须花钱养着一支数量庞大、遍及世界各地的海军部队。但是庞大的海军所带来的庞大军费开支，又让英国政府感到，即便是维持这支军队的日常运作，也需要耗用极大的财富。这让1710年8月才刚刚当上财政大臣的罗伯特·哈利感到十分头痛。为了应付不断飙升的军费开支，英国政府已经大幅提高了进出口关税、国内消费税以及土地税等各种税收。税收占到国家岁入的比例已经从17世纪70年代的3.5%提高到9%。但即使如此，政府的钱袋子依然入不敷出，政府债务已经累积到900万英镑。[15]

为了筹钱弥补财政亏空，英国政府拼命发放国家彩票，但是民间对于彩票的过度疯狂又让政府不得不在18世纪初明令禁止了彩票活动。正是这个时候，在伦敦的商业圈中崭露头角的约翰·布伦特联系上了罗伯特·哈利，并给他指出了一条生财的门道：既然在新的法令下，政府不方便亲自发售彩票，那么不妨把彩票的发行交给刀锋公司代理。[16]布伦特的方案是，卖彩票的收入，大头归政府，公司从利润中取得销售提成和手续费。哈利听了布伦特的建议以后，颔首同意。很快，刀锋公司就获得了政府授予的彩票发行代理权。

但彩票的收益仍然无法让哈利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虽然政府靠彩票赚到不少钱，但是和英国两三千万英镑的负债相比，数十万英镑的彩票收入只能说是杯水车薪。要想彻底解决债务问题，哈利和他的同僚们还需要另想办法。

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作为财政大臣，哈利对于英国政府陷入巨额负债的原因，当然心知肚明。英国的海外战争是罪魁祸首。不过，对于打赢这场战争能为英国带来的实际利益，哈利更应该了然于胸。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焦点在于遏制西班牙与法国联盟的形成，但英国参与这场战争，还有一个明显的动机，那就是如果英国最终得胜，那么它将有机会得到垂涎已久的战利品——西班牙在海外的殖民地。而殖民地，对于殖民者而言，意味着大量的金银和贸易机会。当时欧洲各国虽然存在程度不一的贸易隔阂，但一个颇具规模的统一市场已经初见端倪。[17]尤其是欧洲国家与海外殖民地的贸易，为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积累了原始资本，形成了一个网络遍及全球的贸易市场。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与美洲、非洲、亚洲的贸易往来比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密切。

西班牙的殖民地多分布于南美洲。自1519年进入今天墨西哥湾的阿兹特克以来，蕴藏着大量金银的南美洲地区一直是西班牙人的海外宝藏，但是，掠取了这些金银的西班牙却由于政体的原因，一味将这些财富消耗于修筑宫殿和骄奢淫逸[18]，并未像后来的英国那样将掠夺来的财富运用在工业生产和技术创新上。相反，仅英国一国与美洲诸国的贸易量，在整个18世纪就翻了十倍，贸易盈余极大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19]事后看来，如此迅速的增长足以说明美洲贸易的繁荣程度，也不难想象在尚未获得中南美洲的殖民地时，该地区贸易对18世纪初期英国人有何等强烈的吸引力。事实也的确如此，西班牙人在中南美洲发现黄金的消息，让整个欧洲震撼之余，也让人们倍加确信，尚未被充分开发的美洲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富庶之地。但凡经济实力过得去的临海国家，都迫不及待地组织船队向美洲进发。于是，英国的几位商人出钱筹建了普利茅斯公司（Plymouth Company）和伦敦公司（London Company），主要业务是在北美开拓殖民地。1606年，英国皇家向二者颁发特许状，将其合称为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英国人在北美的殖民历史，正式拉开帷幕。

然而，神秘富饶的中南美洲虽与北美相邻，却被占领者视为禁脔，英国长期无法插足。即使在距离伦敦公司成立一百年后，放眼英国国内，也没有一家专门经营南美洲贸易的国有公司。而且，原本令人期望

颇高的经营北美贸易的弗吉尼亚公司，成立之后的利润却远低于人们预期。[20]英国人在对北美的贸易有所失望之余，转而把更多的希望寄托于中南美洲，那儿的富庶一直是英国人耳熟能详之事。当初搞砸了达瑞安公司的威廉·佩特森先生，在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期间，就曾书谏英王威廉三世，向其描绘南美洲贸易的绚丽美景，把威廉三世说得怦然心动。[21]自此之后，英国无论民间或政界，一提到南美贸易，人们无不怀有万分憧憬和乐观期待。为此，布伦特向哈利建议，不妨利用人们对南美贸易的乐观情绪，仿效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和伦敦公司的模式，建立一个专门负责中南美洲贸易的公司，在那里建立英国的殖民地并进行掠夺与贸易。他预计，此举会为英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富，从而一次性解决政府的债务问题。18世纪，欧洲人称南美洲附近的海域为“南海”（South Sea），布伦特计划中的那个公司，就顺理成章地被称为“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

但是，哈利刚刚听到布伦特这个新奇的计划时，还不太确定它是否可行。哈利是一名谨慎的政客，他担心的是，万一新成立的这家公司并没有从海外贸易中赚钱，而是像苏格兰达瑞安公司一样，受到强大的竞争对手的钳制，以至最终毁于战火，到时又该如何收拾残局？正当哈利为此事踟蹰、犹豫之际，一封来信消解了他心头的疑虑。这封信来自乔治·卡斯沃尔，一位伦敦的富商，同时也是前文曾提及的刀锋公司的副主管。他在信中用诚恳的口吻劝告哈利，说他花了很多时间认真考察了约翰·布伦特向哈利提出的建议。经过缜密的思考后，他认为，布伦特的计划有助于恢复政府的公共信用。他说，建立股份公司在眼下的社会中无疑是最迅速的筹集资金的方法，也是解决公债问题的唯一途径。因此，他希望哈利能听从布伦特的建议。[22]哈利经由这番劝说之后，打消了疑虑，成立南海公司的决心就更为坚定了。

1711年3月7日，罗伯特·哈利向英国议会下议院提出建议，希望议会为英国巨额的公债专门成立一个应对计划。尽管议会最初同意就这项计划进行讨论，但是这项议题随即又被议会搁置。因为就在哈利在议会提出这项建议后的第二天，一位贵族试图以匕首行刺哈利。所幸哈利避过致命一击，只是受伤，并无性命之虞，歹徒也很快被制伏，受到了应有的惩治。[23]由于这起突发事件，哈利不得不卧床养伤数月，虽然他的弟弟爱德华·哈利继续向议会提起解决公共债务的计划，但是，整件事情因此被一直拖延到了该年5月。当罗伯特·哈利的伤势基本痊愈、可以重

回工作岗位的时候，公债计划才被重新提上议会的议事日程。

罗伯特·哈利为了英国政府债务的问题，不说殚精竭虑，但至少也耗费了不少的心血，甚至几乎为此把性命赔进去。按照某种逻辑，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把它解读为：罗伯特·哈利是个好财政大臣，为了联合王国的利益，鞠躬尽瘁，并且差一点就死而后已，值得表彰。但是，哈利毕竟没有死，18世纪的英国人也不会幼稚到用一些廉价的道德词汇去评价政治人物。其实人们很清楚，哈利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全体英国人民”的利益，更是出于自身的政治考量。

哈利当上财政大臣的前一年，他亲手扳倒了英国政坛的老江湖、辉格党领袖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主持的政府，辉格党把持的英国朝政易手至托利党，议会进行了换届改组。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可是英王威廉三世身边的重臣。当年，威廉从荷兰渡海来到英国的时候，原本预备会与詹姆士二世的军队有一场血战。正是这位当年担任詹姆士国王军统帅的约翰·丘吉尔阵前倒戈，使得威廉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未打一仗就顺利进入伦敦成为英国国王。

光荣革命之后，大功臣马尔伯勒公爵被委以重任，辉格党成为英国的执政党，而英国参与那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也是由于马尔伯勒公爵以及辉格党的主战思想所导致。辉格党人认为，英国参加这场战争捍卫了光荣革命的成果以及王室的新教继承权。英国兴义师，讨伐由天主教势力支持的詹姆士二世和西班牙，在马尔伯勒公爵看来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出师之名。[24]然而，这场战争为英国带来的结果却是高额军费引发的国家债务的危机。当哈利在1710年8月正式履新之时，英国海军军费的负债已经高达500多万英镑。[25]人们此时不再把与法国、西班牙的战争视作所谓的义战，而是把它看做一场劳民伤财，徒令英国经济陷入困顿的战争。

最早以辉格党身份走上政坛的哈利此次是以托利党的身份成为财务大臣。但问题是，那一届的议会并未得到内阁的完全支持，不少人还不愿意对于新上台的托利党表示出过度的好感。哈利建立南海公司解决公共债务的提议，并没能得到大多数议员心悦诚服的同意。当时的英国议会下议院中有由全国314个选区选出的558位议员[26]，然而，在这五百多名议员中，真正完全同意哈利计划的人数只不过占到1/10左右。[27]

南海公司方案的阻力主要来自辉格党。当时的英格兰银行完全处于

辉格党的控制之下，名为国家银行，其实无异于一家党属银行。当初约翰·布伦特试图将他麾下的刀锋公司经营为一家土地银行，就遭到了英格兰银行的反对。现在布伦特卷土重来，与财政大臣哈利一起，筹建计划更为宏大的南海公司，英格兰银行就不可能熟视无睹。毕竟，当时的英格兰银行是一家以营利为目的的银行，它需要稳固自己的业务，自然也会试图瓦解潜在的竞争对手，约翰·布伦特的刀锋公司已经让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感到非常不快，如今又冒出一个南海公司，就更令英格兰银行心生疑窦。在那个银行像公司，公司像银行的年代，谁也不可能保证，由托利党财政大臣筹划的南海公司私底下不会经营类似银行存放贷的业务。

英格兰银行原是政府债务的主要放债人，它当然不希望任何一家机构插手英国国债的事务。不少人也这样认为：托利党政府抛出的这个南海公司计划，根本就是意在挑战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在英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但仍然有一部分辉格党员或明或暗地对这项计划表示出了支持。[28]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未来英国在中南美洲的贸易有利可图。

哈利在英国政坛混迹多年，他不会不知晓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之间存在的矛盾，背后实际上是托利党和辉格党的政治矛盾。何况，如今英国的大小事务，尤其是那些和“钱”沾边的事情，无不必须通过议会的同意才能实行。为此，他在向议会提请这项计划的时候，就颇动了一番心思，充分考虑了党派间的平衡和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哈利拉拢自己的政敌，不仅是为了让提案顺利通过，实际上更是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所以，哈利向议会提请的计划是从政府债券持有者的利益出发，他希望议会以自身名义担保，为所有的政府债券持有者提供6%的年息，并且固定了酒类、醋、烟草、丝织品、鲸须等等商品的关税。哈利计划将这些商品征税的所得用来支持一家专门负责与“南海”，即南美洲国家做贸易的公司。他在议会里对议员们说，南美洲的秘鲁和墨西哥等国蕴藏着无数的黄金白银，只要能获得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专营，那么滚滚财源就会不断涌入政府的钱袋，偿还政府债务不在话下，甚至还能因此让政府财政出现大规模盈余。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听闻这个消息，又坐不住了，他们商量着要在议会里进行联名抵制，将这个商业竞争对手扼杀于摇篮中。[29]

但东印度公司董事们的努力最终失败了，这是因为哈利的话说得非

常动听，让托利党控制的整个下议院都重新燃起了希望：或许南美洲的贸易真的能一次性解决政府债务。于是，在1711年5月18日，英国的上下议院均通过了哈利这项计划的法案。计划随即送往英国皇室，也得到了同意。这项法案也是罗伯特·哈利在财政大臣任上所做的最后一桩政绩，数天之后，他就被擢升为英国皇室财政大臣（Lord High Treasurer），而政府的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Exchequer）一职，则由托利党的另一位政治家罗伯特·本森（Robert Benson）担任。30

这项即将生效的法案上，写着如下的字句：

鉴于南海地区的贸易将会为这个王国带来的荣誉和财富，女王陛下特此将政府债券的所有者们以一般公司的方式合并在一起。这项法案将许诺公司八千英镑的费用用于公司的运行。并且，为了更好地维护英格兰银行的利益，六个月内，这家新公司不能够以它们的票据或账单借款。另外，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票据，公司都不得将其贴现。公司也不能为公司以外的任何个人或团体储蓄现金或账簿。

然而，公司的成立是出于这个王国的荣誉和幸福的必然结果，是为了促进王国内财富的增长，也是为了将王国境内的产品、制造业、商品和货物出售到世界各地，亦为了将各地的上述物品带进这个王国，同时，也是为了穷人的就业。综上原因，南海地区以及南美洲的贸易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运作这一贸易的最佳方法莫过于专营性质的股份公司。为了鼓励即将成立的公司成员，特此颁布：

该公司应该从1711年8月1日起，被永久授予美洲规定范围内的王国、陆地、岛屿、城市、乡镇、港口、河流等所有地点的交通以及贸易专属权。范围由南美东岸自奥里诺科河到最南端的火地岛；南美西岸从火地岛经由南海至南美最北端的地方。在此范围内的所有地方，过去属于伟大的西班牙王国统辖之下，如今专属英国一国实行贸易权……

在此范围内，除了公司及其代理人之外，一切贸易皆不被允许。

女王在她即将颁布的公司特许状中，将赋予这家公司制定法律的权力，只要该法律有益于政府的贸易等目的，同时也应该对违规行为进行监禁或罚金的惩罚。

公司为所有岛屿、贸易站、城镇和一切在规定贸易范围所发现的地方的唯一所有者，并且免费为王室保有这些土地，但如果王室提出要求，公司将支付一盎司黄金的土地年租金。

公司所有的舰船、商人为公司本身的私有财产。为了在规定区域内贸易的目的，他们可以购置武器，并诉诸武力。

公司将不被允许航行到上述规定范围之外的海域，麦哲伦海峡以及火地岛周边海域除外。公司同样不能航行到东印度地区，也不能通过麦哲伦海峡和火地岛之外的其他航线返回大不列颠及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其他地方。公司也不能与印度、波斯或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总之，其贸易对象不可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对象有所重合。同样，公司的船只不能驶往智利、秘鲁或加利福尼亚海岸线以西的海域。

除了保护并发展渔业，目前还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王国变得更富裕，培养出更多有能力的海员，女王特此在为公司颁发的特许状内，直接为公司的每一百英镑股份注入二十英镑个人股份，作为激励、扩展王国的渔业发展之用。

南海公司经准许进行贸易的海岸、国家和岛屿的界限地图。

公司的统治者和主管人员，不能同时也在英格兰银行或东印度公司担任任何职位。[31]

从以上这段文字，不难看出，英国皇室通过法案把南海公司的贸易范围死死限制在中南美洲地区，也可以说是西班牙在中南美洲的旧有势力范围。公司的贸易范围可谓泾渭分明，英国势力范围之外的地区，完

全被禁止染指；而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既得利益，南海公司也休想从中分一杯羹。同时，条约把与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有瓜葛的人排除在南海公司的管理层之外，也是哈利赋予了公司一种“托利党”的属性，潜台词是说，南海公司的盈利，没辉格党的份。[32]总之，这个法案似乎想告诉人们一件事情：老老实实待在南美洲做贸易，这才是南海公司分内的职责。

既然批准公司成立的法案已经出台，那么如何让公司的经营获得最大收益就成了公司董事会与主管们需要操心的事情。当然，对于股份公司的操作，他们早就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政府批准公司成立的法案一经生效，对于董事会而言，说明了一件事情：向公众发放公司债券和股份的时机到了。1711年6月，南海公司合并了超过九百万英镑的政府流动性债券。为了使合并后的公司债券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南海公司不得不接受政府短期债券的面值，让投资者们依照此面值进行交易。[33]在吸纳了足够多的政府债券之后，公司股份的认购就随之开始了。

7月29日，第一批认购在伦敦城的绸缎商大厅（Mercer's Hall）举行，虽然最初只得到了约两百万英镑认购，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人们对南海公司股份的热情有所升温，又有价值两百万英镑的股份被陆续认购。[34]获得了政府背书的南海公司在短期轻易就筹集到了大笔金钱，当然，这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一份6%的年息。[35]就这样，这家新成立的股份公司，从金融之城伦敦开始了它远在南美的贸易之旅。

南海公司的吹鼓手：兰姆、笛福与斯威夫特

1711年9月8日，英国皇家正式授予南海公司经营特许状。公司正式拥有了在南美进行贸易的特权，而且，特许状还规定说，公司的主管将由公平的选举产生。但实际上，想要竞选公司的主管级职位，起码的资格是至少要有1万英镑的现金做抵押，而主管选举的每一票的投票资格，价值均在1000英镑。在这样严苛的财产规定下，平民百姓想要参与公司管理层，从理论上来说是毫无可能的。南海公司的掌舵人，只可能来自于英国的权贵阶层。

因此，人们还没来得及看清英国政府的特许状长什么样子的时候，南海公司的管理层名单就已尘埃落定了。公司最初的管理者包括：公司的最高所有者、已经受封为牛津伯爵的罗伯特·哈利，二级主管詹姆斯·贝

特曼爵士（Sir James Bateman），副主管萨缪尔·昂格雷（Samuel Ongley）。公司的董事包括：罗伯特·比奇克罗夫特（Sir Robert Beechcroft）、罗伯特·本森（Robert Benson）、约翰·布伦特、查尔斯·布伦特（Charles Blunt）、约翰·卡斯沃尔等等一共三十人。在这三十人当中，直接担任政府显赫职位的至少有九人，例如，罗伯特·本森就是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至于其他的董事会成员，不是封爵受禄的贵族就是做生意发财的英国富贾。不过，在由英国社会权贵阶层组成的南海公司董事会名单当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具有在南美洲做贸易的经验，甚至没有一个人到过南美洲。[36]而约翰·布伦特也乘其便利，直接将手下的刀锋公司变为了南海公司背后的证券公司，实质上也就是为南海公司的贷款提供“现金”的私人银行，南海公司的董事，有不少也身兼刀锋公司的管理职务。[37]

很快，南海公司开始兴建他们的办公大楼，大楼的位置就选择在伦敦针线街与主教门大街（Bishopsgate）的交会之处。四角形的大楼上下一共有四层，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可以说修建得富丽堂皇，而建筑所采取的砖石结构，则显得非常气派、厚重。似乎，南海公司想要透过这座建筑来暗示他们的投资者，公司的业绩和股票也将像这座南海大楼（South Sea House）那样，坚实而牢固。

英国著名的散文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在1791年9月到1792年2月曾在南海公司做小职员，其间的主要工作，便是帮公司做账本，工资合每周半个基尼。[38]在他的散文集《伊利亚随笔》（Essays of Elia）里，兰姆曾有一篇关于南海公司忆旧的文章，开篇就提醒前往伦敦针线街的旅行者：“难道你就没有注意，从针线街拐向主教门大街的左首，有一栋外表壮观、神态凄凉的砖石结构大楼吗？恐怕，你看了它那敞开的大门，露出幽暗暗的庭院，其中曲廊回绕，圆柱矗立，却罕有人迹出入，一眼望去，只见像巴克鲁萨似的一派荒凉景象，你也不免要常常流连一番吧。”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英国散文家，代表作品有《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伊利亚随笔》等。兰姆出身贫寒，因口吃未能升入大学，1791—1792年曾在南海公司做小职员。

兰姆的这番描述，以文字形象地呈现了南海公司大楼的外貌，但《伊利亚随笔》至19世纪才出版，南海公司大楼的“容貌”可以说已是面目全非，再加上1773年公司另起炉灶，修建新大楼，那么旧址的风貌就更加湮灭不可考了。虽如此，下笔有神的散文家兰姆对于南海公司旧址在针线街昔日的繁荣景象却仍然有一番令人感喟的回想：“往年，这里是一家公司——熙熙攘攘的商业活动中心。那时，大批商人为赢利的欲望

所鼓舞，纷纷来到这里——如今，这里仍然进行着某些交易活动，可是过去的那种热火朝天劲儿再也没有了。现在，这里仍然可以看到雄伟的柱廊，阔大的楼梯，办公室宽敞得如宫殿里的豪华大厅……在那些壁板上悬挂着已故的经理和副经理的画像、安妮女王的画像，以及来自汉诺威王室的两位国王的画像；悬挂着极大的海上航线图——后来的地理发现已使它们成为古董……在这些建筑的下边，还有一排排巨大的地窖，往日里数不清的金银钱币曾在那里存放，形成‘不见天日的窖藏’，足够让玛门去安慰他那孤寂的心；——然而，那次鼎鼎大名的骗局像气泡一般破灭时，这一切财富都一下子荡光散尽了。”[39]兰姆的笔触，夹带追忆与想象，在落寞的思绪之中，不禁让读者对这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南海公司心生悲悯。

不过，在公司刚刚成立的岁月里，无论南海公司的内部人士还是一般的投资者，人们的情绪哪曾有过半点的“落寞”甚至“悲悯”？相反，当时人们对南海公司的期望，怎么估计也不会为过。所有的人都带着极度乐观的心情看待这座新成立的公司。这些人根本无法想象公司日后为他们带来的灾难，他们唯一愿意做的，是满怀希望地往这家经营遥远的南美洲贸易的“国有公司”投下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赌注。

人们的热情与希望又来自何方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南海公司的“吹鼓手们”，若不是他们有意或无意间对南海公司的“吹捧”，人们那种盲目的乐观情绪，日后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被激发出来。其中一位最富盛名的“吹鼓手”，便是受后世小说界和新闻界推崇的丹尼尔·笛福。



南海公司大楼原貌。

著名报人笛福在投身小说创作之前，以撰写报刊上的政论文章见长。不过，在1703年他却因言获罪，导火索是他在当时撰写的一本政论小册子里，以激烈的言辞批评了英国的教会和政府，政府于是将他拘捕，并投入监牢。这件事对他打击不小。狱中的笛福意志低迷，思想绝望，不过，就在他感觉人生已丧失希望的时候，转机却出现了。他兴奋地在一封狱中信笺写道："当我躺在纽盖特（Newgate）监狱，无依无靠，极度沮丧的时候，我的家庭已经分崩离析，我本人获救的可能也微乎其微。而就在这时，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士为我带来了好消息，在这之前，我甚至谈不上与这位人士相互认识。"[40]

这位给笛福带来新转机的神秘人物就是罗伯特·哈利。早在笛福纵横伦敦新闻界之时，哈利就颇为赏识笛福的才华，只是二人一直无缘相识。笛福此番坐文字监，反而让时任议会下议院议长的哈利有了直接与笛福接触的机会。在笛福入狱后不久，哈利就开始动用人脉关系，经过一番努力，最终将他释放出狱，作为交换，感恩戴德的笛福也很自然地开始支持起哈利和托利党政府的政策。

1704年，笛福创办了支持哈利政府的政论刊物《法国事务评论》（A Review of the Affairs of France），内容主要涉及西班牙的战事，该刊物每周发行直到1713年战争结束。在这段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笛

福通过办刊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支持托利党政府以及罗伯特·哈利的政策。[41]

笛福支持哈利的言论内容又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尽早结束这场与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因为战争越早结束，对于南海公司来说，就越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当时，英国已在这场战争中占得优势，一场和平谈判并非不可能。[42]而和平一旦达成，那就意味着西班牙有可能出让在南美洲的贸易权，英国也将拥有一个更加安定的南美洲贸易环境，南海公司的生意，就将做得更为顺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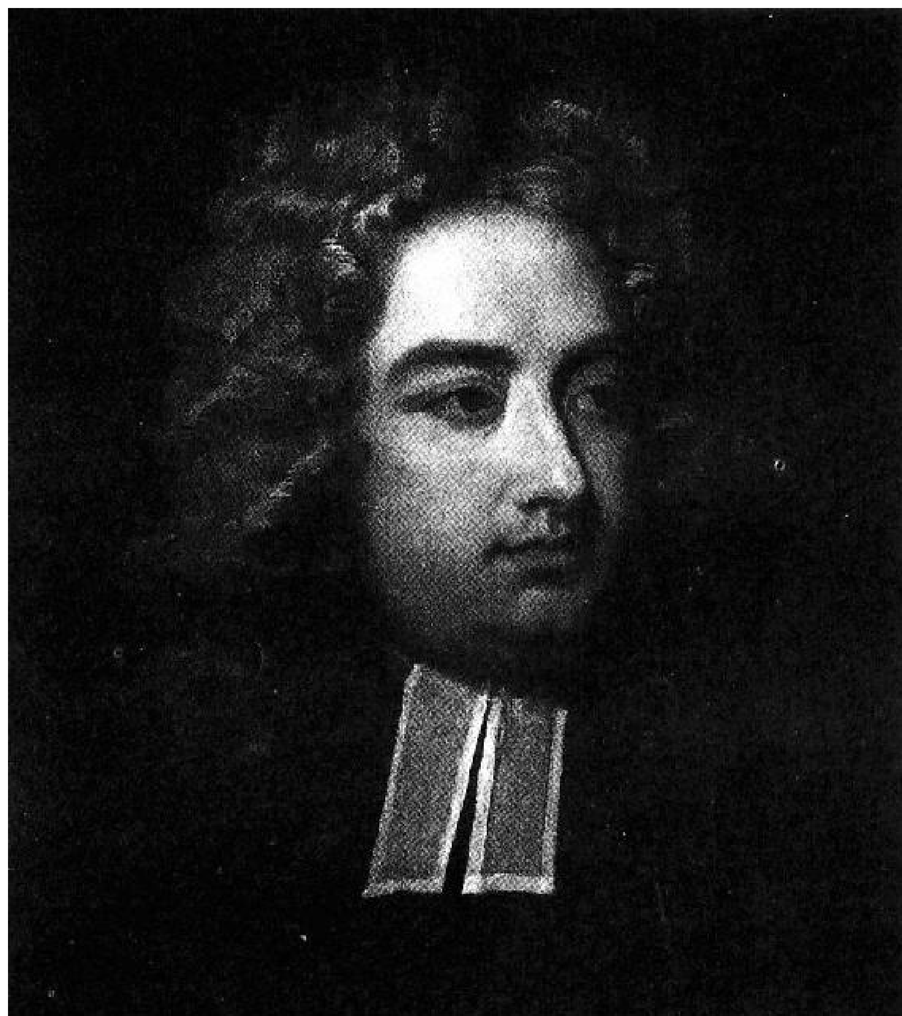
因此，在南海公司成立的那一年，笛福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题为《为什么这个国家应该立即停止这场昂贵的战争》。在那篇文章里，笛福火力全开，义正词严地声讨了英国卷入的这场不义之战，评论说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为债务问题埋单的将是全体国民的利益。并且，他还为战争结束后英国的美景做了一个期许。1711年年底，笛福又印行了一系列小册子。笛福通过他操作的新闻媒体所发表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英国公众的思维，这让包括哈利在内的托利党上上下下都感到很满意。[43]

笛福在反战的同时，还发表了不少支持南美洲贸易的言论。他在一篇谈南美贸易的文章中写道："如果要进行南海贸易，我们必须理解的是，我们必须拥有南美洲那些属于我们或者目前还不属于我们的港口和地盘，这些地方我们根据一份协议应该据为己有，就像殖民地那样，用来种植和居住。并且在那里建立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无论它是西班牙还是别国的属地……我认为这就是政府应该考虑的贸易方法，也是南海贸易的意义所在，这个问题绝非琐碎不足取，实际上这意味着人们想象中的那座金山。南美洲的贸易不仅是极好的，而且将会被证明是最伟大、最有价值、最多利的贸易。它将促进英国贸易分支的增长，因此，其间的任何冒险、投机、付出、痛苦都是值得的。"[44]言语之中，笛福已经不甘于当一个单纯的写作者，而几乎是迫不及待要跳出纸面为南海公司鼓与呼了。

1711年伦敦的"和平主义者"并不止丹尼尔·笛福，还有一位富有盛名的小说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他也曾撰文支持和平。作为爱尔兰教会驻伦敦的代表，斯威夫特的思想表现出了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因此在战争问题上，他与笛福一样，也持有一种强烈的反对态度。[45]哈利当时是英国的王室财政大臣，而且前一年主战的辉格党在英

国议会的失势让主和的托利党成为政坛新星，二者在“和平”问题上的一致也让斯威夫特得以被哈利和托利党所接纳，不知不觉间成为他们的盟友兼政治宣传工具。由此看来，哈利可以算是英国历史上最早开始懂得利用媒体力量的政治家。

无论是笛福还是斯威夫特，他们思想上都是极度自我的作家。如果认定了一件事情，他们会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且认为，这就是所谓作家的“品格”。然而，保持这样想法的人最容易受人蒙蔽，心理上也不太勇于自我批判，因此笛福和斯威夫特两人的性格弱点也就为哈利这样的政坛老手轻易利用。46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国作家，代表作为《格列佛游记》。18世纪初，斯威夫特大力支持和平政策，为托利党及罗伯特·哈利所利用。

尽管有笛福、斯威夫特这样的知名人士为托利党的和平政策大肆鼓吹，但南海公司刚刚建立的时候，人们对它还难免有些将信将疑，毕竟，伦敦的投资者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玩股票的经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因此，在1711年9月14日，第一次股东会议召开的时候，鉴于南海公司与政治圈的关系如此深厚，有不少外部投资者认为这潭水太深而持谨慎观望的态度，没有立即购买公司股票。正当公司董事为此发愁的时候，他们却发现有一份时人编写的歌曲在伦敦的大街小巷流传开，这首名为《南海的奇想》（The South Sea Whim）的歌中唱道："我们这群阴险的人鱼龙混杂，比天气更多变，但我们都是些新老债户，被混合在一起；水手、士兵、商人、流放犯、记账人，就像是被拴成一串的奴隶。"[47]

南海公司的人员被歌曲编写者描绘成了一群阴险奸诈的小人和乌合之众，这似乎说明在民间其实他们难以博得大多数人的好感。史实的记载也的确是如此，伦敦的投资者们最初对这家含着金汤匙诞生的"国有公司"并没有百分之百的信任感，因而人们对南海公司股票的认购并未出现像后来一样的疯狂。直到1711年年底，南海公司的股票均是贱价出售，价格相当于股票实际面值的76%。[48]

公司自身过于复杂的"背景"，固然是人们慎言投资的一个原因，此外，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事延绵不停，也是让人们对英国未来的南美洲贸易不太放心的重要原因之一。种种因素相互作用，使得这一时期的英国人民对于政治家的言论缺乏信任。[49]罗伯特·哈利和他的同僚们深知，仅仅靠几个舞文弄墨的刀笔小吏，还不足以说服人们乖乖掏出口袋里的钱购买南海公司股票，只有让实际的和平尽快在西班牙和英国之间到来，未来南海贸易的利润对于投资者来说才具有诱惑力。

和平是当务之急，托利党政府信用的恢复和对公共债务的偿还均系于此。哈利的一位幕僚对他建议，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赶紧把舰队送往西印度"[50]。因为只有占领了该地区，纸上的和平才能成为现实。哈利欲实现"南海计划"，就必须让英国议会尽快支持自己的和平政策。对于曾经是下议院议长的哈利来说，想要下议院通过自己的和平政策并不是什么难事。问题在于上议院。当时，英国的议会上议院主要是由辉格党的贵族议员组成，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死硬反对派，托利党和哈利想

过上议院这一关，注定会遭遇阻力。

自光荣革命以来，现代政党政治的雏形已经在英国议会初见端倪，政党之间以笔墨攻讦，互相谩骂、拆台的现象已是家常便饭，因此，辉格党上议院拆哈利和托利党下议院的台乃是议会政治的题中之义。人们看着两党围绕“和平”的问题互不相让，非常着急。甚至民间有谏言的小册子，希望哈利等政治家能够放弃政党的小利益，将托利党和辉格党团结起来，为英国社稷谋福利。[51]哈利自然不会如此天真，他非常清楚，辉格党上议院的目标现在归根到底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托利党从执政的位置赶下来，一雪前耻。因此，尽管推行和平政策、尽早结束与西班牙的战事符合大多数英国人的意愿，上议院仍然百般阻挠，让哈利的和平政策无法获得有效的支持。

困厄之下，哈利心生计谋。他决定和托利党的另一位领袖博林布罗克子爵（Viscount Bolingbroke）共同游说安妮女王，希望获得允许在上议院新增设十多名贵族议员席位，以此冲淡辉格党议席所占的比例，从而削弱上议院对托利党政策的干涉。在这之前，哈利争取到了一些立场居中的托利党议员的支持，这些人在辉格党执政期间一直受排挤，得不到重用，因此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对哈利抱有绝对的支持态度，此外，这些新增的托利党贵族议员，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获得擢升之后，亦对女王表示出了效忠。[52]女王同意了哈利的建议，为托利党增设了席位，最后哈利的政策也得以通过。哈利此招，既拔掉了“辉格党上议院”这颗眼中钉，又巩固了英国王室对于托利党的感情支持，可谓一箭双雕。

此外，老谋深算的哈利为了尽快取得和平，甚至不惜采用特别手段干涉司法，以贪污的罪名将好战的辉格党政治对手送进了监狱。更有甚者，哈利干脆绕开议会，以个人政治影响力直接干涉前方军队的作战指挥。在战争结束的前几年，英国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得消极怠战。南海公司成立的法案在英国议会通过仅仅一个月左右，哈利就迫不及待派出了他的另一位文臣，著名的诗人外交家马修·普莱尔（Matthew Prior）前往法国商讨和平事宜。不过，当时法国的外交部长看见不争气的英国军队作战消极，希望多捞一些谈判筹码，因此没有即刻答应普莱尔提出的议和要求。遭到拒绝的普莱尔情急之下拍案说道：“我们是一个贸易国家，因此我们必须要保护我国的交通安全！”[53]

普莱尔的这句话，确实足以代表当时英国国内那些急切的“主和

派”的普遍想法。原本，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开始以来，得益于军事统领马尔伯勒公爵的能征善战，英国这些年在与法国和西班牙的军事行动中是占据一定优势的。但是在战争最后几年“急切盼望和平到来”与“和平压倒一切”的情绪下，英国在议和谈判中似乎反而占不到什么优势，甚至成了弱势的一方。在英国“主和派”的斡旋下，到1711年10月，英国和法国初步达成了一个和平协议。西班牙起初不打算接受这个协议，但迫于法国施加的压力，也只得妥协。1712年10月，经过一年多的唇枪舌剑、讨价还价，英、法、西三国就和平协议的各条款初步达成一致。而当协议实际上签署的时候，距离南海公司建立已经过去了两年。这两年期间，南海公司为英国在南美洲贸易所做的努力，几乎为零。[54]

1713年4月，和平条约终于签署。这份名为《乌得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的文件，规定路易十四之孙可以继位为西班牙国王，但条件是西班牙和法国不得合二为一。英国还得到了从地中海的直布罗陀到西印度的圣克里斯托夫岛的广大领地。[55]这份协议预示着战争正式结束，和平重临英国。对于托利党和南海公司的内部人士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大好消息，多年翘首以盼和平的他们也得以长长舒了一口气。南美洲贸易的最大障碍，现在看来似乎已经扫除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果真如他们的期待那般顺遂吗？来看看具体签订的条款就不难理解，和平的到来并没有对南海公司的经营者和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实际好处。

条约规定，英国每年只可以派出一艘载重为五百吨的船只，前往中南美洲的规定海域进行贸易，时限为三十年。这条规定一旦生效，那么南海公司就会自动继承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的奴隶贸易特权，可以向英国在南美洲各地特许设立的工厂和种植园贩卖奴隶。[56]但同时，英国与西班牙政府也将享有公司利润的1/4，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还将从每年的公司利润中额外提成5%，以作为英国船只获准进入该海域的“过路费”。

这份和平协议无论怎么看都更像是一份出卖自身利益的“不平等协议”：西班牙某种程度上成了受益的一方。南海公司的舰船只被允许以每年一艘的缓慢速度由大西洋向中南美洲进发，并且，每次贸易还要被征收高昂的税费。不知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为何物的西班牙政府层层寻租，徒令交易成本上升。再者，贸易种类也受到严格的限制，除了贩卖奴隶这桩血汗生意之外，公司不被允许从事其他任何种类的贸易。而签订的

这些贸易条约最让人感到不牢靠的是，它完全是建立在英国和西班牙取得的暂时性和平的基础上，一旦两国交恶，英国在中南美洲贸易的安全性就更加不堪设想。令人遐想的南海，在如今的和平时代反而具有了一张薄利而多灾的贫瘠面容。

经过上述分析，可见《乌得勒支条约》对南海公司的投资者来说绝对算不上是一个能令他们手舞足蹈的好消息。协定签署的当年，就有人评价这份和平协议是“一份对于国家利益贡献几乎为零的协议”[57]。此话不假，不过，就南海公司自身利益而言，英国签署的这个和平协议毕竟是为南美洲贸易提供了一个政治上的保障，其效果当然要比战时的不稳定局面来得不同。无论如何，英国在南美洲的贸易从此被南海公司名义上独占，其他任何国家都休想分羹。[58]这白纸黑字的条文，正是公司日后用来敛财的最佳保证。

但令公司内部人士感到失望的是，在和平最初到来的那些日子里，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依然和先前一样，并没有出现暴涨的迹象。[59]这是因为在1713年伦敦的金融圈里，南海公司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得到像英格兰银行等主流金融机构的支持，而是自成一个独立运作的金融体系，这未免会给投资者带来隔阂之感。对于这座曾经上演一幕幕金钱游戏的伦敦城来说，诞生不久的南海公司还只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或者说是一名刚踏进赌场的新手。

和平的降临让人们在乐观情绪的裹挟之下很快度过了这一年余下的时光，一转眼，时间来到了1714年。那些一年前还在为和平协议的签订而手舞足蹈的人不会料到，英国即将经历一场更大的变故。

注释

1 Edmund Lodge, Portraits of Illustrious Personages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832, p. 2.

2 William Hay, Stephen Taylor, Clyve Jones, Tory and Whig: the Parliamentary Papers of Edward Harley, 3rd Earl of Oxford, and William Hay, M. P. for Seaford, 1716-1753, Boydell & Brewer, 1998, p. xxvii.

3 Pat Rogers, The Alexander Pope Encyclopedi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4, p. 217.

4 格里高里·曼昆：《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梁小民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p. 72.

5 Michael J. Braddick,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

1550-17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58.

6 诺威奇：《地中海史》下册，殷亚平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1, p. 397.

7 William Thomas Morgan, "The Origins of the South Sea Company"，原载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44, No. 1, Mar., 1929, p. 19.

8 Michael J.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Routledge, 1996, p. 106.

9 Stephen P. Reyna, R. E. Downs, Deadly Developments: Capitalism, States and War, Routledge, 1999, p. 52.

10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0.

11 T. S. Omond, The National Debt: Its Origin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 & G. Shrimpton, 1870, p. 3.

12 完整数据参见ukpublicspending.co.uk网站的Time Series Chart of UK Public Spending统计表格。

13 完整数据参见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网站的UK Government Debt & Deficit统计表格。

14 Richard Dale, The First Crash: Lessons from the South Sea bubb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1.

15 Lewis S. Benjamin, South Sea Bubble, Ayer Publishing, 1967, p. 1.

16 Rosemary O'Day, Cassandra Brydges, Duchess of Chandos: Life and Letters, Boydell Press, 2007, p. 20.

17 E. E. 里奇、C. H. 威尔逊：《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高德步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p. 187.

18 许倬云：《历史大脉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pp. 109-112.

19 Michael Adas, Islamic & European expansion: the Forging of a Global Order,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53.

20 Mary Beth Norton etc, A People & A Nation: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1, Cengage Learning, 2011, p. 38.

21 William Thomas Morgan, "The Origins of the South Sea Company"，原载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44, No. 1, Mar., 1929, p. 18.

22 British Museum, Portland Loan, Harley Papers, 29/28, George Caswall to Robert Harley, 6 Oct, 1710.

23 John Britton etc, The Beauties of England and Wales: or, Delineations, Topographical,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of Each County, Volume 17, Verner & Hood, 1813, p. 56.

24 Linda Frey, Marsha Frey, The Treaties of 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5, p. 106.

25 John G. Sperling, The South Sea Company: An Historical Essay and Bibliographical Finding List, Baker Library,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962, pp. 2-3.

26 Jeremy Black, The Politics of Britain, 1688-1800,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56.

27 David Hayton etc, The House of Commons, 1690-1715, Volume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38.

28 Hiram Caton, The Politics of Progres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ercial Republic, 1600-1835,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88, p. 275.

29 Bruce G. Carruthers, City of Capital: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53.

30 D. W. Hayton etc., The House of Commons: 1690-17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79.

31 Lewis S. Benjamin, South Sea Bubble, Ayer Publishing, 1967, pp. 2-5.

32 就英格兰银行是否具有经营南海公司的银行业务权，托利党与辉格党有很大分歧。哈利深知辉格党的经济实力更为雄厚，如果公司的银行业务由辉格党控制的英格兰银行经营，无疑等于把公司拱手送人。此外，就南海公司董事会如何任命等问题，两党基于自身利益，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详见John G. Sperling, The South Sea Company: An Historical Essay and Bibliographical Finding List, Baker Library,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962, p. 7.

33 Sir John Harold Clapham etc.,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CUP Archive, 1941, p. 388.

34 Lewis S. Benjamin, South Sea Bubble, Ayer Publishing, 1967, p. 6.

35 Andreas Michaēl Andreadēs, 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1640-1903, Routledge, 1966, p. 128.

36 Malcolm Balen, A Very English Decei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First Great Financial Scandal,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imited, 2008, p. 38.

37 Larry Neal, The Ris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in the Age of Rea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06.

38 Charles Lamb, Charles Lamb: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 E. Morpurgo, Routledge, 2003, p. 36.

39 查尔斯·兰姆：《伊利亚随笔选》，刘炳善译，三联书店，1987，p. 2.

40 Thomas Wright, The Life Daniel Defoe,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5, p. 96.

41 Leo Abse, The Bi-Sexuality of Daniel Defoe: A Psychoanalytic Survey of the Man and His Works, Karnac Books, 2006, pp. 135-137.

42 George Watson, The New Cambridge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ume 2 (1660-1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891.

43 James Sutherland, Defoe,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38, p. 182.

44 Richard Lansdown, Strangers in the South Seas: the Idea of the Pacific in Western Thought: An Anth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p. 49.

45 Jonathan Swift & Christopher Fox, Gulliver's Travels: Complete, Authoritative Text with B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Critical History, and Essays from Five 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Palgrave Macmillan, 1995, p. 15.

46 John J. Richetti, The life of Daniel Defoe, Wiley-Blackwell, 2005, p. 372.

47 Arthur Maynwaring, The Life and Posthumous Works of Arthur Maynwaring, Printed for A. Bell, 1715, p. 331.

48 Lewis S. Benjamin, South Sea Bubble, Ayer Publishing, 1967, p. 12.

49 Geoffrey S. Holmes, British Politics in the Age of Ann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1987, p. 51.

50 William Thomas Morgan, "The Origins of the South Sea Company"，原载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44, No. 1, Mar., 1929, p. 30.

51 J. P. Kenyon, Revolution Principles: The Politics of Party 1689-17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50.

52 David Backhouse, Tory Tergiversation in The House Of Lords, 1714-1760, E-Seminars in History,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London, http://www.history.ac.uk/resources/e-seminars/backhouse-paper.

53 Linda Frey & Marsha Frey, The Treaties of 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Dictionary,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5, p. 18.

54 John A. Richardson, Slavery and Augustan Literature: Swift, Pope, Gay, Routledge, 2004, p. 57.

55 Charles Knight, Popular history of England, Volume 5, Bradbury and Evans, 1859, p. 397.

56 William Russell & William Jones, The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pt. II. From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in 1648 to the Peace of Paris in 1763, Harper & brothers, 1839, p. 396.

57 Edwin Ernest Rich & E. E. Rich,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UP Archive, 1967, p. 356.

58 Thomas Henry Dyer, The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From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in 1453, to the War in the Crimea, in 1857, Volume 3, J. Murray, 1864, p. 281.

59 Linda Frey & Marsha Frey, The Treaties of 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Dictionary,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5, p. 414.

第四章　债务问题让国王头疼

——乔治一世时期的英国经济与公债

不懂英语的英国国王

1714年9月的一天，伦敦刚刚退去暑热，阴霾的天气又重临这座蒙了灰的城市。泰晤士河上一片雾霭沉沉。在浓雾中，一艘大型舰船正缓缓靠向格林威治港。岸边的文臣武将早已恭候多时，不消说，面带恭敬之色的他们是为了迎接这艘船上的某位乘客而来，而这位惊动了伦敦政界要员的乘客，其来头想必更是不小。

不多时，只见一个人影由豪华的船舱内走出，出现在了甲板上。他没有去看那些在岸边迎接他的人群，而是望向远方水天相接之处的那些建筑物。但是，伦敦的浓雾让他的目力难以分辨远处模糊的一切，这番糟糕的景象让他皱了皱眉。他唯一能真切感受到的是近处港口人们的欢呼声，尽管不谙英语的他听不懂人们到底在欢呼些什么。船很快在岸边停稳了，这位衣着华丽、留着卷发的男人也在人们的簇拥之下，不太情愿地走上长长的跳板。当他的双脚踏上格林威治口岸的地面时，迎接他的人们才看清，自己的面前是一位粗胖而敦实的中年男人。

这个男人，就是英国的新任国王乔治一世。

乔治一世原名乔治·路德维希（Georg Ludwig），他的身份原本是德国汉诺威的选帝侯，对英国这顶皇冠可以说既无企图之心，也无继承之意，那么，他为什么会在1714年成为英国国王呢？其中的缘由，与英国《王位继承法》（The Act of Settlement）有关。

1701年，英国议会通过的《王位继承法》规定，英王王位由玛丽皇后的后代继承；如玛丽去世时无后裔，则王位由詹姆士二世的另一个信仰新教的女儿安妮（Anne）继位；如果安妮去世后没有直系后裔，那么，英王位应传给詹姆士一世的孙女，汉诺威的索菲娅（Sophia of Hanover）；索菲娅如去世，王位则应该传给她信仰新教的后代。继承法如此设定，是为了防止英国王位再次落入信仰罗马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家族手中，从而巩固光荣革命的成果，达到“限制王权，维护国民之自

由”[1]的目的。

有趣的是，此后历史的发展果然和《王位继承法》设计的一模一样。威廉国王没有子嗣，在他去世后，他的弟媳安妮继位为英国女王。不幸的是，安妮女王虽然一生中多次怀孕产子，但怎奈其后代均早夭，因此安妮生前并未留下子嗣。[2]1714年8月，安妮女王病故，皇冠的归属成了一个问题。安妮不仅自己没有后代可以继位，连顺位继承英国王位的索菲娅也因年事过高而在两个月前去世，依照《王位继承法》的规定，英国的这顶王冠拐了几道弯，最后落到索菲娅已经54岁的儿子乔治·路德维希头上。[3]

这位乔治·路德维希一开始对于英国国王的头衔兴趣不是很大。他原本在今天德国境内的汉诺威安心当着他的选帝侯，在专属的领地之上享受着闲适安逸的生活。而且，路德维希早已耳闻英国伦敦那潮湿而多雾的糟糕天气，对此心生厌恶，最重要的是，他本人连一句英文都不会讲，也无意学习。如此一位“纯老外”来到英国当国王，岂不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因此，路德维希在感情上对自己成为英国国王这件事是一百个不愿意。

他毕竟还是来了，虽然当路德维希正式登上英国王位的时候安妮女王已经去世了两个月。并不算聪明的路德维希非常清楚，英国是一个正逐渐崛起的海上帝国，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当时落后的欧洲大陆，这顶皇冠的分量对他来说也就不言而喻了。汉诺威枢密院的策士们此时也在催促路德维希去英国即位。[4]因此，尽管有诸多不乐意，但离开德国去继承英国王位还是成了路德维希的主动选择，名义上统治英国长达近两个世纪的“汉诺威王朝”，自此开始。就像当年威廉渡海来英就任国王带来革命一样，乔治一世的渡海来英，也为英国带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变动。在安妮女王时代失宠的辉格党，借此重新上台，并迎来了所谓的“黄金年代”。

成为英国国王之前，乔治一世对于安妮女王的托利党政府就有颇多怨言。在商谈《乌得勒支条约》的时候，英国政府方面就完全忽视了汉诺威家族的利益，这让乔治一世对当时执政的托利党不抱什么好感。而且不谙英语的乔治一世之前对英国了解有限，因此在来到英国之后与大臣们的沟通交流多有不便。他刚成为英国国王没多久，辉格党政客又将托利党人和流亡海外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勾勾搭搭的事情告诉乔治二世，加上翻译过程中的信息失真和故意的添油加醋，乔治一世听闻后，对托

利党的厌恶之情就更甚了。[5]

可以说，乔治一世从一开始就不待见托利党，他在成功戴上这顶英国皇冠之后，立即罢免了托利党的众多大臣，转而任用了一大批辉格党党员担任要职。辉格党领袖汤曾德子爵（Viscount Townshend）被任命为国家首席大臣，斯坦诺普伯爵（Earl Stanhope）被任命为次席大臣，贵族院总理由考珀（Cowper）出任，马尔伯勒公爵丘吉尔则重回军队最高领袖的职务，哈利法克斯（Halifax）出任最高财政贵族长官……他们都是清一色的辉格党人，唯一身居高位的托利党人仅仅是担任国王顾问会主席的诺丁汉公爵。[6]当然，乔治一世并没有办法亲手把托利党搞下台。在英国境内，议会拥有最稳固的政治权力，不通过它，任何政治动作都寸步难行，而区区国王，只不过是在议会政治流程中走一个过场而已。官员的任免虽然表面上出自国王之令，但在这些命令的背后，实际上是辉格党控制的议会所施加的政治影响力。



乔治一世（George I of Great Britain，1660—1727），“神圣罗马帝国”的汉诺威选帝侯，因为《王位继承法》的规定而“意外”成了英国国王。

但实际上，把托利党赶下台这件事也无须劳烦外人动手，托利党本身已开始“自毁长城”。在汉诺威王朝初期，有些英国人背地里窃窃私语：像乔治一世那种连自己的属地都治理不好的人，又怎么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呢？人们并不欢迎这位平庸的国王。因此，在乔治一世摄政之

初，英国底层社会反对国王的暴乱事件层出不穷，社会动荡不安。一些英国人打心底认为，乔治一世根本不应该成为英国国王。[7]托利党在愈发处于党派政治博弈劣势的时候，决定利用人们对汉诺威王朝的这种反感，收复自己的政治版图。

于是，乔治一世头上这顶王冠还没戴稳，对汉诺威家族抱有敌视态度的一些托利党人就联合英国境内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发动武装政变，企图复辟斯图亚特王朝。詹姆士二世闻讯也渡海亲往苏格兰，准备联合各方反对乔治一世的势力由北向南一路杀向伦敦，夺取王位。詹姆士二世想要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自然少不了英国境内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和一部分托利党人里应外合。

詹姆士二世的"光复计划"很不走运地再次落空了，君主立宪之后的英国人心思图稳，谁也不想再打劳民伤财的内战。有些英国人的确反对乔治一世的统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希望斯图亚特王朝复辟。[8]而与复辟势力眉来眼去的托利党此时或许忘了，所有英国议员在当年威廉国王登基后不久都曾集体宣誓说，他们将誓死效忠新教君主，拒绝向君主施加任何继承自斯图亚特王朝的头衔。[9]如今他们又企图武力推翻英国的新教君主，等于是违背了当初的诺言，道义上如何取信于人？因此，这场丢失了既往政治原则的叛乱最后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以失败告终，托利党为此信誉扫地，有不少党内领袖被捕或被流放。[10]大势已去的托利党继而在1715年的选举中输给了东山再起的辉格党。辉格党利用对手的这次"政治失误"，再次成为英国的执政党。

辉格党的此番胜利，虽然源于托利党自身在政治策略上的失算，但似乎也有"胜之不武"的嫌疑。据史书记载，在安妮女王临死前，有两位辉格党公爵冲进女王寝宫，来到卧榻之前，说服了行将就木的她委派其中一人成为国家的财政大臣。这使得辉格党确保了在接下来的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11]而像罗伯特·哈利和已经与他反目的博林布罗克子爵这样的托利党政客，此时还在忙于权力内斗，等他们从党派内部利益中回过神来时，却发现他们长期依靠的安妮女王已经过世，英国政局风云将变。果然，就在安妮女王过世的前几天，她免除了权臣哈利的皇室财政大臣职务，没过多久，已经失势的哈利被送进了伦敦塔监狱。

哈利遭受议会弹劾并接受审判的时候，恰好是托利党人和詹姆士二世党人密谋造反的传言愈演愈烈的节骨眼上。他被捕的罪名是里通外国，为法国国王献计献策。[12]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哈利等人从受

审到被羁押，只用了几个星期，速度之快，足见当时政治力量对司法的干涉。其后，博林布罗克子爵也受到了议会的弹劾。

手段实在是利索，心肠实在是狠辣，如此高效率地铲除异己，非大政治家做不出来。当哈利1715年6月在议会下议院接受弹劾时，他与自己的一位“老相识”打了个照面。此人名叫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新任的英国下议院的反对党领袖，同时也是托利党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

沃波尔1676年出生于诺福克郡（Norfork）一个地主家庭，就学于伊顿公学和剑桥郡皇家学院。1700年，他当选为地方议员，仅仅一年之后，他就进入下议院成为议员。接下来的几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爆发，沃波尔转入英国军队任职。从了军的沃波尔可谓风生水起，没花多少时间，他就官拜陆军大臣及海军财务长。[13]但这位“准军人”沃波尔与纵横政坛一时的哈利又有何瓜葛？原来，当年哈利用“贪污”的罪名送进伦敦塔监狱的辉格党政治对手当中，就包括这位从海军财务长任上辞职不久的辉格党员。[14]汉诺威王朝的到来，让辉格党时来运转，重新执掌政府，而作为辉格党领袖重回英国政治权力核心后，沃波尔立即给这位老对手来了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将托利党人哈利送进了当年曾经羁押自己的伦敦塔监狱。

当年，沃波尔被哈利送进伦敦塔，但并未就此葬送政治生命。由于关押政治犯的伦敦塔没有禁止探监的规定，沃波尔在蹲牢房期间并未与外界隔绝。相反，他的牢房里经常是人满为患，他的朋友、政治联盟者、下属等等络绎不绝，前来探望。马尔伯勒公爵、前任财政部长戈多尔芬（Sidney Godolphin）等头脸人物都是他的座上宾。[15]因此，沃波尔在狱中信息十分灵通，不出牢房而得以洞晓英国政界大小事务。仅仅六个月之后，他就被朋友设法从伦敦塔监狱释放了出去。当初哈利将沃波尔等人投进监狱，为的是让自己的和平政策尽快得到议会的认可，在这个目的达到以后，他本人对于沃波尔出狱以后到底在干些什么，根本就不关心。然而，沃波尔是一个记仇的人，在重获自由之后，他暗暗发誓要把让自己饱尝铁窗滋味的哈利等托利党人搞下台。



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极富政治手腕的英国政治家，借由南海公司的丑闻而获得大权，成为英国“第一首相”，此后主导英国政权约二十年。

沃波尔没等待多久就达到了目的，他顺利成为内阁成员，亲眼目睹几年前送自己进监狱的人遭到政治清算。但是，沃波尔把哈利送进监狱后，自己却也在重复哈利以前走过的老路。如果说哈利是第一位懂得如何运用报刊和文字的宣传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政治家，那么沃波尔对于刚刚发展起来的新闻媒体的利用，则可以说超越了他的这位“前辈”。例如威廉·阿诺尔（William　Arnall）等当时的知名新闻界人士，均是沃

波尔的御用记者，为沃波尔服务一年的劳务费为400英镑。如此高的薪酬，同样以此为生的笛福却花了好几年时间才从哈利手里拿到。[16]而沃波尔手下的写手和作家，数量远远超过哈利豢养的文人，宣传自己、诋毁对手的力度，只会比哈利变本加厉。

恰如当代历史学者保罗·兰福德（Paul Langford）所言，18世纪的英国政客不再像以前那样考虑如何绕开议会而达到政治目的，他们盘算的事情变成了如何使用政治手腕直接操纵议会，让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17]之后的历史进程告诉人们，沃波尔无论在利用个人权力影响议会还是对媒体的政治操纵方面都明显超过了哈利。而托利党在英国的失势，尤其是哈利的垮台，更让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感到，这个把英国议会搅得天翻地覆的沃波尔和他身后的辉格党，绝对不是省油的灯。

沃波尔的后台实际上是他的妹夫，辉格党领袖汤曾德。一夺取议会领导权，他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大搞秋后算账，那些曾参与詹姆士二世党人叛乱以及与西班牙的贸易谈判的托利党人，接连遭到委员会的审查与弹劾。[18]作为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沃波尔曾在议会下议院里拍案怒道："我带着强烈的愤怒看到这个伟大的团体里面，竟然出现了这样不堪的成员，他们竟然会毫不脸红地张嘴为暴徒和弑君者说话。"在充满敌视和仇恨的情绪下，沃波尔把他的政敌一个个投进了监狱。[19]从前和哈利等托利党人走得很近的政客和商人们不由得担心起自己的前程，生怕因为历史上曾经站错队而身败名裂。这其中，就包括南海公司的几位创建者。他们此时不得不开始政治上的一次"自救"。在哈利成为汉诺威王朝的政治斗争牺牲品的同时，约翰·布伦特等人已经在开始为南海公司在新王朝的生存而四处奔走。

布伦特不可能以南海公司的名义直接去拉拢哈利的死对头沃波尔和他的同党们，他明白这肯定会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于是，他将注意力转向汉诺威王室和辉格党的其他成员。布伦特向上层层疏通关系，找到乔治一世的儿子，新任威尔士王子乔治二世[20]，并邀请他成为南海公司的主管，取代哈利过去的位置。而作为交换，威尔士王子会得到公司赠予的价值不菲的年金。威尔士王子应允成为南海公司主管。两年后，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南海公司将它的一艘商船命名为"皇家王子号"（Royal Prince）。[21]

透过威尔士王子，布伦特接触到了更为关键的人物——英王乔治一世。面对乔治一世，布伦特还是使用老招数，开门见山向他说明了投资

南海公司将会带来的可观利益，乔治一世听闻后，兴趣盎然。在布伦特的游说下，天性好利的乔治一世经不住诱惑，主动认购了大量的南海公司股票。布伦特通过这一招，等于把英国国王也拉入了局，虽然他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让国王直接挂职南海公司，但乔治一世认购的大量股票实际上是间接在为公司背书。而两年之后，议会更是通过法案，让国王直接成了南海公司的主管。[22]与此同时，布伦特对公司的内部领导层也进行了一次“政治大换血”，之前隶属于托利党的董事和高官，悉数被剔除出南海公司核心层之外，重新获选的公司董事中，不少人都“恰好”是辉格党党员。1715年，南海公司在尚未实质上大规模从事南美洲贸易之前，已经完成了一次政治上的自救。布伦特的智慧让它顺利获得了汉诺威王室和辉格党的支持，在英国经历新朝廷和新政府换血的阵痛时，南海公司这个原本贴有政治标签的公司，不但没有一蹶不振，反而进一步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布伦特的政治敏锐度和商业手段，的确高妙。

滴血的奴隶贸易锁链

1717年，距离南海公司的最初成立已经过去了六年。这六年间，南海公司在南美洲贸易的业绩实在乏善可陈。然而，在伦敦金融城内，南海公司的股票六年以来一刻也没有停止运作，在英国政治圈里，公司的游说一刻也没有停歇。这实在让人感到讽刺，如果一家国家授权的公司开业六七年，除了和政客拉关系、向人们吹嘘自己的业务利润如何丰厚之外，几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这还算是一家值得信任的公司吗？

普通人对它是否信任，这对于南海公司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关键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取得政府对自己的信任。为此，南海公司和英国政府又在背地里开始了一次利益交换。在着手南美洲的贸易业务之前，南海公司必须先获得新一届英国政府的支持。在君主方面，布伦特已经利用乔治家族对金钱的贪恋而获得了汉诺威王室的好感。而面对虎视眈眈的辉格党议会，布伦特除了要让公司在政治上向辉格党“表决心”之外，还给予了英国政府实际的经济利益。他面带笑容地告诉英国政府：南海公司将要降息。

布伦特向政府作出的这个承诺完全是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英国政府向南海公司的借债已高达950万英镑，年息为6%，布伦特主动将这个数字降到5%，这等于是变相降低了政府的财政负担。[23]不仅如此，

1717年，公司还为政府提供了一份价值200万英镑，利息为5%的贷款，用来偿还1711到1712年间发行彩票所损耗的费用。[24]换句话说，英国政府从南海公司那里得到了低息的好处，而作为交换，南海公司自身持有的政府债务比以前更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金钱链条的捆绑而愈发显得“亲密”。

这就是南海公司，贸易上建树有限，政治上左右逢源，行事风格又是唯利是图、我行我素，毫不在乎投资者们对它的评价如何。现在，在正式挂牌开张多年之后，它终于要派出第一艘船驶向遥远而神秘的南美洲了。他们在那片遥远的海域贩卖一项当时最为流行的货品——黑奴。

其实，贩卖黑奴的生意在欧洲由来已久。早自1440年，欧洲的海外商人就开始在非洲沿岸的殖民地贩运黑奴，从14世纪到16世纪早期，黑奴贸易主要掌握在开辟新航路的葡萄牙人手里。不仅如此，葡萄牙殖民者的商船队还从非洲掠夺了大量金银、宝石、象牙等物品，并将其源源不断地运回欧洲。[25]这为席卷欧洲的经济革命埋下了伏笔。而到17、18世纪之交，经过数个世纪的开发，海上新航路对于欧洲各国来说，早已不再是什么秘密，各国纷纷成立了专营殖民地贸易的国有公司，争先恐后地在北美、南美、非洲、亚洲开辟殖民地。

欧洲最早的冒险家们来到其他大洲寻找财富时，原本只是打算做一锤子买卖，压根没想过做什么长期贸易。强盗一般的他们以坚船利炮为手段，直接从当地土著手里抢夺金银珠宝，然后把抢来的财富运回他们的国家，献给君主，自己从中获取收益。但是，当土著的黄金被搜刮得一干二净之后，如果还想要发现更多的贵金属，唯一的办法就是开采地表以下的金属。[26]这就需要冒险家们在殖民地修盖矿场，并且安顿下来长期工作、居住。这些专属于某一国探险家们的工作地和居住地，就慢慢演变为该国的殖民地。对于荷兰、西班牙这样的欧洲海上国家来说，经营殖民地的好处除了采矿之外，还可以弥补本国国土有限的经济短板。因为殖民者们发现，土壤肥沃的殖民地不但蕴藏着丰富的贵金属，而且还可以大规模发展种植业。欧洲国家普遍面积狭小，而且多处于高纬度地带，因此种植作物的数量以及种类都会受到天然的限制。但是一旦建立了海外殖民地，那就意味着该国拥有了面积更广阔、纬度分布更多样的土地，因地制宜在殖民地开办种植经济作物的种植园，也就成了殖民地宗主国一条生财的捷径。

但是，三四百年前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根本见不着机械化生产

的半点影子，人们的劳动还是基本靠手，因此殖民地的种植园需要大量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如果从本国运送劳动力前往殖民地，成本过高，而且不实际。相反，生活在殖民地的土著有效地弥补了当地的劳动力短缺，他们屈服于殖民军队的暴力，成为种植园主的奴隶，被迫为主人劳作。不过，这些土著奴隶，毕竟数量有限，再加上肆虐欧洲的天花等传染疾病，也被殖民者用商船带到了美洲等海外殖民地，大量奴隶因为感染传染病而死，殖民地的劳动力很快又陷入短缺。[27]与此同时，随着专营殖民地贸易的"股份公司"商业模式的推广，欧洲国家在海外圈地的速度越来越快。面积广阔的种植园，亟需更多的劳动力填充进去。

欧洲的商人们于是把注意力转向了那些被他们划归为"人形牲口"的非洲黑人。这些"野蛮人"身体强壮、能干少吃，并且售价低廉，一个黑人的工作效率相当于好几个美洲土著。如果把他们作为劳动力单位分批卖到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绝对是一桩利润很高的买卖。如此丰厚的劳动力资源，欧洲商人们当然不会不充分加以利用。于是，在大西洋两岸贩运黑奴的生意在利益的驱使之下应运而生了。据统计，在长达数世纪的奴隶贸易过程中，被贩运的黑奴总人口达到了11,863,000人。[28]

18世纪初叶，崛起的英国刚刚踏上它的"帝国之路"，海外殖民地的面积正在迅速扩张，相应地，殖民地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自然不小。英国新开发的分布于美洲地区沿岸的殖民地，让奴隶贩卖成了海外贸易的一个主要项目。专属经营北美殖民地业务的皇家非洲公司承包了贩运黑奴的大多数业务，他们在伦敦港将纺织品、玻璃球、火器、金属器皿装上商船，然后驾船驶往西非沿岸，高价卖掉这些货品，并用一部分盈利在当地购买大量黑奴，用绳索和链条将这些"货物"捆绑起来，运往美洲的殖民地，卖给种植园主、农场主和矿山的主人。[29]依靠着这条贸易链，英国攫取了巨额的财富。在1708到1710年，皇家非洲公司总共从伦敦总部派出了六艘商船，从海外种植园派出了两艘商船专门贩运黑奴。伦敦港和布里斯托港的奴隶交易共达84次。[30]具有优良港口和工商业基础的伦敦此时已成为欧洲最繁荣的奴隶贸易中心之一。而南海公司，正位于伦敦这座贸易中心的中心。

在针线街上，在公司旁边的咖啡馆里，人们对南海公司即将参与的奴隶贸易议论纷纷。公司通过《乌得勒支条约》继承了皇家非洲公司从事奴隶贸易的特权，这在旁人眼里无疑是让他们羡慕甚至眼红的暴利生意。要不是因为以布伦特为首的公司高层人士对奴隶贸易知之甚少，只

关注公司金融层面的操作，南海公司的奴隶生意或许早就正式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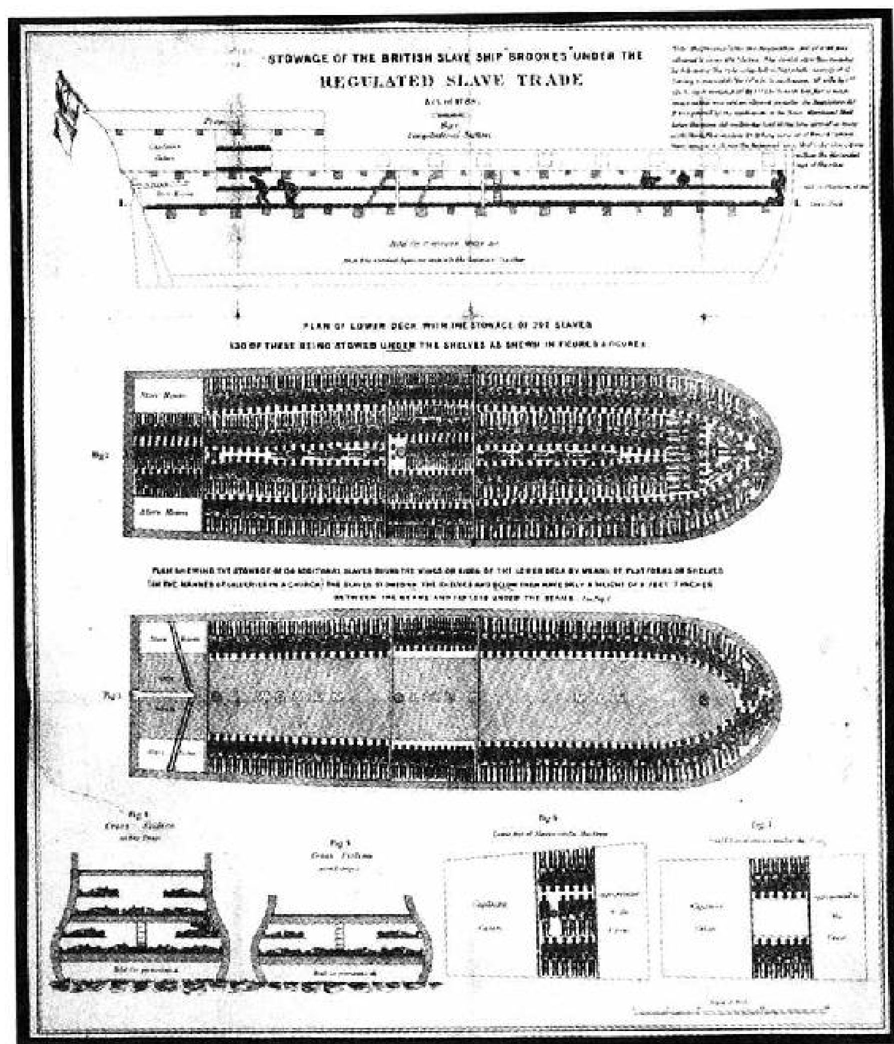
根据英国与西班牙签订的协议，南海公司每年能够贩运4,800个黑奴单位（女性黑人相当于0.8个黑奴单位）。[31]然而，南海公司并没有完全遵守规定行事，因为在奴隶运送的过程中，疾病和暴力所造成的死亡是常有的事，而且公司不时会钻规定的空子，悄悄派出一些私人商船前往南美洲进行奴隶贸易在内的各种商业活动。[32]据统计，早自1714年，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已经开始派遣一些船只进行奴隶贸易，为此，公司还特地向广大投资者募集了价值20万英镑的债券。[33]公司董事们的腰包，开始变得鼓鼓囊囊。自此以后，南海公司才开始真正把注意力转移到海外奴隶贸易上来，每年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派往南美洲的商船也越来越多。1718年，南海公司在南美洲殖民地靠岸卸货的商船多达40条。[34]

虽然奴隶贸易富了南海公司的董事们，也让伦敦、布里斯托等地的商人发了一笔横财，但这趟跨大洋的贸易对于被贩卖的“商品”——黑奴来说，无异于有去无回的地狱之旅。当时，那些用来运送奴隶的商船卫生设备简陋，木质船舱肮脏、潮湿而狭小，奴隶被捆绑成堆，毫无秩序地“堆积”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在茫茫大海上忍受着长达数月的摇晃和颠簸。加之贩运他们的商人在旅程中对于食物和水的克扣，奴隶在中途病死或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据资料统计，南海公司注册在案的奴隶贩运数量达到34,000人，但最后真正在南美登陆上岸的奴隶只有不足30,000人。[35]也就是说，在每一趟贩运黑奴的商船中，至少13%的奴隶由于各种原因死在了途中。而为了防止疾病在船上蔓延，这些黑奴的尸体，统统在半路被视为垃圾抛入了大海。

残忍的奴隶贸易之旅通常是这样开始的：船队选择在每年的12月从欧洲起航，经过数月的航行，中途经过不断的海浪颠簸和奴隶的大量死亡，在第二年的春天船队会到达南美洲的西印度群岛。这条血色贸易航线虽然谈不上繁荣，但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运转，除了在1726年因为西班牙和英国交恶曾经暂停一段，其余时间，南海公司在南美洲的黑奴贸易，一直以一种不紧不慢的速度进行着。

奴隶贸易的缓慢并不全然因为南海公司内部人士的懈怠，而是由于西班牙和法国严密监视着英国每年向南美派出的商船的数量。作为一家国有商业公司，南海公司的海上贸易是受英国皇家海军的保护的，从为商船提供护卫到直接经济援助，海军对南海公司的“贴身服务”几乎无所不包。[36]说来这也情有可原，南美洲的这些贸易区域原本为西班牙专

属，对他国而言，其地位近似于军事禁区，任何国家想要接近这些区域的后果就只能是枪炮伺候。但是在条约规定数量以外的商船并不能受军队的合法保护。随着额外从英国驶往南美的商船数量增多，从1717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南海公司或其他私人的非法商船在从英国到南美进行贸易的途中被西班牙和法国的海军截获。[37]



一艘名为“布鲁克斯号”的英国黑奴商船剖面图。454名黑人牲口般挤在狭小的船舱内。

南海公司的血色奴隶贸易链，可以说时常处于虎视眈眈的敌国的军事干涉之下，进展并非一帆风顺，而实际的黑奴贸易，也并没有给南美殖民地的农场主们带来令他们满意的利润。相反，牙买加等地的种植园

主和农场主对南海公司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由于西班牙在南美地区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威慑力，因此在南美的奴隶生意中，南海公司很“识趣”地主动把贸易的天平偏向西班牙人。历次运往南美洲的奴隶商船，总是先把身体健壮，更年轻、更能干活的黑奴出售给西班牙人，而卖给英国种植园主的奴隶，大部分是人家挑剩下来的老弱病残。[38]

南海公司对种植园主的抗议，漠然置之。对商品的卖方来说，头等重要的事情在于尽快“出货”，否则，奴隶在他们的船上待得越久，其死亡的概率就越高，最后受损失的，还是公司自己，至于是卖给西班牙人还是英国人，对他们来说毫无二致。一桩生意而已，谁付的钱不是钱呢？再说，商船出海在外，开罪不起的，还是已经在殖民地站稳脚跟的西班牙人。而英国政府方面，只要每年能从南海公司的贸易中获得寻租收益，对于来自遥远的南美洲的抗议，他们也就姑且一听而已。

这段日子，南海公司生意上的一举一动，沃波尔等辉格党政客都看在眼里。不过，就沃波尔本人而言，他其实对南海公司是否真正从南美洲贸易中盈利，并不特别关注。在他看来，海外贸易的最大好处就是能为国家培养一批又一批的海军人才和水手，至于那些分布在贫穷落后的非洲、中南美洲地区的殖民地，沃波尔压根没有把它们视为能带来丰厚利润的成熟市场。[39]如今，困扰沃波尔等辉格党政客的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政府债务。当年，哈利等托利党人为此伤透了脑筋，但并没能根本解决政府负债过多的问题，如今辉格党东山再起，又能否妥善处理英国政府欠下的一屁股债呢？

谁是政府最大的债主

要解决债务，首要问题是开源节流。先说“节流”。辉格党面临的财政开支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汉诺威王室。虽说乔治一世自1714年之后名义上成了英国的最高统治者，但他那一段拐了几道弯的王位继承之路，让这位新国王看上去更像是联合王国的一位“倒插门的女婿”。认祖归宗说起来，乔治一世的血脉里，流的是欧洲大陆汉诺威家族的血液，对海峡对岸的这个岛国既没有感情也没有责任。某种程度上，乔治一世是逐利而来，这从他来到英国时一同渡海前往的情妇、随扈、文官这一干人等身上能窥出个大概。这些人来英国以后，无不身居要职，飞扬跋扈，从英国席卷了不少钱财。[40]关于汉诺威王室的公共话题主导了

英国的舆论，无论是议会里的辩论，还是伦敦流行的报刊，不少内容都是关于乔治一世的某些政治决定。围绕这些争论，议会内部的分歧也由此形成。[41]

在议会下议院，有不少人士主张限制王室开支，并且削减军费。作为议会内反对派的领袖，沃波尔虽然客观上得感谢汉诺威王室的入主给他带来了政治上翻身的机会，但对于胡乱花钱的汉诺威家族，他并不抱好感。为此，当乔治一世向英联邦索要筹建一支新舰队的经费时，沃波尔坚决地投了反对票。他心里非常清楚，不断扩张的军备除了能够满足乔治一世的私欲之外，剩下的作用就是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和赋税，从而使已经高筑的债台雪上加霜。然而，令沃波尔大失所望的是，对于这笔额外的支出，除了一位托利党议员同样表示反对外，其余的议员都支持批准这笔军费开支。[42]

乔治一世希望增加军费，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武力威慑瑞典和丹麦，从而确保他在汉诺威领地的安全。[43]可以说，这个决定与英国本身的国家利益关系不大。但为何乔治一世的决定会得到英国人的支持呢？这是因为，随着英国海外殖民的发展，一支用来争夺殖民地、保护贸易航线的海军必须与之配套升级。否则，英国“海上帝国”的梦想就可能仅仅是南柯一梦，难成现实。庞大的军队需要庞大的开支，由此，议会里和辉格党内出现了一群支持扩张军备的“爱国派”，这一派政客与辉格党的“传统派”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出现了一系列的龃龉与矛盾，辉格党随之分裂。在一片纷扰和政治阴谋作祟之下，汤曾德的政府没能坚持多久便倒台。作为政治盟友兼小舅子，沃波尔决定同汤曾德一起辞职，离开内阁，退居议会下议院。1717年，斯坦诺普子爵詹姆斯（Viscount Stanhope）和桑德兰伯爵（Earl of Sunderland）查尔斯组成了新的辉格党联合政府，沃波尔则率领支持者成了党内的反对派。[44]

相比支持国王乔治一世增加军费预算的议员人数，沃波尔这样微弱的反对声音始终难成气候，而且沃波尔的这种反对，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尊崇议会体制中反对派“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原则。乔治一世筹备海军虽说是为了汉诺威王室私利，并非从英国的角度考虑问题，但当时的英国，确实也需要这么一支海军，用以保护连通英国与德国汉堡之间的海上贸易要冲地带。[45]这一点，乔治一世的私欲正好符合英国政府的利益需求。

这也正是英国政府难以根本解决债务问题的原因之一，当时的欧洲

各国之间的海上争霸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首先是葡萄牙、西班牙，然后是荷兰，现在，英国又通过武力征服成为了欧洲海上的贸易新贵。但是，西欧各国哪肯就此罢休，拱手将全球贸易的蛋糕让与英国？因此，英国遍及全球的殖民贸易链条，如果不持续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加以维护，那么它将在欧洲列强的炮舰威慑之下变得纤细而脆弱，整个国家的经济也将陷于不利。这也是为什么议会对于限制汉诺威王室的开销基本能够取得共识，然而一旦涉及军备问题，无论乔治一世的要求如何，人们都很难提出异议。当然，绝大多数议员与乔治一世其实是貌合神离，他们实际的想法是，无论如何，先利用国王将军费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待扩军的决议成行之后，再把国王的要求抛在一边。至于军费和舰队具体怎么使用，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留待下一轮政治博弈解决。

正如一位当代英国历史学者所说，18世纪英国繁荣的商业和海外贸易为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收，让政府得以投入高昂的军费，推行军事上的强硬政策。而正因为英国奉行的武力扩张政策，保护了海外贸易的安全，才使得贸易的稳定繁荣能成为支持强硬军事政策的条件，二者紧紧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密不透风的循环。[46]显然，想要打破这个“政治—经济”的循环，一时间是难以找到办法的。况且，无论辉格党还是沃波尔本人，他们实际上都乐于看到这种循环，并且不断从中获利。所以，他们毫无必要为了减少政府负债而裁减军备开支，打乱原本运转良好的“坚船利炮＋殖民贸易”的经济增长模式。看来，为了解决公债问题，“节流”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正途还在于如何“开源”。

所谓“开源”，也就是指债务资金的来源。要在这上面做文章，必须先搞清楚的事情是，政府的债务由谁来埋单？谁是英国政府的债主？因为对于任何债务人来说，是否有一个财大气粗、慷慨大方的债权人，这比什么都重要。

英国自17世纪以来，百余年间动荡与战乱不断，从国王查理一世和议会的内战到英国与荷兰之间的海外贸易战，不计其数的战斗让政府为打仗而筹措金钱成了家常便饭。借钱给英国政府打仗的人，最早是英国各地的“金匠银行家”（goldsmith-banker）。金匠原本的工作是为货币发行人铸币并保管人们委托的金币，他们会给储存金币的客户开具一张有金匠签名的收据，上面写有存放金币的数额等信息，称为“银行券”（banknote），用以保护储户委托保管的财产。久而久之，金匠银行家们逐渐发现，每天实际来取走金币的客户数量有限，金库里剩有大

量的金币，于是他们开始暗地里为实际上没有存金币的人开具额外的收据，并约定还钱期限和利息，从中赚取手续费与贷款利息。[47]这就是银行放贷业务的雏形。流通的银行券，性质类似于银行家们私自发行的纸币。金匠库房里存着的贵金属，就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储备金。

在伦敦经营信贷业务的人，当然不只是这些金匠银行家，伦敦富有的贵族、商人、职业放债人等等都和金匠们做着类似的事情。但到了17世纪中期，更专业、更讲信用的英国金匠银行家们已从众人当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商业阶层和土地所有者阶层的普遍信任。在这些金匠银行存钱和借钱，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经济活动的一部分。[48]不光是英国的工商业阶层，连高高在上的英国皇室成员们，此时也把金匠银行视为他们筹措战争资金的主要手段，因而和金匠阶层往来频繁。一来一往，政府向金匠银行家们借贷的短期债务，也就由此形成。

依靠债务市场筹集军费的办法，并不是英国人的原创。和银行、证券、股份公司这些概念一样，国家债务也是英国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习得的。早期的大规模政府借债行为发生在14世纪的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各个城邦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各地领主为了筹集军费，开始向臣民有偿借款，其中，以佛罗伦萨的公债规模最为庞大。[49]究其原因，还在于银行和信贷活动在意大利一带的繁荣。而随着英国金融的崛起，伦敦的信贷业务，尤其是政府的信贷也就愈发兴盛了。

不过，信贷活动的频繁，马上产生了令银行家们伤脑筋的问题。债主最担心的事情是债户还不出钱，而债户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是自己永远不用还钱。二者之间的这对矛盾无法调和，引出历史上多少事端。银行家们肯解囊相授之人，大多为王公贵族，但这帮英国的上层阶级平时养尊处优，骄纵跋扈，借钱的时候和人自来熟，一到还钱的当口就翻脸不认人。1641年，伦敦城的银行家们就曾抗议议员和贵族拖欠借款达百万英镑。按照当时法律，议员和贵族享有豁免权，债权人由此无法将欠钱不还的债务人绳之以法，于是集体向议会提出请愿，废除豁免权。议会却对此置之不理。[50]

债务人做得最过分的事情发生在查理二世当政时期。1671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需要为他的海军筹集军费，用于对荷兰的战争。为此，他特地召集了伦敦地区所有金匠银行家来到王宫，苦口婆心劝说，希望他们能够慷慨解囊，为国王出资打仗。哪知，被再三欺骗的伦敦金匠们拒绝为不得人心的查理二世继续提供借贷。查理二世一怒之下，下令“停止

对银行的支付”。在冻结了分属四个银行家的130万英镑债务之后，国王规定他只对他愿意偿付的对象偿付债务，这个命令极大地损害了贷款给政府的金匠银行家们的利益。[51]由于王室的大宗债务无法收回，因此金匠手里的储备资金大幅缩水，储户在银行兑现时发现金匠们已经拿不出金钱支付给储户，这最终酿成了英国金匠银行的一场信用危机。

在这次信用危机之后，人们对于金匠银行的信任一落千丈，更要命的是，政府的信誉也被蛮横的查理二世一手葬送了，赖账的英国国王再休想从金匠银行家的手里借到半个便士。这种借方与贷方相互的不信任一直延续到威廉三世成为英国国王之后。当时的威廉三世国王准备为他的军队筹集资金，但是英国境内已经没有银行家愿意再借钱给不讲信用的王室和英国政府，而英国每年的税收有限，往往不敷使用。政府开支又该如何筹措呢？这个难题，让威廉三世和政府要员们伤透了脑筋。

这时，那位曾向苏格兰政府提出“达瑞安公司计划”从而毁了整个苏格兰经济的威廉·佩特森再次向英国政府进言献策，提议建立一个专门为政府提供借贷的银行，用以解决政府开支的来源问题。这个银行的名字，最初叫做“吨位银行”（Tunnage Bank），这是因为在1694年确立银行成立的法案上写着“该法案授予国王陛下按照英国船只的吨位收税”的权力。[52]然而，尽管当时执政的辉格党人强烈支持这家银行的建立，但在议案送交至议会讨论的时候，托利党和伦敦的银行家都对此表示了不信任，他们都担心自己的利益因这家政府控制的银行成立而受损。

恰如经济学家希克斯所说，“借钱给国家比借钱给私人更冒风险”[53]，这是因为政府总是可以利用强硬的政治手段干预、歪曲，甚至违背债务契约，令自己获益，同时让借债人利益受损。解决之道在于必须有政府的债务担保。佩特森也深知这一点，为此，他为英国政府设计的债务“抵押品”就是法案中提到的针对船舶、酒类等等的政府税收。在有了抵押品以后，债权人的疑虑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贷款的信誉度获得了很大的提升。这家银行的放贷者们得以说服吝啬的客户把钱借给他们，好让银行用来转手借给政府，以钱生钱。并且，这家政策统一的银行不像过去那些向政府放贷的私人银行那样利率和信誉度千差万别[54]，借钱之前借贷双方还需要一一沟通，颇为麻烦。这家政府筹建的银行和英国政府原本就是一家人，因此办起事来不需费太多唇舌，工作效率也更高。

松了一口气的不只是威廉三世，还有英国政府的债权人。人们的额手相庆源于三个相关联的假设：如果没有这家银行的帮助，英国政府很可能连军费都筹集不到；如果军费短缺，英国就很有可能会在战争中输给支持詹姆士二世的法国；如果詹姆士二世复辟，这位被人民驱赶出英国的“正统”国王很可能像查理二世那样，将之前政府向“叛逆分子”借贷的债务一笔勾销。[55]债务人无疑将会因此蒙受巨大损失。而这家政府银行的成立恰恰保证了军费来源的充足，从而避免了詹姆士二世复辟的可能。由此，皆大欢喜。政府有了更强有力的筹钱渠道，王室开支有了来源，入股的银行家和达官贵人也赚得大笔金钱。在这个受到三方欢迎的银行获得了威廉三世颁发的皇家特许执照之后，人们不再叫它以前那个土里土气又难听的名字了，而是很礼貌地称之为英格兰银行（The Bank of England）。许多人发现，威廉国王和不少英国议会成员都成为了这所英格兰银行的大股东。

在十二天之内，英格兰银行通过向社会募集借款的方式，向英国政府提供了一份价值120万英镑、年息8%的贷款，其中的一半用作对外战争的军费。银行则根据政府的债务额印发对应的“国家银行券”，当然，这种银行券还不等于今天的纸币。这是因为议会驳回了佩特森把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用作法定纸币的提议，金融上还略显保守的英国政府希望银行券仅限作政府偿债之用。[56]如此，与之前政府的短期债务相加在一起，1694年英国政府的总债务达到了6,734,297英镑。不过，这个当时貌似庞大的数字在日后看来，只能算是九牛一毛。英国政府既然有了英格兰银行这个慷慨的债主，自然也成了一位出手阔绰的债户，花起钱来比以前更加肆无忌惮。1697年，政府累积的债务比三年前翻了一倍多，上升到1,400多万英镑，到《乌得勒支条约》签订的1713年，政府累积债务为4,000多万英镑，到1718年，政府债务更是攀升到40,379,684英镑，年息高达2,965,889英镑。[57]

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如果一个人准备找人借钱，那么他需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要借一笔自己根本还不起的钱；第二，在第一笔欠款没有还清的情况下，绝不要借第二笔。但英国政府显然不在乎这个道理，它的年税收根本不够支付欠款的本金和利息，而在头一笔欠款没还清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又接连借更多的钱，同时向人民征收更多的税种和更高的赋税。自1697年威廉三世第一次立法延长原本已征税期满的税种以来，经过政府多年来的不断“努力”，到乔治一世登基的第三年，以前只

是短期征收的税大部分成了永久税，而其用途也演变成了基金，用来偿还借款的年利息。[58]

所谓“实践出真知”，在不断的借贷过程中，英国政府似乎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公债并不总是“必须偿付的或是自动清偿”的。只要把长期公债转变为永久债务，那么，本金就永远不需要偿还，政府只需偿还年利；同时，这笔债务因能够被多次转手，所以它在转手的过程中也能为国家带来不竭的现金资源。[59]不用说，政府的主要债务，都要通过英格兰银行这个“中介公司”，银行又会把手中的巨额债务打包卖给第三方。英格兰银行向政府贷款的数额如此庞大，最直接的因素来自于其对国家债务的垄断性质。辉格党主导的英格兰银行成立两年后，眼红的托利党也想成立自己的土地银行，与之对抗，结果却因辉格党议会的一纸禁令而只好作罢。由于布伦特与托利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他创建刀锋公司时，英格兰银行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敌意。英格兰银行的主管们认为，布伦特开的这家同样经营放债业务的土地银行，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英格兰银行的潜在竞争者，它的存在，简直是在给欣欣向荣的英格兰银行添乱。

于是，英格兰银行利用自己和政界关系密切的优势，与英国财政部做了一次秘密的利益交换。英格兰银行向亟需金钱的财政部提供了价值100余万英镑的贷款，年息只需4%左右。[60]久旱逢甘霖的财政部，在钱财落袋后立即联合议会，通过了针对刀锋公司的一项银行法案。1708年，议会通过新的银行法案规定，英格兰银行对政府贷款的垄断权被延长至1732年。为了使英格兰银行获得更为彻底的垄断，该法案还规定，在此期间，英国境内任何超过六个人的团体或公司，如果以发放银行券的方式进行借贷活动都属于非法行为。[61]布伦特的刀锋公司，只得依照法规退出了与英格兰银行的竞争，在日后操办起了南海公司的金融运作。而大获全胜的英格兰银行，此后俨然成为不列颠金融帝国的执掌者，同时也是政府的最大放债代理人。

然而，英国在改朝换代之后，国内政局已是物换星移。托利党在政治斗争中彻底失势，从城市政治中心退居乡村。南海公司掌门人布伦特则很有“政治觉悟”地疏远了托利党，主动与汉诺威王室以及重新上台的辉格党攀上了关系。这让新生的南海公司没有因为英国政局的震荡而土崩瓦解，反而在新王朝经营得风生水起。时过境迁，对操持南美洲贸易毫无兴趣的布伦特预感到，如今似乎已轮到南海公司在英国耀武扬威

了，尽管伦敦的投资者对南海公司并无多少好感。这是因为他想到了一个极好的点子，这个点子可以带来单纯经营南美洲贸易永远也赚不到的滚滚钱财，为南海公司创造前所未有的利益，但前提是南海公司必须与英国政府以及英国议会密切合作，否则这个计划难以成行。布伦特这个新计划的灵感间接来自于英吉利海峡的对岸——法兰西。在那里，一位自1707年就被迫离开英国国境的苏格兰人正在策划一场金融界的大变局。他的名字已经有好些日子没有被英国人提起了。这个人是约翰·劳。

注释

1 E. N. Williams, The Eighteenth-centur Constitution 1688-18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56.

2 David Bronte Green, Queen Anne, Scribner, 1971, pp. 268-269.

3 Hutton Webster, Historical Source Book, D. C. Heath and co., 1920, p. 58.

4 Nick Harding, Hanover and the British Empire, 1700-1837, Boydell & Brewer, 2007, p. 33.

5 John Miller, Cities Divided: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English Provincial Towns, 1660-172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80.

6 William Cox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Administration of Sir Robert Walpole, Earl of Oxford, Vol. 1, Printed for T. Cadell, jun. and W. Davies, 1800, p. 104.

7 Colin Haydon, Anti-Catholic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 1714-80: A Political and Social Stud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ND, 1993, p. 100.

8 Paul Poplawski, English Literature in Contex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23.

9 查尔斯·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陈周旺等译，格致出版社，2008，p. 138.

10 Clyve Jones, Britain in the First Age of Party, 1680-1750,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1987, p. 88.

11 Charles Carrington, John Hampden Jackson, A History of England Part III, 1714-1945, University Press, 1949, p. 458.

12 Lord Ronald Sutherland Gower, The Tower of London, Vol. 2, Wharton Press, 2008, p. 100.

13 详见唐宁街官方网站“Sir Robert Walpole”词条，http://www.number10.gov.uk/history-and-tour/sir-robert-walpole/.

14 见BBC历史频道Sir Robert Walpole词条，http://www.bbc.co.uk/history/historic_figures/walpole_robert.shtml.

15 Lord Ronald Sutherland Gower, The Tower of London, Vol. 2, Wharton

Press, 2008, p. 95.

16 Clyve Jones, Britain in the first age of party, 1680-1750,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1987, p. 122.

17 转引自Kenneth O. Morgan edi., The Oxfor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05.

18 William Cox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Administration of Sir Robert Walpole, Earl of Oxford, Vol. 1, Printed for T. Cadell, jun. and W. Davies, 1800, p. 112.

19 同上，pp. 122-123.

20 公元13世纪末，英王爱德华一世武力征服威尔士之后，为了让威尔士民众信服，将他的儿子封为“威尔士王子”，以示“在乃父的指令下，得到了他所有的臣民和威尔士贵族们宣誓效忠”。这个称号也一直由英国王位的继承人沿用至今。详见Roy Martin Haines, King Edward II: Edward of Caernarfon, His Life, His Reign, and Its Aftermath, 1284-1330, McGillQueen's Press - MQUP, 2003, p. 6.

21 Adam Anderson & William Combe, 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Containing an History of the Great Commercial Interests of the British Empire, Printed for J. White, 1801, p. 64.

22 Lewis S. Benjamin, South Sea Bubble, Ayer Publishing, 1967, p. 26.

23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of 1688, Evans, 1813, p. 89.

24 John Wade, British History, Chronologically Arranged; Comprehending a Classified Analysis of Events and Occurrences in Church and State, READ BOOKS, 2007, p. 355.

25 Herbert S. Kle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76.

26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2, J. Maynard, 1811, pp. 394-395.

27 Adam Furgang, Smallpox, The Rosen Publishing Group, 2010, p. 22.

28 Ronald Segal, The Black Diaspora: Five Centuries of the Black Experience Outside Afric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5, p. 4.

29 Kenneth Morgan Slavery, Atlantic Trade and the British Economy, 1660-1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9.

30 James A. Rawley, London, Metropolis of the Slave Trad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3, p. 31.

31 Helen Paul, The South Sea Company's Slaving Activities, The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Papers, University of Exceter, 2004, p. 17.

32 Elizabeth Donna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Slave Trade to America, Carnegie Institute of Washington, 1931, pp.

17-20.

33 Marieke de Goede, Virtue, Fortune, and Faith: A Genealogy of Fina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p. 25.

34 Helen Paul, The South Sea Company's Slaving Activities, The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Papers, 2004, p. 21.

35 同上，p. 18.

36 Helen J. Paul, The South Sea Bubbl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Its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Taylor & Francis, 2009, p. 59.

37 同上，p. 19.

38 Richard B. Sheridan, Sugar and Slaver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1623-1775, Canoe Press, 2000, p. 218.

39 Jean O. McLachlan, Trade and Peace with Old Spain: 1667-1750, CUP Archive, 1940, p. 23.

40 William Cox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Administration of Sir Robert Walpole, Earl of Oxford, Vol. 1, Printed for T. Cadell, jun. and W. Davies, 1800, p. 144.

41 Brendan Simms & Torsten Riotte, The Hanoverian Aimension in British History, 1714-183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

42 Jeremy Black, Parliament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5.

43 Jeremy Black, The Hanoverians: The History of a Dynasty,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7, p. 60.

44 Jeremy Black, The Politics of Britain, 1688-1800,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80.

45 William Cox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Administration of Sir Robert Walpole, Earl of Oxford, Vol. 1, Printed for T. Cadell, jun. and W. Davies, 1800, pp. 149-150.

46 Maxine 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1700-1820: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Work in Britain, Routledge, 1994, p. 108.

47 Detlev S. Schlichter, Paper Money Collapse: The Folly of Elastic Money and the Coming Monetary Breakdown, John Wiley and Sons, 2011, pp. 49-51.

48 Eric Kerridge, Trade and Bank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ND, 1988, p. 69.

49 据统计，在12世纪，威尼斯就建立了早期的公债系统。14世纪早期，佛罗伦萨有2/3的家庭拥有城邦的公债，其中最大的公债持有者是控制着佛罗伦萨政治经济的美第奇家族。见Niall Ferguson,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Penguin Books, 2009, pp. 72-73.

50 劳伦斯·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于民、王俊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pp. 234-235.

51 Douglas E. French, Early Speculative Bubbles and Increases in the Supply of Money,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10, p. 77.

52 详见Bank of England Act 1694，英格兰银行官网，http://www.bankofengland.co.uk/about/legislation/legis.htm.

53 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p. 79.

54 D. M. Joslin, "London Private Bankers, 1720-1785"，原载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7, No. 2, 1954, p. 176.

55 沃尔特·白芝浩：《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p. 43.

56 Murray N. Rothbard, The Mystery of Banking, Richardson & Snyder, 1983, p. 182.

57 John Francis, 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ts Times and Traditions, Published by Banker's Magazine, 1862, p. 29.

58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2, J. Creech, 1806, pp. 395-397.

59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顾良译，三联书店，2002, p. 581.

60 Douglas E. French, Early Speculative Bubbles and Increases in the Supply of Money, Ludwig von MisesInstitute, 2010, p. 87.

61 同上，p. 54.

第五章　来自巴黎的金融炼金术

——纸币系统开始在法国运转

约翰·劳的新发明

当年约翰·劳第二次离开英国时，心情五味杂陈。这个亡命天涯的银行家，一心要让他的“土地银行货币系统”付诸建立，然而，他的祖国苏格兰无情揉碎了这个梦想。新成立的联合王国甚至没有他的容身之所。于是，就像当年因为谋杀之罪而被迫潜逃到法国那样，他再一次选择离开，回到欧洲做起了赌博的营生，并一如既往地以此赚了不少钱。奔走于欧洲大陆的赌徒约翰·劳，此时又显现出了昔日公子哥儿的派头，他既出入于勾栏瓦肆、引车卖浆之左，也往来于达官显贵、上流人士之间，俨然一位精于交际酬酢的外交家。一句话，约翰·劳做着以前他一贯擅长做的事情，并且做得一如既往的好。但同时，他那埋藏于心头，一时还难以实现的经济计划也在不断折磨着他，让他没办法过一种小富即安的平庸生活。他始终笃信，自己的经济思想一定会被某位贤明的国君所采纳，从而流芳百世。

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约翰·劳在回到欧洲以后继续在这片大陆游历，足迹遍及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国。[1]一方面，他通过这些游历了解到欧洲各国商贸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施展卓越的外交家口才，利用自己和上流社会关系熟络的优势，向当地政要和贵族们兜售自己的经济理论。每见到一位上流社会人士，他都会尝试进行游说，希望他们能采纳自己的治国之策。

但好运似乎依然不在约翰·劳这一边，他在欧洲的上流社会圈子已颇有名气，却无法改变他的建议一次又一次被各地君主们拒绝的事实。不过，约翰·劳并没有就此放弃，在法国和意大利，他在向当地统治者提出自己的经济计划时，均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1711年游历到意大利首府都灵时，他曾向萨沃依公爵（Duke of Savoy）维克多·阿玛杜斯（Victor Amadeus）建议，在意大利成立一个土地银行。约翰·劳特地起

草了一份手稿，托人转交到公爵手里，手稿内文详细地说明了土地银行系统和纸币系统的运作机制，其中还特别提到了可供参照的一个新生事物——英格兰银行。[2]这表明，约翰·劳虽然孤身游历于欧洲大陆，但对于岛国英格兰经济、政治上的风吹草动，皆是了然于胸的。

约翰·劳向萨沃依公爵建议，依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在都灵成立一所银行，对外发行银行券。此前法国也曾发行过类似于纸币的货币，但最后被取消了流通。他试图在这份手稿中解释法国失败的原因，以及英格兰银行有效地把货币发行和公债捆绑在一起，从而为政府解决债务问题、刺激经济活力的原理。他以为，凭借自己的诚意和才学，足以打动这位公爵。

然而，萨沃依公爵再一次令约翰·劳失望了。他回答约翰·劳说，自己所统治的领地面积实在有限，恐怕难以承载如此宏大的经济计划，并且自己是一个谨小慎微、财力有限的统治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会使得整个计划毁于一旦。因此，他建议约翰·劳将这个建议提供给比他更有权势的人，例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3]换句话说，萨沃依公爵婉拒了建立土地银行的建议。

说到这位路易十四国王，约翰·劳并不陌生。当他背井离乡，云游到巴黎的时候，曾经人介绍，向法国政府的审计官迪斯马里兹（Desmarets）提交了一份财务计划，内容和提交给萨沃依公爵的大致相近。迪斯马里兹随即把这份财务计划转交给了国王路易十四，本来，此举算是为约翰·劳做个顺水人情，然而偏执而独断的国王在接到这份计划书之后，并没有询问其中的内容，反而向人打听计划的提起者是不是天主教徒。当得知约翰·劳并不信仰天主教，这份计划书马上就被愤怒的路易十四扔进了垃圾箱。[4]

如此一位具有宗教偏执的国王，要他采纳与自己宗教信仰不符的人士的建议，恐怕比登天还难。有路易十四这座险恶的“大山”横亘在面前，约翰·劳除了等待，也别无他法。就在约翰·劳感到希望渺茫之际，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逝世了！王位的继承者年仅七岁。由于年纪太小，法国的大小政事由摄政王（regent）辅佐，国家的实际统治权，此时掌握在路易十四的侄子、摄政王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eans）手里。

这位奥尔良公爵，已经被约翰·劳引以为老朋友多年了，奥尔良公爵本人也十分赏识约翰·劳身上散发出来的冒险家精神和聪明才智。如今，

这位懂得欣赏自己的人获得了法国的政治大权，对于约翰·劳来说，当然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他甚至无须费唇舌向奥尔良公爵解释自己的宏伟计划，那是因为，在昔日巴黎上流社会的饮宴聚会上，他曾无数次向奥尔良公爵提起自己的经济思想和设立国家银行的计划，奥尔良公爵对他的经济思想也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可当时谁曾想到，在法国改朝换代之际，千载难逢的机遇居然借由这位幸运的公爵传递到了屡屡错失好运的约翰·劳身上。

约翰·劳对自己的计划得到公爵的重视有充分的自信，这种自信不仅来源于他和公爵笃厚的私交，也来源于当时法国惨不忍睹的经济状况。由于路易十四穷兵黩武，让法国常年陷入与英国等国家的战争，军费开支惊人，加上国内政治腐败堕落，王侯将相们生活奢侈，政府欠下了巨额债务。这笔公债与邻居英国相比，数字更庞大、影响更恶劣，当时的法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因此破产。[5]而庞大的公共支出所带来的沉重赋税，更是让整个法国的经济陷于极度的萧条，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溢于言表。

具体而言，奥尔良公爵接手之初的法国，公债已经累计达到了近28亿里弗尔，其中，永久性债务高达10亿里弗尔。抛开其他债务不算，政府需为这一部分债务支付的年金，就达到了4500万里弗尔。[6]如果把政府其他的短期浮动债务相加起来，其数量就更为惊人。然而，当时法国的财政年收入不过1.45亿里弗尔，仅相当于债务总额的一个零头。每年，法国除去政府自身1.42亿里弗尔的开支，仅能勉强从财政收入中挤出300万里弗尔偿还公债的利息。[7]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奥尔良公爵急切地希望寻找到一条拯救法国经济的途径，以免在自己掌权期间经济危机酿成政治危机。就这样，他想到了那位经常在他面前献言献策的约翰·劳，他相信这个民间经济学者拯救法国经济的手段会像他的赌术一样高明。除此以外，他其实也找不到任何可以解救法国的灵丹妙药了。1715年，海峡对岸的南海公司已开始做起了黑奴生意，而约翰·劳穷其才智构建起来的经济计划，也终于有机会付诸实践。

在路易十四死后不到两个月，约翰·劳的金融计划就被送交政府理事会进行讨论。[8]尽管计划遭到了一些法国政客的反对，但他依然把自己的想法再次向奥尔良公爵作了陈述。他说，解决政府债务问题的最佳方法就是发行纸币，用银行印发的那些本身并无价值的票据来充当还债的金钱；并且，按照约翰·劳的理论，纸币更易于流通，因此也会促进法国的

商业活动，从而带动整体经济的繁荣。奥尔良公爵担心这种新发明的支付方法难以被人们接受，约翰·劳则劝慰他说，现在法国人因穷困而产生的不满已经堆积成山，随时有可能酿成一场暴力革命。[9]对于危机四伏的法国政府来说，与进行这场经济改革相比，不改革的代价和风险无疑要大得多。经过一番劝说，公爵接受了约翰·劳提出的建议。

根据约翰·劳的计划，第二年，法国出现了一家能够发行银行票据的私人银行——法国通用银行（Banque Générale），1718年它接受政府颁发的特许状更名为皇家银行（Banque Royale）。这家专门发行银行券（纸币）的银行显然是在奥尔良公爵的同意之下才获准成立的。银行的资本通过公开募股筹得。通用银行IPO一共发行了1,200份股票，每一份股票售价5,000里弗尔。这些股票中的半数都归约翰·劳所有，另外有380股的所有人是法国国王。[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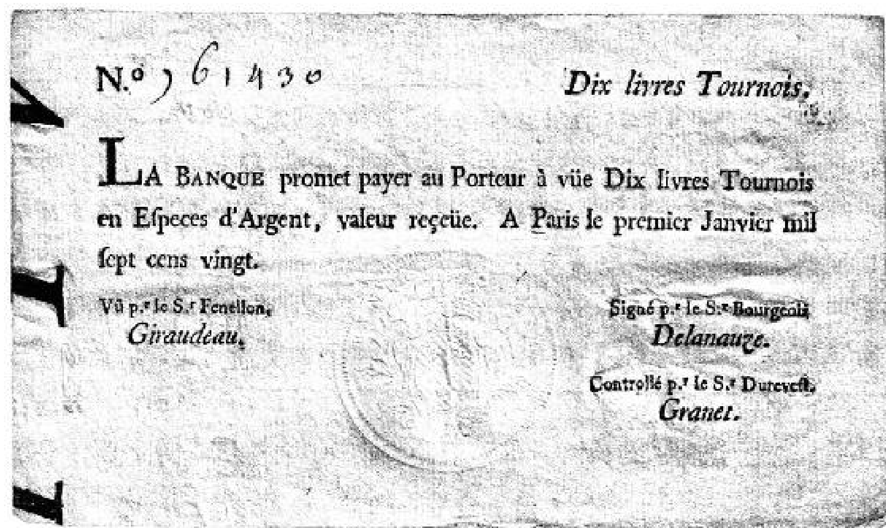
约翰·劳很快发现，人们不太喜欢使用这家刚成立的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这很不利于经济计划的实施。为了让法国人尽快接受新发行的纸币，在1717年，法国政府就发布命令，勒令境内税收的征收均以通用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支付手段。当时的银行券面值由小到大分为10埃居、100埃居和1000埃居三种。埃居（écu）是法国过去的一种金属铸币，1埃居硬币等值于5里弗尔。

不过，法国政府在1718年铸造金属货币时，却有意将铸币的实际重量和成色减低，面值由原来的5里弗尔增加为6里弗尔，并且，政府还在同一年出台规定说，鉴于新铸币实际上已经升值，前一年发行的面值100埃居（500里弗尔）的银行券，根据货币在一年内的增值幅度，可以充当600里弗尔的金钱使用。[11]这条狡猾的规定并没有告诉人们，之前政府铸造的面值5里弗尔的埃居铸币是否也会相应升值。换句话说，法国政府以行政手段强行让新发行的银行券升值了1/5，同时让旧的铸币变相贬值。如此，为数众多的人们抛弃手中越来越不值钱的旧金属货币，将其更换为通用银行发行的那张印有“银行承诺兑现支付”字样的纸质票据。政府略施小计，就让法国人对银行券的信心陡然提升。不消说，这一招也是约翰·劳的主意。至此，他的经济计划已完成了一半。

约翰·劳经济计划的另一半是这样开始的：在通过发行纸币席卷国家财富的同时，约翰·劳接手了一家经营海外贸易的股份公司，同样是在奥尔良公爵的授意下，该公司得到了二十五年内在北美路易斯安那殖民地（Louisiana Colony）以及加拿大沿海贸易的垄断权，并有权任命当地

的殖民总督和官员。[12]这几乎相当于政府殖民机构的职能。这家半政府、半商业的股份公司所经营的区域正是北美著名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因此，人们逐渐改口把这个公司叫做密西西比公司（Mississippi Company）。没过几年，这家“后台老板”过硬的公司收购了法国的多家贸易公司，密西西比公司的实力因此迅速膨胀。

当时的法国，虽然国内经济可以说一塌糊涂，但是它在海外地区拥有数量庞大的领地，由密西西比公司主导贸易的路易斯安那就是其在北美的一块主要殖民地。那片广袤土地的面积比整个法国加起来还大。对于这片远在大洋彼岸的陌生土地，生活在法国本土的人们对其了解实在有限，不少人竟然连路易斯安那在地球上的哪个大洲都不知道。[13]人们对这片殖民地的无知，恰好给了约翰·劳一个可乘之机。



法国政府在18世纪发行的银行券。

约翰·劳很快便派人四处散布消息说，有人在路易斯安那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发现地下蕴藏着大量金银，法国能得到这块风水宝地简直是天不亡我法兰西，因为只要把远在美洲路易斯安那地下的真金白银开采出来并运回法国，那么一切经济问题都即刻迎刃而解。显而易见，这项伟大而光荣的使命，就落在了专营路易斯安那殖民贸易的密西西比公司身上了。为了更好地经营殖民地贸易，一座以奥尔良公爵的名字命名的崭新的城市“新奥尔良”被密西西比公司建立了起来。约翰·劳还通过一纸法令，释放了法国监狱里的罪犯，把他们派到路易斯安那，充当公司的劳

动力和殖民地的第一批合法移民。[14]万众瞩目之下，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价格随着人们不断增高的期待而上涨。不久，密西西比公司又被法国政府全权授权在东印度群岛、南太平洋、中国和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属地进行贸易，一跃成为法国最大的股份公司。巴黎的人们纷纷花钱购买公司的股票，渴望靠此大赚一笔，皇家银行于是加紧印刷新的银行券，为投资者购买股票提供资金供给。这下，公司有了本钱，立刻向人们承诺说：等着吧，丰厚的回报还在后头。

密西西比公司的发展历程，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南海公司的建立。二者有太多雷同点了。它们的成立具有相似的经济目的、相似的政治背景、相似的经营理念，甚至连经营的生意都同样在远离本土的大洲。事实也的确如此，目前为止，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司显然是在一定程度上拷贝了南海公司的模式，而他的皇家银行则可以说是复制了英格兰银行的模式，两者都并无太多创新之处。不过，在此之后，约翰·劳策动其创办的这两大金融机构的一次“合谋”，就显然不再是简单复制，而称得上是一种“制度创新”了。

约翰·劳在一封写给奥尔良公爵的信函中，透露了自己的野心：“这家银行并不是我唯一的，或者最伟大的构想。我将要完成一件足以令整个欧洲为之震惊的工程。这项工程带给法国的利益和变革，将超过西印度群岛的发现或者信用的发明。通过这个工程，君等皇族成员能够拯救这个王国于水火，并且能使它比以前更具力量。金融的秩序将被建立起来，落后的农业将被取代，制造业将获得支持，商业将长足发展；王国的人口和财富也将因此不断增长。”[15]约翰·劳的这份野心，在皇家银行和密西西比公司相继成立之后，终于等来了实现的契机。

为了给这家密西西比公司融资，同时也为了给政府还债，约翰·劳想出了一个妙招，那就是政府直接将公债以很低的利率卖给公司，公司则用股份作为支付公债的手段。[16]这样，二者在完成这笔交易后，政府债务就直接转化为公司的股票，而且由于股票和债券的利差，此举还变相降低了政府债务的利息。法国政府因此轻而易举地从一穷二白变得“不差钱”了，因为密西西比公司已经为其债务埋单，而公司又通过出售股票，将这些债务转手卖给了认购股份的普通投资者们。同时，为了让公司股票的价值支持住银行券的价值，约翰·劳又告诉投资者们，每9000法郎的银行券可以兑换等价的股票。[17]由此，约翰·劳成功地将纸币、公债和国有股份公司的股票锁死在一起，法国人已经无须对政府的公信力保持信

心，亦无须担心被政府欺骗。现在，他们只需要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密西西比公司身上，期待这个传说中极具盈利能力的公司，能为这个国家偿债，为所有的人带来财富。

这个看似高明的办法，其本质不过是透过国有公司和国有银行，将政府的债务进行了转嫁。“嫁祸”的对象就是购买密西西比公司股票的全体投资者们，因此，这项计划的关键在于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价格只能涨不能跌。股票升值带来的利润越多，公债问题就解决得越彻底，反之，整个计划就会破产。果然，密西西比公司股票价格的涨幅惊人地高而快。在计划刚刚提出的时候，股价还在3,600里弗尔左右徘徊，而仅仅一个月之后，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上涨到了5,000里弗尔。人们涌向巴黎的证券交易所，为了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抢破了头，不少资本不足的人甚至举债前来购买股票。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拉高股价，公司采用了十至二十个月按揭付款的方法，放宽购股标准之后，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就更加炙手可热了。[18]

约翰·劳这项疯狂的计划的确让法国政府暂时摆脱了债务危机，并且通过股票市场迅速创造了大量财富，巴黎有不少投资者一夜暴富，成了拥有100万以上银行券的人。他们因此也被称为百万富翁（Millionaire），后世称有钱人为“百万富翁”的习语，也就来源于此。[19]眼瞅着近邻法国平白无故冒出来了这么多“富翁”，英国人对法国的“致富之路”也产生了好奇。正当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受到巴黎人追捧的时候，约翰·劳在巴黎的一位苏格兰老乡约翰·达尔林普尔（John Dalrymple）却在和他商量向英国政府举荐他的事宜。

巴黎陷入了疯狂

达尔林普尔是第二任斯泰尔伯爵（Earl of Stair），时任英国驻法国巴黎的外交使节。达尔林普尔对约翰·劳的才智素抱欣赏之态度，在两人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慨叹对方“拥有一颗能够胜任各类计算的大脑，才智超过了任何人”[20]。约翰·劳也对达尔林普尔十分信任，以至于当他在巴黎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他依然不忘向自己的这位老乡倾诉衷肠说，如果有可能，那么他愿意随时将自己的全部才智贡献给联合王国。达尔林普尔惜其才，决定帮助约翰·劳。他曾向英国的国务大臣斯坦诺普伯爵汇报过约翰·劳这位流亡法国的苏格兰经济学家的事迹和经济计划。在落款日期

为“1715年2月12日”的一封私人信函上，他不吝辞藻地向斯坦诺普夸奖这位同乡：“在这里，有一位我的苏格兰同胞。他是一个有极强判断力的人。计算的天才无人可匹敌……像这样的人才难道没有机会为我国政府偿还公债的计划作出一点贡献吗？如果您想见他，那么将他带来并不是一件难事。他有一种为祖国服务的强烈愿望。为此，我也向哈利法克斯爵士推荐了此人……如果不是长时间了解这个人的话，我不可能向您推荐这位有敏锐洞察力、能堪大用之人。以我和他之间的熟悉程度来看，他无疑是我见过的最有智慧的人。”[21]

尽管这封信将约翰·劳的才华吹上了天，但令他失望的是，斯坦诺普只是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封信，便没有了下文。和过去一样，达尔林普尔的溢美之词并没有受到斯坦诺普或其他任何一位英国政府官员的重视。当时的英国自恃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银行系统和最能盈利的股份公司，法国的经济，则一直被政界人士视为落后的样板，而像约翰·劳这样一位寓居于法国的经济研究者，自然也引不起英国人的半点兴趣。

不过，随着约翰·劳受奥尔良公爵启用而飞黄腾达，英国人对他的看法开始稍有改变了。打个比方，这位公爵身边的红人着手创建了密西西比公司和皇家银行并担任管理者之后，他的地位就好比同时兼任了世界五百强公司、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局三者的最高管理者一般。[22]而当他创造性地把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和政府债务成功绑定在一起时，约翰·劳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了在巴黎权力最大、最受人尊敬的一个名字。在由默默无闻走向暴得大名的过程中，达尔林普尔一直充当约翰·劳的朋友和斡旋人。他对约翰·劳的经济计划了解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当密西西比公司成立之初，达尔林普尔曾亲笔写信给奥尔良公爵，建议他以低价认购总价400万里弗尔的8万股公司股份，以便他与约翰·劳可以共同控制公司总价100万里弗尔的股份，从而更全面地掌握这家公司。[23]

类似的事情，达尔林普尔参与了不少。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在密西西比公司和皇家银行建立之初，达尔林普尔一直在热心帮助约翰·劳实现自己的经济计划，与此同时，身为英国外交官的他也在时刻观察着这份经济计划为法国带来的实际收效。当约翰·劳的皇家银行和密西西比公司在巴黎掀起这场投机的金融风暴时，达尔林普尔也兴奋地将他在疯狂的证交所目睹的一切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他在伦敦的上司们。

毫无疑问，巴黎随即陷入了对金钱前所未有的疯狂，以至于大部分人一时间难以分辨出这短暂繁荣背后蛰伏的巨大危机。正如一位当时的

作者以激愤的笔调所写下的字句：“如果我们或者我们祖先曾经历过的时代中有一个时代被命名为‘计划的时代’，我想，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如果有一个国家，花了二十三年的时间让自己走向毁灭，却又在一朝得救，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如果一个政府不使用真正的钱，就能偿还自己的债务，而且将国家所有的钱换成一些没人或者资金愿意为其付出代价的纸张，我想，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如果信用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也能够被建立，以至于其难以立足、很快就将倒塌，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24]如此的疯狂，最后必然会给陷入这种疯狂的个人和国家招致疯狂的代价。

达尔林普尔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这时的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迫不及待地劝说英国政府重用自己的这位苏格兰同乡。约翰·劳在巴黎的地位提升得如此之快，让达尔林普尔感觉事态有些超乎寻常。更重要的是，随着他本人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约翰·劳的经济计划当中，他对支撑法国经济的根本动力也逐渐洞悉、了解得一清二楚。那根本的动力，便是人们对于股票的非理性狂热以及对有政府背书的国有公司的愚昧信任。它看上去或许很迷人，但内核却是空心的。达尔林普尔认为，英国的经济假如也采用约翰·劳的这个体系，虽然或许能获得一时的繁荣，但是这个支撑点并不稳定的体系一旦发生崩溃，后果将不堪设想。“约翰·劳将给英国带来一场大麻烦。”[25]

达尔林普尔的态度，已经与最初对约翰·劳绝对的支持截然不同，现在的他，隔三差五就往英国国内写报告，描述他在巴黎所见的虚假经济繁荣，警告英国切不可逞一时之快而步法国的后尘。达尔林普尔还给他在法国的“政治盟友”摄政王奥尔良公爵写信警告说，约翰·劳所操弄的这个经济计划，表面上繁荣了法国，而从长远看，它却会实实在在地危害到法国的经济，进而损害英国的利益。与他有同样觉悟的人，还包括曾经是约翰·劳私人银行家的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和约翰·劳一样，从事股票投机业的坎蒂隆也是一位极富洞察力的经济学者，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充分理解约翰·劳的新经济体系的人；并且，他甚至比约翰·劳更早地察觉到了这个经济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在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上升到最高点之前，坎蒂隆在1719年8月就变卖了所持有的全部密西西比股份，只身从巴黎来到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在伦敦的日子里，他依靠炒作南海公司的股票再次大赚了一笔。[26]

不过，在去往伦敦的十四个月以前，当他和约翰·劳初次接触的时

候，坎蒂隆对这位法国经济界最炙手可热人物的才华还是欣赏备至的。当时，他主动写信给一位他和约翰·劳共同的朋友，希望对方引荐二人认识。坎蒂隆对银行事务的熟悉以及他曾参与英国政府与西班牙战争赔款事宜的背景，让这两个人很快熟络起来，成了生意上的伙伴。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坎蒂隆完全了解密西西比公司、皇家银行、约翰·劳三者之间相互依附、纠结的关系时，他无法不惊异于约翰·劳在经济上的大胆与冒险。但同时，他也已经萌生去意。巴黎的证券交易所里人们对密西西比股票的疯狂，在坎蒂隆眼里并非一种正常的证券交易，而更像是举国进行的一场浩大的投机活动，其最终代价将是整个法国的经济。但是，密西西比公司对法国东印度公司、西部公司和中国公司等等的不断并购，又使坎蒂隆万分确信，在短时间内，密西西比公司表面会维持一种“繁荣”，股价会一路上升。这个准确的判断，让他在离开巴黎时，兜里揣着价值5万英镑的现金。[27]

如果说达尔林普尔向英国政府发回来的报告仅仅只有一些理论上的说服力，那么坎蒂隆来到英国时随身携带的大把金钱，毫无疑问会让人有更为实在的感受。金钱的诱惑，完全摧毁了达尔林普尔之前提出的警告，也让英国人在觊觎巴黎股市投机者所创造的短期财富的同时，随时准备将整个英国的经济推向投机的深渊。

都说疯狂是会传染的，英国人即将迎来的举国疯狂是由于他们在新的经济计划之后目睹了邻居法国所经历的疯狂，而法国人的疯狂则是源于赌徒约翰·劳的劣根性。股票让奢华之都巴黎又重新焕发了活力，原本行人稀稀落落的街道又变得人满为患了。而那些穿梭于巴黎大街小巷的证券商，为了不错过任何一笔买卖，干脆租下了街道两旁的所有房屋，把它们临时改造成了交易所。[28]这样一来，街道就变得更拥挤不堪了。“拥挤的人群在甘康普瓦大街的交易所里，把那里挤得水泄不通。从清晨到夜晚，包括王孙贵族在内的法国最有权势的人，都在那里。他们变卖地产，抛售珠宝，只为了大笔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29]一位英国驻巴黎的外交使节曾如此写下他所眼见的疯狂。甘康普瓦大街（rue Quincampoix）几乎可以直接改名叫做密西西比大街，或者约翰·劳大街。

英国人明白，将巴黎的金融业搅得天翻地覆的人就是当年逃离伦敦的那位杀人犯。这位昔日被他们视为凶手和赌徒的亡命人，今天却成了海峡对岸炙手可热的头脸人物。密西西比公司新近一次发行的股票共有

5万股，但是陆续前来巴黎甘康普瓦大街认购股票的人数居然超过了30万人。不少人为了求得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挤破了头想要约见约翰·劳，希望获得他的帮助。他在巴黎的居所，经常被从四面八方赶来向他询问股票事宜的贵族、主教、商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每个人都渴望见到这位巴黎的“金融炼金术士”。[30]这种狂热起初令约翰·劳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据说，巴黎的一位女士为了能和约翰·劳说上一句话，竟然下令自己的马车夫在路过约翰·劳的家门口时，掉头冲向大门，堵在门外高喊约翰·劳的名字，只求能和他说上句话，托他帮助自己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人们对约翰·劳迷恋程度之疯狂，堪比现代的粉丝追星。作为“大明星”的约翰·劳，其生活在这段时间自然也充满了声色犬马、美女香车。巴黎的贵妇们以能和约翰·劳的妻子或者情人们共同乘坐一辆马车为荣，而约翰·劳的女人们则会在车内用纤手一撩秀发，发出酸溜溜的感叹：“这世上没有什么比成为公爵夫人更累人的事情了。”[31]

正如一位造访巴黎的英国贵族所发出的感慨：“约翰·劳先生是一位远远强于过去、现在和将来法国任何一位大臣的能人，他在一个难有公共信用可言的国家建立了政府信用，并且，他凭借自己的能力所给予法国人民的财富，比之前路易十四从人们手里夺去的财富更多。”[32]的确，在约翰·劳的经济计划运转起来以后，法国政府收获颇丰，政府一高兴就减免了以前的不少苛捐杂税，这样，巴黎市民就更支持这份新经济计划了。约翰·劳亲手打造出了这份“经济奇迹”，无论人们将其视为运气还是命运，总之现在的约翰·劳获得了切实的成功，这位赌徒中的经济学家多年来颠沛流离，却不期在巴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而当他和他的家人被奉为国王的座上宾，成为上流社会人们最希望巴结的权贵人物之时，整个巴黎也陷入了毫无节制的对约翰·劳的盲目信任之中。包括约翰·劳本人在内，没有一个人在当时愿意相信，这个新生的金融系统，将在不久之后彻底崩坏。[33]

得罪不起的邻居

对普通人来说，如今的约翰·劳几乎象征着在世俗世界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金钱、荣誉、权力和地位，因此谁都不愿意推倒这个树立在巴黎的财富偶像，唯恐巴结不及。对于英法政府来说，约翰·劳的象征意义显然不仅仅是一尊赫尔墨斯式的大理石塑像。英国与法国之间、英国本

国之内的种种利益纠葛和关系线条，现在都逐渐缠绕、汇聚到了约翰·劳的身上。他这尊塑像所庇佑的不仅是商人们的利益，更是两个毗邻国家的经济命脉。要是把这个人毁了，无异于毁掉了支持法国和英国经济前途的信心。

因此，达尔林普尔不时发回国内的关于法国经济的负面报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正如他当年举荐约翰·劳的信件遭受冷遇那样。英国政府的想法，此时已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当初英国方面派遣达尔林普尔出使法国，名为派驻外交使节，实则让他在暗中搞好和奥尔良公爵的关系，让公爵成为法国国内“亲英”的政治人物，从而孤立法国国王路易十四。[34]随着路易十四的离世，奥尔良公爵一跃成为法国功高震主的权臣，英国苦心培植的“法国联盟”，似乎有了眉目。因此，从1716年开始，英国政府的对法外交路线，已经偏离以往的习惯，走得与奥尔良公爵治下的法国政府非常之近。[35]受到奥尔良公爵重用的约翰·劳亦不再是昔日伦敦的通缉犯和巴黎的一介民间经济学家，如今的他，是法国极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要搞好英法双边关系，对于约翰·劳这样的关键先生，怎能待以冷遇呢？

再者，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与动乱之后，英国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稍显和平的时期，整个国家也有机会得以喘息，将政策的重点从军事转移到工商业。为了保护自己靠坚船利炮取得的海外贸易利益，一个稳固安定的国际环境对英国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对于法国这样一衣带水、渊源颇深的邻国，更应该主动搞好关系。此外，国王乔治一世出于私利，也亟需拉拢法国，从而孤立瑞典，好让他能够重新获得瑞典在德国境内的领地，进而夺取波罗的海地区的外交优势。[36]方方面面的因素促使英国对法国乃至欧洲的态度在汉诺威王朝产生了转变。在汉诺威王朝之前，英国对于欧洲大陆的利益纠葛始终显得有几分事不关己的态度，但自从乔治一世这位来自德意志的皇帝驾临英国之后，英国的外交政策多了几分乔治国王的个人意志色彩，对于欧洲的大小事情，英国似乎一改过去“不闻不问”的常态，开始忍不住想参与其中。实际上，在外交政策方面，乔治一世并非孤身一人，因为在议会中，他早已有了汤曾德和沃波尔等政客，支持对外干预政策，与法国重修旧好。

英国国王和政府并不想得罪法国这位日益阔绰起来的邻居，而伦敦的商人们眼瞅着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司在对岸呼风唤雨的情景，按捺不住也想过去分一杯羹。于是，有不少人变卖了手中持有的英国股份公司

的股票，乘船来到巴黎，挤破了头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这让伦敦诸多股份公司的董事们感到十分不快，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公司的股价正在快速下跌，直接原因是他们的不少股东都携带资金逃到了对岸。不过，在巴黎坐收渔利的约翰·劳却乐于见到此等情景，此刻，他正为自己大获成功的经济计划沾沾自喜。仰仗着足够强大的资金吸引力，在1719年，密西西比公司又吞并了法国的东印度公司，并在同年重新配售了大量股票，这些股票在转瞬间即被疯狂的投资者认购一空。[37]然而，对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来说，密西西比公司过于强大的融资能力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

果然，没过多久，约翰·劳在一次谈话中，提到了英国经济，而且特别提及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他对人预言道，这家公司的股价过不了多久就会暴跌。这件事传到达尔林普尔耳朵里，让他非常担忧，在当年的9月，他再次写了一份报告，发回英国。

报告写道："他（约翰·劳）的每一次谈话都透露出同一个信息，那就是他将让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涨得更高，并且，他还希望全欧洲都来效仿他的经济模式。他毫无疑问将会毁掉英国和荷兰的经济，以及我们的东印度公司，而这完全取决于他的意愿。他曾经在公开的场合当着伦敦德里郡公爵托马斯·皮特（Thomas Pitt）的面说，在欧洲，只有一个伟大的王国，只有一座伟大的城市，那便是法国和巴黎。他告诉皮特，他将会让我们东印度公司的股价下跌。"[38]

从约翰·劳不怀好意的言论中，谁都听得出来，他是准备唱衰东印度公司乃至整个英国经济。在接下来的多个场合，他的谈话内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英国的股份公司。他之所以敢于说出这番豪言，那是因为他对自己亲手搭建的密西西比公司有着坚不可摧的信心，并且认定了如今的巴黎对投资者来说是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天堂，而伦敦的股份公司将会被人们抛弃。为了证明自己的英明判断，约翰·劳和皮特对赌，以一年为限，皮特预付给他18万英镑购买面值10万英镑的东印度公司股票，如果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在一年后贬值，那么约翰·劳将会因此获利，相反，如果股票升值，约翰·劳就会亏钱。[39]赌场高手约翰·劳认为自己必胜无疑，因为他预计东印度公司的股价会一路走低，今年10万英镑面值的股票在第二年会变得一钱不值，皮特等于花了18万英镑从约翰·劳手里买了一堆废纸。不过，约翰·劳这次犯了一个大错误，英国的股票市场不仅在一年之后不会低迷，反而会像巴黎那样，走上一条疯狂的不归路。他的这次

打赌，只能以失败告终，而他最终输掉的，却不仅仅是一场赌局。

英国人的担心还不仅于此。在伦敦的金融圈有一个关于约翰·劳的公开秘密：虽然约翰·劳早年即离开英格兰，再未返回，但他手里的金钱却并没有忘记伦敦这片投资的故土。1712年，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投机大赚一笔的约翰·劳就在伦敦开设个人账户，存入10万英镑，负责打理该账户的人是伦敦的银行家乔治·米德尔顿（George Middleton）。[40]米德尔顿与约翰·劳是苏格兰同乡，二人关系的基础建立于伦敦金融界的苏格兰人际关系网。启蒙运动前金融业在苏格兰蓬勃发展，但苏格兰国运却在17世纪末期愈加衰颓，其面临的经济困境使得苏格兰人经常思考、辩论关于经济和商业的问题，因此17世纪至18世纪的经济学者与银行家大多出自苏格兰。约翰·劳以及稍后的亚当·斯密等，均为个中翘楚。银行家的名头或许不如经济学家响亮，但这位米德尔顿先生在当时的伦敦已经是一个足以引起英国政府关注的重要人物了。

米德尔顿为约翰·劳操持的账户，表面上并没有写着约翰·劳的大名。通常来讲，约翰·劳的户头上挂的名字是米德尔顿自己，或者是另一位苏格兰贵族伊莱伯爵（Earl of Ilay），约翰·劳本人从来不在票面上显示真身。[41]不过，这两个表面上和约翰·劳并无关联的名字却随着约翰·劳的地位日隆而愈加引发英国的担忧。

自从约翰·劳得到奥尔良公爵赏识，身价百倍之后，他在伦敦的账户也变得越来越活跃，吞进和吐出的资金流量也一天多于一天。人们还发现，除了米德尔顿与伊莱伯爵这两位帮手，约翰·劳的亲兄弟威廉·劳（William Law）也来到了伦敦，从事金融投资。这不禁令人疑窦陡生，这三人越看越像在帮助约翰·劳打下伦敦的“经济滩头阵地”，一旦发生金融战，那么导火索就很可能源自他在伦敦隐秘开设的个人账户，伦敦的情况就会更加危急。在时局敏感的1719年，约翰·劳兄弟的账户已经不满足于吞纳货币了，而是直接存入金银。[42]这让敏感的英国人担心，“不怀好意”的约翰·劳妄图控制英国的贵金属，从而达到打击英国经济的目的。他们的担心从理论上讲不无道理，但随后的历史事实却证明了这种担心有些多余。与英、法两国自身积重难返的经济危局相比，约翰·劳的威胁，反而退居次要了。

再将眼光移向巴黎：时来运转的约翰·劳成了18世纪初的法国经济明星，但在法国国内，仍然有少部分人与达尔林普尔一样没有受股票市场一时间疯狂的迷惑，而对约翰·劳本人保持着敌意，并且对他的经济计划

提出警告。其中最主要的人士，就包括约翰·劳在法国的政敌们。当初，约翰·劳拿出自己的股票作为贿赂法国贵族圣西门（Saint-Simon）的筹码时，对方委婉地拒绝了他。奥尔良公爵对圣西门的与众不同之举感到诧异，于是询问他这样做的理由。圣西门答道："自从米达斯神话以来，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谁能将他用手触及的一切都变成黄金呢。我相信，约翰·劳也不具备这种能量。"[43]言下之意，他对这位来自苏格兰的经济学家所做的那一套，并不感冒。不过，作为约翰·劳在法国政府内最大的反对者之一，圣西门并没能充分理解约翰·劳经济计划的运作原理，他们二人的分歧，仅仅在于政治理念的不同。在圣西门看来，约翰·劳脑力超群，智慧确属超乎常人；而且，此人不是一位寻常的赌徒，他有着自己的一套原则和思想体系，并且坚决执行这套思想。"他爱知识胜过金钱。"这是圣西门对约翰·劳的评价。[44]

约翰·劳的确不是一位寻常的赌徒，你固然可以反对他的看法，但是，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全都陷于这个赌徒所制造的疯狂之时，反对声音的效力也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在这个时候，所有人的情绪和行为都不由自主地被一种赌博心态牵动着四肢和大脑，不复有改变的可能，约翰·劳便是这群"提线木偶"的幕后操控人。法国民众对约翰·劳愈加狂热的崇拜，让海峡对岸的英国人也逐渐警觉起来。越来越多的关于"密西西比计划"的书面报告从巴黎寄回了伦敦。英国人感到，约翰·劳的力量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积聚，影响范围已不仅限于金融领域。这从密西西比公司庞大的股票数量可以看出来。密西西比公司在短短数年之间前后四次总共发售了60万股票，这些股票总共吸纳了16亿法郎的资金。[45]此外，通用银行还通过银行券的发行聚敛了大量的贵金属。这笔被他生生"制造"出来的巨额金钱，完全可以成为约翰·劳手中的利器。实际上，约翰·劳在热内亚、阿姆斯特丹、伦敦的银行经纪人此时都在摩拳擦掌，只要他一声令下，密西西比公司就能利用其在证券市场无以匹敌的强大影响力让欧洲任何一只公司股票价格狂跌，甚至将该国经济毁于一旦。不少英国政界和金融界人士都暗忖，如果此时英、法之间掀起一场金融战争，最后的赢家，很可能将是法国。

滚雪球的政府债务

英国人所担心的事情，不仅在于约翰·劳随时可能造成的经济威胁，

更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仍然是英国政府的债务。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原本是用以从根本上解决“谁为政府放债”这个问题。很幸运，在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后，政府果然不愁没人借钱给它了，政府的财源算是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但在此之后，政府出手也更为阔绰，旧债没还新债又至。英国政府账单上欠款数字的增长速度，与过去相比并没有减慢，反而有所增加。雪上加霜的是，1717年，乔治一世统治下的英国一不小心又卷入了战争，这一次的导火索又是被西班牙点燃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和皇后不甘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失败，以及《乌得勒支条约》对西班牙的制裁，出动军队占领了在上一次战争中西班牙失去的领地，这些领地现在已归法国和意大利所有。1718年，法国、奥地利、荷兰、萨伏依组成联军，正式向西班牙开战。英国出于捍卫《乌得勒支条约》的目的，不得已加入了战团。[46]

虽然这次战争无论从规模还是时间上来看，都不及“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但对于原本就负债累累的英国政府来说，多一次战争，就意味着压在骆驼身上的稻草增重了一点，这头硕大的骆驼，离倒下也更近了一步。辉格党政府并非不担心过高的政府负债让政府信誉度直线下滑，从而危及他们的执政。原本在1719年夏天丢下英国国事，到汉诺威游山玩水的乔治一世也不得不在当年年底匆匆赶回他并不喜欢的伦敦，召开新一届的议会。[47]在11月23日开始的那届议会上，乔治一世始终眉头深锁。

议会召开当天，他大腹便便地踱入下议院，缓慢走到国王演讲的讲台。在一番客套和寒暄后，乔治一世对出席议会的下议院议员说：“下议院的先生们，你们将会看到，就像我曾经给你们的理由那样，我对于使用自己的权力增加我国陆上和海上军队的数量是多么谨慎。我完全依靠各位对我和我的政府所表现出的无上的责任和感情，因此你们有完全的责任去调度安排今年政府的必要供应。为此，我特意命令将预算如实呈现在诸位面前。并且，我必须要求各位将你们的思路集中于寻找一切能够减轻国家债务的方法。”

然后，他又转而对上议院的议员们说道：“我亲爱的贵族和绅士们，”他顿了一顿，“你们或许都察觉到了，在我的统治之下，我所必须面对和经历诸多本不值得的困难以及不寻常的问题。由于外国的滥用权力，我们国家的军队大量被派到了海外。我们军队的部署使得国外势力以一种难以忍受的方式来对待我所统治之下的国家。我们由此不得不承

担国家的困难和庞大的开支，然而，在你们的帮助下，我已经很好地克服了这些困难；而在你们继续的帮助下，我希望我们能很快战胜这一切困难，因为上帝之手显然会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的事业。”[48]

乔治一世这位不通英文的国王，很难得在英国议会发表一篇诚恳感人的讲话，但这次似乎是个例外。乔治一世如此“一反常态”，言下之意其实是要在英国议会面前服软，祈求上下议院，希望议员们此时能发扬无私精神，消弭党派政治争执，共同帮助他与英国度过时艰。乔治一世在议会演讲的时候，英国再次濒临滑入战争泥潭的边缘，国家债务也因为累年战事增加到了政府难以负担的程度，可能随时会影响英国的政治稳定；而且，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现在英国的旁边还有一个法国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挑起一场国与国之间的金融战争。如此内忧外患、前狼后虎的状况，难怪乔治一世要在这新的一届议会上向列席的议员们大倒苦水，寻求经济帮助了。

不过，接下来的议会进程有些令乔治一世失望。在1719年11月，英国议会争论最激烈的并非军费和国债问题，而是上议院递交的一份关于上议院改革的《终身贵族提案》（Peerage Bill），这份获得了斯坦诺普支持的法案声言要废除国王任命新贵族议员的权力，名义上是减少贵族议员数量，而削弱国王干涉上议院之权实际上旨在为上议院的贵族议员增强权力。[49]这份法案在议会下议院立即引起了激烈辩论，贵族议员和平民议员为了各自利益，在议会中拍桌子瞪眼，吵了一个多月。1719年12月8日，这次纷争才算尘埃落定。议会最终以269票对177票否决了这项议案，下议院的利益由此得到了保障。[50]直到这个时候，议员们才想起乔治一世几个月前在议会说过的那番话，英国议会的注意力和焦点，才又从上下议院的斗争转而集中于政府债务和国家的经济问题上来。这时，时间已来到1720年年初了。

在接下来叙述英国议会解决政府债务问题的情况之前，有个关键的问题不得不让我们首先进行一番讨论。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同样具有债务问题的英国和法国，在采取了相似的经济措施之后，后者的债务问题表面上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完全解决了，而英国费尽周章成立了中央银行以及专门为政府还债的国有公司，结果却并没有像法国那样，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公债战争”中取得一个暂时性的，甚或说是表面上的胜利？

这是因为两国政府人员对经济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同吗？还是因为法国的经济实力其实强于英国，因此还债能力也更强？或者仅仅是因为约

翰·劳这尊赫尔墨斯塑像此刻在巴黎而不是在伦敦？也许以上原因都对，也许都不对。但是，在种种可能的理由与解释以外，还存在一种解释，其答案或许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情形。

英、法两国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期几乎同时陷入了战争和债务的泥潭，两国政府都试图将国家的永久债务转换为其他形式的债券或抵押品转包给第三方。[51]然而，英、法在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得它们对于政府债务的处理方法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别。简言之，当时的法国虽然具有了代议制机构，但是其地位的不稳固使得这个国家实质上处于皇权的统治之下，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国家。英国则不同，1688年君主立宪制建立之后，皇权退居次席，英国议会掌握了国家的立法权和财政权。拥有稳定的权力制衡机制的英国，个人财产权和信誉更受尊重，资金流动的成本也更低。[52]加之政党政治在英国议会的兴起，英国政治圈关于财政税收问题的博弈也较法国复杂、激烈得多。

直到托利党人罗伯特·哈利等人失势下台之前，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治下的英国政府，具有一种“党派混合”的特质，“用托利党反对托利党，用辉格党反对辉格党”在当时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53]在这个时期，英国议会里的政党斗争异常剧烈，但因为反对派的强大以及内阁自身的多党派属性，也使得英国政府在威廉国王和安妮女王时代大致保持了一种“均势”的局面。无论托利党还是辉格党，没有任何一方的势力能够在政府中占据绝对优势。

这种托利党和辉格党“平分天下”的政治局面对于国家财政有什么影响呢？那就是政府财政由于政党政治的存在而得到了制衡。其中的道理并不难懂。在当时的英国，“辉格党”这个名称具有三重含义，第一是指宗教上反对詹姆士国王和天主教的议会议员，第二是指阶级上属于土地阶层的英国贵族，第三层意思是指英国国债的债权人。[54]这最后一层含义，正是政治制衡的关键所在。

自从英国人学会了来自荷兰的那一套金融手法之后，政府的公共信用就被利用到了极点，甚至出现透支的趋势。所有的国家公共证券，不管它是什么形式，都被政府加以最大化的利用。[55]彩票、有偿证券、国债风行一时，表面上是为了所有人的“共同富裕”而设立，而其实际目的在于替国家还债，准确地说是替那些有钱、有土地、有社会地位的辉格党债权人筹集债务。但是在英国议会中，辉格党的财政计划总是会遭到他们的死对头托利党的反对和阻挠。托利党极力减小政府开支，并且以

此为政治口号，在议会中攻击辉格党。那位在理念上认同辉格党所宣扬的“自由主义”的乔纳森·斯威夫特，也不禁在为托利党撰写的政治小册子里，批评国家卷入的战争实际上使得债权人获利最大，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实际上已经被辉格党以公债的形式所“绑架”。而丹尼尔·笛福则更直接指出，政府信用的危机在于过分将信用寄托于某一个政党。[56]后来，斯威夫特和笛福两人又被托利党政客罗伯特·哈利利用，成为托利党的宣传机器，来龙去脉前文已经详细讲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且不论斯威夫特和笛福甘愿成为某一政党的传声筒是否有辱“文士气节”，二人所抨击挞伐的现象，却是确凿无疑地存在。英国所推行的对外扩张政策，事实上是在为辉格党埋单，使公债的债权人获利。但在议会之中存在着强大的反对派托利党，却让辉格党的钱财没法轻松入袋。在1698年的竞选中，托利党抓住公债问题猛烈攻击辉格党，并向政府施压，要政府强制取消之前的部分债务。[57]

托利党看似正义的建议，实际上也是出于党派利益考虑，但在政治的竞技场上，存在反对的声音总比不存在反对的声音好，反对的声音大总比反对的声音小好。英国进入18世纪以来，政府时常处于分裂状态或政党联合执政，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英国政局的暂时混乱，但议会在经济和政治上“制衡”各方的作用，却得到了充分发挥。政治和经济从来不分家，政治上的制衡减小了，经济上带来的危害只会更大。这个道理很快得到了验证。没多久，在英国进入汉诺威王朝以后，特别是托利党被和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叛乱相联系以来，随着托利党政治上的一蹶不振，英国进入了一个“一党独大”的辉格党时代。[58]

当然，辉格党执政对于国家债务来说并非没有任何实惠。一个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政府能够以较低的利率拿到长期借款。短命的哈利政府由于不被债权人信任，不得不为借款支付8%的高额年息，而辉格党政府深得债权人的信赖，他们只需要为长期借款支付6.25%的利率。[59]债权人对于曾扬言要政府取消一部分公债的托利党心存疑虑，担心他们会像当年耍无赖的查理二世国王一样，把政府欠下的债务来个一笔勾销。辉格党统治之下的社会稳固，成了债权人消除心头这一疑虑的重要保障。

因此，维持“稳定”，成了辉格党执政后的一个首要政治目标，因为社会越是稳定，政府的信誉越高，债权人就越放心，政府借钱的成本也就更低。在沃波尔等人的带领下，辉格党执政以来为实现自己“稳坐江

山”而不断努力。1716年，辉格党让议会通过了《七年法案》（Septennial Bill），把议会选举的期限延长了一倍以上，如此，当政的辉格党执政时间无须选举就能自动延长。另外，辉格党还通过了《骚动法案》等“维稳”法令以限制人们自由集会的权利。[60]稳定，只有稳定，对于辉格党而言，才是他们让政府取信于人，从而借到低利率债务的前提，反过来说，充足的金钱似也有助于政党长久稳固地待在执政的位置。

我们再来看看英国的邻居法国。同样是一个诉武力于世界、债台高筑的国家，但法国的政治体制与英国截然相异。君主专制政体在18世纪仍然是法国不可动摇的政治制度，如此，法国国家政策的随意性就远远高于英国这种拥有代议制机构的国家。君主制对于政府的债权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专制政权的决策通常伴随着君王的个人好恶与喜怒，因此往往缺乏信用，债务违约的情况时有发生。[61]债权人的不信任感，导致了法国政府长期只能以很高的利率借债，而高利率反过来又会驱迫政府加重人民的税收负担。

其实，法国并非没有权力制衡的机制；但是，发源于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三级会议”（the Estates General）已经废止多年，有将近一个半世纪没有在法国召开过，国家从上到下的政令咸出于君主与上层贵族，公债也就在国王路易十四等人的欲壑难填之下无休止地往上蹿升。路易十四死后，圣西门等人曾建议恢复三级会议，商讨国家公债的偿还计划，但遭到了失败。圣西门原本打的小算盘是，国王的债权人多数是巴黎的金融家、农场主和法国的财务官，他们在三级会议中的代表人数很少，政治影响力低微，相反，社会下层阶级构成了三级会议的主要成员。因此，圣西门希望利用来自于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的“第三等级”对增税的反感，让他们在会议中否决继续的借债和以前政府已借的债务，宣布国家破产。[62]

但圣西门的谋划没能如愿，急功近利的法国人拒绝了英国式的政治经济体制，最终选择了约翰·劳那令人迷狂的金融炼金术。法国人为此感到幸运，因为他们的选择在很短的时间就收到了奇效，密西西比公司带来了股票投资的空前繁荣，政府负债就像变戏法一样地轻松“解决”了，每个人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加富足。就这样，法国，这个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国家，却凭借股票这针强心剂从行将就木中站了起来，并以“公债战争”胜利者的姿态睥睨着对岸的英国。而英国虽然在政治制度上具有某

种“优越性”——这让它的公共债务问题一直不如法国严重——但自从辉格党的寡头统治开始以来，英国的权力结构开始向法国靠拢，愈加集中的权力，让这两个国家变得有些趋同。现在，英国和法国最显著的区别在于：英国依旧未采纳约翰·劳发明的金融炼金术。

注释

1 Charles Mackay, 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R. Bentley, 1841, p. 10.

2 Antoin E. Murphy, John Law: Economic Theorist and Policy-Mak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15.

3 Charles Mackay, 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R. Bentley, 1841, p. 11.

4 John Philip Wood, The Life of John Law, Newton Page, 2009, p. 13.

5 Peter M. Garber, Famous First Bubbles: the Fundamentals of Early Manias, MIT Press, 2001, p. 92.

6 法国政府在1715年的债务详细数据见Francois R. Velde, Government Equity and Money: John Law's System in 1720 Franc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2004, pp. 7-8.

7 Charles Mackay, 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R. Bentley, 1841, p. 13.

8 André Cochut, The Financier, Law, Newton Page, 2010, p. 36.

9 Deborah J. Weir, Timing the Market, John Wiley and Sons, 2005, p. 300.

10 Francois R. Velde, Government Equity and Money: John Law's System in 1720 Franc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2004, p. 11.

11 同上，p. 12 .

12 Cristina Johnston, France and the Americas: Culture,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 2, ABC-CLIO, 2005, p. 289.

13 Jon Moen, John Law and the Mississippi Bubble: 1718-1720, Mississippi History Now, http://mshistory.k12.ms.us/articles/70/john-law-and-the-mississippi-bubble-1718-1720.

14 Troy Taylor, Wicked New Orleans: The Dark Side of the Big Easy, The History Press, 2010, p. 9.

15 Janet Gleeson, Millionaire: The Philanderer, Gambler, and Duelist Who Invented Modern Finance, Simon and Schuster, 2001, p. 118.

16 Peter M. Garber, "Famous First Bubbles"，原载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4, No. 2, Spring, 1990, p. 42.

17 Jerry W. Markham,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M. E.

Sharpe, 2002, p. 100.

18 John Berdell, "An Early Supply-Side-Demand-Side Controversy: Petty, Law, Cantillon"，原载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4, Number 4, Fall 2010, p. 213.

19 William Bernstein, The Four Pillars of Investing, McGraw-Hill Professional, 2002, p. 138.

20 Richard Saville, Bank of Scotland: A History, 1695-1995,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4.

21 A. W. Wiston-Glynn, John Law of Lauriston: Financier and Statesman, Founder of the Bank of France, Originator of the Mississippi Scheme, Newton Page, 2010, pp. 27-28.

22 Niall Ferguson,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Penguin Books, 2009, p. 144.

23 Antoin E. Murphy, John Law: Economic Theorist and Policy-Mak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71.

24 见Original Journal, December 17, 1719，转引自Lewis S. Benjamin, South Sea Bubble, Ayer Publishing, 1967, p. 34.

25 Malcolm Balen, A Very English Decei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First Great Financial Scandal,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imited, 2008, p. 74.

26 Richard Cantillon, 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 in General,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p. viii-ix.

27 Antoin E. Murphy, Richard Cantillon, Entrepreneur and Economi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76.

28 Adolphe Thiers, The Mississippi Bubble: A Memoir of John Law, Greenwood Press, 1969, p. 105.

29 Antoin E. Murphy, John Law: Economic Theorist and Policy-Mak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05.

30 David Henry Montgomery, The Leading Facts of French History, Ginn & Company, 1889, p. 191.

31 James Caulfield, Potraits, Memoirs, and Charactors of Remarkable Persons, Vol. 2, London, 1819, pp. 107-108.

32 Adolphe Thiers, The Mississippi Bubble: A Memoir of John Law, Greenwood Press, 1969, p. 116.

33 同上，p. 110．

34 Thomas Wright, The History of France: From the Eearliest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 Vol. 2, The Londo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company, 1858, p. 245.

35 Jeremy Black, British Diplomats and Diplomacy, 1688-1800,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2001, p. 142.

36 Jeremy Black, Debating Foreign Polic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1, pp. 99-100.

37 Federal Writer's Project of the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Mississippi: A Guide to the Magnolia State, The Viking Press, 1938, p. 64.

38 John Philip Wood, Memoirs of the Life of John Law of Lauriston, Printed for A. Black, 1824, p. 81.

39 Antoin E. Murphy, John Law: Economic Theorist and Policy-Mak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02.

40 Larry Neal, "'For God's Sake, Remitt me': The Adventure of George Middleton, John Law's London Goldsmith-Banker, 1712-1719"，原载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 23, No. 2, Winter, 1994, pp. 31-32.

41 同上，p. 33．

42 同上，p. 34．

43 彼得·马丁、布鲁·诺霍尔纳格：《资本战争：金钱游戏与投机泡沫的历史》，王音浩译，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p. 55．

44 Robert Harms, The Diligent: Worlds Of The Slave Trade, Basic Books, 2002, p. 46.

45 Adolphe Thiers, The Mississippi Bubble: A Memoir of John Law, Greenwood Press, 1969, p. 108.

46 David Marley, Wars of the Americas: A Chronology of Armed Conflict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1492 to the Present, Vol. 1, ABC-CLIO, 2008, p. 368.

47 Andrew C. Thompson, Britain, Hanover and the Protestant Interest, 1688-1756, Boydell Press, 2006, p. 15.

48 详见First Parliament of George I: Fifth session-begins 23/11/1719，收录于The History and Proceeding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Vol. 6 (1714-1727), British History Online.

49 Isaac Kramnick, 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 the Politics of Nostalgia in the Age of Walpol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43.

50 Clyve Jones, A Pillar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House of Lords in British Politics, 1640-1784,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1989, p. 103.

51 Roderick Floud, Donald N. McCloskey,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64.

52 Douglass North, Barry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Britain"，原载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9, No. 4, 1989, pp. 803-832.

53 David Hayton, ect., The House of Commons, 1690-1715: Introductory Survey. Appendi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36.

54 David Stasavage, Public Debt and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1688-17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6.

55 Robert Eric Wright, One Nation Under Debt, McGraw-Hill Professional, 2008, p. 23.

56 David Stasavage, Public Debt and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1688-17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24-125.

57 同上，p. 121 .

58 William E. Burns, A Brief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Infobase Publishing, 2009, p. 129.

59 David Stasavage, Public Debt and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1688-17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25.

60 同上，p. 128 .

61 Philip Hoffman, Kathryn Norberg, Fiscal Crises, 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450-17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33.

62 David Stasavage, Public Debt and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1688-17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34.

第六章　拿什么“拯救”英国经济

——“南海计划”在议会的通过

沉甸甸的英国王冠

与法国的一朝繁华相比，此时英国的天空似乎都凝结成了冰冷的灰色，从国王到大臣，每个人脸上都分明写着四个字——愁云惨淡。

乔治一世或许有些后悔当初前来英国继承王位的决定，他怎么能够预料到，自己在英国得到的这顶王冠，镶嵌的不是钻石或黄金，而是沉甸甸的债务。他刚当国王没几年光景，英国王冠上债务的重量又增加了不少，压得他有点透不过气。

当然，国家债务对于王室的实际开支不存在决定性的影响。付给王室的年俸（Civil　List）[1]自从威廉国王时代设立以来，从来都是非常慷慨，也没有一次怠慢过国王，这笔钱始终足够每位王室成员过着一种尊贵而舒适的生活。1689年威廉国王的年俸禄达到了60万英镑，其来源悉数为经过议会批准的国家公共拨款。1698年，由于征收新的船税等因素，王室的收入增加到了70万英镑。[2]不过，在此后的日子里，王室的生活可以称得上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自1713年开始，王室的私人欠债以比年俸增长更快的速度累积起来，到了乔治一世统治英国的时期，虽然年俸进一步上调了将近10万英镑，但对于生活奢靡的王室家族来说，仍然是资不抵债，到1720年前夕，英国王室已经负债累累了。

因此，乔治一世遍寻天下良方，希望能够彻底医好英国的这场“债务病”。他这样做的目的，更多是出于偿还王室债务的考虑，好让自己的奢靡日子能够持续下去，当然，这在客观上也使得国债问题的讨论在英国一直保持着舆论的热度。你可能会问，既然英国的“议会至上”原则在威廉国王登基之初已经建立，那么在英国的政治经济领域，国王应该靠边站，怎么还轮得到乔治一世来替英国的国债问题操心？即使非得操这份闲心，但乔治一世说的话，又值几斤几两，能有什么效力呢？

从原则上讲，议会是英国的唯一立法机构与征税机构，国王被剥夺了私自组织法庭、军队，私自征税，干涉议会等诸多权力，尤其是决定

王室开支的权力。以上权力，全被移交给了议会，以至于有议员说："除非国王再也不需要金钱，否则他不可能不需要我们。"[3]但乔治一世毕竟是名义上的英国最高统治者，而且无论议会召开还是各类政令的颁布，都需要国王的出席或者签署，虽然国王单独什么也干不了，但他依然扮演着英式民主流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角色。因此国王在政治体系当中，虽谈不上举足轻重，但绝非可有可无。况且，国王在议会之中有他的不少亲信和盟友，其中的政治关系只能说是剪不断理还乱。

看来，乔治一世这个异域国王多少还是能起到一点作用的。为此，向他进言献策的各界人士也就不在少数。在他刚刚登基为英国国王时，就有一位哈奇森先生（Archibald Hutcheson）向乔治一世提出了解决国家债务危机的方略，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在全英征收土地税，设立一定比例的永久债务基金，等等，整个意见非常具有系统性。[4]只可惜谏言者并非有名的贵族议员或者政府高层人士，建议因而没有最终得到实行。1715年，又有一位名叫约翰·阿斯基尔（John Asgill）的经济学者提出了他的建议，这份建议采取了更有效率的国债偿还方案，即在英格兰银行之外，再成立一个银行，政府向其注入2000万英镑的资金，银行以这2000万英镑为本金，发行等值的国库券，年息为3%。[5]

说起来，这并非阿斯基尔第一次向国王和政府提出类似建议了。多年前，他就联合另一位经济学者和银行家尼古拉斯·巴尔本（Nicholas Barbon）计划建立一家土地银行，银行将募集250余万英镑的资金，并且将这笔钱以7%的年息贷款给英国政府，贷款的担保为英国的年税收收入。这笔收益相当于英国一年的债务额，因此对缺钱的政府来说，原本是一件十分可行的方案。不过，这项浩大的工程俨然就是要建立央行制度，事关英格兰经济之基础，提议在议会里掀起了一番争执。争执结果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土地银行的提议遭到了议会的抵制和百般阻挠，在跌跌撞撞推行了一段时间后最终归于失败。[6]这是因为，当阿斯基尔和巴尔本提出这个计划之时，成立英格兰银行的计划已经孕育于辉格党人的内心，且有必行之势，他们怎么可能甘愿把如此重要的一颗政治砝码让与外人？尤其当巴尔本还是颇受罗伯特·哈利赏识的一位议会议员时，把持议会的辉格党也就更不可能让阿斯基尔和巴尔本的土地银行计划能够顺利运作。土地银行在艰难发展之下，信贷业务被英格兰银行围追堵截，下场凄惨。

既然提到这位巴尔本先生，不妨说几句题外话。根据英国17世纪的

议会记录，1694年，巴尔本作为股东之一收回了他在伦敦消防保险公司投入的股本，他随后以这笔钱作为资本，欲联合诸多议会议员和英国贵族成立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拥有一项技术专利，那就是从肮脏不堪的泰晤士河河水中，提取水源并进行过滤，把河水净化为市民可以直接使用的饮用水出售。[7]虽然这份公司计划像巴尔本的许多计划那样，只得到个无疾而终的结局。但通过它，也颇能透视出当时英国社会，尤其是伦敦的一些真实状况。

比如，这家公司的业务就很耐人寻味：饮用水。此处的饮用水并非是指经过更高工艺处理的纯净水，而确实只能按照字面理解为能喝的水（drinkable water）。前文曾提及，17、18世纪的伦敦，城市公共卫生建设非常鄙陋，人们连喝到清洁的饮水甚至都成为一大问题，但饮用水这件事情却并不被市政当局视为人人理应获得的公共服务，而是一项可以赚取暴利的商品服务。同样，巴尔本撤回股权的消防保险公司，在伦敦大火之后陆续成立，在当时也是完全由私人资本经营，消防保险公司下属的消防队和救火队，全部属于私人营业。[8]如果发生火灾，消防队并不会无偿替人灭火，而是需要受灾者支付金钱购买服务才肯前来救火，否则，无论火势如何猛烈，消防队只当没有看见。这一切，与现代人的一般观念肯定大相径庭。

我们认为理所应得的基本社会福利，在18世纪的英国可以说基本见不着影子。政府和王室最关心的事情不是如何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是如何增加他们的收入。因此，上层社会锦衣玉食、人民茕孑无靠的状态一直贯穿着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发展进程。直到20世纪初叶英国自由党上台执政之后，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之下推行国家福利政策，鲜明的阶级差距才终于有了扭转的希望，社会的“公平”二字，始被抬升到政治高度。[9]这种“历史的滞后”固然可归咎于18世纪科技落后，有待提高的社会生产力尚不具备提供全民社会福利的条件；但将其归结于历史特定时期的必然现象，似乎更合于事实。资本主义发展初始阶段的繁荣伴随着政府权力的不断增强，这种强势意味着政府对于自身利益之外的一切事情不管不顾。政府的逻辑可以总结为：国家主导、唯商是图、藏富于国，再加一条：国强而民微。18世纪的英国，“民”相对于“国”，其地位的卑贱与低微，颇令今人有扼腕之叹。

在当时充斥着“重商主义”逻辑的英国，我们可以看见政府行为与今天的显著区别。作为工业生产基础的矿产等资源性产业固然是数百年来

各国政府不惜代价抢占掠夺的主要领域；此外，暴利的黑奴贸易需要大量武装力量作为后盾，也离不开国家强制力量的“呵护”，在诸如此类的行业，无处不见“政府”和“国有”的大手在操弄与控制，民间资本常受干扰。[10]虽然私人企业当时已占据整个英国制造业的半壁江山，而且英国的普通法系统也为企业产权提供了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保护，但除了政府不得不扶持的掠夺性企业以及殖民地企业，民间资本实际上时常会主动寻求政府的帮助，把自己置于政府的重重阴影之下。[11]一纸“皇家执照”，对任何企业来说都无异于一张通向更广阔市场的准入证。与此相反，那些在现在看来本不应该由私人企业包办，而是属于全民公共设施的消防队、饮用水以及一系列社会福利项目，却成了政府不闻不问，完全由私人企业经营的买卖。这种“政企错位”，乃是早期资本主义逐利与残忍的一面，与今天的“小政府，大社会”以及“政企各安所当”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较，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反过来说，以今人的眼光丈量彼时伦敦普通市民的生活，也可参照比较得知，现在有哪些国家尚处于资本积累的初始阶段，又有哪些资本主义国家已发展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了。

说回正题：在发表土地银行的方案后时隔多年，经济学家阿斯基尔卷土重来，再次撰写了新的经济计划。1719年5月，他的新计划正式公布，该计划可归纳如下：首先是将价值4000万的政府债务转换为银行币，利息为1%，大大低于本金的原息。此外，债务的转换必须在债权人的同意下才可以发生，而通过兑换得到的银行币，可以在英国的任何流通领域充当货币使用，且在六个月之内需要作兑现偿付。由于乔治一世不谙英文，因此这份建议书被印刷为英文法文各一册，呈递国王御览。[12]

以上所举，仅是沧海一粟，在乔治一世临朝之后，各类经济计划与方案如雪片一般纷纷呈献给国王。有一位议员曾向下议院建议说，应该下调国债年金的利率，不过此提议被否决以后，没有议员继续跟进，因而不了了之。但没过多久，关于下调利率的建议又被一些议员提起，苦口婆心在议会中进行游说。到1715年，议会终于通过了立法，确定新债务的利率维持在5%，年金数额也得以下调，但是议员们没有找到充分的理由说服议会让政府过去的债务利率也同时下调。沃波尔重回英国政坛之后，在他的主导之下，像英格兰银行和南海公司这样债务人比较集中的机构，都同意下调利率，并再次贷给政府一笔数额可观的款项。[13]

此举可以说解决了政府的燃眉之急，不过，英国政府还有大量的不可兑现债务（irredeemable debt），这部分有限债务由于期限短，因此不能通过固定的年金加以偿付，而只能以利率的方式缓慢消化或者直接偿还。[14]对于可兑现债务，政府能找到一万种方法将之转嫁出去，1715年曾短暂担任两年英国首席王室财政大臣的沃波尔建立了利率极低的偿债基金（sinking fund），用来偿还利率相对较高的政府债务。[15]另一方面，辉格党政府借助于成立不久的英格兰银行来吸纳利率较低的短期债务。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方法偿付债务，因此这些不可兑现的债务，成了压在英国政府肩上最大的财政负担之一。这让急于还清公共债务的辉格党政府在绞尽脑汁之余仍感头痛。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布伦特等公司高管想到了利用南海公司的影响力和政府急于偿债的愿望，从而盘下政府债务这桩大买卖。自1711年开始，南海公司获得的皇家执照就允许其涉足政府债务的买卖，和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一起，成为了掌控英国政府债务的三大金融机构。但由于辉格党领衔的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势大权倾，南海公司的股票虽然一路价格高涨，引来众多买家喝彩，但是在政府债券这个巨大的市场，它依然无法与英格兰银行这样的官办机构抗衡。到1719年，英格兰银行几乎掌控了全部的短期政府债务，以及1650万英镑的可偿付债务，加上它所持有的价值340万英镑的政府年金，英格兰银行拥有的政府总债务至少有2000万英镑。[16]而南海公司只拥有价值920万英镑的政府年金，加上其他类型的债务，南海公司持有的政府总债务大概有1100万英镑，只及英格兰银行的大约一半。[17]

虽然实力不如英格兰银行，但南海公司自成立之后，董事们的心思从未放在南海贸易的业务上。这帮大部分从刀锋公司“空降”过来的银行家和托利党政客们挺过了当年沃波尔对议会的“清洗”，在利益驱使和党派情感的作用下，一直希望在债券市场能有一番作为，最好是能够与死对头英格兰银行分庭抗礼，甚至是取而代之。对于政府债务，南海公司觊觎多时，早就恨不得一口吞掉。英国和西班牙两国1718年的再次交战，使得南海公司的海上贸易被迫暂时中断，以布伦特为首的公司董事们如今只剩下一件事情可以动脑筋了，那就是政府的债务。这时，他们想到的却是令不少英国人感到担忧的密西西比公司和它的掌舵人。

议会里的反对者

南海公司的计划在正式公布以前只在小范围内流传，布伦特在乔治一世匆匆赶回英国之后不久，就向斯坦诺普等人言及，自己希望向政府提出一项计划，计划的灵感直接来源于约翰·劳。据说，这项计划可以“预付国家的所有债务”，并且能够“把各类负担繁重的债务进行最大简化”。[18]不久，布伦特所言自然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心里憋不住话的乔治一世则干脆在议会上向全体议员提及了这份经济计划。

英国的不少政客此刻正紧张地观察着海峡对岸巴黎经济的风吹草动，并且打心眼里厌恶约翰·劳所做的一切给他们带来的不安与利益损失。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到，约翰·劳真正登陆英国的“滩头阵地”，并不在有形的伦敦证券交易市场，而在人们无形的观念里。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力，早在布伦特操纵刀锋公司代理发行国家彩票的时候就已悄然而至了。

根据历史记录，布伦特当年建议哈利以发行彩票的办法增加国库收入这个点子，其实并不是他本人的原创，而是来自于约翰·劳的建议。早在1711年南海公司即将成立的时候，远在布鲁塞尔的约翰·劳就曾给哈利写信，表示他希望回到英国辅佐哈利完成这项宏伟的经济计划。[19]尽管遭到哈利拒绝，但约翰·劳这些年身在欧洲，除了向欧洲的君主们推销自己的经济思想，他也始终未曾忘记英格兰的事务。他曾不止一次写信给英国的朋友，希望自己的计划可以得到英国政商界高层的赏识，只可惜一切努力皆是无功而返。[20]约翰·劳虽对英国政府心灰意赖，却并未断绝与英国方面的联系。终于，在法国“意外”获得成功之后，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经济理念在英国的最佳代理人，那人就是曾经采纳他建议的约翰·布伦特。布伦特在看到密西西比公司股价飙升带来的丰厚财富后，马上成了约翰·劳的信徒。他认为，约翰·劳能在法国巴黎获得的，凭什么就不能在英国伦敦同样获得？时任英国财政部长的艾斯拉比曾将布伦特提交的这份计划描述为约翰·劳经济计划的英国版本，简而言之，这份大胆的计划意图将所有的政府债务，不论利息高低、长期还是短期，全部混合在一起由一家大型金融机构接手，这家机构理所当然应该是南海公司。在布伦特看来，无论对政府还是对南海公司，这都是个一劳永逸的办法。[21]

这份经济计划最大的一个取巧之处就在于其提出的时间。1719年年底，正是英国普通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由淡转浓、对于巴黎的密西西比公司兴趣盎然的时刻。[22]况且，就在这一年，南海公司成功地“购买”了政

府在1710年末被认购的大部分彩票，这次认购使得公司和政府分别获得了7万和20万英镑的收益，这次与政府的成功交易直接促使布伦特决定向政府提出南海公司的债务解决计划。[23]在这个绝佳时机提出一份直接借鉴自“密西西比模式”的新债务计划，吸引那些持有政府不可兑现债务的人交出自己手中的债务进行投资盈利，岂非既可以解决公债问题，又能最大限度扩张南海公司资本的良策？布伦特和公司的董事们如此盘算着，并且成立了一个“南海计划”的七人委员会，布伦特自任负责人，其他成员还包括公司的财务主管罗伯特·奈特、次主管约翰·费洛斯、副主管查尔斯·乔伊斯等人。1720年1月22日，议会下议院正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讨论南海公司的这份提案，并在议会里传阅当年政府的债务明细单，好让每位议员都对英国此刻面临的困难心里有数。[24]颇有心机的布伦特开始在委员会中排挤南海公司的反对者，因为他发现，有太多他不想看到的人也名列这个委员会。为此，他特别向议会建议，委员会由公司的副主管直接管理和听取意见，如此一来，反对派就会在委员会中彻底失势。布伦特想以委员会为据点，一步一步扩大南海公司计划的支持者在整个议会中的势力。[25]

然而，这些招数并没有使议会就这项议案立即达成共识，相反，对这项建议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人，并不能忽略不计。英格兰银行在议会中的盟友们条件反射似的对这份计划表示了异议。按照这些年的“老规矩”，英格兰银行享有处理国家债务的优先权；反观南海公司，自成立至今没有为国家解决公债问题出过任何一点力，如今居然想一跃成为政府债务的最大持有者，于情于理似乎都说不过去。另外，辉格党的几位大佬，也没有直接支持这项前所未闻的计划。桑德兰伯爵一直没有对这份计划表态，斯坦诺普虽密切留意着南海公司的动向，但在公开场合同样是默不作声。处于不同利益方的人们此时面对南海公司的新计划，考虑的策略各不相同，布伦特和他的伙伴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议会格局。

自从辉格党内部出现派系分裂以来，以沃波尔和汤曾德为首的反对派与国王的亲信大臣斯坦诺普、桑德兰伯爵等人组成的政治小团体产生的分歧越来越大，到了1719年左右，二者的不和已呈冰炭之势，难以调解。沃波尔等辉格党反对派占据了议会下议院，主张对王室开支进一步进行限制，削减政府负债。而以亲近乔治一世的桑德兰伯爵为首的内阁则对国王的要求一律妥协，抱定了“跟着王权走”的信念。两派人马最激

烈的一次交锋便是该年年底的《终身贵族议案》。斯坦诺普和桑德兰伯爵一直在力推议案获得通过，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沃波尔和反对派最终获得了胜利。[26]另外，乔治一世也因反对派的胜利而受益，毕竟，这部法案原本是要禁止国王继续履行任命上议院议员的权力。

这就是沃波尔的聪明之处，通过议会对贵族法案的拒绝，他更加巩固了下议院的实力，顺便也将国王拉到了自己的阵营一边。与此同时，沃波尔在议会之外还有另一个坚定的盟友，与乔治一世长期不和的王子——威尔士亲王乔治·奥古斯塔斯（George Augustus）。在沃波尔的斡旋下，叛逆的王子在多年之后终于与国王取得了暂时的和好。[27]这件事在无形当中，让乔治一世父子越来越愿意相信这个议会中的反对派领袖。沃波尔的政治砝码，正在一点一点通过国王和议会这两条途径积聚着分量。此消彼长，斯坦诺普和桑德兰伯爵等人的政治势力却因为沃波尔在议会中的崛起而开始有所动摇。1720年，正是决定两派政治力量日后走向的转折点。布伦特在这个时候提出“南海计划”，使得几方力量终于在议会中找到了利益博弈的契机。

用股票换选票

不过，斯坦诺普和桑德兰伯爵并不方便在议会里公开表示自己是否支持南海公司的计划。有关这项经济计划在议会里的琐碎讨论，大部分责任落在了财政大臣约翰·艾斯拉比和邮政大臣詹姆斯·克莱格斯（James Craggs）二人身上。这两个“资深政客”，都非善类。先说说艾斯拉比，他的家族原本出身于地位低贱的约曼农。[28]不过，他出身贫寒的父亲早年却幸运地通过婚姻攀上了高枝——娶了颇有政治影响力的约翰·马洛里（John Malory）骑士之女为妻，从此艾斯拉比家族一跃成为新晋贵族。[29]父亲创造的良好家境让年纪轻轻的艾斯拉比在1695年就进入议会下院，成为托利党议员。不过，这位托利党人的“党性”并不强，多年来政治立场时常摇摆，每每左右逢源。因此，当提拔他成为海军大臣的罗伯特·哈利倒台之后，他并没有受到太大的负面影响，而是马上选择与桑德兰伯爵结为政治盟友，他很快就受到桑德兰伯爵赏识，并被迅速提拔为英国的财政大臣。

布伦特原本希望“一步到位”，直接向斯坦诺普和桑德兰伯爵和盘托出自己的建议。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天真。劝说这两位英国权势

最大的政治人物并非易事，布伦特的计划因此面临搁浅。此时，经人介绍，布伦特将这份计划呈递给艾斯拉比。[30]艾斯拉比作为当时英国财政的“总管家”，对于政府债务问题早已是焦头烂额，当布伦特等人向他提出南海公司计划的建议时，艾斯拉比本人很是支持这个有助于减轻政府公债负担的计划。不过，南海公司之外的另外两大金融机构，东印度公司和英国银行都在议会中有他们的庇护人。要想这项虎口拔毛的计划获得他们的同意，难上加难。为此，当布伦特把经济计划的草案拿给艾斯拉比过目的时候，他建议说，整件事情只有找到克莱格斯并请他帮忙，成功的可能性才会更高。

这位克莱格斯先生究竟是何方高人，竟能得到财政大臣如此信赖？和艾斯拉比截然相反，克莱格斯没有他那样的好运，在进入议会下院之前，他从1702年开始一直担任地方议员，多年来一直俸禄微薄，影响低微，还曾一度担任马尔伯勒公爵夫人的仆从。不过，自此他的人生开始转运，不仅得到了公爵夫人的喜爱，还就此获得了显赫的地位。直到1715年，混迹政界多年的克莱格斯总算熬出头，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成为英国的邮政大臣。[31]

邮政大臣乃英国邮政部的首脑。英国邮政部常年垄断着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邮政通信和全国信使及马匹的管理，在行政级别上，与英国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都能平起平坐。克莱格斯凭借自己在政界摸爬滚打的经验和广阔的人脉，在邮政大臣的职位上捞了不少好处，此外，他和伦敦的商界也往来频繁，也在商业机构中任职，亦官亦商，是个官商通吃的老滑头。

布伦特和罗伯特·奈特等人一经与克莱格斯接触，对方马上就领会了来者的用意，对于任何送上门的生意，他是一概不会拒绝的，更何况这次来的是南海公司这棵“摇钱树”。没过多久，克莱格斯就成了布伦特和奈特的同盟者，当然，这个联盟是建立在金钱交易的基础上的。[32]主管南海公司“钱袋子”的奈特开始了英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政治贿赂。但行贿的物品，却并不是金钱，而是一样比金钱更值钱的东西——南海公司的股票。

作为私人酬谢，奈特在1719年12月以个人名义买进了价值高达22,000英镑的南海公司股票，这些股票立即被转到了艾斯拉比的名下。令艾斯拉比高兴的是，到了1720年，更多的股票被归到他自己的名下，从该年1月到3月，至少有7万英镑的南海公司股票被一位叫马修·魏蒙索

尔德（Matthew Weymondsold）的伦敦证券商买走，不用说，这些股票被全部转移到了艾斯拉比的个人账户，以及艾斯拉比女婿的账户。不过，这笔贿赂在短短一年后就让艾斯拉比遭了殃，他甚至连享受的机会都没有。[33]

对于那位比艾斯拉比更“神通广大”的克莱格斯大人，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则另有利用他的方法。艾斯拉比无论怎样向南海公司频送秋波，董事们都只当他是政府中人，说句话也要防备三分；但这位游走于官商之间的克莱格斯，则更像是南海公司一位可靠的朋友。克莱格斯实际上充当了南海公司在政府中的顾问角色，在他的建议下，布伦特对于议会里哪些重点人物需要加以行贿，金额是多少，很快就了然于胸。而克莱格斯这个“顾问”也不是白干的，他和他的儿子从南海公司手里得到了价值超过36,000英镑的股票作为回馈。[34]在克莱格斯的建议下，布伦特等人对政府里的关键人物挨个进行了贿赂，有人统计，此次行贿的总金额超过了50万英镑。[35]当然，南海公司的贿款全数是以股票的形式赠送给受贿人的。公司的董事会可不准备在这帮政客身上花太多的钱。

当时，打算向政府提出公债解决计划的并非只有南海公司一家机构，但南海公司无疑是其中最会与政府打交道的一家，这使它脱颖而出，获得了向议会提出议案的宝贵机会。有了艾斯拉比和克莱格斯这两位仁兄里应外合，南海公司便壮着胆子向议会提请了这项议案。1720年1月22日，议会下院正式宣读了南海公司挽救政府债务的提议。提议的开篇写道：南海公司多年来深受英国政府关照，因此在致力于南美洲贸易之余也不忘关心国家社稷。他们希望同政府合作，共同找到解决国家债务的方法。为此，南海公司建议，政府允许他们在现有基础上扩大资本，其方法便是接收政府欠下的年金和债务。南海公司计划在1721年3月25日之前完成所有政府债务和年金的转换。但南海公司并没有足够的钱来买这些债务，于是，公司股票成了这桩交易的支付手段。拯救国家债务的计划就这样成了“打白条”的买卖，因为股票的发行数量，在当时完全由南海公司自己说了算，没有任何限制。

南海公司“恭谦的请求”包含了诸多条款。第一，上述提及的年金以及债务将以直接购买或者自愿捐赠的方式由南海公司获得，并且整个过程不受任何人的强迫或干预。价格由南海公司与年金的所有者和债务持有人协商确定。第二，对于那些有效期为99年和96年的年金来说，公司每购入5英镑年金，或者100英镑的债券，公司的股本都将获得100英镑

的补偿。公司还将购买1710年国家彩票发行的剩余金额，以充股本。第三，公司对于依靠购买政府年金和债务获得的资本收益，有全权责任。但在1727年年中之后，南海公司将不再享有这种优惠。第四，南海公司应当以公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为王室的国库埋单，偿清1716年圣诞节之前的所有债务。第五，对于国家新发行的国库券，南海公司有按比例支付的责任，具体数额将由财政部最后定夺。书面建议的落款处，签着南海公司的两位“二把手”——约翰·费洛斯和查尔斯·乔伊斯的名字。[36]

在下议院，收了贿赂的艾斯拉比此刻不遗余力向诸位议员列举南海公司计划的好处。首先，利率会因此降低，这对于减轻政府的经济负担是一大实惠；其次，南海公司会为政府的债务埋单，而这家公司光明的贸易前景让他十分有把握将公债问题交给布伦特等精明能干的董事会成员解决；另外，公债问题困扰英国政府已有二十多年，拖得够久了，但凡有可行的解决之道，他都希望议会能予以慎重考虑。克莱格斯和其子随即应声附和，声称艾斯拉比的意见是目前唯一的可行之道。

但这份完全把英格兰银行排除在外的提议，并没有立即获得多数人的支持。议会里的人们此时还不太清楚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打算先静观其变。况且，下议院对于任何形式的金融垄断从来是深恶痛绝，因此，要让艾斯拉比劝说议员们短时间内同意一项废除英格兰银行特权，从而让南海公司一家独大的法案是不可能的事。[37]一位议员记录道，当他们听闻了南海公司的计划之后“如雷霆万钧”，有一位议员甚至惊愕得脸颊煞白。然后，议会就是否接受这项提案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激辩。[38]论辩双方的立场可以粗略归纳为两种：一方是拿了南海公司贿赂的，另一方则是尚未收受南海公司贿赂的。

英格兰银行在议会里的代表把此次辩论的细节带给了银行董事们。这时，英格兰银行再也沉不住气了。在南海公司呈递计划仅仅五天之后，英格兰银行也向议会下院递交了他们的国债救助计划。布伦特和他的同僚们感到，这次或许真的到了和英格兰银行硬碰硬的时候了。一想到这儿，布伦特心里又宽慰不少，他已经用金钱在议会下议院里买下了不少“暗桩”，这先于英格兰银行的一着棋，会暗中帮助他和南海公司成为这场大博弈的胜利者。

英格兰银行提出的计划与南海公司针锋相对，承诺向政府收购欠下的债务、年金、历年发行的剩余国家彩票、军费等等，而且这笔钱全数付清的期限比南海公司计划中的公债转换期限更早，条件也更为慷慨。

在计划书中，英格兰银行不忘把“爱国”的标签往自己身上贴，英格兰银行称他们非常了解国家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债偿还的情况，这便是促使他们提出这项建议的动机，因此“怀着恭谦的心情向光荣的议会递交这份建议”[39]，极尽言语的虚伪肉麻之能事。英格兰银行唯恐不能说服议会，又在2月1日第二次向议会下院提出了计划。南海公司，也随即第二次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双方的针锋相对逐渐进入白热化。议会正式接受了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各自提出的“公债解决计划”，交由议员们公开讨论。就这样，一场经济战的序幕，由议会里的口水战拉开。

如何说服大多数人

在议会里，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都拥有各自的支持者，前者的首领是财务大臣艾斯拉比，后者则是沃波尔。在下议院呼风唤雨的沃波尔凭借前不久驳回《终身贵族提案》一事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在议会的领导地位，更重要的是，打击了桑德兰伯爵等人的政治力量。[40]几个月后，他的对手变成了当年被自己送进监狱的托利党人哈利创建的南海公司，这次面对“老对手”的挑战， 口才了得的沃波尔更是志在必得。

议会下院的每一个人应该都没有忘记，沃波尔数月之前在这里的慷慨陈词：“罗马人将代表名誉的神庙建造在代表道德的神庙后面。这象征着要想获得名誉，首先要获得道德。而如果这项法案获得了通过，那么最有力的一项道德动机将不复存在。”沃波尔以这段颇富文采的话作为开篇，接下来，他历数了这项法案的诸多不是，然后总结说，这项法案的最大作用就是限制在座的各位具有高尚道德的议员有机会晋升为贵族议员。“这件事情实在是令人惊讶，因为它直接出自或者说至少得到了一位议会绅士的支持，这位绅士本人在晋升为贵族议员后，便希望转身关上它身后通往荣誉的大门。”沃波尔所说的“绅士”，显然就是指斯坦诺普。[41]

沃波尔的演讲得到了众人的赞赏，结果也如他所愿，这部《终身贵族提案》没有获得通过。如今，议员们仍对沃波尔这番很有说服力的“道德说辞”记忆犹新，但面对南海公司的提案和议会集体腐败的现实，他的“道德论”还行得通吗？

一开始，沃波尔很高兴地听到了议会中支持自己的声音。在南海公司第一次正式提请自己的国债方案时，艾斯拉比恨不得让议案立即被议会通过，因为此计划通过得越快，对他本人和南海公司就越有利。这

时，议会里出现了反对艾斯拉比的观点。一位名叫托马斯·布罗德里克（Thomas Broderick）的议员从座位上站起来，对艾斯拉比说，在国家债务得到真正的解决以前，任何人或者团体提出的建议都应该纳入议会的考虑范围，而不是草率地决定一个新的偿债计划。即便是南海公司提出的这份计划，也应该交由议会进行充分的讨论之后再做判断。[42]这等于直接把艾斯拉比的想法顶了回去，这令财政大臣十分恼怒。但没等他反驳，另一位名叫约瑟夫·杰凯尔（Joseph Jekyl）的议员也站起来表示同意布罗德里克的意见，并对艾斯拉比说，议员的责任是充分讨论问题，运用人的理性解决问题，而不是凭感觉做事。两位议员丝毫不给财政大臣面子，弄得艾斯拉比异常尴尬。在艾斯拉比长达一小时的讲话过后，是一段短暂的沉默。默默坐在台下的议员们心里都在想：谁会是下一个站起来发言的人？这时，已在座位上忍耐很久的沃波尔终于站起来打圆场说，从原则上，他认为南海公司提出的这份详尽的建议是合理的，但是一切议案都必须按照议会的规则来办。因此，他赞同前面两位议员提出的“议案应充分讨论”的建议，在议会中对南海公司的议案进行公开的讨价还价。[43]

沃波尔的这番话看似温和，其实是以退为进、暗藏锋芒。当有人试图站起来反驳他时，遭到了下议院全场的嘘声。议长在讲台上大声呵斥道：“请听一下你们的议员说话。”场下传来更大的呼声：“我们早就听够他废话了。”[44]议长见状，只得无奈地退席。此番场景，沃波尔看在眼里，心头平添了几分胜利者的自信。

但是，沃波尔的自信并没能一直维持下去。“道德论”在“不道德”的议会中并不吃香。人们推崇的，还是“利益论”，谁的方案最有利，就采纳谁提出的方案。在两份计划书送交议会讨论的过程中，英格兰银行没有占到上风，他们的国债计划也因为南海公司而遭受挫败。在这期间，沃波尔一直在下议院发表演讲，批评南海公司的这项计划。但就在沃波尔和他的同僚们不遗余力地批评南海公司的时候，公司的股票价格却在悄然上升。南海公司的计划被送交至议会讨论以来，其股票价格在数月内往上翻了好几倍，从1月的120英镑每股，2月的175英镑每股，3月的330英镑每股，再到4月底的400英镑每股。[45]股票价格的稳步上升无疑为“南海计划”在议会中的通过做了最坚实的心理铺垫，议员们不约而同认为，只要股票还在上涨，那么这项计划就具有可行性。

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很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股票价格的上升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南海公司把股票作为贿款赠送给了议员们，而随着持有南海公司股票的议员数量越来越多，人们对股票的信心会更坚定，股价自然会涨得更高，这种循环最终将使整个国家陷于对南海公司股票的迷狂之中。[46]当南海公司的雄心开始发酵时，支持布伦特的人数渐多了起来，沃波尔在下议院的地位开始显得有些孤立了。

在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第二次公债计划被提交到议会进行讨论时，沃波尔又一次以反对派领袖的身份站了出来，他在议会下议院发表了反驳南海公司计划的演讲。在演讲中，沃波尔直言他很担心南海公司的经营状况，如果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把国家债务悉数交付给这家公司，一旦公司自身有个闪失，公债将会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并且，由于公司的股票升值不受任何限制，那么，南海公司很可能会重复法国密西西比公司的方法，通过让股票不断上涨的办法来最终化解所购买的债务，这会造成整个伦敦股票的虚假繁荣。为此，沃波尔向议会建议，如果接受南海公司提出的方案，就必须以限制公司股票上涨的幅度作为前提。他还进一步预言，如果议会批准了这项计划，那么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将借此成为掌控国家命脉的“经济贵族”，甚至会进一步掌握国家的立法机构。[47]沃波尔向议员们描绘的南海公司，不仅有深不可测的经济野心，并且还有昭然若揭的政治野心。这家手执皇家执照的公司，可以说是异常黑暗而邪恶。

尽管沃波尔口才出众，他的这番话在1720年的议会下议院里又有几个人听得进去呢？有不少人早已感觉到，南海公司提出的计划和此时约翰·劳在对岸的法国所做的事情十分相似，但问题在于，与约翰·劳相似又有什么不好吗？比起严重的债务问题来，对于南海公司的计划到底是何居心，毫无必要过于敏感。约翰·劳现在是全欧洲瞩目的经济学家，他的这套方法已经成功地“解救”了法国经济，为什么英国人就不能采用他的这套“治病良方”呢？

再说，英国人对于英格兰银行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自1694年成立以来，英格兰银行曾经承诺解决的政府债务已经堆积如山，银行的董事们也并未想出更好的解决之道。连艾斯拉比也在事后承认，英格兰银行紧随南海公司之后提出国债偿付计划纯属“临时起意”，在此之前，“这家银行已经显示了它在减少公债方面存在的巨大缺陷，并且它还以轻蔑的态度对待这项偿债计划”[48]。在两份债务计划的天平上，议员们原本将自己的认同感作为决定胜负的砝码，安放在英格兰银行的那一边，但随着

辩论在议会的进行和南海公司股价在交易所的攀升，现在，这些砝码似乎被移走了。

布伦特们知道，仅仅如此还不足以使胜利的天平向南海公司一方发生偏移。很显然，议员们的信任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收受贿赂和受股价涨价的刺激而激发出的一时之举，无法持久。要想让人们把从英格兰银行那里取走的砝码安放到南海公司这一边，还需假以时日。这个时候，擅长“和稀泥”的艾斯拉比找到布伦特，向他建议说，鉴于目前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在议会中的胶着状态，债务计划恐怕会因此受到拖延，不如采取和英格兰银行合作的办法，共同提出一份新的计划，如此，成功的希望会更大。谁知布伦特断然回绝，并气愤地大声回答：“我们绝对不会和别人瓜分自家的孩子。”[49]

布伦特的理念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担心一旦合作，实力更为雄厚的英格兰银行会蚕食自己的权力，一步一步把两家机构共同经营的生意变成英格兰银行一家的生意。布伦特和任何一位公司董事都不想吃这种暗亏。布伦特现在的野心已经足够大，他要凭借自身的力量让南海公司成为英国唯一的公共债权人。[50]

在布伦特为了他的“南海计划”而“壮心不已”时，沃波尔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反对南海公司向议会提出的任何计划，但如今他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在议会中进行一些带有鼓动性的演讲而已。几个月下来，人们发现这些旨在反驳南海公司的演说似乎有些变味，沃波尔已经不纯粹是为了反对南海公司的公债计划而争辩，而是在这些辩论中杂糅了他个人的好恶和政治立场。原本就不算团结的辉格党，此时依旧延续着以往的分歧，以桑德兰伯爵等人为代表的政府内阁在南海公司公布计划之初就公开表示支持这项计划。[51]沃波尔提出的反对，更像是在履行下议院反对派“为了反对而反对”的职责，与桑德兰伯爵唱了多年反调的他这时已感觉到，自己作为异议者的声音，正随着人们对南海公司期望值的上升而变得越来越微弱。[52]

经过3月底的最后一次激烈辩论后，尘埃逐渐落定。反对者沃波尔以完败为自己在议会的这场演出谢幕。1720年4月4日，南海公司的计划以172票赞成55票反对正式获得议会下议院通过，当计划送至上议院表决时，反对票仅有17票。但即使反对者已经是少数中的少数，一位名叫考珀勋爵（Lord　Cowper）的上议院贵族议员仍然在议案通过后站起身来，向众人提出了悲观的警告。他说，这个法案就像是一架特洛伊木

马，在万众瞩目和极尽奢华之中被引进英格兰，但却无时无刻不在谋划着背叛与毁灭。“该项法案的公众意愿是为了再次买回国家的债务，此举将在未来遭遇无法克服的困难。”[53]此外，诺斯勋爵、格雷勋爵，以及沃顿公爵等人都对这项富了少数人的计划表示反对。但贵族院的反对派已经无力回天了，此刻，根本没有人愿意多听他们说一句话。

4月7日，法案在通过议会三读之后获得皇家授权。凭借这项法案，南海公司独占了半数以上的国家债务，这使得它一举超越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成为政府的最大债权人。[54]更为重要的是，占据公债大半江山的南海公司，此刻已经通过金融的链条，把公司的利益和英国政府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南海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们，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国家的“幕后老板”。这一天，闻讯而来的投资者把伦敦交易大厅围了个水泄不通。

可想而知，南海公司的股票在议案通过以后将变得如何炙手可热，但是，对于这个计划是否真能为英国解决政府债务问题，当时谁也不敢拍胸脯保证。不过，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却不需要为上述这些问题感到烦恼，因为包括布伦特在内的每个人都知道，只要有办法能使南海公司的股价持续上升，那么政府的债务就等于自动清偿，并且公司还能不断地从这项法案中捞取好处。布伦特很为自己的这次成功感到高兴。南海公司为制造这架借鉴自约翰·劳的“经济特洛伊木马”付出的代价，是价值超过100万英镑的贿款。[55]当然，这实际上并没有花南海公司一毛钱。议员们收下的以及南海公司付出的，不过是一些转瞬即逝、随时可能变成废纸的股票而已。

一位英国历史研究者曾感叹道：“如果英格兰银行按照他们自己的原则制定的计划得到了议会的通过，那么，由此引发的投机行为在日后带来的糟糕后果就能够避免了。”[56]但是，历史不存在“如果”，人们作出的选择造就了不可扭转的残酷现实。我们习惯于把历史的进程解读为由冗长的平庸段落和其间几个奇峰突起的关键节点所构成，认为只要改变那些在关键时间所作的关键决策，历史的进程便将被彻底改写。然而，集体在某一时刻作出的选择并不是随意为之的，它与社会土壤有着更为深层的联系。英国的议员们选择“南海计划”而不是英格兰银行或别的什么机构来“拯救”当时的英国，是一种自由选择，但又何尝不是各种综合因素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注释

1　所谓年俸是指英国王室的年度预算开支，涵盖了王室的日常生活、出访、人力、公事等方面开销。光荣革命之后，王室年俸彻底与国家财政分开，由议会批准一定的额度。详见Bill Jones, Dictionary of British Politic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9.

2　见The County Magazine, Vol. 1, Printed by B. C. Collins, 1788, p. 66.

3　见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British网站“William III (r. 1689-1702) and Mary II (r. 1689-1694)"词条。

4　Sir John Sinclair, The History of the Public Revenue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1, 1785, London, pp. 95-96.

5　同上，p. 97．

6　Bruce G. Carruthers, City of Capital: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41.

7　D. W. Hayton, The House of Commons: 1690-17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2.

8　John B. Nadal, London's Fire Stations, Jeremy Mills Publishing, 2006, p. 5.

9　19世纪的自由党由辉格党演变而来，于1859年正式成立。后来成为首相的自由党人劳合·乔治在1905年入内阁之后力倡社会公平与社会福利，为二战后西欧福利社会理念之肇。详见Michael J. Winstanley, Gladstone and the Liberal Party, Routledge, 1990, p. 38以及Martin Pugh, The Making of Modern British Politics, 1867-1945, Wiley-Blackwell, 2002, p. 110.

10　例如，美国企业在18世纪的逐渐“脱英独立”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摆脱英国殖民企业对市场的独占和人为的贸易限制。详见Lawrence M. Salinger, Encyclopedia of White-Collar & Corporate Crime, Vol. 1, SAGE, 2004, p. 132.

11　Patrick Karl O'Brien, Roland E. Quinaul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ritish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24.

12　Sir John Sinclair, The History of the Public Revenue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1, 1785, London, p. 98.

13　同上，p. 100．

14　Hugh Murray, 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Longman, 1834, p. 356.

15　James Franck Bright, A History of England, Vol. 3, E. P. Dutton, 1837, p. 950.

16　James MacDonald, 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08.

17　Dwight Clayton Cozier, Regulating Moder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Centres Dorrance Publishing, 2010, p. 5.

18　Sir John Sinclair, The History of the Public Revenue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1, 1785, London, p. 102.

19 John Carswell, The South Sea Bubb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77.

20 Stanley L. Engerman, Finance, Intermediar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4.

21 John Carswell, The South Sea Bubb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100.

22 George Richard Potter,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CUP Archive, 1971, p. 250.

23 John Toland, A Collection of Several Pieces of Mr John Toland, Vol. 1, London, 1726, p. 406.

24 见First Parliament of George I: Fifth session-begins 23/11/1719，收录于The History and Proceeding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Vol. 6, 1714-1727, British History Online.

25 John Toland, A Collection of Several Pieces of Mr John Toland, Vol. 1, London, 1726, pp. 410-411.

26 Clyve Jones, A Pillar of the Constituti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1989, p. 101.

27 父子不和是汉诺威王室的一项“传统”。乔治一世父子长期争吵，乔治一世盛怒之下将儿子赶出了皇宫；而当乔治二世继位后，同样的不和又发生在他和他的儿子身上。详见John Clark Ridpath, Ridpath's Universal History, Vol. 14, Jones Brothers Pub. Co., 1899, p. 503.

28 “Yeoman”是指拥有自己土地和一定资产的自耕农。在经济上，他们算是当时英国的中产阶层，但政治地位依然十分低下。整个18世纪，自耕农阶层处于衰落的过程当中。见Élie Halév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in 1815, Routledge, 1987, p. 194.

29 John Preston, Neale Views of the Seats of Noblemen and Gentlemen in England, Wales, Scotland and Ireland, London, 1826, p. 204.

30 John Toland, A Collection of Several Pieces of Mr John Toland, Vol. 1, London, 1726, p. 408.

31 John Heneage Jess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England, Richard Bentley, 1843, p. 412.

32 Danby Pickering, The Statutes at Large, Vol. 14, J. Bentham, 1765, p. 356.

33 William Cobbett,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7, R. Bagshaw, 1811, p. 749.

34 Alexander Pope, The Works of Alexander Pope, esq., Longman, Brown, 1847, p. 106.

35 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98.

36 William Cobbett etc.,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7, AD

1714-1722, Printed by T. C. Hansard, 1811, pp. 630-632.

37 John Carswell, The South Sea Bubb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102.

38 Malcolm Balen, A Very English Decei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First Great Financial Scandal, Fourth Estate, 2009, p. 88.

39 William Cobbett etc.,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7, AD 1714-1722, Printed by T. C. Hansard, 1811, p. 639.

40 William Cox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Administration of Sir Robert Walpole, Earl of Oxford, Vol. 1, Printed for T. Cadell, jun. and W. Davies, 1800, p. 201.

41 同上，pp. 207-209 .

42 George Lillie Craik, Charles MacFarlane, The Pictorial History of England, Harper & Brothers, 1848, p. 359.

43 William Cox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Administration of Sir Robert Walpole, Earl of Oxford, Vol. 1, Printed for T. Cadell, jun. and W. Davies, 1800, pp. 222-223.

44 同上，p. 224 .

45 Peter M. Garber, Famous First Bubbles: the Fundamentals of Early Manias, MIT Press, 2001, p. 117.

46 Tobias George Smollett,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Revolution in 1688, to the Death of George the Second, London, 1825, p. 209.

47 William Cox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Administration of Sir Robert Walpole, Earl of Oxford, Vol. 1, Printed for T. Cadell, jun. and W. Davies, 1800, pp. 225-226.

48 Philip Henry Stanhop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Peace of Utrecht to the Peace of Versailles: 1713-1783, Vol. 2, J. Murray, 1837, p. 7.

49 同上，p. 8 .

50 William Russell, The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Vol. 5, London, 1789, p. 14.

51 桑德兰伯爵是马尔博罗公爵约翰·丘吉尔的女婿，他在大力支持南海公司方案之余，也说服马尔博罗公爵夫妇投资南海公司股票。但公爵夫人后来认为这个计划是个骗局，撤回了自己的全部投资，并与桑德兰伯爵决裂。详见John Benson Rose, Historical Tracts, Printed by W. Clowes and Sons, 1869, p. 145.

52 见Museum of Foreign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 Vol. 24, E. Littell, 1834, p. 613.

53 Philip Henry Stanhop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Peace of Utrecht to the Peace of Versailles: 1713-1783, Vol. 2, J. Murray, 1837, p. 9.

54 据统计，南海公司在法案通过后，实际上将85%的政府可兑现债务和不可兑现债务都转换成了公司股票。详见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25.

55 William Russell, The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Vol. 5, London, 1789, p. 16.

56 Caroline Thomas, "The South Sea Bubble"，原载Student Economic Review, Vol. 17, 2003, p. 24.

第七章　投资的激情与消费的疯狂

——“繁荣”背后的非理性行为

繁荣降临英格兰？

南海计划在议会获得通过，这时的布伦特正为南海公司新发行股票的认购忙得不亦乐乎。沉寂了多年的股票投机激情，又像是魔鬼附身一般地控制了人们的思维和感情，那些低价买进南海公司股票的议员和政客们成了最直接的受益者。布伦特作为幕后策划人，很享受地看着这一切，颇有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意。

但布伦特并非“独醒”之人。政府之中，眼光锐利的桑德兰伯爵早将一切看得透彻，在议案还没有获得议会通过的时候，他就说过：那些鼓励和支持南海公司计划的人们根本没有自己的主见，只不过是一心想要解决让政府饱受折磨的债务问题罢了。但从另一方面看来，南海公司的管理者们毫无疑问会因为这项议案的通过而大获其利。如果公司的管理层在议案通过后还延续他们之前的做法，那么股价的上升将会更为迅速。南海公司将会获得更多的利润，股东们的分红也会更多。[1]

桑德兰伯爵此番话，不经意间道出了南海公司提出这项债务计划的本意。但这并不说明他本人是这项计划的反对者。实际上，桑德兰伯爵本人在议案送交议会讨论之际，也暗中收受了来自布伦特的贿赂，低价入手了数量不菲的南海公司股票。就连那位在议会中表现得“正义凛然”的沃波尔先生，也在发表反对南海公司计划的演讲之余，暗地里悄悄购买了南海公司的股票。他所谓的“反对”，其成效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没过多久，南海公司计划获得议会通过的爆炸性新闻很快传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咖啡店里的股票经纪人闻讯又开始忙碌起来了，因为他们都知道，一单大生意马上就将到来。1720年4月12日和23日，南海公司连续两次进行了股票的大规模认购，每次发行的股票总金额都达到了百万英镑。[2]

到目前为止，结果似乎又一次令每个人都感到满意。就像当年为了解决债务而成立英格兰银行一样，从政府到债权人再到银行家和普通股

民，每个人都成为表面上的受益者。乐观的情绪又降临了英格兰。议案的通过似乎让英国人证明了一件事情：法国人能做到的事情，他们也能做到。对巴黎股票市场兴盛的向往几乎使人们忘记，同样是在1720年的法国，马赛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大瘟疫，城市里腐臭的尸体堆积如山，而在距离马赛不到五十公里的土伦，骇人的饥荒几乎把当地百姓逼到了人食人的境地。[3]这番地狱般的景象，与金融之都巴黎的歌舞升平形成了令人震惊的反差。但在“南海计划”刚刚获得议会通过的时刻，整个伦敦都不会有人“不合时宜”地关注随时可能降临法国的灾难，毕竟，那是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经济榜样，巴黎才是英国人目光唯一所及之处。

在这个已经集体陷于自我陶醉的国度，每个人都把南海公司视为确保繁荣的象征。那些整日里苦中作乐，希望凭借投机而一夜暴富的投资者已经对南海公司的股票蠢蠢欲动了。布伦特等获得暴利的公司高管自然是弹冠相庆。而那些为了国家债务和王室年俸操心不已的政府大臣们，现在算是松了一口气：“南海计划”通过以后，这该死的债务负担终于从他们被压得生疼的肩上移走了。国王乔治一世也心情大好，原本愁容不改的他甚至来到位于针线街上的南海大楼亲自巡查了一番，并赠给公司一些油画和皇家艺术品，其意义，大致相当于中国的领导人给公司题词祝贺。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18世纪初期的伦敦，就是一片繁茂的商业丛林，公司数量众多的伦敦山头林立，其他的公司看见拥有皇家执照的南海公司获此大利，当然都希望效仿。在1719到1720年间，不少人向国王提出请愿，希望国王能授予他们所经营的业务以“皇家特许”。[4]在同时向议会提出请愿的许多人当中，有两个人脱颖而出，引起了乔治一世和英国政府的注意。他们提出的计划是要准备成立两家大型的保险公司，并且通过这两家公司为王室开支提供资金来源。这让乔治一世眼前一亮。

随着多年来英国海外贸易的扩张，商船出海航行次数每天都在增加，同时，航海所带来的风险逐渐增多，也愈发引起商人们的关注。由此，海事安全保险业自17世纪后叶以来发展的速度相当迅猛，发展至1720年左右，伦敦经营航海保险业务的公司可谓林立。[5]为了控制、管理保险公司，英国政府在一个世纪以前就设立专门的办公室甚至法庭来审判保险案件，但法官们对承保人利益的无视很快招致了大家的怨恨。在这种群情愤恨之中，政府干预保险业的力量也逐渐衰弱，相关的管理

机构也一度废止。[6]相应地，民间的保险业因此有机会开始扩张。

虽然政府过去设立的保险法庭等机构可以说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干预这个新兴行业的努力。通过议会为行业立法就是控制保险业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政府的手其实并未从伦敦的保险业移开。伦敦的这些保险公司，大多是从事风险管理并利用人们的赌博心态盈利，故深知“机会”二字对他们生意的重要性。这两个抓住机会向政府请愿的人分别是切特温德勋爵（Lord Chetwynd）和翁斯洛勋爵（Lord Onslow），二人均出身贵族，后者还一度是议会下议院的议长。[7]翁斯洛勋爵个人曾经不止一次向政府请愿，希望从英国政府处得到皇家特许执照，好让他能够垄断经营英国的海事保险业务。但是，由于商业对手的联合抵制，他的请求被首席检察官等人以“国家尚无必要授权这种业务”为由婉言回绝。[8]不过，翁斯洛勋爵并未就此放弃。南海公司独家承包下政府大半债务的事实又让他看到了与政府合作的希望，于是联合切特温德勋爵等人，在1720年向议会提出了新的提案。[9]然而，此时政府的债务已被南海公司一家包揽，外人无从插足，现在还剩下一些有空间可供争取之处，就是王室年俸了。

由于国王花钱的速度总是比政府给钱的速度快，当时的王室年俸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翁斯洛勋爵看中了这一点，于是他联合切特温德勋爵向政府提出建议说，南海公司解决了债务问题，但国王年俸长期亏欠的事实南海公司却没有直接解决；鉴于此，他们愿意共同出资60万英镑作为王室年俸的资金，而作为交换，他们将获得以王室名义签署、由议会批准提供的海事保险特许经营执照，成立一家新的合资公司，垄断伦敦船舶海运的保险业务。[10]

为了使这项计划能获得通过，翁斯洛勋爵和切特温德勋爵开始大把撒银子，对许多政府人员进行了贿赂。贿赂，这个令老百姓痛恨不已的词，却分明是当时英国政坛通行的一条“潜规则”。18世纪的英国，尽管已经确立了议会民主制的政治体制，但在英国的政治文化中，却渐渐浮现出“朝中有人好办事”的行为和思维习惯。英国的新闻业虽然早已从伦敦的咖啡馆萌芽，并迅速占领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英国人或许尚未意识到新闻对于民主政府的权力有着不可或缺的监督作用。关于英国议会新闻的报道，在当时几乎可以说是绝迹，记者和撰稿人实际上并不被允许进入议会参加旁听。

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是出现在伦敦咖啡馆的《每日新闻》。自此之后，新闻业在18世纪的英国发展迅速。这完全超越了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法国哲人孟德斯鸠访问英国时，发现连铺瓦工都有阅读报纸的习惯，由衷生发出一股倾慕之情。可是，日后成为“崇英主义者”的孟德斯鸠在鼓吹英国新闻业的发达和英国式民主制度的同时，却没有留意英国的阴暗面。对于“英国人民是否真的享受到了自由”，孟德斯鸠等人虽为一介鸿儒，却并没有发言权。[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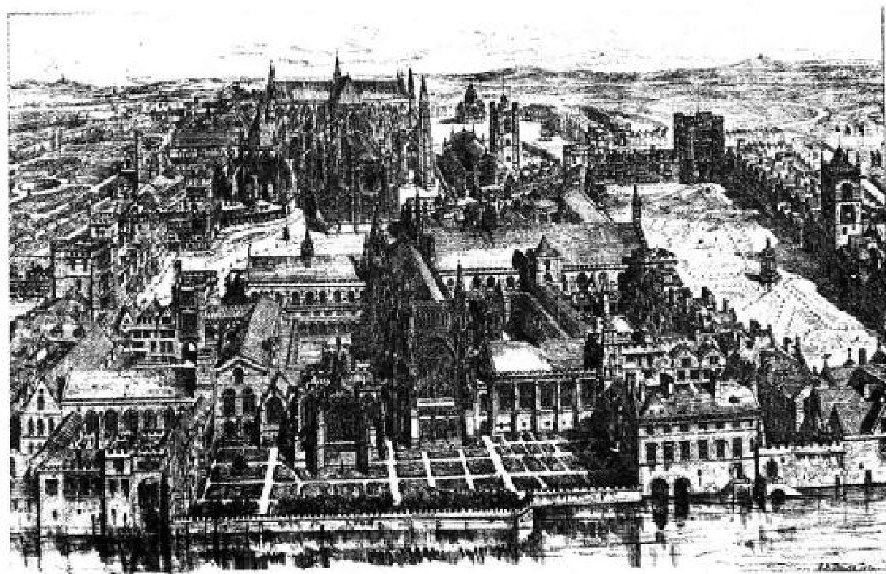
孟德斯鸠更难以料到的是，活力四射的英国新闻业，在当时可谓无孔不入。但当它遇上英国议会，却被生硬地阻挡在外，不具有独立自由的报道权。偶有几位胆大的记者采取各种方法混进议会，一旦被发现，下场都比较悲惨。例如，1720年一位名为米斯特的记者，写了一篇笔调极尽辛辣的文章，批评议会辩论的内幕，引起读者的关注。一打听，才知道该文出自一位下议院议员向他提供的议会辩论的消息。记者米斯特由此“被施以示众柱刑，罚款以及监禁的全套刑罚”，并且“在此事之后，议会又以对违禁者施以重罚相威胁，重申禁止对议会的报道”。[12]记者米斯特的遭遇，仅仅是当时英国社会的冰山一角。英国的议会，和外界隔着一道厚重的门，门里的人当然不会让外面的人知道这里发生的黑幕与交易，门外的人也无从找到入门一探究竟的途径。

这道隔开议会与公众知情权的大门培育出了英国议员在当时行贿受贿的风气，尤其是议会下议院。看似开明公正的议会政党政治，却因为监督环节的缺失，而变得乌烟瘴气。议会里的争吵和辩论，反而与被“隔”在议会大门之外的民众没有什么关系，倒更像是一群利欲熏心的政客与商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钩心斗角、讨价还价。

在如此不堪的大环境下，行贿与受贿，自然就成了伦敦政商两界的家常便饭。中国人所谓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或许在英国行不通，但有钱确实能够让议员们为自己办事。南海公司的例子就是这条“真理”的最佳注释。不但是南海公司，财大气粗的东印度公司多年来一直受到议会的支持，全靠他们常年累月拿钱和股票“孝敬”议员们。在光荣革命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献金一直充当着英国议会的“通行条例”。[13]议员们经常收受贿赂然后表决通过某项商业计划，由于缺少公众的质询机制，因此只有等到计划获得议会通过，贿赂的丑事才等于自动昭告了天

下。[14]不考虑党派制约因素的话，不受公众监督的议员和公司所有者，几乎能在议会里为所欲为。

议员出身的翁斯洛勋爵混迹伦敦商界，对于如何说服下院贪婪的议员，自然深谙其道。但令他发愁的是，尽管在该用钱疏通的地方他无一遗漏，但议会方面还是没有决定通过这项商业计划。此时，国王乔治一世帮了翁斯洛勋爵大忙，他从一开始就对这项能为王室年俸提供资金的商业计划十分感兴趣。计划送交议会后，同样期望计划赶快获得通过的人，除了翁斯洛勋爵本人，恐怕就是乔治一世了。为了立即种下这棵摇钱树，乔治一世直接给议会写信催促，希望下议院诸位议员能够通过这项议案，授予两位贵族以特许执照。[15]此信一出，整件事情立即峰回路转。下议院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支持翁斯洛勋爵的人数多了起来。政府大臣们见状，也都纷纷随大流，同意通过这项议案。议会眼看就要将执照颁发给新成立的伦敦保险公司（London Assurance Company）和皇家交易所保险公司（Royal Exchange Assurance Company）。



16世纪的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即英国议会大厦（Houses of Parliament）。原宫殿在1834年大火中被毁，现今的建筑是19世纪重建的。

1720年5月4日，在该议案通过前夕，刚刚为了南海公司的提案而操劳不已的艾斯拉比又来到下议院，对翁斯洛勋爵提案发表了这样一番演说：“国王陛下收到了伦敦最出色的商人的多份请愿。人们都谦逊地请

求，希望和蔼的国王能授予他们专营证书，以成立专门为航船和商业提供保险的公司。只要国王向他们颁发特许证书，上述的商人就将提供相当可观的金钱供国王使用。国王据此将同意建立两家公司，专属经营船只和贸易的保险业务，并将其他的公司与商业社团排除在外，其经营将在严格的规定和限制之下开展。这将有利于并能保护本王国的商业贸易。在议会的建议和协助下，国王陛下更了解这份很具吸引力的提案的本质与重要性。国王陛下因此希望这项提案生效，以保护并确认陛下授予这两家公司的特权。这将使国王能够减除他的平民政府的债务负担，而不再对人民进行新的索取。”[16]根据财政大臣所传达的“文件精神”，翁斯洛勋爵的提案一个多月之后获得了通过，新公司获得了乔治一世颁发的特许执照。[17]

乔治一世心情大好，他在这一届议会即将结束时，在议会大厅发表了总结性的讲话：“下议院的绅士们，对于你们在今年给予的支持和为国家提供的服务，我表示感谢。你们找到了一个弥补王室年俸亏欠的方法，并且这个方法没有为国民增加新的负担。在这一届议会上，各位还就解决国家的公债问题创立了基金，并且解决了债务中的很大一部分。这个过程不仅几乎没有违反公众的意志，并且，我认为还将极大地促进联邦的团结，而且促进了我国与外国力量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一切也正是我希望看到的。”

随后，他又对上议院的议员们说：“我的贵族绅士们，你们可以看到由于国家的稳固所带来的好处。如果说我们还有一点可以让这个世界满意的东西，那就是更多的信用、安全和崇高，这些都是靠和平换来的，并且仅仅依附于对承诺的信守，而不是依靠战争带来的好处，或者对野心的追求。为了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我计划很快地去一趟我在德国的领地，希望能够解决北部的纷争。”可见，这时的乔治一世，已经放下债务和年俸这两块胸中的大石头，迫不及待想回到德国老家了。“毫无疑问，明年的冬天我们会再见面的。”[18]已经“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乔治一世最后向议会撂下这句话。他于该年6月暂时丢下英国的事务，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德国。[19]

“落在谷仓门口的鸟”

乔治一世的脚步还没迈出英格兰，南海公司的股票就成了人人都在

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完全要拜伦敦发达的新闻业所赐，报纸和记者虽然不能进入英国议会揭露那些利欲熏心的议员们犯下的种种罪过，但使之成为股份公司们的宣传工具，实在是太便利的一件事了。

经过多年的培植和经营，到1720年，南海公司已经与伦敦的新闻媒介建立了密切的沟通，公众知晓股价变化行情和公司经营状况的最主要渠道，便是充塞于伦敦咖啡馆的报刊杂志。南海公司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发放薪金聘请人员与媒体建立沟通。这项工作，很类似于今天的企业媒体公关部门所做的事情。每天，南海公司的大门口、皇家交易所都贴满了有关公司最新消息的告示，南海公司股票的价格被《伦敦公报》《每日新闻》《每日邮报》《晚间邮报》等媒体竞相报道。[20]布伦特等人对事情的顺利进展感到非常高兴，被人为压低的股价透过新闻传播这个渠道，正在为日后的暴涨积聚着能量。

只需要花一便士就能购得的报纸，成为了金融戏法的最佳传声筒。当然，伦敦的新闻报纸，从创办一开始就有着为商业贸易服务的目的，18世纪的伦敦报纸上，商业新闻早就是报纸版面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21]但是，像专门雇佣人员沟通与媒体关系这样的事情，以前还很少有过。南海公司如此重视利用媒体宣传，除了为自身利益计算，在那个年代也的确是时代之风使然。各类“计划”满天飞的时代，为了让本公司的经济计划获得政府的支持和皇家授权，伦敦的众多公司已经开始集体抢夺媒体这块“阵地”，想尽一切办法让报纸为他们的公司做最大限度的宣传。而新闻媒体自身，也经常乐于与公司之间的“合作”，毕竟，这对于提升报纸的销量，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布伦特们已经认识到，“股票交易者的主要工作就是卖出一只股票，再用赚得的钱买进另一只股票，关于股票的特殊环境或故事将会降低第一只股票的价格或升高另一只股票的价格”[22]。此时，股票涨跌的指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从相关新闻资讯中获得的利好消息。

就这样，伦敦的媒体成了带领人们集体陷入股票陷阱的一个先导者。一时间，各类可行或不可行的商业计划纷纷见报，看得人们神迷目眩，仿佛英国经济的春天就要来临。一份名为《每周杂志》的刊物刊登过这样一段话评论英国人对财富的渴望：“一位聪明的骑士多年前就曾观察到，英国人就像是落在谷仓门口的鸟群，无论射杀多少，侥幸存活的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回到谷仓门口，完全遗忘了降落在他们同伴身上的不幸。因此，英国人始终认为，他们近来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不会被

各式各样的计划欺骗，但每当新的计划一出现，他们又会栽跟头。”[23]这样的跟头，伦敦人多年前已经栽过，17世纪末期在伦敦兴起的各类股份公司骗走了不少投资人的血汗钱。现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规模骗局来临之前，伦敦人竟然是浑然不觉。不仅如此，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他们跃跃欲试，恨不得马上参与到这场大骗局之中。这时候，伦敦的大街小巷又流传着另一条小道消息：斯坦诺普伯爵已经收到了来自法国方面的消息，西班牙政府不久之后将会以秘鲁沿海的港口城市作为筹码，交换直布罗陀海峡、马翁港等殖民地，以扩展南海贸易的规模。[24]换句话说，英国将来在南美洲的生意会更好做。这条来得十分“及时”的利好传言，让人们对南海公司的期望值进一步上升。

现在，为了让这群“落在谷仓门口的鸟”进一步入局，布伦特和他的伙伴们还需要做以下的事情。首先，把认购的股价压得尽量低，然后吸引尽量多的人持有南海公司的股票，剩下的，就是不择手段拉高已转让出去的公司股票价格，此后，董事们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坐等数钱。毫无疑问，这第一步已无须南海公司专门操心，因为新的股票认购尚未开始，整个伦敦，不，应该说全英国的人就听说了南海公司的大名。1720年4月进行的认购大大超出了公司董事会的预期，第一次认购时，股价为300英镑，而在一个多星期之后的第二次认购时，股价上涨到了400英镑。足见人们对南海公司股票的热度。1720年春夏之际的伦敦，渐渐与巴黎有了几分诡谲的相似。

第二次股票认购时，内阁对南海公司作出了一个规定，那就是每个董事会成员的认购总额不能超过26,000英镑，这个数字不仅包含了每一个董事自己的股票，还包括他的亲人、朋友的股票。并且，认购的名单必须详细呈报给南海公司的第二主管。认购后剩余的20余万英镑股票，则留给了公司的第二主管和副主管随意处置。[25]当然，这个名单中不会出现南海公司的“主管”，因为公司名义上的主管，此时已经是将公司称为“亲爱的孩子”的国王乔治一世。[26]

对董事会成员作出认购限制的规定一方面说明，股票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日益让政府内部的一些人士感到眼红，于是希望限制南海公司，好让利益能更多分流到公司之外的人手里。同时，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出，股票发行最初的经手人主要还是公司管理层和英国政界商界的上层人士。股票的最初经手人不会超过四五十人，这当中就包括桑德兰勋爵、艾斯拉比、克莱格斯、斯坦诺普这一帮政要，以及乔治一世的情妇和显

赫的王公贵族们。由上述人等构成的这个证券市场，是一个并不为公众所熟知的市场。当时，股票市场还不存在严格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区分，国家亦无完善的证券法规和监管机构。因而证券市场上出现各类舞弊、不公的现象也就毫不奇怪了。从官到民，伦敦对待南海公司的股票就像巴黎对密西西比公司那般着魔，最后，认购的总金额大大超过了预期，高达150万英镑。[27]然而，当英国议会向南海公司要求查看股票认购的名单和公司账本时，对方给出的答复只有两个字：没有。面对这个答复，议会也无可奈何。

“南海计划”在议会的通过不仅意味着英国政府利益和南海公司利益的合谋，还意味着公司利益对政府利益的“绑架”。从一开始，议会和政府就失去了对南海公司股价的限制权，南海公司的股价，完全由布伦特等公司董事操纵，正在一刻不停地向上攀升。南海公司的股价拉动了整个伦敦股票市场的景气，人们的投资欲望又回来了，整个股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用当时伦敦人的流行语来说：“你看看任何一家公共办事处或者能够进行商业交易的地方，人们询问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股票现在怎么样了？而如果你在一家咖啡馆，那么这里唯一的对话也是关于股票……如果你去一家酒馆，唯一启迪性的话题是关于南海公司。”毫无疑问，伦敦已经正式进入了一个“股票交易的时代”。[28]

正好是理性计算的结果

这个作弊横行的时代，股票交易成了一场纯然的全民骗局，然而，为什么明知股票交易多少带有欺骗的性质，人们还要争先恐后地参与其中呢？或许，有人会将其解释为当时逐利的风潮已经让每个人都丧失了理性与良知，为了追求金钱而投入到一场公开的骗局之中；或许还有人将其解释为股票交易初期的市场法律不健全、行为不规范所导致，是对利益的“疯狂”让人们铤而走险，纷纷跳上了“欺骗”这艘航船，期望能在彼岸发现他们梦中的金银岛。一位经济史研究者曾如此总结人们疯狂热衷投资的原因：“狂热与经济泡沫都是人类情感和从众心理的产物，即使是最有学识、富于理性的人也难以抵抗这种心理。”[29]

当然，这样的论点是不无道理的，但还不够准确。1720年繁荣异常的英国股票市场，人们的行为确实表现出了一种以往不曾有过的“疯狂”，但是这种“疯狂”并不是因为人们受到股票的“蛊惑”，变得丧失道

德、丧失理性，从而让他们的行为变得不可理喻。恰恰相反，人们过于狂热的投资行为，不但不是“疯狂”所造成，却正好是理性计算的结果。换句话说，“疯狂”的确在发生，但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混乱和制度化的疯狂。

人们对于股票的理性计算，可以从活跃于伦敦报章上的“股评家”们所撰写的文章中窥知一二。1720年南海公司的股票涨幅最大的时候，一位作者曾发表一篇论及股票实际价值的文章，里边所给出的股价判断标准是：“估算一个东西的价值，方法就是看它每年所能带来的利润。”[30]这种“以年利推算总价”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英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土地产权问题，使得英国人对于价格的测定和计算早就自成一套体系。著名的学者约翰·洛克在论述土地的价值时就总结过，土地的实际价值取决于地租每年所能带来的收益。[31]英国人对股票价值的理解，灵感上可以说来源于约翰·洛克等人对土地价值的论述。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固定资产能够带来的实际利润有多少？

但瞬息万变的股票毕竟不是旱涝保收、升值缓慢的土地。相较于土地交易，股票交易的手续简单，流程方便，周期短而收益明显。在看待这个新生交易品种的时候，英国人延续了以往从土地交易获得的经验，将土地获益的规律运用在股票身上。因此，股息就像地息一样，在1720年成了炒股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一篇在当年广为流传的文章对伦敦的投资者们如此说道：“股票交易这门科学建立在一个最主要的原则之上，那就是股息所带来的收益总是取决于它和股票价格的比率。因为，股票的购买者本应该会把这一回报率与他将同样的钱投资到别处的收益加以比较。”[32]也就是说，对于股票投资的未来回报期待越高，人们购买股票的动机就会越强烈，而在当时的每个人看来，投资股票的回报率，无疑是所有投资途径当中最高的。

不仅如此，对于如何准确地计算股票的利息，当时的通俗出版物已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人们。在名为《有钱人指南》的一部出版物中，作者就向普通投资者传授了收益的计算方法。那便是1加利息之和的n次方（n代表购买股票的年份）。此外，对于利率、折现的计算，在当时均有若干文章或书籍进行了最通俗易懂的说明。各种简单的金融计算公式出现在报纸上，使得1720年的大多数伦敦人对于股票的基本知识都多少有些了解。因此，这场席卷英国的“疯狂”，可以说并非建立在无知之幕的遮蔽之下，相反，投资者当中不乏内心敞亮之人。正是所谓的理性原

则告诉了他们：只要人们对股份公司盈利的预期不减退，股票价格就会持续上涨；只要在股市崩盘的前一刻把手中的股票抛售掉，自己就不会成为最后的输家。有人这样评价1720年的伦敦投资者："根据当时所能取得的最佳经济分析进行投资。"[33]早期伦敦股评家的话，看来是能够影响投资者决策的。

此时，人们的心态，十分类似于1711年布伦特说服哈利发行国家彩票时购买彩票者的愿望：他们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回报。股票的升值，就好比彩票开奖时的"奖品"。但如今，伦敦股票市场的"赌徒"比以往更有自信，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凭借的已经不单是运气，而是金融投资的技巧。[34]

赌博和股票模糊不清的界限不禁让人追问，股票这桩生意的底线在哪儿？不少抱着"买彩票"心态的伦敦人直奔股市而去，却苦于一时筹不出足够的资本。南海公司为这些囊中羞涩的"散户"们提供了按揭付款的服务。但分期付款的投资者们深知，自己赖账的作弊行为一旦被抓住，将为之付出经济代价。乔治一世在位期间，针对伦敦不规范的股票市场出台过相关的法案。法案规定，对于那些拒绝支付股票按揭付款的人，公司有权直接剥夺他对股票的所有权。而当股票认购者拖欠公司的按揭款项超过三个月的期限，公司则有权单方面回收并出售他未付款的那部分股票，以充还债款，如果股票的现价已超过了认购者欠款的数额，那么公司会将差额补还给认购者。[35]不难看出，英国对于股票交易的规则，当时并不乏明文规定。只是，这种宽松的规定并不能对股票市场的欠款者产生有效的规制作用，并且，法案对于股票的内幕交易等问题亦是只字不提。

随着这套法案的推行，分期付款的炒股者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伦敦逐渐出现了很多付不出按揭款的股民，而根据规定，他们未付清的股票被南海公司强行收回后，其实投资者个人并不会遭受很大的损失，公司在弥补了欠款之后，会把现价出售股票的盈余返还股民。法案对投机者的约束可以说异常宽松，事实上，在该法案通过后，虽然投资者中不乏违约未能支付股票购款的人，但公司依据该法案与之对簿公堂的机会非常之少，而通过法庭或者法律强制欠款者完成股票支付的案例更是少得可怜。[36]最快解决违约的方法，莫过于尽快将股票回收，再次卖出。这等于是给资金不足的投机者开了绿灯，分期付款的股票价格因此水涨船高。根据后人对当时伦敦的股票牌价统计，1720年4月至11

月，全额认购的南海公司股票价格实际上要低于按揭付款的股票价格。[37]

这种分期付款的股票，与其说是单纯的股票买卖，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早期的看涨期权（call option）交易。南海公司与投资者签订的按揭付款合同实际上赋予了股票持有人在特定时期以固定价格购进股票资产的权利。而在按揭期间股票价格如果上涨，那么这位投资者可以在此时停止继续支付按揭费，然后让南海公司转手将股票售出，如果这时的股票现价高于投资者签署合同时的股价，那么二者之间的这笔差价就等于落入了投资者的腰包。他先前已经为股票支付的那部分按揭款，实际上也就成了期权的价格。[38]南海公司规模庞大的股票认购，因为允许款项预支，实质上变得更像一次期货买卖，而在官方认购以后投资者私底下的交易细节到底如何，也难以逐一查证。

牛顿也被套牢

不过从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记录中，我们可以推想当时英国人普遍的投资情况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波特兰公爵（The Duke of Portland）亨利·本廷克（Henry Bentinck）。这位本廷克其父乃是威廉三世国王麾下大臣，家有良田千亩、金银无数，1716年，本廷克从父亲手里继承了所有的财产，受封为波特兰公爵。这位堪称地方巨富的贵族在南海公司股票炙手可热之际也希望从中大捞一票，可惜手中流动资金有限，于是，他便打起了自家地产的主意，向本廷克家族的地产信托基金借款炒股。[39]

波特兰公爵一次性从信托基金借出83,575英镑，然后，波特兰再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钱，与借款一起投入了股市，购入了南海公司股票160股。股票悉数交由他的托管人（两位律师和一位银行家）处理。三位托管人再把股票转让给另外六位投资者。然后，波特兰公爵又从南海公司那里借到了78,000英镑，再购买了160股南海公司股票，这一笔股票分别由南海公司的主管之一罗伯特·苏尔曼（Robert Surman）和另一位和南海公司来往甚密的股票经纪人掌握。在一次次的转手交易中，名义上属于波特兰公爵的股票实际上辗转于无数人手里，其价格也在不知不觉间呈螺旋式上升。人们或许已经忘了1720年新年第一天，南海公司股票价格不过区区128英镑；但进入4月，股价历史性地突破了300英镑；一个月后，达到352英镑；6月的第一天，价格大幅升至610英镑；在投机

交易的助推下，至6月中旬，南海公司股票的直接交易价格上升到每股750英镑，而长期交易价格已经达到了每股920英镑。[40]这场难得的牛市，既有赖于南海公司董事会的苦心策划和英国政府的“合谋”，也离不开波特兰公爵等投机人士的“推波助澜”。

既然有“买涨”的，自然也有“买跌”的。还记得前文曾提及的约翰·劳和伦敦德里郡公爵托马斯·皮特的那场赌局吗？皮特预付18万英镑，从约翰·劳手里“购买”面值10万英镑的东印度公司股票，时间以一年为限。这实际上是约翰·劳进行的一次看跌期权（put　option）交易。因为只有当伦敦的股票市价下跌，让他预先“卖出”的股票总额低于和皮特约定的10万英镑时，约翰·劳才能从市价与约定价的差额中赚钱。当然，唱衰英国股市的约翰·劳是个例外，当时的大部分投资者都与托马斯·皮特立场一致，看好伦敦股票市场。他们赚钱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南海公司等公司股价上升的基础上。试问，这个时候又会有哪一位已“上了贼船”的按揭投资者愿意股价下跌呢？当然不会。每个投资者的理性意识都反复告诫他，一定要把“疯狂”进行到底！

“理性的疯狂”笼罩着1720年的伦敦。与此同时，在交易所街的咖啡店和酒馆里，关于对岸那位“炼金术士”约翰·劳的传言也从未停歇过。不少英国人依然认为，虽然约翰·劳对英国不怀好意，但他也的确采取了一套独特的经济方案将原本孱弱的法国改造为足以统治整个欧洲的金融力量。[41]所不同的是，如今的英国人认为，通过南海公司的这次经济计划，伦敦也将成长为影响欧洲金融的强大力量之一，并很快会取代巴黎，成为欧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他们的乐观，通过南海公司的阴谋诡计和伦敦报纸对股市的报道，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巴黎的股票投资热潮也是在这个时候与伦敦一起达到了顶峰，甘康普瓦大街上的交易所人满为患的现象自1719年以来就从未停歇。正当南海公司的提案被送交英国议会讨论时，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开始了疯狂的上涨，1720年1月，公司宣布的高达四成的分红成了股价飙升的最初动力。几天之后，约翰·劳来到巴黎的天主教堂，正式宣布自己改信罗马天主教。当然，此举实际上与宗教信仰无关，约翰·劳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就任国家总审计长“政治正确”的需要。这时的他爬上了权力的顶峰，一手掌管着法国的海外贸易、公债、金融和税收。[42]这时，伦敦的一份报纸却对约翰·劳极加嘲讽：“如果你的野心足够大，那么你应该佩上宝剑，杀死一两个花花公子，被送进纽盖特监狱，然后越狱。如

果你能通过任何方法游过那片海洋到达对岸一个陌生的国家，然后建立一家密西西比公司，发行股票，并且让一个国家变得泡沫化，那么，你就是一个伟大的人。”[43]

伦敦的新闻界尽管仍对约翰·劳保持着戒备，有不少人对南海公司这次与密西西比公司十分相似的换股计划颇有微词，但零星的反对和异议对于大局来说已产生不了根本的影响。诚如伦敦的报纸向人们宣告的，“股票交易的时代来临了”。不管人们愿意还是反对，现在的伦敦和巴黎，已经踏上了同一条无法回头的投机道路，而他们选择这条道路，完全是出于自愿——一种建立在侥幸心理基础上的自愿。

在这种自愿的驱使之下，股票被人理所当然地视为发家致富的捷径。新闻报道说，已经开始有密西西比公司的投资者从法国乘船来伦敦购买南海公司的股票。当初被势头强劲的密西西比公司吸引到对岸的投资者现在又掉转头回到英国了！不仅如此，英国的政商名流和上层人士也纷纷购买南海公司股票。据说，在友人的劝说下，贵为皇家学会执掌者的科学家牛顿也购买了南海公司的股票。但在1720年夏天，牛顿像是预感到什么似的，卖掉了持有的南海公司股票，他从中获得了7,000英镑的收益。[44]不过，精于数学计算的牛顿似乎并不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他在出手之后发现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还在一个劲儿往上蹿，终于忍不住再次购进了数量不菲的南海公司股票。这一次，幸运女神将不会再眷顾牛顿爵士，也不会再眷顾英格兰。

蔓延欧洲的“传染病”

隔着一道短狭的海峡，英、法两国如今已陷入了同一种注定通往灾难的宿命。而且，与英国和法国的举国欲狂一样，二者共同的“老师”荷兰，也在这一年陷入对股票的痴迷之中。自从股份公司在伦敦大规模涌现，英国的证券市场上就从未缺少过荷兰人的身影，荷兰投资者们似乎也更青睐回报率更高的英国股票。[45]当布伦特的手下们利用报纸大肆宣传南海公司的股票时，和伦敦联系愈加紧密的阿姆斯特丹证券市场已成为从巴黎传染到伦敦的股票热潮的下一个受害者。

1720年，荷兰有二十多家股份公司向股民进行了新的股票认购，人们的投资热情也很快被激发出来。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股份公司股价在这一年急剧膨胀，引发了荷兰的股市泡沫。[46]该年六七月间，阿姆

斯特丹证券市场又把这场股市的“热病”传递给了德国汉堡的股票市场。波及西欧几大金融城市的金融市场泡沫，紧随着密西西比泡沫和南海泡沫的步伐到来了。[47]

这场金融的传染病之所以成为可能，与18世纪欧洲的金融愈加一体化有直接的关系。经过多年的金融投资和贸易往来，人们的思维中“证券”的概念已根深蒂固，股票已成为荷兰、英国、法国等国人的普遍投资手段。著名的爱尔兰宗教哲学家乔治·伯克利（George Berkeley）亲历了欧洲金融泡沫的膨胀和破灭。在欧洲旅行之际，他仔细观察当时居住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的人们对于金钱和财产所有权的概念，和过去相比发生了未曾有过的变化。他在1720年曾经写道，一种新的关于“所有权”的概念正在欧洲形成。他的依据是，假如人们不认为自己实际上“拥有”具有财富价值的股票，那么整个欧洲金融泡沫的形成根本就不可能。[48]

但仅仅有观念上的相近还不足以形成各国间共同的股票市场。伦敦和欧洲的金融市场究竟是如何开始发生联系的呢？这个问题又把我们拉回了债务危机和南海公司建立的起点——战争。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直接引发了英国的公债问题，南海公司便是公债危机的产物之一。虽然这场战争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不义之战一样，为平民百姓带来的只有无尽的痛苦，但对于伦敦股票市场的投机者们来说，战争却帮了他们大忙。被战争支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英国政府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开始鼓励更多的外国资本进入伦敦证券市场。作为英国金融的“老师”，荷兰的投资者自然是值得“拉拢”的首选对象。

在过去，阿姆斯特丹是当之无愧的欧洲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金银储量居欧洲之首，加上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思想自由，因此各国资本纷纷流入荷兰，金融业的繁荣程度堪称一时之最。而在光荣革命后，英国的政治、金融体制为之一变，伦敦的金融市场虽较荷兰为后，但颇有青出于蓝之势。自南海公司建立以后，已经有不少荷兰人选择在英国进行投资，内容涉及彩票、政府债券，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东印度公司、英格兰银行的股票，足见当时荷兰人对英国经济的信心。[49]当吓跑了一部分投资者的战争在1714年结束，伦敦的投资需求反而变得比战前更旺盛了。和平时期相对稳定的政局和低利率，让来自荷兰的投资者们进一步增持了他们手中的英国资产。在阿姆斯特丹的投资者手里传阅的报纸上有着关于海峡对岸股份公司的最新消息。如此，阿姆斯特丹与伦敦两座城市间的距离因为新闻报纸的发行而几乎消失于无形。伦敦、

阿姆斯特丹、巴黎之间的交易活动日益频繁，人们大量使用“见面即付”的短期汇票进行国际交易，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记录表明，自1706年到1720年，短期汇票的数量逐年呈上升趋势。[50]

幸运的是，在密西西比公司股价上涨到最高点之前，大部分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投资者成功逃顶，没有蒙受太大的损失。[51]但是，面对“亲缘关系”上距离荷兰更近的英国，阿姆斯特丹的投资者就没那么好运了。人们对来自伦敦的投资热潮毫无抵抗，荷兰投资者视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的股票为黄金，唯恐求之不得，此外，数十家保险公司出现在投资欲望热烈的荷兰，保险公司股票成为仅次于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之外最受追捧的投资品。

英国的保险业虽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以大规模兴起，但是比起那些上头有政府支持，专营殖民地贸易的企业，保险业在伦敦金融圈绝对算不上“主流”。于是，在看到国内市场有限的情况下，英国的不少保险从业者选择离开伦敦来到阿姆斯特丹，向自己昔日“师法”的对象传授起了他们致富的新路径——保险公司。荷兰的保险公司业务的基础，可以说就是依靠这批来自伦敦的商人打造出来的。不过，倘若看一眼伦敦人自己的保险公司所经营的业务，任何人恐怕都会对这些打着保险业旗号的公司是否“靠谱”产生不小的疑问。例如，有一家名为“马匹自然死亡、遭窃或残废保险公司”（Insurance office for horse dying natural death, stolen or disabled），主营的业务据名称推断应该是马匹的生命保险。这个名字拗口的公司竟然还算伦敦众多保险公司当中比较正常的一个，至于“谎言保险公司”（Assurance from lying）、“饮用杜松子酒致死保险公司”（Insurance from death by drinking Geneva）、“女性贞操保险公司”（Assurance of Female Chastity）、“处女膜保险公司”（Insurance of maidenhead）以及“性病与离婚保险公司”（Insurance against veneral disease, and of marriage from divorce）等等，其经营的业务简直匪夷所思近于荒诞。[52]伦敦的保险公司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由骗子和金融欺诈犯操持的“皮包公司”。当经营此类公司的人拍拍屁股从英国流窜到荷兰，他们将会为阿姆斯特丹带来什么，可想而知。

结果，荷兰的股份公司在1720年泡沫泛起，其程度亦足令伦敦和巴黎的投资者咂舌。后世学者为当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股价的上扬幅度制作一表格，三百年前阿姆斯特丹的股市风云，在纸上毕露无

余。升幅最快者，当属荷兰西印度公司（WIC），股价升值达到647%，其次是米德伯格商业公司，升幅达406%。此外，斯希丹公司股票升值325%，艾丹公司股价上涨300%，蒙利肯丹公司股价上涨278%，乌得勒支公司股价上涨275%……荷兰大大小小的股份公司，大部分股价均有升幅。而在29家主要的股份公司当中，竟然有18家公司主营或者部分经营所谓的保险业务。由是，这场受英法牵连而席卷荷兰的股市泡沫，也称为“保险泡沫”。[53]

在阿姆斯特丹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卡尔弗斯塔特街，往来穿梭于此的投资者络绎不绝。他们大都集中在一家临近的法国咖啡馆里，炒卖英国和荷兰本地的股票。据说，疯狂的投机交易不舍昼夜地进行着，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清晨四点才结束。一位叫兰根迪克的人以讽刺诗记录了人们在咖啡馆里疯狂的一幕：“这里简直人多得无法立足——人们在这里用英语和各种语言发出叫喊。”伦敦商人纷纷来到阿姆斯特丹时，咖啡馆里流传着关于南海公司的传言，他又写道：“一个人带来了来自伦敦的消息，南海公司的股票升值非常迅速。另一个人驶出海上五六里，带回来一些快信和潮汐。”[54]

近水楼台先得月，股市的繁荣惹得阿姆斯特丹金融界的人士有机会第一时间认购英国的股票。例如，一位在阿姆斯特丹银行工作的内部人士和他的家人在1720年3月购进了价值1,000英镑的南海公司股票和2,500英镑的英格兰银行股票。安德鲁·佩尔斯掌管着这座城市当时最大的国际银行，他在1720年4月买进了1,000英镑的南海公司股票。安东尼·德茨的公司经营着为君主放贷的业务，他也在这一年购买了1,000英镑的南海公司股份。幸运的是，这些荷兰的金融界人士没有受到日后南海公司股价下跌的太大影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自当年5月开始陆续出售持有的英国公司股票。[55]换句话说，他们在南海公司股价最高的一段时期将股票变现。他们不仅没有受损，反而因短期持有股票而赚了一笔钱。

在金融小圈子之外，还有大量的中小投资者散布于阿姆斯特丹，他们的“财运”似乎稍微差一点。在这些人当中，势力最大者当属以前从法国移民而来的胡格诺教派徒众，由于宗教原因，他们和移民至伦敦的胡格诺教徒往来密切。胡格诺教徒大都精于商业或金融投资，其卓绝者，甚至当上了英国议会议员和跨国贸易公司的大股东。不论在荷兰还是英国，这帮“教派商人”均是股票市场的常客，那么，伦敦的胡格诺派教徒

充当阿姆斯特丹投资者的“经济线人”，也是必然的了。在荷兰从一月持续到八月底的投资狂热中，这些分散于两地的胡格诺教徒，联系热络，俨然是金融泡沫的高效催化剂。[56]

当金融阶层和普通大众集体陷入疯狂时，企业主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在阿姆斯特丹，专事股票买卖而放弃企业经营的产业阶层大有人在。那些起初依靠经营企业发家的商人，如今摇身一变从事不事生产的股票投机生意。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源地之一荷兰来说，这不啻为一种讽刺。时隔多年后，有位俄国人这样批判18世纪荷兰的金融投机阶层：“由于在18世纪的荷兰‘资本主义精神’的衰落，资产者自然不会像在其他国家那样被‘封建化’。然而，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资产者开始患肥胖症，他养尊处优，对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趣都越来越低。”[57]说“资本主义精神”自此衰落，有文胜其质之嫌，但引诱那些具有开拓精神的资本家舍弃身上的勤劳和理想，沉湎于财富之梦的，确实是泡沫四溢的股票市场。至此，荷兰的金融、企业和普通大众均在金融泡沫面前“沦陷”，编织着一场关于财富的春梦。

此情此景，不禁让人联想到百年前发生在荷兰的一幕。17世纪初，莱顿、阿姆斯特丹等地的荷兰人对郁金香球根兴趣日渐浓烈，经过改良培育的郁金香，能开出各种花色和条纹的花朵。稀有的高级郁金香当时已价格不菲，这属于爱花者的癖好所致，无可厚非。不过，人们对郁金香的特殊喜好，很快成了投机者眼中的生财捷径。

1636年左右，荷兰对郁金香球根的投资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狂热，和之前不同的是，此时人们已无心欣赏郁金香花瓣的颜色，也不再倾倒于其恬淡的香气了。来自荷兰民间和国外的资本大量流入郁金香球根市场，郁金香价格如同股价一样疯狂上蹿。一棵郁金香球根的价格上涨到一所住宅的总价，在当时并不是新闻。[58]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人们发现，他们持有的球根买卖票据根本无法兑现，数千人因为付不出郁金香的分期购款而负债。在郁金香交易即将兑现交货前夕，全荷兰境内的郁金香价格突然暴跌。“一月份可以卖600到1,000块荷兰盾的一整个花床郁金香，据说只能以6荷兰盾易主，而一批在市场大好期间价值约400荷兰盾的球茎，也只能卖到2荷兰盾。这些价格显示，就算能找到买主，也只有旧价的5%，不到原价1%的情况更是常见。”[59]荷兰顿时陷入了一场全国性的金融混乱。最后，荷兰政府出面强制中止了交易，使得所有的郁金香球根票据失效，荒唐的“郁金香狂热”才宣告结束。

1720年，历史似乎又在重复自身的轨迹，区别只是，人们为之疯狂的对象，从有色有味的郁金香转变成更为抽象的股票。值得一提的是，荷兰等地的金融泡沫虽然对当地经济造成了不小影响，但规模与同时期的英国，尤其是与法国相比简直别如天渊，也并未酿成后者那样严重的恶果。或许荷兰人已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乖了，但根本的原因，在于荷兰政府并没有英、法政府那么多的债务负担，阿姆斯特丹的政客们似乎感到没有必要冒险把公债转换成股票。[60]军费开支的下降，减轻了政府的实际债务负担，这也是荷兰等资本主义萌芽地淡出殖民争霸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对于荷兰政府以及生活在那里的普通人来说，没有将公债与股票进行兑换，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相反，在殖民扩张速度最迅速的英、法两国，迫在眉睫的债务问题，逼迫政府采用了铤而走险的经济决策，到头来却让它们的人民为政府因冒险而犯下的错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批发的是疯狂

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有一段话广为流传：“我们在所有第二等重要的事情上都可以说是聪明的，或者可以变得聪明起来，可是在头等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就得退回到全然无知的地步。我们对于我们据以作出选择的最终原则，对于它们是否健全一无所知；我们最终的原则除却我们任意而盲目的喜好之外，并无别的根据可言。我们落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小事上理智而冷静，在面对大事时却像个疯子在赌博；我们零售的是理智，批发的是疯狂。”[61]

施特劳斯此语可作如下解读：欧洲古代社会奉行“道德义务优先于人的权利”这一原则，道德乃是世间“头等重要”的学问，其重要性远在经济、财政、赋税、金融这些“二等重要”的学问之上。而迈入现代社会，随着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文化产生了。人们开始强调人的权利高于道德义务。[62]人的诸多权利，其中一项便是自由追求财富的权利。经济学所研究、解决的对象便是人的财富问题，于是，经济学这样过去受冷落的“二等学问”逐渐被人们重视，而那些原本受社会歧视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开始成为了普遍受到尊敬的社会主流。理智、冷静、善于计算，是他们一贯给人的印象，大众也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了对待财富的态度：通过理性的计算，用智慧获取财富。

1720年，英国人刚刚迈进现代金融社会的门槛。对财富的追求被欣欣向荣的股票市场彻底激发了出来，人们时刻关心着伦敦的股票牌价，在咖啡馆和酒馆里的谈资大部分被股票占据，每个投资者都拿着笔和纸，反复计算、验证自己的投资收益……然而，“在小事上理智而冷静，在面对大事时却像个疯子在赌博”，这个定律自现代金融市场建立开始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至今未止。一代又一代的人用他们的财富反复验证这一真理——个体在金钱上的绝对理性和工于计算，最终得到的却是集体的非理性疯狂。

在南海公司股票的带动之下，股票市场迎来了空前“繁荣”。东印度公司、英格兰银行的股价都有不小的涨幅。从交易规模上看，英格兰银行股票的交易达到了近7,000次，账面总额为5,965,286英镑，东印度公司的账面总额也增值到了320万英镑，皇家非洲公司也增发了面值150万英镑的股票，而南海公司的股票总账面，已经膨胀到了1,100万英镑，并且从换股计划生效之后，每个月的交易次数都在1,000次左右。[63]对于近三百年前的股票市场来说，这样的股票转手率可以说相当频繁。频繁的股票交易伴随着人们跟风从众的心态，毕竟，没有人能准确预测股价上涨幅度，大部分投资者的交易活动主要是依据交易所和咖啡馆里听来的消息，此外就是观察其他投资者的行动。人们选择股票投资，固然是出于理性选择，但是投资过程中的抉择，则不知不觉受到了集体行为的左右。股票跟风投资兴盛一时，以至于一位名叫约翰·马丁的银行家在1720年说道：“如果整个世界都走向了疯狂，我们也得多多少少步众人后尘吧。”[64]的确，疯狂就是通过集体的行为传递到了每个个体身上，最终吞噬了人们意识中原本残存的理性。

此外，短短一年时间，伦敦各个公司股票面值的涨幅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1720年，土地耕种公司的单只股票从1英镑左右上涨到超过11英镑，涨幅逾10倍；“建造及购买货船公司”股票面值从1英镑的最低值上升到15英镑；“伦敦保险公司”的股票在1720年最低值时只值5英镑，而最高点竟然达到了175英镑，“约克建筑公司”的股票最低价格为10英镑，最高点则达到了305英镑；“皇家交易保险公司”的股票也从10英镑上涨到250英镑。在众多公司中，股价涨幅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当属“通用保险公司”，其股票面值在最低时仅有1/8英镑，而最高值则达到了8英镑，增长率为6300%。[65]在几乎所有股份公司的股价都疯狂上涨的伦敦，投资的诱惑力，无论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有人说，伦敦的投资者一提到股票交易便状如疯人。然而，观察这种“集体疯狂”的最佳角度并非在于人们的投资，而恰恰是“投资”这枚硬币的反面——消费。

末日前的炫富与狂欢

众所周知，在生产力落后的前工业社会，消费这一概念仅仅发生在极少数的社会富裕人群当中。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贸易和生产的扩大所带来的消费品数量和消费人群均在日益增加，消费逐渐从个体行为转变成一种蔚为可观的集体行为和社会现象。[66]到了18世纪初，英国给别国人的总体印象是，生活在英格兰这片土地的人们变得更富裕了，因此理所当然有能力进行更多的消费。有人颇带讥讽地说，当法国人还打着赤脚满街跑的时候，英国人“没有一个人穷得穿不起鞋”[67]。此语稍嫌夸张，但这些吃着细软的白面包、身着毛料衣裤、足蹬皮鞋的英国佬，的确体现出了当时英国人强大的消费能力。

在1720年的伦敦，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股票投机中赚到钱，伦敦的消费活跃了起来，炫耀性的奢侈消费更是成为了人们显示身份的一种标识。在繁忙的证券交易所楼上，坐落着纵情声色的奢侈品商店。股票交易和奢侈品在同一个地点发生，这本身就象征着，消费能力与社会身份和财富的联系愈加紧密。[68]

奢侈性消费和一般消费区别明显。如果说一般性消费是一种为维持生存而必须的消费，那么奢侈性消费则称得上一种“不必要的消费”[69]。华服、珠宝、考究的家具、制作精致的饰物……这些都可以被归类于奢侈品的行列。作为世界贸易的中心之一，伦敦一地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珍宝与特产，只要付得起钱，再昂贵的稀罕事物均可据为己有。奢侈品的消费，是当时的伦敦人区分社会阶层的明显标志。[70]换言之，能花得起别人花不起的钱，这说明一个人已经有一只脚跨进了上层社会。想要证明自己是上流社会的一员，钱是最佳凭证。

伦敦交易所的投资者，大部分可被划归为新兴商业阶层。除了钱，他们大概已穷得什么都没剩下。对他们来说，获得金钱在这特殊的一年里成了一件比过去容易很多的事，只需将持有的南海公司股票变现就可做到。“百万富翁”一词不再是法国巴黎的本地化概念，以股票换公债之后的伦敦，出现了不少说英语的百万富翁。有名的出版商托马斯·盖伊

（Thomas Guy）就在股价上升到最高点之前，悉数抛售了价值45,000余英镑的南海公司股票，赚到数倍于此的利润。[71]伯尔尼的坎顿（Canton of Berne）也是十分成功的投资者，他在1719年将自己放外债的钱全部收回，购买了15万英镑的股票，他依靠这次投资赚到了堪称天文数字的利润。像盖伊、伯尔尼的坎顿这样见好就收的投资者几个月后成了南海泡沫的“幸存者”，他们在股市崩盘以前把股票卖给了下一批倒霉蛋，自己却两手一拍，成功“出逃”。

套现离场的投资者大都赚了几倍、甚至十几倍于成本的金钱，这些怀揣巨款的幸运赌徒，构成了伦敦奢侈品消费的主要埋单者。金银珠宝和高档商品的买卖因为他们变得异常活跃。靠股票致富者中赚得最多的，当属南海公司的人士。主管之一的西奥多·詹森（Theodore Janssen）就在狠赚一笔之后购置了温布尔登一处豪宅，而出售豪宅给他的，正是马尔伯勒公爵夫人，她此前已经通过倒卖南海公司股票赚取了10万英镑。[72]南海公司的会计格雷格斯比（John Grigsby）也是靠炒股票发家，他曾经在人前吹嘘，他连喂马的食物都是用的金子。当然，这样的话后来为他招致了麻烦。但像格雷格斯比这样通过股票获利的有钱人，炫富之举确实不在少数，令人侧目，以至于有时人这样写道：“在臭名昭著的南海泡沫膨胀期间，奢侈、罪恶和放荡增长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那些痴迷于财富迷梦的冒险者，饕餮由别国运来的珍稀美味，啜饮昂贵的红酒，购买最奢华的家具、马车、华服，毫无品位和鉴赏力可言。”[73]1720年的伦敦，有钱人竞相炫富不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反倒是值得自豪的举动。在投机的年代，传统的社会财富秩序在金融业的冲击下发生了动摇，新一代的金融阶层攀上了较高的社会阶梯，人们不惜以耗损财富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财富。对财富的耗损——消费不但能说明一个人的社会阶级，还象征着他的眼光、智慧和洞察力。

传统英国的社会阶级划分原本严苛，各个等级之间人员流动较少。但商贸的兴盛，让英国新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商业阶层，打破了原有的阶级固化，“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不再是什么难事。[74]这些新兴阶层的人士大多出身低微，凭借个人奋斗，或成为企业主，或成为商人，还有不少人进入银行，专事金融工作。商业阶层虽逐渐形成一股独立的社会势力，但是文化上他们尚未能够独树一帜，消费方面更是随贵族阶级的奢华亦步亦趋，他们不遗余力地想通过与贵族花一样的钱、过一样的生活来证明自己已然跻身为上流社会的一员。

18世纪还有一个普遍概念是，判断成功商业精英的标准很大程度投射在了他妻子的身上。女人穿什么样的衣服，佩戴什么样的饰品完全取决于她丈夫的财力和生活品位，而这无疑代表着一个人的社会阶层。[75]紧身胸衣和内装有圆形支架的裙撑是当时上层社会的时尚潮流，但穿起来非常不适且面料十分昂贵。尽管如此，伦敦的紧身胸衣和裙撑销量依旧不错，买主中有不少是来自中下层的女性。都说“女人是天生的消费者”，当女性的消费天性和奢侈消费被“后天”地联系到一起，作为展示财富的一种手段，那么服装、首饰、配饰等等明显具有“女性”属性的消费，自然会猛增。女人的消费，透露了她背后男人的经济实力甚至社会地位。

无论男女，以伦敦为首的英国人已然建立了一套“金钱即道德”的消费哲学，而当时的这座伦敦城，也令这套消费哲学有了实践之地。林立的餐馆正好饱饕餮者之口腹，奢侈品的流行可满足虚荣者之欲望，正所谓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极尽豪奢之事。伦敦成了名副其实的繁华与享乐的都市，难怪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在几十年后会感叹：“谁要是厌倦了伦敦，谁就等于厌倦了生活。”[76]对于伦敦的有钱人来说，如此丰富多姿的生活怎可能会令他们厌倦呢？

不过，若要追根溯源，奢侈和炫富消费的源头则应是法国巴黎。这种造成“道德与政治堕落”的消费习惯，很大程度上就是密西西比泡沫在巴黎发酵的产物。[77]在英国议会通过“南海计划”之前，密西西比公司的股市泡沫早已使得法国的贵族阶层变得更为富裕，同时，新富阶层也凭借股票投机实现了财富的崛起，二者都拥有惊人的消费能力。[78]据说，在密西西比公司股票价格上涨最快的日子里，连受主人委派去股票交易所卖出股票的仆从都晓得从利益中赚取回扣。他们往往会在交易所等上一段时间，并不急于出手，而是等待股价上涨超过主人的委托价时，才进行交易。如此一来，委托价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差价，就被他们揣进了自己的腰包。这些获得意外之财的仆从，会迅速将这笔靠欺骗获得的钱花掉，而奢侈品商店，无疑他们最常光顾的消费场所之一。



18世纪英国画家托马斯·哈德森（Thomas hudson, 1701—1779）所绘的一幅贵妇肖像图。紧身胸衣与宽大的裙撑、华丽的珠饰，这是当时贵族妇人的普遍装束。

有人说，“轻易获得的金钱也会被轻易地花掉”[79]。为了能够“轻易”地花钱，将手中的股票更为“轻易”地变现成了巴黎人最乐于做的一件事。不少昨天还死死攥着股票不放的人却在今天把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变了现金，又将现金变为他们享乐的资本。股票虽然价值连城，但毕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金钱，不能直接满足人的消费欲望，一些投资者对于仅限于股票账面上的财富已显出厌倦。约翰·劳预感到了危机，他在

1720年初就曾发布命令，禁止人们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佩戴金银饰品，禁止金银的买卖，并规定100里弗尔以上的交易不得使用铸币。这一条条对人们消费的“限购令”，透露着约翰·劳对巴黎这套建筑于虚拟经济之上的信用体系的担忧。一旦资本外流，他苦心经营的一切，可能在顷刻间坍圮。

英国人显然还暂时体会不到约翰·劳的忧虑。密西西比泡沫的获益者们在暴富之后的阔绰曾给了自视甚高的英国人非常强烈的刺激。“法国人凭什么变得富有？”不少人这样问道。而当他们引入了约翰·劳在法国实行的那套制度之后，财富似乎也立刻像变戏法般源源不匮了。有幸搭上“股票”这一班顺风船的人，立刻践行了新教精神对他们的告诫之一：追寻现世的幸福乃道德之举。从股票交易所踱步而出的人们开始公开追寻他们的幸福——股票馈赠给他们的金钱。

恰如社会学家桑巴特所说，奢侈“实际上是一种力图胜过后来者的欲望”。而在1720年的英国，编织这种欲望的“所有的要素均已齐全：财富、性自由、人口中某些集团的优势势力、对大城市生活的偏爱”[80]。奢侈消费的泛滥是人们将心智委身于欲望的结果，对于财富、享乐、权力的欲望则是集体疯狂唯一通往的终点。伦敦，这座已经被金融的浮华冲昏头脑的城市，那一颗颗一门心思钻研股票的头脑，很难再装下别的事物。在股市的“末日”来临前，被财富之梦和奢华的生活牵着鼻子走的人们，注定要成为这场纵欲狂欢曲终人散时的殉葬品。

注释

1 见The History and Proceedings of the House of Lords, Vol. 3, Printed for Ebenezer Timerland, 1742, p. 126.

2 Rapin de Thoyras, The History of England, Vol. IV, Part 2, J. and P. Knapton, 1747, p. 216.

3 Daniel Defoe,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1992, pp. 218-219.

4 Geoffrey Wilson Clark, Betting on Lives: the Culture of Life Insurance in England, 1695-1775,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ND, 1999, p. 112.

5 A. H. John, "The London Assurance Company and the Marine Insurance Market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原载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25, No. 98, May, 1958, p. 126.

6 Geoffrey Wilson Clark, Betting on Lives: the Culture of Life Insurance in

England, 1695-1775,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ND, 1999, p. 21.

7 Frederick Martin, The History of Lloyd's and of Marine Insurance in Great Britain,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2004, p. 93.

8 Sir Cecil Thomas Carr, Select Charters of Trading Companies, A. D. 1530-1707, Ayer Publishing, 1913, p. cxx.

9 Institute of Actuaries (Great Britain), The Assurance Magazine, and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Actuaries, Vol. 4, C. & E. Layton., 1854, p. 120.

10 Frederick Martin, The History of Lloyd's and of Marine Insurance in Great Britain,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2004, p. 95.

11 伊恩·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刘雪岚、萧萍译，三联书店，2007，p. 42．

12 让—诺埃尔让纳内：《西方媒介史》，段惠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p. 39．

13 Richard Price, British Society, 1680-188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53.

14 Helen J. Paul, The South Sea Bubbl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Its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Taylor & Francis, 2009, p. 76.

15 Frederick Martin, The History of Lloyd's and of Marine Insurance in Great Britain,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2004, p. 95.

16 Nicolas Tindal, The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7, Knapton, 1746, p. 368.

17 Francis Boyer Relton, An Account of the Fire Insurance companies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During the 17. and 18. Centuries Including the Sun Fire Office, Swan Sonnenschein & Co., 1893, p. 156.

18 Nicolas Tindal, The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7, Knapton, 1746, pp. 369-370.

19 James Anderson, Royal Genealogies, Printed for the author by James Bettenham, 1732, p. 28

20 Richard Dale, The First Crash: Lessons from the South Sea Bubb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5.

21 Natasha Glaisyer, The Culture of Commerce in England, 1660-1720, Boydell & Brewer, 2006, p. 178.

22 Remarks upon Several Pamphlets Writ in Opposition to the South Sea Scheme, London, 1720, pp. 13-14.

23 见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Numerous Fraudulent Projects to Which It Gave Rise in 1720, Thomas Boys, 1825, p. 125.

24 Adolphe Thiers, The Mississippi Bubble: A Memoir of John Law, Greenwood Press, 1969, p. 272.

25 John Toland, A Collection of Several Pieces of Mr John Toland, Vol. 1, London, 1726, p. 415

26 Lewis S. Benjamin, South Sea Bubble, Ayer Publishing, 1967, p. 27.

27 John Toland, A Collection of Several Pieces of Mr John Toland, Vol. 1, London, 1726, pp. 415-416.

28 Stuart Banner, Anglo-American Securities Regulatio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oots, 1690-18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3-44.

29 Kevin Mellyn, Financial Market Meltdown, ABC-CLIO, 2009, pp. 137-138.

30 An Argument Providing that the South Sea Company Are Able to Make a Dividend of 38 per cent for 12 Years, London, 1720, p. 19.

31 John Locke, Several Papers Relating to Money, New York: Kelly, 1989, pp. 57-58.

32 Ways and Means to Make South Sea Stock More Intrinsically Worth Than Ready Money, 1720, London, p. 6.

33 Peter M. Garber, Famous First Bubbles: the Fundamentals of Early Manias, MIT Press, 2001, p. 52.

34 Peter George Muir Dickson,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Gregg Revivals, 1993, p. 156.

35 Gary S. Shea, "Understanding Financial Derivatives During the South Sea Bubble"，原载Oxford Economic Paper, Vol. 59, 2007, pp. 75-76.

36 Gary S. Shea, "Financial Market Analysis Can Go Mad (in the Search for Irrational Behaviour During the South Sea Bubble)"，原载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0, Issue 4, 2007, p. 747.

37 Gary S. Shea, "Understanding Financial Derivatives During the South Sea Bubble"，原载Oxford Economic Paper, 59, 2007, p. 78.

38 同上，pp. 80-81．

39 Gary S. Shea, Sir George Caswall vs. the Duke of Portland: Financial Contracts and Litigation in the Wake of the South Sea Bubble,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Larry Neal upon His Retiremen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2007, p. 14.

40 同上，p. 17．

41 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25.

42 Peter M. Garber, "Famous First Bubbles"，原载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4, No. 2, Spring, 1990, p. 43.

43 Lewis S. Benjamin, South Sea Bubble, Ayer Publishing, 1967, p. 56.

44 Richard L. Peterson, Inside the Investor's Brain: the Power of Mind Over Money, John Wiley and Sons, 2007, p. 3.

45 Eric S. Schubert, "Innovations, Debts, and Bubbles: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in Western Europe, 1688-1720"，原载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8, No. 2, 1988, p. 301.

46 Rik G. P. Frehen, etc., New Evidence on the First Financial Bubble, Yale ICF Working Paper, No. 09-04, 2011, p. 4.

47 Larry Neal, The Ris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79.

48 Constantine George Caffentzis, Exciting the Industry of Mankind: George Berkeley's Philosophy of Money, Springer, 2000, p. 32.

49 Charles H. Wilson, Anglo-Dutch Commerce and Fin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41, p. 72.

50 Eric S. Schubert, "Innovations, Debts and Bubbles: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in Western Europe, 1688-1720"，原载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8, No. 2, 1988, p. 302.

51 Anglo-Dutch Commerce and Fin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03.

52 J. P. Van Niekerk,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 in the Netherlands from 1500 to 1800, Vol. 1, Uitgeverij Verloren, 1998, p. 620.

53 Rik G. P. Frehen, etc., New Evidence on the First Financial Bubble, Yale ICF Working Paper, No. 09-04, 2011, p. 42.

54 Anglo-Dutch Commerce and Fin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04.

55 同上，p. 105．

56 同上，p. 107．

57 尼·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经济学》，郭连成译，商务印书馆，2005，p. 15．

58 Anne Goldgar, Tulipmania: Money, Honor, and Knowledg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 2.

59 赖建诚：《西洋经济史的趣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p. 139．

60 Jan De Vries, A. M.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53.

61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p. 4．

62 Carlo M. Cipolla,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 1000-1700, Routledge, 1993, p. 122

63 Ann Carlos, Dissecting the Anatomy of Exchange Alley: The Dealing of Stockjobbers during and after the South Sea Bubble, Mellon Sawyer Seminar on Debt, Sovereignty and Power, 2007, pp. 5-6.

64 John Carswell, The South Sea Bubb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163.

65 Rik G. P. Frehen, etc., New Evidence on the First Financial Bubble, Yale ICF Working Paper, No. 09-04, 2011, pp. 40-41.

66 Giorgio Riello, A Foot in the Past: Consumers, Producers and Footwear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5.

67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pp. 56-57.

68 Natasha Glaisyer, The Culture of Commerce in England, 1660-1720, Boydell & Brewer, 2006, p. 57.

69 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朱绍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p. 42．

70 Robert Markley, The Far East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600-173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80.

71 George Godfrey, Cunningham Lives of Eminent and Illustrious Englishmen, A. Fullarton & co., 1835, p. 120.

72 Christopher Christie, The British Country Hous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0.

73 Nathan ben Saddi, The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England,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J. Fairburn, 1821, p. 197.

74 Asa Briggs,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984, p. 208.

75 Peter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164.

76 "What was the best Time and Place to be Alive," Intelligent Life magazine, November/December 2011, http://moreintelligentlife.com/content/ideas/best-time-and-place-be-alive.

77 Michelle Henning, Museums, Media and Cultural Theory,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 2006, p. 19.

78 Alden Cavanaugh, Performing the "Everyday": the Culture of Gen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7, p. 15.

79 John Francis, 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ts Times and Traditions, From 1694 to 1844, New York, 1862, p. 62.

80 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p. 82．

第八章　股市最后的泡沫

——伦敦的泡沫公司与《泡沫法案》

伦敦的泡沫公司

当人们争先恐后地炒卖股票时，几乎没有人留意到伦敦的众多出版物中，多了一份不太起眼的小册子。这本册子的名字叫做《论赌博》（An Essay upon Gaming），作者杰雷米·科勒尔（Jeremy Collier）是一位牧师，他的这篇文章最初出版于1713年，主旨在以宗教视角痛陈赌博之恶，劝导人们远离赌博、潜心向善。科勒尔这篇初版时影响颇广的文章把赌博和享乐至上的“伊壁鸠鲁主义”联系在一起，在他笔下的职业赌徒们，“认为财富和身份完全取决于个人运气”。这种机会主义哲学，毫无疑问会为整个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1]

在这个特殊的年份再版这册文字，颇为讽刺。英国人对股票的投资，正如他们对彩票和赌博的热爱，均是这“机会主义哲学”在从中作祟。一个人是腰缠万贯还是家徒四壁，无非是与“机会”迎面撞上或是擦身而过的区别罢了。当每个人都在贪婪地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时，从众与跟风之气便会兴起，鱼目混珠者也就从中得了便利。在1720年的伦敦，股份公司就是人们想象力所及的最不可错过的机会。拥有一家能公开发行股票的机构，无疑是迅速让致富“机会”最大化的终南捷径。在投机之徒眼中，“股份公司”四个字，仿佛一件具有魔法的外衣，会令穿上它的人立即闪耀出黄金般的光芒。

这或许足以解释当年伦敦上演的荒诞一幕吧。

南海公司的股价上扬，牵动起整个伦敦股市的“大好形势”。不过，并不是每个投资者都有机会购买南海公司的股票。毕竟，与庞大的市场需求比较，认购股票的数量实在有限，而投资者往往又对“南海”二字趋之若鹜，原本就供应不足的南海公司股票遭到了人们的争抢。这场“股票争夺战”的获胜者无疑是英国的权贵阶层和一部分中产人士。更多的人，并无机会获得南海公司股票，但他们投资的热情总得有处寄托，于是，南海公司之外的股份公司成为他们投资自己那点可怜资产的最佳去处。

这帮人的打算是，先通过购买小一些的股份公司股票进入伦敦股市，等自己的股本积累起来以后，再卖掉手中的小公司股票，购入南海公司股票。[2]

可以说，南海泡沫的形成有赖于整个伦敦股市泡沫的膨胀，而这一切的前提，则在于数量庞大的股份公司。伦敦人对于投资股份公司的热情在17世纪末期已被激发过一次，那些仿佛一夜之间遍布街头的股份公司，经营着稀奇古怪的业务，它们为金融的泡沫做了历史上的最佳注脚。相隔数十年后的1720年，英国的社会和政局早已物是人非。但伦敦的股份公司却迎来了与几十年前极为相似的虚假繁荣。据统计，伦敦新出现的股份公司在1720年已达到近两百家，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则增长了八倍。[3]炒股此时似乎成了一桩伦敦的“全民事业”，人们的公共生活，全都围绕着数不清的股份公司股票展开。当时，有人形象地描绘了股票在伦敦的风靡程度：在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无论智者、愚人、小镇居民或城市人，混杂在一起前往交易所，每天都在浪费或获得金钱。[4]

没有数量众多的股份公司，股票交易是不可能压倒性地占领人们的公共生活的。而这些股份公司的创建者，与其说是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倒不如说是群做一锤子买卖的赌徒。向乔治一世提出“年俸解决计划”的切特温德勋爵和翁斯洛勋爵乃泡沫时代的众多淘金者当中，兼具眼光和能力之人，二人新成立的保险公司，也因此获得了皇家的授权。但在这二人之外，更多的股份公司遍布伦敦，则呈现出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之态。

然而，众多股份公司中，能“有幸”被允许向政府和国王提供贷款者可谓凤毛麟角，大部分公司集中精力之所在，是要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购买本公司股票。股份公司的创办者们，一心以为如此便能从商业上复制“南海公司”模式，让自己成为第二个布伦特。于是，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布伦特的手段越来越像。伦敦的大小报纸上，密密麻麻出现了这些公司所提出的各类商业计划。类似于以下的广告语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报刊上：“下周二，在某地将会开始价值高达200万英镑的股票认购计划，认股簿也将在同一日开放。这个商业计划是关于如何融化碎木屑和锯屑，并将它们无缝、无裂痕地熔铸在新板材上。”[5]其言之凿凿，很容易让时人信任这些商业计划都建立在新技术与新发明之上。不过，对于公司的执掌者来说，那些自我吹嘘的白纸黑字有多少真实性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们用文字勾勒的图景是否有足够的诱惑力让投资者把金钱乖乖递

到他们手中。

这一招果然收效显著。没过多久，“从白天到夜晚，在交易所大街上人满为患，包括南海公司投资者在内的股票商人们逗留在此，竟壅塞道路令人无法通行。每周七天，没有任何一天你不会从报纸上读到华而不实的新商业计划广告，它们指引着读者应该上哪里投资。这一切肆无忌惮地膨胀着”。[6]这一幕，在1720这个特殊的年份其实并不怎么特殊，但令人感到有些异样的是，人们所为之迷狂的股票，已经不限于南海公司、东印度公司、英格兰银行等等有特许状在手的大型股份公司了。大众的目光开始从股份公司制度的金字塔尖向下方移动。在这座金融金字塔的基座周围，布满了数以百计、良莠不齐的股份公司。与高高在上的大公司相较，它们似乎是普通投资者更触手可及的金库。

在伦敦的咖啡馆里，民间的股票认购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展开。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购买顶级公司的股票无门，便带着他们有限的资产寻觅小公司的股票。公司老板们模仿南海公司的手段收到了成效，投资者的热情很快被调动起来，再加上许多公司在股票认购时都为认购金打折。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纷纷抢购股票。当众人还没来得及从投资中收益半个便士，欺骗的行径就已经在股份公司中蔓延开来。

不少一心向往财富的股票认购者遭遇了令他们感到绝望的境遇。上午还在接待四方投资者认购股份的公司，很可能当天下午就已人间蒸发。一些不走运的投资者回到自己一天前甚至半天前认购股票的地方，却发现此地已是人去楼空，公司的负责人带着股票认购书和现金消失得了无影踪。伦敦临时充当股票交易用的房屋大多按天出租，整个认购过程只需花费数小时就可完成，因此，“前脚收钱，后脚走人”的情况在伦敦并不鲜见。讽刺的是，这些骗子公司的广告甚至还堂而皇之印在前一天的报纸上。[7]

善良的投资者此时或许还在安慰自己，只要公司最后将股票的盈利返还给他们，至于这些公司经营的业务具体情况如何，商业前景如何，反倒没那么重要。此情此景，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股份公司风靡伦敦的时候。历史又在重复自己，至少在目前看来，过去的多次教训并没有令英国人从金融投机的陷阱中挣脱出来。在1720到1721年之间，几乎没有公众将南海公司以及众多其他公司的虚假繁荣称为“泡沫”。[8]不仅如此，愚蠢的投资者似乎比以往更加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这些不知踪影的股份公司的股票也因此不乏买家，价格亦是一路飙涨，股票最后的

卖价高于最早认购价格五六倍以上者，在当时的伦敦股市并不罕见。其中涨势最为凶猛的，已然有赶超南海公司半年内股价上涨近十倍的势头。

什么样的股份公司能够在短短几个月内让股价往上翻好几倍？这些公司既没有南海公司那样的皇室特许状，也不像东印度公司经营着利润丰厚的印度殖民地，更没有英格兰银行那样得天独厚的金融垄断背景。它们唯一能够仰仗的，就是自己所经营的业务以及对投资者不遗余力的宣传。

看看1720年伦敦，新成立的股份公司都在经营什么业务吧。据统计，当时渔业公司有12家，土地公司13家，矿产和冶金公司15家，美洲贸易公司11家。此外，麻布公司有6家，盐业公司4家，清洁水资源公司4家，纺织公司5家，制油公司6家……以上诸公司，所经营的业务尚且在“正常范围”，但如果仔细翻阅是年的公司列表，会发现更多的公司经营令人无法理解的业务。

试举几例。在伦敦的股份公司清单中，你能找到诸如经营“为私生子建造医院”的公司，经营“人类毛发贸易”的公司，开发“催肥生猪”技术的公司，制造“永动轮”的公司，甚至是经营“翻修全英国楼房”业务的公司，负责“增加儿童财富”的保险公司，负责“装修坟墓”的公司，主营“治愈性病”业务的公司，专门“建立收费关卡和码头”的公司等等。各类商业项目之离奇，简直穷尽了人类的想象力。[9]

这些不知所谓的公司让人不觉回忆起了几十年前出现在伦敦又倏然消失的一家家泡沫股份公司，同时，也想到了近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众多经营古怪业务的保险公司。平心而论，新出现的公司不能说每一家都不可靠，但它们当中有多少真的在老实经营自己对外宣传的业务，以公司效益而不是自我吹嘘来说服投资者，实在大可存疑。不难想象，股份公司一多，各类商业计划自然就遍地开花，让人应接不暇了。数量庞大的商业计划书被递呈到议会，着实令人伤脑筋。议员们并不打算通过这些计划，国家的经济债务负担已经被南海公司等几家大公司分担殆尽，而南海公司的股票已被这众多的商业计划抬了起来。[10]如今，它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虽然还有议员和政府大臣垂涎于各类商业计划的利益，但实在有太多的英国商人递呈商业请愿和计划书，这令政客们感到厌倦，因此，他们当中有人开始盘算如何才能停止眼前这一幕幕金钱闹剧。

对于当年如此纷繁复杂的金融市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相对客观地理解呢？1720年的投资者贪婪是不假，跟风炒卖、金融欺骗的行为亦是令人痛恨，凡此种种无须赘述。以此而敌视股票市场，将其视为“人性之恶”的试炼场，似乎也是今人的一种思维定势。不过，以一种笼统的现象而简单推导出结论，乃是学问上的粗疏。股票市场所谓的“善恶”乃至其存废与否，并不仅仅在于它是否造成了投资者的非理性疯狂。一个常识是，疯狂是集体行为的常态，问题本质在于：在市场出现不合理之后，有无可能通过自我调节或者外界强制力干预而中止市场中的各种不合理情况。通俗地说，在股市这辆急速前行的快车即将撞上山崖之前，车上是否有人能够及时拉一把刹车。

18世纪初叶英国的股票市场，各种投机的丑恶形态杂然纷陈，固然是金融圈的虚伪与堕落使然。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个时代的股票市场，乃至于整个资本市场实际上已经建立了“高度的组织性”，无论是完整的金融结构、价格信息的广泛传播还是职业套利人的出现，都令18世纪初期，或者干脆说是1720年这个时间点上的伦敦股票市场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专业性”。[11]可叹的是，这个日渐发展得羽翼丰满的股票市场，却由于政商的合谋以及监管的缺失，催生了一场空前的金融大泡沫，而这场泡沫破灭为英国所带来的，却使得正处于发展中的股票市场陷入停滞。整个英国的股份公司也因此一蹶不振，股票市场也就此收住了疾行的脚步。站在金融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不得不说是一桩憾事。

英国经济史的发展脉络中之所以有这么一段“节外生枝”的故事情节，其原因在于有人在股市的车轮疯狂旋转之际，使劲儿拉住了刹车。可是这个急刹车却没能挽救伦敦的股票市场，相反，由于刹车过猛，以至于这趟金融列车未即刻停止却冲出轨道。这个改写英国经济史走向的“急刹车”，就是后世闻名的《泡沫法案》（Bubble Act）。

泡沫法案

《泡沫法案》虽然在客观上暂时遏制了泛滥伦敦的泡沫股份公司，但是这部法案最初被提出并送交议会讨论，却不是因为人们意识到股市泡沫膨胀将对英国经济带来一场灾难，而要采取补救措施。这个最终获得“一个饱受惊吓的议会通过”，并且“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遏制了英国的股份公司发展”的法案，其动机却是明白无误的四个字：经济利益。[12]

这个动机，从该法案的另一名称便不难看出。《皇家交易所和伦敦保险公司法》（Royal Exchange and London Assurance Corporation Act），眼尖的读者或许会觉得这个名称看上去似曾相识。翁斯洛勋爵和切特温德勋爵向议会提出的商业计划不就包括成立法案中的伦敦保险公司和皇家交易所保险公司吗？没错，法案中的两家保险公司和两位勋爵创办的股份公司乃是一回事——那两家引发了伦敦“保险公司热”、致力于为王室年俸提供资金的股份公司。如果说南海公司的股价泡沫还不足以从经济上掀翻英国这条航行在波涛中的航船，那么以伦敦保险公司为代表的众多新兴保险公司，则是另一股潜藏着的具有毁灭性力量的金融大风暴。1720年6月，这两股风暴终于汇合在一起了。二者的交点就是这部《泡沫法案》。[13]

既说到这部法案的通过，就不得不重提几句两家保险公司的来历。我们知道，乔治一世在1720年6月离开英国之前凭借个人政治影响力促使两家公司的商业计划和特许状在议会获得通过并获得了授权。当时的乔治一世，返回故乡汉诺威心切，在那届议会上通过的不少法案他都未曾细读，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通过了至少18项法案。[14]这部所谓的《泡沫法案》正是这诸多草率通过的法案之一。除了两家公司为王室年俸提供资金这个条件，国王并不关心这部法案到底说了些什么。在议会闭幕的两天前，法案匆匆获得了通过。布伦特还获得了国王赐予的男爵头衔。

要弄清楚这部法案的受益者是谁，我们的解读不妨从《泡沫法案》在议会通过时冗长的正式名称开始——“法案用来保护由陛下的两份特许状所授予的权力和特别待遇，该特权授予航海与商贸保险业，以方便船舶抵押借贷并严格约束所提及的那些过度行为和没有获得认可的行为”（An Act for better securing certain Powers and Privileges, intended to be granted by His Majesty by Two Charters, for Assurance of Ships and Merchandize at Sea, and for lending Money upon Bottomry; and for restraining several extravagant and unwarrantable Practices therein mentioned）。法案中所谓“特别待遇”者，显然就是指皇家交易所保险公司和伦敦保险公司，而那些“没有获得认可”的，想必就是民间未获得政府特许的诸多公司了。换言之，议会在通过这两家保险公司的特许状时，顺便掐断了其他公司的财路。这恶狠狠的一招，其实并不算高明。明显袒护“特许状”的法案虽帮了受政府支持公司的大

忙，但权衡其带来的恶劣后果，却是弊远大于利。

翻遍这份法案，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两家保险公司的各种授权与规定，并没有特别提及应当对伦敦遍地皆是的泡沫公司进行何种限制。唯一的一条与“泡沫”直接有关的条文写着：对于王国内所有的企业而言，如果没有得到议会的正式立法同意或者王室的特许证书，那么任何募集资本的活动都被认为是非法和无效的。并且，法案还对南海公司和其董事会大开绿灯，从立法上肯定了布伦特等人的投机之举。[15]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在皇家交易所和伦敦保险公司将法案送交议会讨论之际，便打定主意利用这份法案为自己牟利。布伦特等人深忧民间泡沫公司会对自己的生意存在威胁，于是在暗地里干涉了法案的通过。议案委员会的主席约翰·亨格福德（John Hungerford）实际上和公司管理层深有交情，而且，在成为委员会主席以前，他一度担任东印度公司的法律顾问。[16]委员会的其余成员，有不少是南海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包括斯坦诺普、克莱格斯等南海公司的“老熟人”均名列期间，整个法案委员会俨然是南海公司的利益代表。可以想见，想要这部法案在表决通过的过程中，做到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

在这份法案生效之后，伦敦的股票生意成了“萝卜占坑”的游戏，南海公司、东印度公司、伦敦保险公司和皇家交易所保险公司这类已经持有特许状的企业无疑在股票市场占据了极大优势。当民间的金融泡沫被官方强行“挤破”，从中流出来的资本最后只能奔向以上数家未被法案取缔的、具有官方背景的大型股份公司。[17]以南海公司为首的股票，经过法案的“加持”，势必更为坚挺。因此，这部被后世史家称为“泡沫法案”的文件，“泡沫”二字，名实难副。倒不如说它是一系列为“国有”背景的公司保驾护航的条款。

当然，在委员会成员中，也并非个个都是只顾私利的贪财之辈。曾针对国家债务问题向乔治一世谏言的哈奇森便是法案委员会中的“另类”。作为议会中的一名议员，哈奇森难能可贵地公开反对股票投机活动。早在1720年3月，他就警告投资者们，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被严重高估了：“我非常确信，现在价格高涨的南海公司股票，并没有真正的资金基础，更不用说以后了。而人们现在的热情也不可能永久地持续下去……无论是在议会内外，人们的普遍观念是，南海公司的股价现在是过高了。”[18]在他看来，过度的投机行为会蚕食、消磨掉人们从事实际生产劳动的动力，以至于整个社会充斥着“不劳而获”的怠慢思想。这无疑

会对英国的整个经济体造成十分消极的影响。

哈奇森的正式身份只是议员一个，但是他对于经济问题却多有思考，以至后世有经济学者称其为“经济学家议员”。这也是为什么并非南海公司“关系户”的他，能够入选议会的法案委员会。[19]况且，即便是当年腐败横行的英国议会，“民主”和“公正”的表面文章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委员会请来哈奇森这个反对派，也是为了显示其“博采众议”之态度。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定没有忘记，在当初南海公司的换股计划交由议会讨论时，哈奇森便是为数不多的异议分子之一。他在议会发言时曾厉声反对南海公司的计划：“我过去和现在始终相信以下事实，近来依靠南海公司股票的买卖勾当聚集起来的利润，无论是谁干的，都极类似于赌棍们获利的方法。”[20]可见，这位刚直不阿的议员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和南海公司“对着干”。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向国王提出的债务解决计划遭到了否定，内心郁闷。另一方面，他十分担心南海公司由此一家独大，威胁到整个英国的经济安全。在他的眼里，南海公司不仅会“并吞掉英格兰银行以及东印度公司，并且还将并吞掉整个英国的海外贸易。前提是只要他们愿意。更严重的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英国议会会成为南海公司那强大社交圈的代理人……”[21]言语间，哈奇森把南海公司董事会形容成了一群包藏祸心的奸商。不过，“抹黑”的招数并未奏效。哈奇森的第一次努力随着南海公司换股计划在议会的通过而付之东流。仅仅数月之后，他迎来了再次与南海公司董事会“交手”的机会。但与数月前相较，形势对哈奇森而言只会更不利，他完全属于法案委员会中的极少数派，胜算渺茫。

哈奇森虽势单力孤，但依然在议会中进行着仅存一线希望的努力。他希望凭一己之力在这份法案中加入对股票交易进行严格限定的条款，例如对投资者持有股票的最短期限加以限制，以防投机的常用手段——频繁的换手交易。尽管在议会之中并没有人响应他的号召，但哈奇森依旧乐观地说：“我有足够的信心，不需要借助于惩戒的力量，这些条款就足以抑制住所有的泡沫。同时，它们也能够防止通过议会法案和特许状建立的股份公司陷入股市泡沫之中，从而破坏公众利益。”[22]

现实再次给哈奇森上了无情的一课。所谓的《泡沫法案》并未加入他期望的那些限制投机行为的条款。南海公司在议会中的“利益代言人”们毫无可能让这种自缚手脚的条款加入法案中。而对于英国议会来说，他们已经不愿意再像以前那样，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案限定股份公

司的发展，那太麻烦，不如通过一份一劳永逸的法案省心。并且，唯利是图的议员们还有着这样的打算：通过法案限制非特许公司的商业活动，反过来就等于为政府颁发的特许状增加了价值，那么，今后试图通过议会获得特许状的公司只会有增无减。[23]在“授予”还是“不授予”二者的选择之间，议员们权力寻租的空间无疑又扩大了不少。一般民众或许对蜂拥而至的经济计划和请愿早就感到了迷惑甚或厌倦，但在腐败的立法者眼里，迎面而来的，却是滚滚财源。

议案委员会的成员们各有小算盘，都想在这份法案中体现自己的利益。因此，当所谓的《泡沫法案》终于新鲜出炉时，它已然成了一纸令哈奇森哭笑不得的文件。试图阻止南海公司膨胀的尝试无功而返。在此项法令下达之后，一部分资本从民间的泡沫公司撤离，流向了挂着“国家”招牌的大型股份公司。这其中，尤以南海公司为甚。

6月初，南海公司股票上涨到了750英镑每股，这几乎是当年1月份时股价的五倍。而在《泡沫法案》通过以后，股价更是上升到1,050英镑的高点，随后南海公司的股价略有回落，在900到1,000千英镑之间徘徊。高价的势头一直维持到了该年7月末。[24]同样是在6月，南海公司在前两次股票认购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第三次股票认购，发行了面值共计500万英镑的股票，超过了前两次的总和。[25]政府要员和巨商富贾们第三次有了大宗进仓的机会，争抢认购，金额在数万英镑不等，南海公司再次为这些人提供股票贷款。

这时，整个英国政府已被南海公司通过三次股票认购和两份法案进一步“绑架”，难以脱身。据统计，上下议院有578名议员至少参与了一次南海公司股票认购，股票总价值超过300万英镑。[26]此外，政府大臣和乔治一世的情妇也卷入了南海公司的股票游戏当中。其牵涉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令人触目惊心。而对于布伦特等南海公司董事来说，《泡沫法案》无非是他们所策划的一系列助推南海公司股价的步骤之一。他们并不关心这份新法案对英国造成的影响，他们更在乎这个筹码能够为自己带来多少英镑的收入。为商者有以私利而舍国家之想法，并不奇怪，本性使然也。

7月12日，英国政府又宣布了一项法令。由于议会在一个月前由乔治一世宣布闭幕，因此这项法令出自国王的顾问班子，或者叫内阁。这项政令开篇便写道：“考虑到出于各种目的建立的股份公司越来越多地带来公共问题，并且国王陛下的臣民们长期以来耗费钱财，加入其中，认

为他们的专营和特许状请愿会受到许可。为除此弊端，最高法官阁下今天颁布命令，命令以下所提及的请愿，以及商务部、国王律师和司法部长的报告一起呈现在人们面前。深思熟虑之后，在国王枢密院的建议下，特命令以下商业请愿将被解除。”[27]

这份清除名单包含了当时大部分尚未通过的商业计划，其中主要是关于海外贸易和渔业的请愿。这也难怪，在当时千奇百怪的公司中，经营这两块业务的公司绝对属于“正常”的范畴，不会令人怀疑其生意的真实性，况且，海外贸易正是英国借以“崛起”的最重要手段，商人们觉得，任何商业计划，只要使劲儿往这上面靠，准没错。但现实却和他们期望的相反，英国政府和大公司们来了一招“过河拆桥”，外加“釜底抽薪”，在限制股份公司发展之余，更取消了一大批提交议会的商业计划。

例如，一位名叫约翰·兰伯特的商人，联合多人向政府提起请愿，希望授予他们组建一家专营格陵兰地区贸易的股份公司。相同的请愿至少还有两份，但最终均名列禁令的榜单之上。受到禁止的商业请愿不仅来自民间公司，冠有“皇家”二字的公司也在其中，例如皇家英格兰渔业公司（Royal Fishery of England），进一步要求专营权的请愿也遭到了否决。那么，像之前翁斯洛勋爵那样，让自己的生意尽量靠近汉诺威王室的利益，成功的把握是否会大一些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好几位商人都提请过专营英国和乔治一世在德国领地之间的贸易，连公司名称都想好了，叫做“汉堡公司”，出乎意料的是，原本他们以为会获得同意的这份计划也被列于即将被取缔的商业计划名单中。[28]喧闹的民间商业请愿就这样销声匿迹了。王室的特许状，被南海公司们变成了不容他人企及的“特权状”。

《泡沫法案》通过之后，进入1720年夏天的英国仿佛一切如故，除了更为坚挺的股份公司股票和人们随着气温一同升高的投资热情，几乎察觉不到其他任何变化。而事实上，这时的英国金融市场俨然是一个充盈着氮气、胀得发亮的气球，如果持续往其中充气，最后的结果就只可能是砰的一声巨响，一切繁华豪奢，皆尽灰飞烟灭。该年六七月间的英国金融气球，正处于濒临爆炸的临界点。《泡沫法案》为它注入了所能承受的最后一股氮气。这只亮晶晶的气球因而往上飘得更高，到达了一个不堪其重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海公司等于搬起《泡沫法案》这块石头砸了自己的脚。[29]

危险的信号

在当时的伦敦交易所大街，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无论是股票投机者、公司董事还是一般市民，这首歌谣传到了许多伦敦人的耳朵里。

歌谣唱道：

伦敦有一栋著名的建筑，
它的附近是一条小路，
欢快的人群聚集在这里，
为钱财而辛劳，
在这里，
智慧让位给欺骗。

这群贪慕钱财的人聚集于此，又是为了干些什么勾当呢？

歌谣接着唱道：

我们的贵族和暴民们，
此刻都买进卖出，观望并忍受，
犹太人和异教徒们的争吵。



18世纪英国画家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创作的“南海泡沫”讽刺画。画面中间的山羊骑在“幸运之轮”上，而画面左边的魔鬼则将“幸运”的身体肢解并丢给台下贪婪的人们。

在这里，盼望财富的人，
总是被狡猾的朝臣所欺骗。
有些人透过帘幕一窥背后的真相，
他们的双眼看清了这场骗局。

我们最高贵的女士来到这里，
每天忍受着马车颠簸，
她们常常典当掉自己的首饰，
换取钱财参与到这场冒险之中。
年轻的娼妇们从特鲁里街赶来，
坐上四轮马车来到交易所，
她们依靠放荡所赚来的钱，
又被人们骗走。

富有远见的人或许能冷静地凭借规则赚钱，
因为他们善于思考，从不酗酒；
但盲从者却是让我们得以发财的傻瓜，
因为他们光知道喝酒，从不思考。
运气好的流氓们，像西班牙犬一样，
纵身跃入南海的海水中，
在海里捕猎金子做的青蛙，
却从没想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30]

这首歌名叫《南海民谣》（South Sea Ballad），在当年伦敦的大街小巷传唱一时。此曲意在讽刺南海公司背地里搞内幕交易以及怂恿人们进行股票投机的险恶嘴脸。南海公司恨不得立即将其禁止，以免影响公司在大众心目中的印象。《泡沫法案》通过之后，许多股份公司被宣布为非法并遭到取缔，但是南海公司的股价并没有因此而继续上涨，反而有所下跌。大量公司被取缔的现实让一部分伦敦人对股份公司的信心产生了动摇。为了弥补股价从1,000英镑滑落至900余英镑所带来的些许不安，南海公司向股民们承诺说：8月份公司会进行第四次大规模的股票认购，以便更多的人有机会买到优质的南海公司股票。[31]这个时候，民间传唱着这么一首“抹黑”南海公司的歌谣，公司的高层和董事们自然希望清除这首歌曲的影响，为他们的圈钱计划进一步扫清障碍。

然而，公司董事们此时恐怕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和一首来历不明的歌谣较劲。让他们费神伤脑的事情正一件件接踵而至。首先的问题，就出在了这份刚刚获得通过的《泡沫法案》上。

尽管南海公司通过《泡沫法案》来保证资本不向外流，但这份法案执行时，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由于该法案为新法，其效力也无法达到英国经济的方方面面。至少有两类公司，就不在这份法案的效力范围之内。其一是轮船公司，另外是非铁矿的矿产公司。前者受制于英国的《海军法》（Admiralty Law），后者则受《锡矿法》（Stannary Law）的管制，《泡沫法案》鞭长莫及。[32]

此外，法案在实际推行时，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英国铜矿公司、皇家上光公司、约克建筑公司、威尔士铜矿公司这四家公司就带头拒不执行《泡沫法案》作出的种种规定。[33]威尔士铜矿公司的名誉主管还是乔

治一世那位和他长期不和的儿子，现在，国王乔治一世离开了英国，这个问题就只能由政府大臣们自己商量解决了。当初沃波尔等人就劝告过威尔士王子，要他别往股份公司这浑水里蹚，但我行我素的王子并不听劝告。结果到了8月中旬，在英国政府皇室专员的压力下，首席检察官宣布了针对上述四家公司的强制执行令（Scire Facias），强制执行《泡沫法案》上的规定。此时，威尔士铜矿公司面临被起诉的威胁，王子脸上实在挂不住，这才放弃公司的主管称号，拿钱走人了事。[34]至此，英国境内无人再敢向南海公司叫板。但有心者难免追问这份“及时出现”的强制令幕后的操纵者到底是何身份？历史学者对此莫衷一是。不过，根据法案的直接受益者推断，这很可能是南海公司或者英国财政部自导自演的一出戏。[35]毕竟，二者的利益在1720年之初便被那份换股计划捆绑在一起，为南海公司的融资扫清障碍无疑就是为英国政府偿债的计划扫清障碍。

还有一件事情，才真正让布伦特和所有南海公司董事担心不已。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自1720年以来，呈直线上升趋势，吸引得法国的不少投资者把手中的资产变现，转而投资南海公司的股票。这件事情，不仅令南海公司的人高兴，连把法国视为经济敌人的英国政府，也对此不无欣慰。但法国驻伦敦的大使德图什（Destouches）却为这一幕而忧心不已。在写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他描述了法国人涌入伦敦购买股票的情形，并称之为“我们信用体系的崩塌和英国信用的建立”[36]。德图什并非故作惊人之语，法国这个建立不久的新金融体系内部此时已经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令人闻之色变的通货膨胀出现了。

前文曾提及，约翰·劳为了他的货币体系，不惜利用政府的权力，强令法国境内以严刑峻法限制对金银的直接使用，这个办法或许短时间内能让银行券和其他非金属货币的支付手段流行起来。但其代价也是非常大的。当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纸币进行商品交换的时候，这种本身毫无价值的货币的购买力也会变得越来越低。1720年年初，法国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20%。

通货膨胀几乎是伴随纸币系统的诞生而开始，也是央行货币系统必然会招致的一个副作用。这并不新奇，18世纪的人们对于货币的本质，其实已有深入的思索与了解，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货币的便利性可以直接消除“交易的困难”，贵金属由于其独特的属性而“适于作为货币”。[37]虽如此，但将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从金属的外衣剥离开来，成为一

种新型的纸币，这显然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范围。当时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都很难接受“纸币”的概念。

因此，约翰·劳设想的纸币系统在法国属于曲高和寡，毫无建立的基础，况且他为了强制推行银行券搞的那一套做法实在是不得人心。限制金属货币乃至人们对金银珠宝的持有，这使得巴黎的人们怨声载道。几乎每天都有人告发他人私自藏有金属货币，告密的行为很快流行开来，弄得整座城市人心惶惶。[38]更为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进一步颁发命令说，对家具中的贵金属含量都作出明确限制，任何器物中的金子含量不得超过五盎司，餐具中银子的含量不能超过十马克，否则也将罚以重款。[39]

约翰·劳这种强制性的手段，无疑是蔑视了人们对自己财富的所有权和处置权。是持有金币银币还是使用银行券，这纯属个人的自由选择，但如今约翰·劳插进一脚，横加干涉，如独裁暴君一般强制人们放弃金银，使用银行券。这不仅不合理，而且不合法。要知道，被强制使用的这些银行券，本质上略等于国家纸币，但这些所谓的纸币却没有储备金作为发行的基础，只是一张张不具价值的白条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强制人们以金银交换银行券，实与赤裸的掠夺无异。

人们被剥夺了使用大面值铸币的权力，铸币仅限用来支付几百里弗尔的交易，但那一张张用金银换到他们手中的银行券并没有获得人们的信心。之前从未使用过这种货币的人难免询问：手中这些薄如蝉翼的纸张票据，今天值这么多钱，但明天还会值相同的钱吗？没人说得清这种钱的面值到底是否能维持下去，如果有一天，这种钱变得不值钱了，人们又该怎么办？不安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比普通人更加不安的是约翰·劳。他发觉，自从自己蛮横的法条被执行以来，巴黎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把他奉若通晓金钱之道的神明。不少人甚至对于“密西西比计划”的信心都产生了动摇，纷纷把资金转移到对岸行情更看好的伦敦交易所。约翰·劳对此十分担心，须知他的计划完全建立在人们的信心上，失去了信心的支撑，他的整个计划就会一瞬间崩塌。约翰·劳和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为此坐立不安，而他们用来抚慰内心的方法有两个。第一就是“印钞票”，并且是拼命地印——从1720年2月到5月，法国政府印行了面值15亿里弗尔的银行券。根据当时法国政府3月作出的规定，负责发行银行券的皇家银行和密西西比公司［当时已改名为印度公司（Company of the Indies）］合并在一起，银行券的发行必

须通过国家理事会的同意才能进行。[40]换句话说，法国在1720年的那次通货膨胀和以后的历次通胀一样，都是政府授意之下对人民财富的公然掠夺。

不过，印刷银行券这件事对约翰·劳和摄政王或许能起到一时的安慰作用，但对于法国大众来说，银行券印得再多，也无法说服他们放心地使用、持有这些银行券。于是，政府又出台规定，设立了银行券和股票的兑换办公室，二者之间按照固定价格进行自由兑换。[41]但即使采用了各种“出格”的手段，约翰·劳也未能重拾公众的信心。连法国政府的一名官员也当面告诉摄政王，他本人宁愿拥有50万里弗尔的金币或银币，也不希望持有面值超过500万里弗尔的银行券。[42]这句话，想必也严重影响了约翰·劳和摄政王看待法国货币政策的态度。

约翰·劳第二个试图重树人们信心的方法是虚造所谓印度公司繁荣的假象。为了这次大规模的“造假”计划，他不惜动用大量人力财力，先在1720年1月，以国家财政长官的身份出现在甘康普瓦大街上，并派人散布谣言说，他即将出台对印度公司有利的财政政策。[43]靠着口头上的欺骗，眼看就要大跌的股票价格，又及时刹住了车，并有所回升。

为了进一步说服巴黎的投资者，约翰·劳以印度公司的名义强行征召巴黎大街小巷的穷人——包括流浪汉、乞丐、无业人员等等进入印度公司，作为公司的劳动力被运往远在新大陆的路易斯安那，以此显示公司在北美的业务正经营得风生水起，以便稳定股民的信心。据统计，一次性从巴黎街头“拉壮丁”式征召的穷人，多达6,000名。与公司在1716年那次征召法国的在押囚犯和流浪汉为密西西比公司的劳动力一样，这次征召的活动，毫无疑问是约翰·劳为人们炮制出的另一桩“商业行为艺术”。所不同的是，当密西西比公司第一次这样干的时候，法国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相信，而当换了个名称的密西西比公司再耍出同样的花招时，人们的反应比上一次淡漠了许多。公众用密西西比公司股价的下跌回答了他。见此情形，约翰·劳又在法国展开游说，希望政府把几内亚的贸易经营权也交到印度公司手中。[44]

总之，约翰·劳想方设法要向人们传达一个信息：“密西西比计划”仍然是靠得住的。事情发展至此，似乎预示着约翰·劳精心设计的这个金融系统逐渐从繁荣走向穷途。越是不厌其烦地向公众解释、说明一件事情，越是暗示一个人对这件事其实心里没底，是典型的心虚表现。有人提出过设想，法国政府如果想要一次性偿还全部公债，有个毕其功于一

役的方法，那就是让摄政王本人在印度公司的股票涨到最高值的时候卖掉20万股，即刻能够套现20亿里弗尔！[45]而卖给市场的这20亿里弗尔，其支付手段又是皇家银行发行的无储备金的银行券，等于是左右互搏，以空对空，用一堆无价值的印刷品，“购买”另一堆无价值的印刷品，其中一堆象征着公债。显然，这桩交易会让那些被纸币“虚拟化”的政府债务一举消失得荡然无存。



当法国密西西比公司股价“跳水”时，投资者们聚集到甘康普瓦大街表达不满。

但这毕竟只是人们的一种设想，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当时的法国人并不想使用银行券，因此这桩惊天交易的可能性也几乎不存在。银行券的滥发已经造成法国纸币与金属货币间的比例严重失衡。解决的办法要么是让铸币的面值提升，要么是让银行券全部贬值。[46]究竟何去何从，这个话题被送到法国的政府理事会进行讨论。大臣们说什么的都有，有的建议应该提升铸币面值，有的建议维持现状，而约翰·劳的政敌们，此刻在理事会里大声疾呼：应该强制银行券贬值。经过激烈的辩

论，约翰·劳的政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皇家银行的银行券就此开始贬值之路。

1720年5月21日，伦敦的投资者们正对未来的经济前景充满憧憬，不计其数的股份公司正在那里遍地开花。但他们法国邻居的财富梦眼看就要走到尽头。在银行券实际贬值了好几个月后，法国正式施行了关于银行券和印度公司股票贬值的法令：印度公司的股票“自法令颁布即日起，下降到8,000里弗尔，7月1日下降到7,500里弗尔，8月1日7,000里弗尔，直至12月1日降至500里弗尔”。至于银行券，则是一律“打八折”，也就是说要贬值两成，继而到12月1日，计划贬值到原来价值的一半。[47]据说，约翰·劳起初极力反对这个法令。在他看来，短时期内如此大幅度的货币贬值，这会直接毁了他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新经济体。

不过，事到如今，贬值已是大势所趋。几个月间发行近20亿里弗尔的银行券，不贬值反而不正常。但贬值的结果却是约翰·劳最不希望看到的，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银行券一旦贬值，人们原本不牢靠的信心就会随着下跌的股票和银行券摔得七零八落。那么，他之前所有树立人们信心的工作皆为白费。事实上，巴黎的商人们正在偷偷把让他们深感不安的银行券带离巴黎，到其他任何不受法国律例干涉的地方兑换成价格更稳定的金币或银币。[48]

这话剧般的一幕幕，身在英国的布伦特看得真真切切，至于他心里怎么想，是为此感到失落、担忧，还是为自己的对手约翰·劳的失败感到庆幸，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人们知道的只是，南海公司或许预感到一场大的风波即将到来，他们为此做着最后的努力。但公司董事们没想到的是，自己所采取的每一步措施，看似壮大了公司自身的经济实力，实际上却是与约翰·劳的密西西比计划一起，走向最终的幻灭。

注释

1 Susanna Centlivre, Jane Milling, The Basset Table, Broadview Press, 2009, pp. 140-142.

2 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Numerous Fraudulent Projects to Which It Gave Rise in 1720, Thomas Boys, 1825, p. 55.

3 见Ranald C. Michie,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A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7以及Stuart Banner, Anglo-American Securities Regu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1.

4 Stuart Banner, Anglo-American Securities Regu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3.

5 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Numerous Fraudulent Projects to Which It Gave Rise in 1720, Thomas Boys, 1825, p. 69.

6 同上，p. 65 .

7 同上，pp. 66-67 .

8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 1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63.

9 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Numerous Fraudulent Projects to Which It Gave Rise in 1720, Thomas Boys, 1825, pp. 77-84.

10 David Dabydeen, Hogarth, Walpole and Commercial Britain, Hansib Pub., 1987, p. 167.

11 Margaret Patterson, David Reiffen, "The Effect of the Bubble Act on the Market for Joint Stock Shares"，原载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0, No. 1, Mar., 1990, p. 163.

12 Ron Harris, "The Bubble Act: Its Passage and Its Effects on Business Organization"，原载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4, No. 3, Sep., 1994, p. 610.

13 A. H. John, "The London Assurance Company and the Marine Insurance Market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原载Economica, Vol. 25, No. 98, May, 1958, p. 126.

14 Ron Harris, "The Bubble Act: Its Passage and Its Effects on Business Organization"，原载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4, No. 3, Sep., 1994, p. 613.

15 同上，p. 614 .

16 John Carswell, The South Sea Bubb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24.

17 Ron Harris, Industrializing English Law: Entrepreneurship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 1720-184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5.

18 Peter Temin, Hans-Joachim Voth, Riding the South Sea Bubble,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2003, p. 42.

19 Helen Julia Paul, Archibald Hutcheson's Reputation as an Economic Thinker: Pamphlets, the National Debt and the South Sea Bubble, Discussion Papers,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2010, p. 4.

20 Archibald Hutcheson, Some Paragraphs of Mr. Hutcheson's Treatises on the South-Sea Subject, London, 1723, p. 3.

21 Helen Julia Paul, Archibald Hutcheson's Reputation as an Economic Thinker: Pamphlets, the National Debt and the South Sea Bubble, Discussion Papers,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2010, p. 14.

22 Ron Harris, "The Bubble Act: Its Passage and Its Effects on Business Organization"，原载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4, No. 3, Sep., 1994, p. 617.

23 同上，p. 621．

24 同上，p. 613．

25 Richard Dale, The First Crash: Lessons from the South Sea Bubb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02.

26 Ron Harris, "The Bubble Act: Its Passage and Its Effects on Business Organization"，原载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4, No. 3, Sep., 1994, p. 616.

27 William Cobbett,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7, R. Bagshaw, 1811, p. 655.

28 同上，pp. 655-656.

29 Jerry W. Markham,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M. E. Sharpe, 2002, p. 99.

30 William Cobbett,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7, R. Bagshaw, 1811, pp. 659-660.

31 Rapin de Thoyras, The History of England, Vol. 4, J. and P. Knapton, 1747, p. 638.

32 P. L. Cottrell, Industrial Finance 1830-1914, Taylor & Francis, 2006, p. 9.

33 Douglas E. French, Early Speculative Bubbles and Increases in the Supply of Money,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10, p. 100.

34 Philip Henry Stanhop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Peace of Utrecht to the Peace of Paris, Vol. 1, D. Appleton and Co., 1849, p. 277.

35 Ron Harris, Industrializing English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7.

36 Malcolm Balen, A Very English Decei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First Great Financial Scandal, Fourth Estate, 2009, p. 130.

37 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p. 164．

38 Charles Mackay, 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Office of the National Illustrated Library, 1852, p. 50.

39 Adolphe Thiers, The Mississippi Bubble: A Memoir of John Law, Greenwood Press, 1969, p. 140.

40 1717年约翰·劳将密西西比公司改组为西部公司（Company of the West），两年后又进一步扩张其业务，成立了印度公司。详见James Handasyd Perkins等著，Annals of the West, W. S. Haven, printer, 1858, p. xvii.

41 Adolphe Thiers, The Mississippi Bubble: A Memoir of John Law,

Greenwood Press, 1969, p. 145.

42 Charles Mackay, 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Office of the National Illustrated Library, 1852, pp. 53-54.

43 Adolphe Thiers, The Mississippi Bubble: A Memoir of John Law, Greenwood Press, 1969, p. 130.

44 Robert Harms, The Diligent: Worlds Of The Slave Trade, Basic Books, 2002, p. 51.

45 John Philip Wood, Memoirs of the Life of John Law of Lauriston, Printed for A. Black, 1824, p. 109.

46 同上，p. 115．

47 同上，p. 116．

48 Adolphe Thiers, The Mississippi Bubble: A Memoir of John Law, Greenwood Press, 1969, p. 133.

第九章　1720年大崩盘

——从股市崩盘到对南海公司的审判

短暂的夏天

对于英国人来说，夏天历来象征着一种诗意的美。莎翁的十四行诗中一句“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做夏天？”（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让后世多少文艺青年为之迷醉倾倒。英国地处高纬度，日照稀少，一年之中只有夏季能享受较多的阳光，使人们得以一驱心中的阴霾；而其余的季节，英国大多雾霭沉沉、天气阴郁，也难怪英国人对夏日如此珍视。1720年的英格兰夏天，南海公司的股价泡沫膨胀到了极致，并在阳光下开始抖动、摇晃，甚至给人一触即溃的感觉。这个夏天，英国人不再像过去那样诗兴盎然，而是变得无比现实。人们的双眼紧紧黏在了股票牌价表上，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关键信息。

《泡沫法案》通过没几天，布伦特和他的同伴们发现情况并没有在他们预期的轨道上发展，股票投资者并没有变得更大胆，黄金的不断外流、股价的下跌让人们的市场预期前所未有地悲观。[1]南海公司的股票火热程度骤减下来，已经低于900英镑。这个消息令布伦特感到惴惴不安，他从一开始就心知肚明，自己所设计的这个经济计划运作的前提完全建立在南海公司股票不断上涨的基础上。只要南海公司的股票变得不再值钱，那么投资者就会迅速抛售手中的股票，让这些虚拟的票据变成现金，而一旦人们开始抛售，股票本身将会变得更不值钱。法国人一窝蜂用银行券换金银的事实让布伦特联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假如投资者都把南海公司的股票卖掉，布伦特执掌的这家公司就很有可能会垮台。不，他对自己说道，决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但布伦特还能做些什么呢？现在的南海公司说得直白点只是一个金钱骗局，它的存在纯粹依靠骗取人们的乐观情绪来支撑。布伦特所能够做的，无非是重复以前惯用的伎俩——再次进行大规模股票认购，重树公众对于南海公司股票的信心。8月初，南海公司的董事们聚在一起开了个会，专门商量稳定公司股价的对策，他们经过一番讨论，定下了向

所有的年金领取者进行股票认购的条件。[2]于是，便有了南海公司几个月之内的第四次股票认购，时维8月24日，这时的南海公司股票，已有了大崩盘的前兆。[3]

这实际上是南海泡沫破灭前的最后一次股票认购，对象限于之前只有南海公司资本的投资者。不得不说，在短时间内股票又有了一些起色，人们原本渐渐退去的热情又被认购刺激出来了。甚至连沃波尔这个极力阻止南海计划在议会通过的异议者，卖掉了自己持有的南海公司股票没多久，也经受不住这一次认购的诱惑而重新购入了大量股票。他的私人银行家杰科姆（Robert Jacomb）写信警告说，现在南海公司股票的不确定因素太多，贸然购买并非明智之举。[4]但沃波尔不听劝告，依然视南海公司的股票为发财的不二法门。

虽然以沃波尔为代表的投资者让布伦特看到了第四次认购的成效，但他的招数依然难以服众。有许多政府年金的领取者公开对南海公司的董事会表达了不满。他们谴责董事们在各次认购股份的过程中做了手脚，将股票的大头瓜分，侵害了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后来，当提出抗议的人们了解董事会主席布伦特及其他一些董事悄悄卖掉了自己手中持有的部分南海公司股票，不满的情绪就更加强烈了，整个8月份，公众对南海公司董事会的批评指责愈演愈烈，与之相反的是，南海公司却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扮演“祥林嫂”的角色，不厌其烦地对投资者宣传说，他们在圣诞节获得的股票分红将高达三成，只要大家一直持有南海公司股票，人们在未来十二年将获得每年50%的回报率。[5]条件固然诱人，但事到如今，无论如何吹嘘，作用都极为有限。南海公司的股价在一路走跌，到了9月2日，股票的报价只有700英镑了。

股市发展到这一步，已足以引起所有人的警觉，在证券交易所内，人们对南海公司的股票议论纷纷，公众对于南海公司股票的虚高价格确信无疑。他们打听到，周围不少没有一次性付清股票款的投资者，至今仍然没能全额偿付。现在，这些尚未缴纳全款的股民已经蠢蠢欲动，想把手中的股票抛售掉。维系着南海公司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信誉”了，只要说服人们相信公司未来经营的前景，那么股票价格就一定能持续稳定下去。但现在，无休止的股票认购说服不了大多数人。一周之后，即9月8日，南海公司的董事们不得不召集全体股东召开了一次股东大会，整个会议向伦敦投资者开放，地点选择在商人泰勒的礼堂（Merchant Taylors' Hall）。[6]当天上午九点，按照英国人的作

息习惯，这算是一天中很早的时间，但礼堂大厅却是人满为患，连过道里都塞满了没法挤进现场的民众，这个景象，让南海公司的董事们想起了当年老百姓涌进股票交易中心认购股票的情景。[7]

会议的主持人约翰·费洛斯（John Fellows）爵士，同时也是公司的次级主管，此时起身向会场里的人们介绍召开这次会议的缘由——他当然不能将真实的原因和盘托出，只是彬彬有礼地向人们宣读了董事会近期的一些决议，并且向公众介绍了公司内部资金的配置情况，以显示公司财务的透明性，稳住人心。[8]在讲话结束前，费洛斯爵士照例为股东们描述了一番南海公司近期的发展战略和未来的美好蓝图。

接下来，秘书长作了一番简短的讲话，他在对董事们进行评价时用了不少溢美之词，并且满怀感情地向董事会致谢，感谢他们对公司富有技巧的管理。在他之后，轮到因为在众议院中经常鼓吹南海公司业绩而遭人白眼的亨格福德讲话了。这一次，他照例滔滔不绝地讲起大话，声称自己从未见过像南海公司业绩这么好的企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在南美殖民贸易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这么多利润丰厚的买卖。“我经常会见到股票价格的涨跌，这没什么奇怪。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一家公司能像南海公司做得那样好。公司的主管们为这个国家贡献得比国王、神职人员、地方法官还多，因为他们为议会里所有不同的党派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利益……通过股票市场，有钱人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财产，乡绅们看见自己手里的土地价格两倍三倍地上涨……总之，公司为整个国家带来了福利。”[9]

但是，亨格福德此刻心里比谁都清楚，这番脱口而出的高论到底是有凭有据还是信口开河。真实的情况其实对很多伦敦人来说已不再是秘密，自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南海公司常年只被允许有一艘船进入南美洲进行贸易。用一艘船来拉动英国在南美洲的整个贸易，是不是太可笑了？但亨格福德并不把自己的话当做笑话来看，他确实亲眼看见了公司创造的另一种“奇迹”：通过操纵股票价格，很多人发了财，财富在南海公司手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翻倍增长。相比从前的乡绅们死守着自己那点土地价值，现在的英国权贵们通过南海公司的股票，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富饶。

亨格福德话还没讲完，台下传来阵阵嘘声，人们对他这套华而不实的说辞早就听腻了。更多的人其实一直在怀疑，亨格福德这样在政府与公司两边通吃的高层为何每次都会猜中股价涨跌，赚得盆满钵满，还有

人说，其中肯定涉嫌内部的肮脏交易，只是咱们暂时无法举出有力的证据。就在人们议论纷纷时，波特兰公爵等人也附和说，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感到不满意”[10]。这时，公司董事会的其他成员，不顾在场听众的不满，竟然带头为这番虚伪的讲话鼓起掌来。

在董事会成员稀稀拉拉的掌声里，赶来旁听会议的人们觉得，这次从头假到尾的会议不会为公众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这实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南海公司的一场“个人秀”。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几项关于公司的决议，但是，公众表现出的冷漠让这些决议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会议当晚，伦敦证券交易所传来了一个令南海公司董事们失望的消息，公司股价持续下跌，已经跌到了640英镑。第二天，股票再次下跌了90英镑。

9月12日，在秘书长克莱格斯的恳请之下，南海公司的董事和英格兰银行董事之间再次召开会议。伦敦有人散布传言，在南海公司的劝说之下，英格兰银行同意为南海公司通融价值600万英镑的债务，这个消息一出，南海公司的股价在瞬间回升到670英镑，但董事们只高兴了一会儿。就在当天下午，当人们知道这则消息纯属无中生有，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之间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条款时，股价在瞬间再次跌落到580英镑。[11]此后，南海公司的股价几乎没回升过，直至跌落至100英镑为止。当时的伦敦证交所和咖啡馆，充塞着一种失落与恐慌的情绪，伦敦的报纸《每周通讯》作了如此的描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遭受损失的人们的抱怨，从前那些精神饱满骑马赶赴证交所的人士，如今只是无精打采地穿过街道，步行来到那里。”[12]第二天，英国议员布罗德里在给大法官兼上议院院长米德尔顿的信件中写道：“关于南海公司的董事们为什么会这么快就遭到灭顶之灾，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我毫不怀疑他们只要有利可图就会不择手段去做一切事情。他们将信用发挥、运用到了没有发展余地的地步，不可能对信用进行进一步的发掘了，以至于铸币数量已经无法支撑这种信用。”[13]

形势大坏，南海公司董事会在焦急中寻找着自我拯救的下一个办法。在几次开会无果的情况下，他们想到了一个人：沃波尔。在反对议会通过南海公司的计划失败后，沃波尔将大把时间留给了英格兰夏天的乡间，远离伦敦政经圈子的是是非非。但他毕竟是政府中人，恐怕连沃波尔自己也十分清楚，事情迟早会找上门来。

果然，南海公司很快找到了这位“敌人”，并请求他出手相救。沃波

尔对英格兰银行的影响力让南海公司决定请他“出山”。做什么呢？南海公司希望通过英格兰银行发行公司的债券。在经历了前面一次又一次失败之后，这可以说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沃波尔自知拗不过南海公司，于是答应帮忙。在他的斡旋下，事情有了转机，公司和银行分别派出了五名代表商议此事。[14]

英格兰银行凭什么愿意在此时搭救南海公司呢？精明的银行董事们从一开始就已经看出，出手救南海公司只能是徒劳，弄不好还会使自己卷入这场金融灾难，因此，他们三番五次声明，要和南海公司保持距离。但是南海公司消化了政府的大部分债务，于国家“有功”，因此虽然二者历史上一直是“宿敌”，但英格兰银行方面也不好断然回绝对方的要求，加上沃波尔在其中牵线搭桥，便促成了双方的会面谈判。

双方在费时的谈判后，并没有取得最后的一致，但还是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英格兰银行帮助南海公司发行总价值超过300万英镑的债券，为期一年，沃波尔当着众人的面把达成的条款简单记录下来，但在这一纸银行合同（The Bank Contract）上，具体事项和双方的交易金额等等沃波尔却空着没写。[15]他知道，无论是南海公司还是英格兰银行都需要时间。这次碰面以后，两家机构各自召开了内部的会议，进一步商讨合作发行债券的事宜。

9月22日英格兰银行的会议上，人们进一步确认了出手援救南海公司的决定，但理由却是“为了支持国家的公共信用”，与南海公司本身并无直接关系。第二天，双方再次见面，确定了这次合作的具体事项：南海公司370万英镑的债券由英格兰银行发行，公司将在第二年的3月21日、10月10日支付给银行应付的款项。债券的价值，暂定为400英镑。[16]尽管有些“半推半就”，但英格兰银行这次确实帮了南海公司一个大忙。

但南海公司就此可以高枕无忧了吗？恰恰相反，情况正变得更糟。在他们的债券计划向市民公布的时候，股价遭遇了一次更大的滑坡。悲哀的现实让公司董事们的绝望进一步加深：最后这针“债券强心剂”已然失效。而在协助双方签署协议的沃波尔眼里，这时的英格兰“每个人眼里都充满着失望”[17]。当然，要不是因为沃波尔，情况只会更糟，公众很可能会额外损失60%以上的金钱。[18]总之，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赔或赚的问题，而是赔多赔少的问题。即使精于数学计算的牛顿，也在南海公司股价大崩盘时大受损失。有一种说法认为，牛顿在当时赔掉的金钱，价值

至少相当于现在的100万美金。[19]以至于大学者牛顿说出了那句关于股票的名言："我能计算天体的运行，但却计算不了人们的疯狂。"[20]牛顿尚且如此，一般的英国投资者会赔成什么样，也便可想而知了。

黯淡的现实，让英国的金融界和政界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这不仅仅是关于南海公司股票的存亡的问题，更牵涉到整个金融股票市场给英国带来的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已逐渐演变为蔓延英国社会上上下下的不安情绪。如今，南海公司的高层只要出现在伦敦的街道上，就一定会有路人对他们进行围追堵截，遭到人们的辱骂与斥责。股市大挫败后，伦敦的犯罪事件也在日益增多。此时，南海公司无疑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而面对这场股市大崩盘，英格兰银行算是为南海公司提供了自己所愿意帮助的一切。看来，人事已尽，余下的只好交给上帝。人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眼看着这个硕大无比的南海泡沫，自行破灭。

议会再次召开

到11月初，以自由落体状下跌的股票让躲在汉诺威属地的乔治一世再也坐不住了，他匆匆动身赶回了英国。贪财的国王本人也是南海公司的股民之一。但当他赶回英国的时候，当初价值不菲的南海公司股票仅值210英镑，几天之后更是跌落到135英镑。和最高点时超过1,000英镑的股价相比，几乎相当于蒸发了九成价格。这给一般投资者心理带来的巨大落差和打击，怎样形容都不为过。因此，在万念俱灰之后，饱受股票摧残的人们向政府提出了抗议，希望英国议会及时召开，商讨解决的办法。[21]

这也是乔治一世赶回英国的目的之一——宣布再次召开议会。12月8日，议会召开，国王来到上议院致辞。乔治一世的发言难免一番客套用语在先，他向议员们述说自上次议会闭幕以来，英国又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人民生活过得如何幸福安康。不过，他随即话锋一转，提到了令众人揪心的国家公债和南海公司股票。

"尊敬的先生们，"他说，"我最殷切地向各位建议，希望大家能集思广益，尽快想出一个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国家信贷的问题，把债务一劳永逸地固定在一个基金上。我对此坚信，你们能够得到所有热爱这个国家的人的援助，特别是将得到这个国家的诸多伟大社团的帮助。我希望你们这一次能够牢记，你们的谨慎、性情、决心是解决我们不幸的最佳途

径，如果你们能够成功，这将会极大促进你们拥有的美名，尤其是当你们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还能解决掉部分国家债务的话，这种荣誉将更甚。”[22]

在乔治一世的致辞结束后，贵族议员对他作了如下的答复：“作为陛下忠诚的臣民，我等贵族因此聚集于议会，对陛下典雅的讲话致以感谢以作回应，并对于欧洲的总体和平致以祝贺。”客套之后，话归正题，“我们十分期望告诉陛下我们是多么急切地想要解决公共信用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向陛下保证，我们已经达成了进行这一工作的共识和努力。”[23]言下之意，议会对于南海公司的态度就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议会的辩论随即开始。

在商议关于“南海计划”的善后方案时，不少在南海公司股票上赔了钱的人都大肆斥责甚至辱骂“万恶”的股票交易。议员斯洛普（Slope）咬牙切齿说道：“目前的灾难完全可以归咎于股票交易这门邪恶的技艺。”他认为，正是股票交易让公众的利益受到了最大的损害。[24]众人附和着开始痛批股票交易的“邪恶”。正当人们骂得口沫四溅、兴味正浓的时候，议员希彭（Shippen）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虽然这次由南海公司股票暴跌造成的影响十分严重，“为了补救目前的这一不幸”，议会的介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忽视了公司之外力量的参与，因为“南海公司的经理们并不是罪行最深的人，因为在他们之上，还有负责监督他们、管理他们行为的人”。言下之意是说，南海公司带来的这场股灾，监管的部门和人员难辞其咎。希彭的这种看法，很快得到了其他议员的支持。[25]

请愿行为再次在议会下议院频繁地展开。来自兰开斯特、约克、德文郡等地的请愿者聚集到议会之外，高声呼喊着他们的口号。不过，现在人们不再准备向议员提出任何商业计划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变成了对南海公司的控诉。此时的南海公司，已被人们普遍视作英国这场经济灾难的始作俑者，因此要求议会公开调查涉及舞弊、幕后交易等行为的公司高管、议员和政府官员。[26]面对短短几个月间蒸发殆尽的财富，英国的普通股民将自己视为这场股灾最大的受害者。人们的悔恨和对金钱的痛惜很快化为了愤怒。

英国的股民一叫苦，法国股民就笑了。事实上，印度公司（密西西比公司）股价的暴跌在巴黎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远甚于伦敦。到1720年9月，南海公司正在和英格兰银行谈判之际，其股价已经跌到2,000里弗

尔，两个月之后，印度公司的股价仅价值1,000里弗尔。[27]比股价下跌更要命的是，银行券的贬值速度似乎更快。十个月前价值16万里弗尔硬币的银行券，在此时不过价值1,800里弗尔。慌了阵脚的法国政府几乎每隔三四天就会出台一项经济法令，以稳固银行券价格。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出台的法令越多，法国经济下滑的速度就越快，商人们越不愿意使用官方的银行券，即便冒着违法的风险，也要重新使用金银货币。情急之下，政府再次颁布法令："鉴于目前银行的混乱，摄政王决定，暂停银行券的支付。"[28]

实际上，当时的皇家银行并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这些银行券。严格来说，这家没有充分储备金的法国中央银行已经在1720年破产倒闭。约翰·劳几经周折搭建起来的金融帝国也随着股市的狂跌和持续的通胀成为一片废墟中的瓦砾堆，就像是昔日伦敦大火之后那焦黑破败的伦敦城。所不同的是，遭受这场"金融火灾"的巴黎看不见硝烟，可以看见的，是人们一张张绝望的脸庞和愤怒、压抑的表情。

数个月前，约翰·劳辞去了在政府中的显赫职位。但他仍然发觉巴黎市民对自己的敌意一天胜过一天，这令他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毕竟，这段时期人们愈发不满的情绪让巴黎街头的暴力事件陡然增多，成为名副其实的火药桶。约翰·劳为数不多的几次公开露面总是伴随着人们对他的辱骂和斥责。激动的人群每天都拥挤在国会大楼门口和皇家银行前，要求把不值钱的银行券兑换为金属货币。一次，由于人们过于拥挤，有十五个人甚至被挤死在那里。人们的愤怒化作了街头暴力行为，始终与"罪魁祸首"缘悭一面的他们为了泄愤，将约翰·劳的那辆大马车砸得稀烂。[29]约翰·劳见状惊恐万分，在夜里，他秘密会见奥尔良公爵，商讨自保之道。公爵早已对他失去了信心。在公爵的建议下，约翰·劳狼狈出逃，被迫离开了被他搅得天翻地覆的巴黎。

作为法国摄政王的奥尔良公爵会怎样看待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金融炼金术士"约翰·劳？失望、悔恨，还是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尽管约翰·劳曾当面向公爵解释说，这个糟糕的结局并非自己的原初设计，而是整个法国金融体系在运转中出现问题所造成的悲剧，但我们还是能从公爵母亲的一封信中看出公爵对约翰·劳的真实态度。在那封信里，公爵母亲写道："我时常希望，所有这些银行券仅仅存在于万劫不复的地狱。它们给我儿子带来的麻烦远远大于安慰。现在法国人都已经一文不名……我的儿子过去享有很高的声望，但是自从这个天杀的约翰·劳来了以后，他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憎恨。每个星期，我都会收到满含骇人威胁的信件，以及将他描绘为一个暴君的言论。甚至有一封信扬言要毒死他。我把信拿给他看，他却只是大笑……”[30]

可以说，在对待约翰·劳和金融泡沫的问题上，奥尔良公爵比他周围的人更看得开。然而，当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最终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灾难性局面时，极为相信约翰·劳的公爵忍无可忍，将这尊瘟神赶出了巴黎。在1720年12月的寒风中，约翰·劳化名为扎町先生（M. du Jardin），遁离巴黎，来到了布鲁塞尔。第二年年初，他又游历到威尼斯，之后辗转于欧洲。[31]在欧洲待了一段时间后，约翰·劳又回到英国的土地住了四年，之后移居威尼斯，1729年死于肺炎。他的晚景，甚为凄凉。

然而，约翰·劳离开以后的巴黎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投资者和商人们的叫苦不迭仅是最浅显的表象，法国经济的整个大衰退才是问题的实质。这一点可以从里弗尔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巨幅贬值体现出来。据统计，印度公司的股票在1720年1至9月贬值了大约一半的价格，而里弗尔兑换英镑的汇率，更是下跌了三倍多。[32]法国人被强制使用的纸币对内对外双向贬值，财富凭空蒸发，而他们寄以厚望的股市最后证明只是一场骗局。走投无路的他们对统治者和约翰·劳这样的经济学者产生强烈的怨恨，乃是非常合理的一种情绪。相比之下，遭受经济损失的伦敦市民虽然也是对南海公司的头头们恨之入骨，但由于他们的国家未采用约翰·劳式的纸币系统，因而泡沫破灭为整个国家经济带来的打击，虽然剧烈，但却并非致命。较之法国，英国人算是不幸中又有侥幸。当然，南海公司股价下跌速度比印度公司快得多，泡沫的破灭带给英国民众更直观的冲击，因此，英国人的绝望与愤怒并不比他们的法国难兄难弟少。伦敦和巴黎，已然成为欧洲的两座“悲情城市”。



1720年12月法国经济崩溃之后，约翰·劳仓皇逃出巴黎，被当时的讽刺画家描绘为一位骑着毛驴的滑稽人物。

最后的审判

人们对股票的热情像英国的天气一样一天天冷却下来，而对南海公司的不满却愈发强烈。不少英格兰乡绅赔得一干二净。人们的怨言和不满需要一个渠道表达出来，议会作为主要的代议机构，无疑首当其冲。当时，一位乡绅给他担任议员的朋友写信抱怨自己投资蚀本的经历：“S先生彻底说服了我，并让我相信，三个月内我肯定会从投资的金钱中获得两倍的利益。我向我的妻子征询意见，她和我持有相同的见解。”[33]这位天真的乡绅，在该年秋天的一次聊天当中听信来自伦敦朋友的劝说，购买了南海公司的股票。他的这位伦敦友人向他拍胸脯许诺，南海公司的股价将会上涨到1,500英镑。但是，当冬季来临时，他手中的股票不仅没有升值，反而只价值原先许诺金额的1/10左右。

这便是当年英国投资者众多悲剧中的一个。乡绅们尚且如此，城市里的中小股民们遭受的损失只会更重。股价的骤跌让他们猝不及防，等这些人回过神来，一切为时已晚，他们手中的南海公司股票已变成一叠叠废纸，甚至连废纸都不如。当时的伦敦证交所和咖啡馆，人们往日的

狂热与对金钱的渴望荡然无存，剩下的是无尽的懊悔与愤怒。恰如一位历史学者的反讽之言：“1720年绝对是值得注意的一年，因为这份非同寻常的、浪漫的计划，它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年份。”[34]

对岸巴黎人的愤怒和怨言显然点燃了伦敦人心头埋藏的愤怒，这才是真正“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年份”的事情。陷入绝望的人们不禁质问道：我们如今赔得一干二净、家徒四壁，不就是因为当初听信了你们这帮辉格党议员和南海公司高层的谎言吗？甚至有部分激愤的市民扬言应该把南海公司的一些董事当众吊死。[35]人们此刻最希望的事情是找议会讨个说法。一些贵族股东们倒是在大限来临之前套现上岸了，但民众却在相信了虚假的承诺之后一个个全成了穷光蛋。民愤不小，随时可能造成社会动乱。这一点，回到伦敦主持议会的乔治一世心头不可能体会不到。

再说，之前曾经为伦敦的股票市场大唱赞歌的报纸和杂志，此时也幡然醒悟。赞颂和吹嘘再也没有了，舆论一片倒戈。读者看到的是股市泡沫后一座真实而萧索的伦敦城。《伦敦日报》如此写道：“在交易所大街有着无以复加的惊恐。那些犯有不正当行为的人们，恐惧和彷徨深深地侵袭着他们……那些想方设法将穷人们欺骗到这场灾难之中的人，难以抹去的污点将让他们变得声名狼藉。因受骗而使得财富毁于一旦的穷人们将对这些人致以最强烈的责骂、威胁和恶毒的诅咒。”《每周报》则评述南海公司的董事说：“这些人曾经过着如此不诚实的生活，以后，他们也不可能换一种方式生活。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不久又会出去掠夺。”[36]伦敦的报纸似乎在为人们的愤怒煽风点火，就像当初它们不遗余力激发人们对股票的热情那样。

和报纸试图告诉人们的事实一样，英国政府的信用已经崩溃，金融泡沫的破灭，甚至撼动了社会稳定的根基。英国政府坐不住了。法国政府在泡沫善后处理中，驱逐了约翰·劳，经济问题上处处以法国为参照物的英国政府似乎也要在处理善后问题上拿出强硬的手腕，否则难以服众。来自英国民间各个城市、郡县、自治镇的人们纷纷涌进议会请愿，要英国议会挽救南海公司的换股计划为他们带来的不幸。[37]其声势之浩大，让统治者感觉有如芒刺在背。因此，在12月召开的议会上，经过商议，议会决定开始对南海公司彻底调查，而且也表示要抓捕几个“典型”，杀鸡儆猴。

这时，一位名叫莫尔斯沃斯的贵族（Lord　Molesworth）甚至发言

说，议会没有现成制定的法律制裁炒卖股票的南海公司董事会，就好像过去的罗马帝国没有制裁弑父罪名的法律，那是因为人们无法想象会有人犯下弑父的罪行。如今英国的情况也一样，之前从来没有人会想到南海公司的人员会欺骗英国大众。他认为，南海公司对英国公众犯下的罪行不啻为一次对大众的“弑父”，因此，他希望仿效罗马人惩治弑父罪名的手段，将涉嫌犯罪的公司高管五花大绑，沉于河底。[38]这番言论，虽有过激之嫌，但布伦特和他的同僚们感到，这一次，英国议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变了过去友好的角色，成了他们的敌人。[39]对议会受贿情况的调查就此开始。议会决定选举出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南海公司的账本和票据。

Lucipher's new Row-Barge.

随着南海公司股价的骤跌，金融泡沫破碎，人们对南海公司的愤怒暴涨。这是18世纪一幅关于南海公司的讽刺画，画中站立者为南海公司总出纳，魔鬼在为他划船。

12月15日，南海公司的副主管向议会递交了供调查的材料，内容包括从1719年年底以来的公司账本、票据等等。数天之后，议会为第二年海军军费来源以及国债问题做了讨论。人们达成的共识是："除了防止声名狼藉的炒股行为，没有什么事情比重塑国家信用更重要了。"[40]沃波尔、杰凯尔、斯洛普、哈奇森等议员主张立即开始行动。杰凯尔甚至说，南海公司的管理者们造成如今英国政府的信用岌岌可危，当务之急是要重树公平的市场法则，照顾到债权人的利益。[41]这条建议得到众人附议。

沃波尔在12月21日将他的提案送交至议会，商讨国家债务的新解决方案，他建议英格兰银行与东印度公司分别消化南海公司伤痕累累的股份。这个建议在议会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不过，议员们显然对如何对南海公司作出调查和惩处更为关心。杰凯尔提出建议说，在整件事情水落石出以前，应该限制南海公司的主管、董事、出纳和秘书等等一干人员的行动，禁止他们离开英国。[42]对此，议会中有不少人士表示支持，之后还获得议会同意上升为法律。同样在这一天，议会的特别委员会正式成立，成员包括莫尔斯沃斯、杰凯尔、斯洛普等主张彻底调查南海公司的议员。

直接负责对南海公司进行审计调查的是查尔斯·斯奈尔（Charles Snell）先生，一位英国的职业会计师。他由议会的特别委员会任命，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介入到这次为南海公司查账的行动中来。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雇佣独立第三方会计师对上市公司进行调查。[43]斯奈尔受到特别委任而奉命调查大众公司之举，也在客观上为英国日后的注册会计师（Certificate Public Accountant）制度树立了楷模。我们亦可以认为，英国的第一位注册会计师便是这位斯奈尔先生。

事实上，敬业的斯奈尔也很对得起自己作为第三方调查者的"独立"态度，对于查账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他决不隐恶，如实汇报给了议会。随着他的调查一步步深入，越来越多的真相暴露在众人的眼皮底下。

1721年年初，斯奈尔向议会递交了他的调查报告。他发现了南海公司和一部分议会议员之间的权钱交易和腐败细节。不过，也有不少牵涉其中的关键人物在议会进行调查之前，就已经脚底抹油，逃之夭夭。[44]例如，南海公司的出纳在斯奈尔开始调查后不久，做贼心虚的他就乘人不备逃离了自己在伦敦的住所，乘船渡海来到了法国加莱。[45]英国政府

随即对他下了逮捕令。

当然，既然有逃得掉的，肯定就有逃不了的，不少涉嫌的议员和南海公司成员都不得不接受议会的质询和特别委员会的调查。比如，与南海公司勾结谋取私利的财政大臣约翰·艾思拉比的女婿沃勒尔，就受到了委员会的仔细审查。没过多久，布伦特也成了人们的调查对象。他被带入议会中，调查委员会的人问他是否有向议会议员或政府人员私下出售过公司的股份。布伦特最初拒绝回答，但在议会的坚持下，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有过这样的行为，当被问到这一切是否经过公司董事会的商议、合乎规定时，他则哑口无言。[46]

布伦特在议会里吐露真言后没过多久，南海公司的董事被传召至议会下院。颇具戏剧性的一幕是，下院议员们把议会大门深锁，并将钥匙摆在议会辩论席的桌面上。议员们宣称，他们已经“发现了一连串最严重最恶毒的欺骗行为。在恰当的时候，他们会将这些罪行呈现于议会”[47]。这句话，令许多人听了以后不寒而栗。经过表决，布伦特本人的财产被充公，仅仅为他留下5,000英镑。他还被强制离任南海公司的职位，离开伦敦。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海公司不为人知的黑幕被人层层揭开。调查者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假账和错账，不少资金的来源和去向均不明，并且南海公司的人员对于议会调查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不合作，这令议会调查委员会十分恼火。[48]公司董事和议会议员们的肮脏交易立即以最难堪的方式赤裸裸地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几个月前还为股票如痴如醉的英国人这才恍然大悟，股票这潭水到底有多深。经议会查证，在南海公司正式进行股票认购之前，公司董事使用了574,000英镑的股票，其中绝大部分被用来贿赂议会人员，以便南海公司的换股计划能够通过。[49]这在公司和议会里早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调查过程中，众人向议会举报关于议员贪污腐败的内情，其涉及面之广可谓前所未有。艾思拉比成为最大的替罪羊，他被查出在换股计划和南海公司第二次股票认购期间收受贿赂，帮助换股计划获得议会通过，并在第二次认购时私自让南海公司增加了50万英镑的认购金额，并且从这次认购中获利80万英镑。[50]议会对他的惩罚毫不手软，艾思拉比很快被驱逐出议会，关进了伦敦塔监狱，并且根据刚刚生效的规定，他在一年之内不得离开英国国境。下议院宣布他的罪状为：“直接参与对这次毁灭性的南海计划的鼓励与宣传，并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外谋求钱

财。勾结南海公司的主管，损害了国王臣民们的利益，破坏了政府的公共信用以及王国的贸易。”[51]

艾思拉比的被捕很是让人民高兴了一阵子，此之不足，议会又将卡斯沃尔等人驱逐出了议会。另外，帮助南海公司在议会中打通关系的邮政大臣詹姆斯·克莱格斯也受到了审判。不过，克莱格斯在对他罪行的调查之际畏罪服毒自杀，他的儿子也在不久后死去。[52]有些伦敦人认为克莱格斯、艾思拉比都是恶贯满盈的大坏蛋，虽百死不能谢罪。如今，他们自吞苦果，总算是除了人们心头一口恶气。于是，在伦敦的街头，有人用木柴点燃了篝火。激动的人群围着火光载歌载舞，在伦敦的街道上上演一出狂欢的盛会。[53]或许，人们为股票所激发的那种狂热情绪还未退去吧，在南海泡沫破灭后，这种幻灭的情绪又找到了另一个承载体——惩罚与股票有涉的人所带来的狂欢。

在整个英国议会，调查出1720年持有南海公司股票的议员数量高达450人，贵族当中持有南海公司股票者，超过120人，桑德兰伯爵、肯达尔公爵夫人、斯坦诺普等贵族也被查出与南海公司的腐败案有涉。南海公司对于英国议会和政府，其“渗透”不可谓不深。老百姓对于南海公司和欺诈横行的股票市场也就愈加愤恨。

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结局

然而，尽管调查出的事实是“公司通过非法购买和出售自己的股票，抬高股价”，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泡沫破灭后，收受贿赂的官员，表面上受到了严惩。实际上有很多人被‘保护’起来，不受法律的惩罚”[54]。并且，“南海公司的每一位董事都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审讯。这些董事的总财产达到2,014,123英镑，其中一共没收了1,659,523英镑的财产，以便对他们为大众造成的不幸予以补偿”。[55]根据每位董事的行动和情况，各人都获得了一定的剩余财产，以便他们能够重新开始生活。那些牵涉得不那么深的人，处理的时候就宽大得多了。

似乎这就是整个故事的结束：随着政府信用的破产以及人们为之所能做的补救，南海泡沫丑闻就此告一段落，议会也说得上尽了自己的责任，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惩罚。但是，股民们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当时，其实有不少人希望彻底没收南海公司董事的财产，最后的判决显然离此有段距离。并且，无论对南海泡沫事件中为膨胀的股价推波助澜的

那些议员们如何惩罚，股民自己的经济损失也不可能挽回。本应代表全民利益的议会议员为了一己私利，公然与贵族操纵的泡沫公司勾结，利用卑鄙的手段在议会里通过了南海公司的股票方案。这无非告诉了人们，当时议会里的暗箱操作和权钱交易的伎俩实在太多，而且这种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英国的普通民众对于南海泡沫的善后工作，可以说并不满意。

为什么审判结果如此不尽如人意？这根本上源于英国的贵族寡头政治。荷兰历史学家皮尔·弗里斯在谈到18世纪英国的政治状况时认为，尽管英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议会政治的改革，但“从政治层面上讲，英国社会仍然处于贵族和金融资本的掌控中……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即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英国人不享有政治权利，保守的精英阶层仍然非常强势”。[56]英国的贵族势力长期把持着议会政治和国家经济命脉，一般民众难有实际参与政治的机会。这次对南海公司的审判，自然也不可能出于对平民百姓利益的考量。处理结果与大众的预想有所距离，也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英国议会却不乏有人对南海公司的这桩案件感到十分高兴，甚至从中直接获利。当初那位带头反对南海公司的沃波尔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在牵涉南海公司一案的人一个个被带到议会接受审讯和调查的时候，他就在议会表示：“就个人而言，我从来没有支持过南海计划，并且敏感地觉察到，这项计划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不幸。每个正直的人都负有这样的义务，那就是要设法从灾难中挽救这个国家。根据这个观点，我对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虑。”沃波尔当然不只是嘴上说说，他提出的议案很快在议会里引起了讨论。[57]不过，这类议案并不是议会的当务之急，当时的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在于议会应该如何惩治南海公司的舞弊行为和议员们的腐败。人们被点燃的愤怒令关于国家债务和政府信用的讨论在议会中一直悬而未决。

从他早年对付政敌罗伯特·哈利的手段就不难看出，沃波尔是一位头脑精明的政治家，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往往离不开政党利益和政治权衡。因此，在人们的不满愈发强烈、严惩议员和南海公司的呼声愈加高涨的时候，他更倾向于以一种较为温和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因此，他想方设法保护在辉格党政府中地位显赫的桑德兰伯爵，虽然伯爵也牵连进了南海公司的非法股票交易，但出于政治稳定之计，沃波尔显然不希望南海泡沫事件撼动整个辉格党在英国议会的地位。因此，他又开始在

议会中施展自己左右逢源的辩才，一边为国王说话，一边也为辉格党议员和部分南海公司董事斡旋。

在这一届议会闭幕的致辞上，国王乔治一世说道："为这场由于糟糕的南海计划所造成的大灾难进行亡羊补牢是很困难的。但我仍然欣喜地看到，公共信用现在开始逐步恢复了。这给了我很大的希望，我认为它很快就会完全恢复。我十分同情受到伤害的无辜者，也对犯罪者感到很愤慨。我准备同意你们递交上来的议案，用来惩戒我们不幸的始作俑者。"[58]这时候，距离南海公司股票价格的突然下跌，已将近一年。

国王对于故事的结局似乎比较满意，毕竟，这次"几乎毁了汉诺威王朝"的金融危机着实让国王和大臣们捏了把冷汗。所幸有惊无险，国家信用虽然跌至谷底，但至少英国没出翻天覆地的大乱子。而关于政府的债务，政府索性直接拒付了一部分，其他的部分也经过一番周折找到了偿还的方法。因此，后世有学者认为，其实在这场风波中最后的获胜者，首先是英国政府。[59]而那位从踏入政坛开始就与南海公司有不少恩怨的沃波尔，凭借在处理南海泡沫的立场和手段，获得了不少英国人的信任。或者说，与南海公司之间的这一段故事反倒成了他的政治资本之一。1721年4月，他被委任为第一财政大臣和下议院首脑，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后人也把这位精明能干的政治家视为英国的第一任首相。第二年，那位既被他保护、又被他视为权力途中拦路石的桑德兰伯爵去世，沃波尔乘机排挤上下议院中自己的政敌，任用了一批亲信，在他的努力下，辉格党的政治地位没有因为泡沫的破灭而立刻崩塌，反而更为巩固。

所谓几人欢喜几人忧，这场金融泡沫无疑让一些人获益，却让另一些人倾家荡产；有人因为这次震撼世界的金融泡沫而身败名裂，也有人凭借它获得了权力。约翰·劳和布伦特等人的金融梦想随着泡沫一起破灭，同时蒸发的，还有数不尽的社会财富。沃波尔利用这一事件为自己塑造了光辉清廉的形象，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实际上，沃波尔本人并不"干净"，他当初并不是没干过假公济私的勾当。并且，他还曾每年从国库里额外支付巨款给国王乔治一世，以博其欢心。当政之后，他公开用现金收买议员，卖官鬻爵，培植私人势力。[60]表面上光风霁月的沃波尔实际上并非善类，小说名家菲尔丁曾撰写《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一书，以面善心恶的魏尔德讽刺沃波尔。

对于英国的大众而言，南海公司带给他们的只是一段苦涩的时光，

因此，南海公司的股票也被人称为“这一切不幸的最大发明者和促进者”[61]。这种“不幸”可以说是那个大时代投射在人们内心的一个缩影：整个英国社会平静的表象掩盖着一种变革和躁动的暗流，某些时刻，这种躁动不安的情绪也会以最直接的方式宣泄出来，化作人们对金钱的迷狂。在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无所适从的人们选择了金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这个选择最终为他们带来的却是欺骗、绝望以及绝望之后无奈的一声苦笑。当年，“能够为面包写作”的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用他的诗行记录下了这苦笑的袅袅余音：

> 天助纸通货，那最后的最好的财源！
> 有了它，腐败便能高飞展翅！
> 黄金如添翼，所向皆披靡，
> 国家入囊中，君主呼来去；
> 区区一纸把大军来调遣，
> 或将议员送往遥远的海岸；
> 如西伯的叶子，一片就能操纵，
> 我们的命运财产，使之飘摇随风；
> 内藏千百隐秘交易和勾当，无声无臭，
> 便卖掉某位国王，或买下一名王后。[62]

注释

1 John Harold Plumb, Sir Robert Walpole, Vol. 1, Allen Lane, 1972, p. 312.

2 William Cobbett,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7, R. Bagshaw, 1811, p. 662.

3 Malcolm Balen, A Very English Decei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First Great Financial Scandal, Fourth Estate, 2009, p. 146.

4 Walter L. Arnstein, Recent Historians of Great Britain,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4.

5 Thomas Doubleday, A Financial, Monetary, and Statistical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Revolution of 1688 to the Present Time, E. Wilson, 1859, p. 92.

6 Robert Chambers, Book of Days: A Miscellany of Popular Antiquiti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lendar,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4, p. 147.

7 Rapin de Thoyras, The History of England, Vol. 4, J. and P. Knapton, 1747,

p. 623.

8 同上，p. 624 .

9 Lewis S. Benjamin, South Sea Bubble, Ayer Publishing, 1967, p. 118.

10 William Cobbett,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7, R. Bagshaw, 1811, p. 666.

11 同上，p. 669 .

12 Malcolm Balen, A Very English Decei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First Great Financial Scandal, Fourth Estate, 2009, p. 149.

13 Charles Mackay, 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Office of the National Illustrated Library, 1852, p. 105.

14 William Cobbett,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7, R. Bagshaw, 1811, p. 670.

15 同上，p. 671 .

16 同上，p. 674 .

17 William Cox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Administration of Sir Robert Walpole, Earl of Oxford, Vol. 1, Printed for T. Cadell, jun. and W. Davies, 1800, p. 235.

18 Douglas E. French, Early Speculative Bubbles and Increases in the Supply of Money,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10, p. 101.

19 牛顿在1727年临终之时，依然持有1万英镑的南海公司股票以及5,000英镑的年金。在1722年，他曾经要求公司支付给他股票的利息。此外，在南海泡沫破灭后，牛顿并未停止股票交易，还继续购买过东印度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票。详见Jim Nightingale, Think Smart-Act Smart, John Wiley and Sons, 2007, p. 29以及Derek Gjertsen, The Newton Handbook, Taylor & Francis, 1986, p. 552.

20 Zach C. Ivey, Truly Rich, Xlibris Corporation, 2006, p. 110.

21 William Cox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Administration of Sir Robert Walpole, Earl of Oxford, Vol. 1, Printed for T. Cadell, jun. and W. Davies, 1800, p. 236.

22 SPEECHES and DEBATES In the Sixth Session of the First Parliament of King George I.，见British History Online网站，http://www.british-history.ac.uk/report.aspx?compid=37725.

23 William Cobbett,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7, R. Bagshaw, 1811, p. 679.

24 Helen Julia Paul, Politicians and Public Reaction to the South Sea Bubble: 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 Economic Division Working Paper, Uinversity of Southampton, p. 6.

25 SPEECHES and DEBATES In the Sixth Session of the First Parliament of King George I.，见British History Online网站，http://www.british-history.ac.uk/report.aspx?compid=37725.

26 Helen Julia Paul, Politicians and Public Reaction to the South Sea Bubble: 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 Economic Division Working Paper, Uinversity of Southampton, p. 7.

27 Robert P. Flood, Peter M. Garber, Speculative Bubbles, Speculative Attacks, and Policy Switching, MIT Press, 1994, p. 43.

28 John Francis, 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ts Times and Traditions, From 1694 to 1844, New York, 1862, p. 64.

29 同上，p. 65．

30 Washington Irving, The Crayon Papers, Echo Library, 2007, p. 50.

31 John Philip Wood, Memoirs of the Life of John Law of Lauriston, Printed for A. Black, 1824, pp. 164-165.

32 Douglas E. French, Early Speculative Bubbles and Increases in the Supply of Money,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10, p. 70.

33 Rosemary O'Day, Cassandra Brydges, Duchess of Chandos, 1670-1735, Boydell Press, 2007, p. 33.

34 John Francis, 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ts Times and Traditions, From 1694 to 1844, New York, 1862, p. 67.

35 William B. Dana, The 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 Vol. 49, F. Hunt, 1863, p. 199.

36 John Francis, 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ts Times and Traditions, From 1694 to 1844, New York, 1862, p. 74.

37 Samuel Griswold Goodrich, Lights and Shadows of European History, Bradbury, Soden & Co., 1844, p. 168.

38 William Cobbett,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7, R. Bagshaw, 1811, p. 683

39 Peter M. Garber, "Famous First Bubbles"，原载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4, No. 2, Spring, 1990, p. 51.

40 William Cobbett,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7, R. Bagshaw, 1811, pp. 687-689.

41 同上，p. 691．

42 同上，p. 693．

43 Michael Jones, Creative Accounting, Fraud and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candals, John Wiley and Sons, 2011, p. 119.

44 Tommie W. Singleton, Aaron J. Singleton, Fraud Auditing and Forensic Accounting, John Wiley and Sons, 2010, p. 4.

45 William Cobbett,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7, R. Bagshaw, 1811, p. 707.

46 同上，p. 704．

47 同上，p. 708．

48 Charles Mackay, 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R. Bentley, 1841, p. 125.

49 William Russell, The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Vol. 5, Printed for G. G. J. and J. Robinson, and A. Hamilton, 1789, p. 16.

50 John Francis, 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ts Times and Traditions, From 1694 to 1844, New York, 1862, p. 76.

51 Helen Julia Paul, Politicians and Public Reaction to the South Sea Bubble: 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 Economic Division Working Paper, Uinversity of Southampton, p. 5.

52 Jerry W. Markham,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M. E. Sharpe, 2002, p. 99.

53 John Francis, 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ts Times and Traditions, From 1694 to 1844, New York, 1862, p. 77.

54 Catherine Ingrassia, Authorship, Commerce, and Gender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a culture of Paper Credi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78.

55 William Cox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Administration of Sir Robert Walpole, Earl of Oxford, Vol. 1, Printed for T. Cadell, jun. and W. Davies, 1800, p. 261.

56 皮尔·弗里斯：《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苗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pp. 17-18．

57 William Cox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Administration of Sir Robert Walpole, Earl of Oxford, Vol. 1, Printed for T. Cadell, jun. and W. Davies, 1800, p. 244.

58 同上，p. 270．

59 Douglas E. French, Early Speculative Bubbles and Increases in the Supply of Money,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10, p. 102.

60 萧乾：《菲尔丁——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pp. 2-4．

61 Pat Rogers, The Alexander Pope Encyclopedi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4, p. 37.

62 蒲柏本人直接参与了伦敦的股票交易，并曾劝说友人购买南海公司的股票。他一度称股票投机的时代为“充满希望和黄金山的时代”，但最终的泡沫破灭让他难逃财富梦碎的结局。详见Pat Roger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lexander P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76-178.

第十章　泡沫之后

——泡沫经济的历史依然在延续

《泡沫法案》的命运

或许有人认为，给人们带来如此痛苦、造成如此巨大财产损失的南海公司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南海泡沫事件的确影响到了英国公众对股份公司的信赖感，也降低了人们对股票和股份公司的热情。据统计，在议会对南海公司内部进行调查的1721年，伦敦的股票行情表上列有8家公司，1745年为7家，1775年6家，1800年5家，1810年4家。[1]但是，南海公司岿然不动，屹立不倒，堂而皇之地继续存在着。从乔治一世的儿子乔治二世开始，英国18、19世纪的历任君主均是南海公司名义上的主管。英国政府一如既往地支持着这家由皇家授权的公司。1724年开始，南海公司决定经营捕鲸业，并获得了英国政府的同意。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经验和专业人士，南海公司经营捕鲸业八年后亏损17万多英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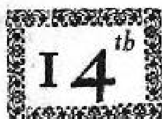
即使如此，英国政府对南海公司的支持却是一如既往的坚定，各种经济上的优惠政策依然眷顾着南海公司。公司依然是政府年金的持有者之一，而且获允出售年金，这让它逐渐又恢复了商业信用。[2]公司对南海贸易的垄断一直持续到1806年，而公司的票据交易业务一直未曾停歇。直到1855年，南海公司才寿终正寝。[3]读者或问，南海公司犯下如此惊天大错，何以“东窗事发”之后依然屹立不倒？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那一纸早获得通过的《泡沫法案》赋予其英国皇室的“高贵”身份，不可能说关门就关门，而其他民间公司几乎没有机会获得政府认可，也不可能与被授予执照的公司相抗衡。

南海公司、东印度公司等等获得政府支持的商业机构，和英国政府脱离不了关系，按今天的标准，可以将它们理解为英国的“国有企业”。南海泡沫破灭之后，受到议会认可的《泡沫法案》并没有被废除，相反，欺诈横行的股市让人们对股份公司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敌视。因此，《泡沫法案》在英国接下来的百年历史中一直伴随着人们对股票、股份公司的戒心与敌视。如果说法律与社会良知代表着“善”，那么股份公司

无疑就代表着“恶”。《泡沫法案》向当时的英国人宣示着，这种“恶”必须受到限制。

我们知道，1720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所谓《泡沫法案》，其初衷并不是为了限制泛滥的民间泡沫公司，而是南海公司借以打压竞争对手，好让自己“一家独大”。而且，当民间的股份公司被剥夺了自由存在的权力之后，获得政府颁发的执照就成了建立商业公司的必由之路，这无疑为政府创造出了新的寻租空间。[4]但讽刺的是，南海公司的丑闻曝光以后，这部原本“非正义”的法案却被用来充当“正义”之用。这场大股灾给英国人带来了惊人的经济损失和剧烈的心理冲击。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现代金融市场的蛊惑力和破坏力，并且明白了，一个贪婪与欺诈横行、缺乏必要的法规监管的市场，灾难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爆发。在这样的情况下，《泡沫法案》派上了用场。

不过，这份法案毕竟在法律效力上颇多瑕疵，因此在大多数时候，它给人们带来的仅仅是心理上的警示作用，并不能有效地阻止金融泡沫的产生。只有在1722年的一次案件中，有直接使用这项法案的记录。当时，也是一家股份公司向英国人宣传说自己将拓展北海（North Sea）地区的贸易，用以促进政府的财政收入云云。该公司所使用的那一套说辞，完全可以称得上当年南海公司的翻版。这一点很自然地招致了不久前受到南海公司欺骗的人们的反感，最后这项商业计划因为《泡沫法案》的阻碍而未能取得“皇家执照”，也无法付诸实践。[5]



No. South-Sea Annuities at 4 per Cent.

Mr. CONRADE DE GOLS,

SIR, YOU may pay on the 13th Day of May, 1730. To the Sum of for Half a Year's Annuity, at 4 per Cent. per Annum, on the Sum of Interest or Share in the Joint-Stock of South-Sea-Annuities, Erected by Act of Parliament in the Ni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His late Majesty King George, made for dividing the whole Capital Stock of the South-Sea-Company, into Two equal Parts or Moieties, and for converting one of the said Moieties into certain Annuiti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Members, &c. and attended with Annuities, not exceeding the respective Rates therein-mentioned, which became due on the 25th Day of March, 1730. and take a Discharge on the Back hereof. South-Sea-House the 30th Day of April, 1730.

Exad

1720年以后，南海公司依然是政府年金的持有者之一。图为1730年的南海公司年金通知单。

这乍看起来或许是一件好事。《泡沫法案》成功地阻止了一项有可能成为“南海公司第二”的经济计划，岂不是为民免遭无良商人欺骗的正义之举吗？不过，这可以说是个案中的个案。更为普遍的情况是，人们对股份公司的疑惧在很长时间里并未减退，这种疑惧又伴随着《泡沫法案》对股份公司的限制，以至于当时的企业家们无论是自愿还是被动，都开始组建一些类似“家庭公司”式的商业组织，而不再选择合作制或股份制来组建联合的商业机构。[6]联合经营的模式，是众所周知更为高效的商业模式，如今因为一纸法令的限制使得企业家对于公共持股公司缄口不谈而回到了作坊式的商业形态，这很难被视为是一种进步。

在105年的时间里，《泡沫法案》的阴影一直笼罩在英国的土地上，公司的“国营化”一直是商业公司的主要形式，民间公司则被视为“异类”。在法案生效后，所有无皇家执照的公司被禁止进行股票交易，继续从事这些公司股票交易的经纪人也将被处以500英镑的罚款。[7]当然，后世史家对于法案的法律效力见解各异，并且，法案中对“意欲进行公司行

为”的法律定义实际上也没有给予英国法官们在判案时任何的有效支持，甚至被评为“史上最不准确的法规措辞”[8]。然而，无可辩驳的一点是，敌视民间股份公司的态度已然透过这项在法律上漏洞百出的法案，成为了当时英国的一种“经济文化”。甚至英国在遥远美洲大陆的殖民地，也不知不觉受到了宗主国这种文化的影响。

然而，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来禁止民间公司，人们对于金融泡沫的顾虑是否太杯弓蛇影了一些？俗话说，不能将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依靠欺诈敛财的股份公司固然应该取缔，但借此用“国家”二字打压民间资本，则属于利用受害者的感情进行借题发挥。而实际上，就在英国人沉浸在南海公司的惊天骗局并且抵制大部分股份公司时，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悄然而至了。

这个漫长的过程开始于一系列被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发明：1733年，英国兰开夏郡的机械师约翰·凯伊发明了纺织机“飞梭”，其子在父亲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良，由是大大提高了织布速度，棉纱顿时供不应求。1765年，同样出生于兰开夏郡的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大幅度提高了棉纱产量。“珍妮纺纱机”的出现在棉纺织业中引发一系列技术革新的连锁反应，因此，这个发明被视为工业革命的序幕。18世纪后半叶，苏格兰人瓦特制成的改良型蒸汽机一经投入使用就得到迅速推广，大大推动了机器的普及和发展。人类“蒸汽时代”的核心动力植入了生产过程中。随着工业生产中机器生产逐渐取代手工操作，大大小小的工厂在英国境内拔地而起。到1800年前后，英国“在制造业领域和交通领域的各种工具都被发明出来并被使用”[9]。至此，机器生产基本取代了过去的手工业生产。英国，这个偏处一隅的海上岛国，成为世界第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工业的长足进步使得欧洲的商品贸易，尤其是纺织业，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十分迅速。商业贸易与工业生产，历来是相互助推的两种因素。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出口已经是世纪初期的2.5倍，此外，“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的棉纺业产量增加了10倍，炼铁工业的产量增加了4倍”[10]。虽然经历了生产和技术上的大发展，但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依然沿用着老旧的《泡沫法案》，这显然已经不适应新经济形势的需要。[11]这项法案似乎逐渐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在南海泡沫破灭后的很长时间内，英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一直为浓重的“保守主义”所笼罩。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议会中的寡头政治为保守思

想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另一方面也由于法国大革命以及与拿破仑的大战让英国人深刻体会到了激进的暴力革命所带来的苦果。因此，这段时间，英国的历任首相都在政治上小心翼翼，取代辉格党执政的托利党也一直以保守谨慎的形象示人。来自欧洲的动乱与不安让英国的保守主义者们感受到，“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之所以维护现行制度，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证明了它们具有实用的功能，因此，如果让这种体制消失，很可能会给人们带来危害和难以预计的结果”[12]。《泡沫法案》延续一个世纪，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归因于当时议会中的保守主义思想。



使用新机器的纺纱车间。

不过，政治上秉持“保守主义”的英国，并没有限制人们在思想上和经济上的“开放”。1776年3月，约翰·劳的老乡，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一书。此书的出版引起英国大众广泛的讨论，因为斯密在这本书中所倡导的，并非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而是回到了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经济”精神，倡导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力量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斯密的名望如此之大，不少政府官员都争相向他咨询关于自由贸易的问题。[13]

新的经济思想令人们开始反思，那些持有“皇家执照”的国有公司，现在无疑是阻碍经济自由的因素之一。工业革命的进程伴随着民间资本

的再次兴起，消失了一段时间的民间公司，在冰封的土层下蓄势待发。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股份公司又开始繁荣起来，达到了150多家，且其中大部分并没有获得政府颁发的执照和特许状。[14]

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和贸易大发展，让人们对股份公司消失已久的乐观情绪又回到了英国。这个情形很像一百多年前当南美洲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英国时，投资者们对南美贸易的前景所抱有的那种无以复加的憧憬。和一个世纪前的情景一样，南美洲再次给英国人带来了好消息。

1822年，英国的债券市场涌现着诸多南美洲国家的身影。新近独立的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需要稳定的资金来源，而英国伦敦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已远远超过任何一座城市，成为当之无愧的欧洲金融中心。因此，这些南美洲国家纷纷向英国借钱。哥伦比亚在1822年首先借了200万英镑，秘鲁借了120万英镑，巴西在之后也借了120万英镑，墨西哥借了320万英镑……总之，前后几次借给南美洲这些新生国家的金钱数额惊人。[15]

很快，乐观的情绪被激发出来了。伦敦的投资者再次把钱砸进了经营南美洲商业的股份公司。1825年1月，至少有6家南美矿业公司出现在伦敦的股票牌价上，到了该年8月，增长到了17家。[16]南美洲公司引起的连锁反应很快波及其他的英国公司，经营业务不局限于矿业。煤气、漕运、铁路、保险等等行业全都囊括在内。这时，整个英国的股份公司达到了624家，这股份公司潮水般泛滥的情景十分类似于当年《泡沫法案》通过前的英国。

然而，19世纪初期的英国已不同于彼时。《泡沫法案》的陈腐让英国人愈发感到厌烦。正当股份公司在伦敦再一次兴起的时候，威斯敏斯特的新一轮议会也在召开期间，因此，就像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各种商业请愿再次被提交议会，而议会却认定提起这些请愿的公司为非法。此事在当时进一步发酵，使得本来并未把有关《泡沫法案》的讨论提上议事日程的议会开始讨论起这项法案的存废事宜。

可以预料，反对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大。但议会之中也有人对民间的公司表示支持。不少属于辉格党的银行家都公开表示，如今的英国社会和《泡沫法案》通过时大不一样，民间公司不仅不会带来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危险，反而会有助于英国的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个中道理不难明白。如果说18世纪初期那些经营着看似不可能的奇怪业务的公司带有更多欺骗成分的话，那么科学的进步和工业革命已经让不少以前人们认为

匪夷所思的业务变成了可能。一位名叫阿特伍德的银行家就在议会里反驳认为民间股份公司非法的最高法官说："只要他们不再试图干涉他们一无所知的经济，而是去修改奇怪且令人丢脸的国家法律体系，那么这些人（指反对民间公司的人士）真是帮了国家大忙。"[17]

最初，废除法案的呼声遭到了时任首相的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r）的否定，再加上众多的商业计划中，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斗争冲突，使得议会对新成立股份公司问题的讨论立场复杂，一时难有结果。实际上，无论这些在议会中的争执动机有多么不纯，内容有多么复杂，归根结底都可以被视为对于一个概念性问题的争执：对于公司这种商业单位和资本构建的形式，是国家和政府的附属品，还是自由贸易和市民社会逐渐成熟后一个必然产物？[18]

1825年7月5日，废除《泡沫法案》的提议终于得到议会和国王的认可，这部自南海泡沫破灭以后就在英国存在的法案由此结束了它的生命。这个结果并不会让人感到太过奇怪，毕竟，这部出于权宜之计而诞生、存在时间已足够长的法案确实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因此，当英国的首席检察官所提交的废除法案被送交到议会并且最终获得通过时，埃尔顿勋爵（Lord Eldon）在议会里说，他"根本不会大惊小怪"，因为"那部法案中，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会遭到惩罚的"[19]。他的发言，相信能够代表当时不少英国人的见解。

细看历史的发展，常常带有浓烈的戏剧化色彩，例如这份《泡沫法案》从生到灭的历程。1720年，英国议会通过这项法案，是因为民间股份公司的泛滥；1825年，英国议会废除了这项法案，同样是由于民间股份公司的泛滥。这项法案的诞生与结束，都是以投机的盛行作为结束。1825年的下半年到1826年年初，包括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在内的大多数英国公司的股价又开始下跌，造成了数十所银行以及数百家公司的倒闭。不过这一次，人们不再重新搬出《泡沫法案》这一剂安慰剂了。他们认识到，关于股份公司，当务之急是立法规范其行为，而不是鲁莽地彻底将它们的生路堵死。

1844年和1856年，英国两次颁布的《股份公司法》（Joint Stock Company Act），规定了有限责任和无须经过议会就可以成立公司的一般权利，另外，公司董事必须登记公司账簿，编制"详尽公允"的资产负债表，并由股东任命的监事对公司日常的会计报表和会计账簿进行审核。1856年7月14日生效的《股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股票买卖和股

票转让各项规范，例如股份公司有权不定期召唤股票持有人，让他们偿付自己的股份，召唤的通知通常要持续21天。如约定当日未能偿付，则股票持有人将额外支付利息。并且，因为财产继承、通婚等等非正常买卖原因获得股票的人，他们的股份所有权和处置权，以及公司主管的权限与责任等方面，法案均有详细的规定。[20]总之，有关股票交易的各个方面，规定非常妥帖。

自此以后，任何一个独立的法人原则上都有资格建立股份公司，而公众对于股份公司的态度逐渐由敌视转为接受，这使得股份公司的形式延伸至纺织业等传统的行业。但是，金融危机的阴影让英国的商业公司不断倒闭。1862到1869年成立的英国公司倒闭了近三成，而1856到1866年之间成立的公司五年后消失了近四成，十年后倒闭了一半以上。到1932年，只有9%的公司依旧以成立之初的形式继续存在。[21]看来，股份公司自身的问题并没有随着相关法规的出现而彻底解决，股票投机的事例在历史上依旧屡见不鲜。

历史上，英国议会通过的有关股份公司的法案不胜枚举。进入20世纪后，英国议会接连于1907年、1908年、1929年、1948年等多次在之前的基础上通过规范公司经营相关的法案。其中，1948年的公司法又在20世纪70和80年代进行数次修订。英国的公司法可以说是历史上修改得最多的法案之一，而最新的一次立法，就发生在离今天不远的2006年。[22]作为现代经济活动的最主要单位，公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历史连锁反应得以发生，其源头还在于1825年《泡沫法案》的废除。

泡沫之后的泡沫

尽管股市泡沫害惨了投资者，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股票市场不但没有因为它潜在的“风险”而让人鲜于问津，相反，无论哪个国家的人，对于股票投资的热情一直都是呈现增长的趋势。

南海泡沫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金融泡沫，也没有理由成为最后一个。发生在它之前的荷兰郁金香泡沫让人类初步见识了金融投机的巨大破坏力，随着现代金融体系一步一步建立，其设计与构成也愈加复杂、完善，经济泡沫的威力也随之不断增强。而这一切的集体心理基础多年来依然没有改变，那就是盲从和投机。恰如日本学者野口悠纪雄所

说："泡沫产生许许多多的危害，但是最大的危害在于资产价格的异常上涨扰乱了人们的价值观。许多企业开始热衷于资本经营，或者放弃主业而转向不动产投资。原本持有土地与股票的资产者，无须付出什么劳动，财产迅速膨胀到上亿的规模。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资产的劳动者，即使辛劳一生，也不能拥有自己的住宅。"[23]

野口悠纪雄的忧虑在于，劳动创造价值和财富的"真理"，在利润丰厚的金融投机面前，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这将会改变人们对于财富的观念，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南海泡沫发生近半个世纪后，英国又发生了一次影响广泛的股市泡沫——孟加拉泡沫（Bengal Bubble），这一次，问题出在另一家"国字头"的企业——东印度公司身上。在经营印度贸易的基础上，1757年公司成功占领孟加拉，东印度公司的前景因而被许多投资者看好。但在1769年，之前价格暴涨的东印度公司股票出现大幅下跌，这暴露出了公司在印度经营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一经调查，人们发现，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业务利润并没有传闻中所说的那么大，而且这次股市泡沫和南海泡沫如出一辙，许多议员因为持有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而牵扯其中。[24]

孟加拉泡沫又一次将英国的官商勾结和腐败行为暴露于世人眼前，英国议会最终通过了旨在"规范印度公司行为"的《东印度公司法案》（The East India Company Act）。[25]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希望获得财富，并且希望轻松地获得财富。这种无法摆脱的原始欲望是滋生投机行为的绝佳土壤。民众如此，议员如此，商人当然也如此。当英国进入工业革命用钢铁和蒸汽机铸就的新时代，英国人又一次像历史上发生过的那样，集体陷入了对股票投资的迷狂，这一次，令他们趋之若鹜的对象是：铁路。

如果说，南海泡沫产生的前提是地理大发现导致西欧海上强国开始在遥远而神秘的南美洲建立殖民地，那么这次英国"铁路狂热"的前提则是工业革命和铁路运输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发展。1825年和1830年，英国早期著名的城际铁路实现通车，即所谓的"伦敦至伯明翰线"以及"利物浦至曼彻斯特线"。尤其是后者，英国修建它的初衷，是希望以最经济的方式连接英国西部最大的港口利物浦和工业革命的中心曼彻斯特。[26]这条铁路线在当时取得了很大成功，商人们发觉铁路运输是发家致富的捷径，于是纷纷成立铁路公司。

"铁路狂热"的另一个因素是，当时的英格兰银行下调了利率，这让

原本习惯购买政府债券的人们感到获利大大受限。工业化时代的来临让贸易和生产的速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骤增，投资者们意识到了交通运输的重要性，而铁路，无疑是陆上交通最为便捷的一种。于是，有人就想，既然投资政府债券利润有限，何不将金钱投进未来发展大有前景的铁路运输业呢？当投资者和企业家同时这样思考的时候，铁路公司的股价自然就直线上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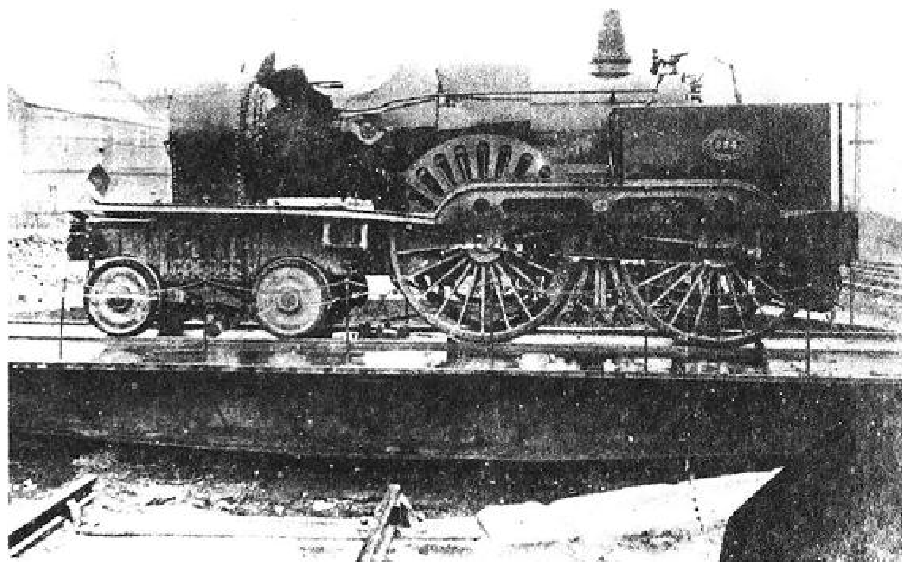
并且，当时的铁路路线基本上都需要通过英国大地主和贵族们的私人土地。要在这些有名有姓的土地上修建这条钢筋铁骨，必须要支付土地所有人一笔“土地出让金”，这笔钱，当然就被聪明的铁路公司老板用本公司的股票代替。[27]因此，铁路建得越长，需要给出去的股票就越多。再加上铁路业普遍被市场看好，一来二去，铁路公司的股价被炒得很高。人们一看见这样的情况，成立铁路公司的速度就变得更快。

但问题紧接着来了。按照当时的规定，铁路公司在修建铁路之前需向议会提出申请，呈递修建路线等内容，然而，当时有关铁路公司的法规是如此之宽松，以至于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向议会提出修建铁路的申请。于是，各种铁路修建方案获得了议会的通过，投资者对铁路公司的前景空前看好，更多的钱投进了铁路公司这个无底洞。

一切都和当年的南海公司那么相似。先是新闻报纸的大肆鼓噪，然后是政府人员与铁路公司过从甚密，并伴随着投资者们盲目的乐观情绪。[28]在当时的铁路大亨当中，有一位身为议员的乔治·赫德森（George Hudson）先生，他说服了英国的许多地主贵族们允许铁路经过他们的土地，当然，方法是晓之以“利”——你们将来能够从经过贵领地的铁路获得丰厚的回报。[29]但不走运的是，赫德森自己的公司却因为违规行为而关闭，他本人也被查出曾向议员行贿等罪行。实际上，当时大部分议员都购买了铁路公司的股票。

赫德森的戏剧性垮台，使得这次匆匆到来的“铁路泡沫”没过多久便匆匆破灭。平心而论，铁路公司的短暂兴起并非没有给英国留下任何遗产，至少，英国人在几年之内建设了长达万余公里的铁路线，铁路运输的优势在英国被确立起来，其工作效率大大超过了同时期的欧洲。[30]但这一点“成就”的代价却是英国数量众多的铁路公司相继倒闭，无数股民的财富因此在转瞬间荡然无存。19世纪资本主义的新生事物——铁路，的确给了英国投资者一个颇有说服力的希望，但他们所期望的财富并没有如期到来。又一次，欺骗和失望是许多人等来的最后结局。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密集。18世纪影响巨大的金融危机不过寥寥可数的几次，而自从1819年发生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恐慌开始，19世纪有名的股市泡沫和金融危机至少发生了十次之多。进入20世纪，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系统发展得比之前更为庞大繁杂，金融危机和股市危机的爆发更加频繁，影响也更为巨大。有的甚至引发了经济大萧条和战争。凡此种种，都是远在1720年的人们所无法预见的。



旧时英国火车机车。

经济学家穆里·罗斯巴德总结1819年美国的金融危机症结时曾一针见血地说："这个国家的货币系统非常不完善，全国的金融业几乎都是新成立的。"[31]在市场的"新"面前，制度的"旧"酿成了一出又一出经济悲剧。无可否认，世界的金融系统或许在其后历史的发展中一步步朝着"完善"的目标艰难地踽踽而行，不过，这并未从根本上减少人们对股票与金融市场的忧虑。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股市泡沫和金融危机爆发的次数就像新增的财富那样，越来越多。

美国穷奢极欲的20世纪20年代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了两百年前的巴黎和伦敦。"物质主义"与"享乐至上"的标签被很妥帖地贴在了美国中产阶层和富裕人群的身上。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乐观诱发了福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热和1929年的股市大繁荣。在描述"1929年的神话"时，经济学家加

尔布雷斯如是说："在夏季的三个月里，威斯汀豪斯公司的股票从151点上涨到了286点，净涨135点。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由268点涨到了391点，而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则从209点上涨到了303点。投资信托公司都赚到了丰厚的利润。"[32]

从1921年到1929年，道琼斯指数从60直跳到200，投资者们趋之若鹜。股票面值的反常膨胀立刻为投机和欺诈提供了土壤。人们不惜举债，甚至抵押自己的房产购买福特、美国无线电公司等"优质"股票，抢购如此之快，市场上一度出现了股票的"供应不足"。[33]人们对股票的狂热程度直追1720年的欧洲。对比这两个年份，会发现一些相似之处：二者同样是刚刚结束了一场战争，同样是迎来了新的投资前景，同样是举国欲狂的乐观情绪……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很大程度上步了1720年英国与法国的后尘——它们拥有相似的繁华，繁华过后又遭遇了转瞬的崩塌与陨落。

1929年，美联储多次提高利率，希望给过热的股票投资降温。到该年10月时，此举果然奏效，而且收效甚猛，熊市很快降临了美国。恐慌性的抛售开始在投资者中蔓延，波及了整个股市。道琼斯指数转眼间从400点开始直线下跌。11月，投资者们的纷纷套现逃离让道琼斯指数回落至145点。更糟糕的是，美国的银行在股市看涨时也购买了不少股票，因此当熊市来临时，银行发生了挤兑，因为投资者此时已确信银行无法从股市泡沫中独善其身。美国的金融系统被拖累得回天乏术，而金融体系的瘫痪势必让失去资金支持的企业无法正常运转。由此，这次股市崩盘引发了持续十年的经济大萧条。1933年，美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还不到1929年的1/3，1300万人失业。直到1941年，美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仍然没有重回1929年的水平。[34]

泡沫的破灭彻底暴露了过去被乐观情绪遮盖的贫穷，而且为数不少——美国1/3的人口都处于贫困线以下，严酷的事实让人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短暂的财富之梦彻底成为南柯一梦。令人欲壑难填的财富尽头却通向普遍的贫穷和不公。无论是在1720年的英国还是1929年的美国，这条真理都发生着作用。

如果顺着这一系列导致金融泡沫的"经济连锁反应"向前追寻，会发现"盲目乐观"以及"非理性投资"是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罪魁祸首。当普遍的赌徒心态代替了理性投资，泡沫的泛起便有了最有效的催化剂。据此，有人这样总结历史上金融泡沫的特征：首先，人们开始热衷于谈论

他们的投资，并且将自己的投资判断建立在“过去价格上涨了多少”而不是“它到底值多少钱”的基础上。第二，一些人开始从中赚钱，贪婪因此逐渐战胜了人类的恐惧。然后，投资被一些人视为一生一次的机会，人们不再关心股票的真实价值，投资被过度杠杆化。[35]

“股票”“银行”“信贷”的游戏，自从被我们的祖先发明，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的周折。历史上，它为不少人带来了财富，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当这个奇妙的市场被利用、被扭曲、被操纵的时候，它也有着最为可怖的破坏力。金融市场的最初建立为资本提供了汇集与流通的广阔平台，给资本主义发展输送了价值连城的金融“血液”，缺少金融市场的支持，经济的贫血病随时都可能发生。而当金融市场成为一个由欺诈和骗局构成的“恶”的市场时，则整个经济系统无异于患了一场深入肌理的“坏血症”，国家福祉与国民财富，更有陷于毁灭之殆。时至今日，这种“经济病症”依旧无解。在这个意义上，1720年的事件无非是开启了此后股票与金融市场这部漫长悲剧的序幕。

纸币的命运

在结束本书以前，有必要交代几句约翰·劳所创制的货币体系。在有生之年，“纸币帝国”没有使约翰·劳成为万世景仰的经济学家，反而为法国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让法国新建立的货币与金融体系几乎一夜之间解体，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混乱衰败的状态。和发生南海泡沫的伦敦一样，巴黎投资者的财富付之东流，贫困伴随着对瘟疫的恐慌重新降临人间。不得已，法国政府只得放弃约翰·劳的纸币系统，回归金属货币本位制。

但积重难返的法国国家经济重新陷入通货紧缩和萧条，可谓回天乏术。泡沫的破灭让纸币体系和信贷市场停止运转，法国人对于股份公司和金融机构的信任感几乎尽皆摧毁。这使得长期困扰政府的债务问题在经过一番折腾之后，实际上又回到了原点。王室财政困难重重，不得不举新债还旧债，国内的税赋高得惊人。到1789年，法国政府欠债达到6亿里弗尔，这时，同受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人选择了联合，将他们的怨恨朝政府发泄出来。[36]最终，法国政府的财政彻底破产，社会分崩离析、动乱不断。1793年，国王路易十六被长期充当经济“冤大头”的第三等级送上了断头台。法国经济近一个世纪的失败改革终于酿成了惊天动

地的政治革命。

这出著名的由经济问题酿成的政治悲剧并非偶然发生。实际上，约翰·劳的纸币系统能够进行良性运作的前提是民主政治体制的保障。法国人也并非不知晓纸币系统的弊端，毕竟他们在并不遥远的过去便有过切肤之痛。然而，18世纪末恶化至极点的政府财政和国民经济状况，又让法国人不得不重新搬出“纸币”这个法宝。纸币改革的支持者马特里尼奥（Matrineau）在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重提纸币改革之际曾说：“纸币系统在专制政治体制的国家是危险的，它易于造成腐败。然而，在一个制宪的国家，则能够对于纸币的发行与使用进行自我控制。如此，危险也就不存在了。”[37]

但是，“进行自我控制”的政治体制在当时的法国真的存在吗？国民议会的不少成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然而，由三级会议改名而来的国民议会仍是有名无实的一个组织，尽管其自我赋予批准税收等等权力，但是权力欲的蛊惑让恢复三级会议的国王路易十六很快又强令关闭了议会大厅。这个愚蠢的做法令第三等级彻底与国王撕破脸皮，而国民议会的诸多政治、经济决策，均是单方面做出。

1790年，国民议会决定发行4亿里弗尔纸币，储备金为从教会没收来的土地财产。[38]但法国的财政问题已是病入膏肓，第一次纸币发行的效果并不明显。很快，国民议会进行了第二次的发行。狂热的法国人将使用纸币视为“爱国”之举，认为要拯救法国于危难，舍此别无他途。相反，使用金属币自然是“叛国”行为了。于是，只见“一卷卷白纸运到米尼翁街，很快被印成精美的有价证券，然后成捆地装上马车，在宪兵押送下，运往设在小田园新街的特别委员会，即所谓的国库，经点数和盖戳后，锁入保险柜。但是这些证券存放在国库的时间很短，第二天就得拿出来使用，而保险柜则在数小时后又将放满另一批新印制好的有价证券。米尼翁街的印刷厂日夜开工，工人分成三班或四班，拼命干活，但是印刷的速度仍远远赶不上需要……”[39]与此同时，将纸币视为法国经济救星的人们却很快感觉到，他们手中的纸币正变得愈发不值钱。通货膨胀开始了。

1791年12月，原先价值100里弗尔的纸币，其市值跌到了80里弗尔，在新的一轮纸币发行后，进一步下跌到65里弗尔。[40]此后的数年中，纸币的贬值一刻未停。1790年只卖2法郎一袋的面粉在1795年涨价到225法郎；一双鞋的价格由5法郎涨到200法郎；一顶帽子的价格由14

法郎上涨为500法郎。[41]然而，当商品疯狂涨价时，人们的工资和收入并没有上涨。纸币的主要使用者——法国大众的财富无形中大量流失，而产业拥有者却从中实现了经济掠夺。民怨因而高涨，社会暴乱事件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层出不穷。

法国民众对纸币失望至极，成立不久的督政府于是决心废除纸币，重新使用铸币。纸币系统实际上已再一次在法国破产。而共和政府建立以来的高通货膨胀率，使得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实为当时法国社会的乱源之一。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命途多舛，战争与王朝复辟不断，虽为其时政治形势所迫，岂是毫无经济方面的因素？读史者对此不可不察。

该如何看待金钱这个“祸乱之源”？记得莎翁的《雅典的泰门》如此描述金钱：“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你惯会在乱七八糟的列国之间挑起纷争。”马克思在这段文字的基础上，总结说货币“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42]。马克思的这一判断，固然生动形象，但失于太带有主观感情色彩。

钱可以行善亦可为恶，这完全取决于钱的用途，因此金钱本身无所谓善恶。但是，运作金钱的系统却往往导人向恶，至少，它也是一个极不公平的体系，纸币体系尤甚。众所周知，现代的纸币系统依靠政府信誉才得以运行。政府接受法定货币为偿债和纳税之用，法院也认可这张纸可以清偿债务，而私人在进行商品交易的时候也认可这张纸的效力，是因为他们相信，别人也会接受这张纸。[43]这些纸张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这些纸张有价值。否则，缺少了这种大家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经济就将陷于停滞。

但作为货币发行的掌控者，政府拥有一万个理由多多发行纸币。正如我们在18世纪的法国所看到的历史事实，滥发纸币实际上是对财富的掠夺。纸币的发行并非一夜之间让每个人的现金额凭空增加，而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注入”国民经济。这个方式就是银行系统及其分支。所谓货币，无非是指由政府钦定的那种银行券。新发行货币的两条路径是借给债权人或者直接支出，而先于所有人获得新货币的人无疑是最大的获益者。正如罗斯巴德所说：“简而言之，通货膨胀是政府、其控制的银行系统和受优待的政治阶层部分地剥夺其他社会阶层的财富的一个方法。

那些能够控制货币供给的人发行新的货币，增加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使其他人遭受损失。”[44]

自尼克松时代以来，整个世界经济走入了纯纸币的体系。黄金直接和美元脱钩，货币对所有人而言都不再意味着是黄金的凭证。因此，货币的供应量比以往更加不受限制，并且整个世界的货币金融体系通过美元从此联为一体。但不论现行的货币金融体系如何纷繁复杂，它的雏形孕育于1720年的英国和法国，准确地说，是巴黎和伦敦的交易所和银行。而我们面临的问题也和前人类似，货币和债券的滥发破坏了政府的基本经济信用，人们将手中不断贬值的纸币投资到股票、债券、房地产市场，像1720年的投资者期待南海公司、密西西比公司股价大涨那样期待着自己手中的资产增值。然而，从前几年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到金融泡沫再到席卷全球的实体经济危机，连锁反应式的经济灾难再次给今天的人们上了一课，信贷的破灭让资本运作背后的欺骗和道德堕落赤裸裸暴露于我们眼前。

信贷危机的真正原因来自信托责任的破产。金匠银行家们愿意把钱借给国王和政府，靠的是他们对政府还债能力的信任（Trust）。海外探险家带着国家与君主的厚望起锚出海，探寻新航路，这也是一种信任。公众自愿将自己的财富交给股份公司，让它为自己获利，靠的还是信任。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按揭贷款、股票买卖，乃至我们手中握着的每一张钞票，其背后无一不是象征着一种信任……信任完全称得上是资本主义的灵魂，落实到纸面上，就是一种严格遵守誓约、履行契约的精神和责任感。而一旦“信任”二字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难以为继时，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也就面临着土崩瓦解。

一位曾在国际顶级投资机构任职多年的观察人士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谈及现行的金融体制时说，信用的增加已经不再依靠储蓄的增加，而是取决于银行的政策及其意愿，如此，纸币的信用体系便增加了债务的累积和人们的投资意愿。[45]现代纸币系统让我们比两三百年前的人拥有更多的货币与财富，同时，也是因为这个纸币系统，如果我们不进行再投资，手中货币的价值就会因为纸币的滥发而一天天减损。就这样，盲目的乐观和投机行为又有了滋长的空间，投资狂热依旧在我们身边徘徊不去。投资者们曾经笃信纳斯达克的概念股、美国的房地产市场、雷曼兄弟的股票，相信对它们的投资会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而等来的结果，却是泡沫的破灭进一步摧毁了资本与信贷的基础。

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关于欲望的历史。恰如经济学大师米塞斯所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都为满足自己的利益而行动，“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手段和目的”[46]。然而，欲望的满足也必然会带来道德风险，纸币系统和股票市场无疑满足了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但其带来的道德风险也更加难以根除。现代金融体系通过信贷将政府、银行、证券三者焊接在一起，但信贷系统自身的道德诘难却是无解。今天，政府的高额支出所带来的大量银行贷款需要进行再融资，这个情况与1720年的英国和法国不无相似之处；同样相似的是政企之间的种种幕后交易以及股票市场里的阴谋，并且，在这个金融游戏中不得不偿付的道德风险很可能需要一般投资者与社会大众埋单。

表面上看，1720年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的无非是一次早期的股市泡沫，但如果剥茧抽丝，探寻其源流，会发现泡沫的诱因其实是国家债务和政府权力的庞大，其背后还透露出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先天存在的问题。任何一本金融史书大概都不会绕开早期的三大经济泡沫，但对这三次泡沫成因的解释都十分一致且笼统：人们丧失理性，盲目投资。然而细读史实，会发现当时人们的理性未必那么“丧失”，投资也未必那么“盲目”，事实上是泡沫背后的这套金融体系引发了灾难。从金融体系的历史延续性来看，1720年股市大崩盘的寓言在三百年后的今天仍没有过时。

注释

1 Philip Mirowski, "The Rise (and Retreat) of a Market: English Joint Stock Shar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原载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3, Sep, 1981, p. 566.

2 John G. Sperling, The South Sea Company: An Historical Essay and Bibliographical Finding List, Baker Library,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962, p. 37.

3 同上，pp. 48-49 .

4 Ron Harris, "The Bubble Act: Its Passage and Its Effects on Business Organization"，原载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4, No. 3, Sep., 1994, p. 622.

5 同上，p. 624 .

6 Ron Harris, "Political Economy, Interest Groups, Legal Institution, and the Legal of the Bubble Act in 1825"，原载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 4, 1997, p. 675.

7 Adalbert Béla Levy, Private Corporations and Their Control, Vol. 1, Routledge, 1950, p. 43.

8 Shaw Livermore, Early American Land Companies, Beard Books, 2000, p. 63.

9 Lewis Hackett, 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http://history-world.org/Industrial%20Intro.htm.

10 波斯坦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王春法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pp. 10-11．

11 Adalbert Béla Levy, Private Corporations and Their Control, Vol. 1, Routledge, 1950, p. 45.

12 Jerry Z. Muller, Conservatism: An Antholog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from David Hum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

13 John Rae, Life of Adam Smith, Cosimo, Inc., 2006, p. 346.

14 Ron Harris, "Political Economy, Interest Groups, Legal Institution, and the Legal of the Bubble Act in 1825"，原载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 4, 1997, p. 677.

15 Giorgio Fodor, The Boom that Never Was? Latin American Loans in London 1822-1825, Discussion Paper No. 5, 2002, Dipartimento di Economia, Universita di Trento, p. 8.

16 Ron Harris, "Political Economy, Interest Groups, Legal Institution, and the Legal of the Bubble Act in 1825"，原载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 4, 1997, p. 678.

17 同上，p. 682．

18 同上，p. 693．

19 同上，p. 691．

20 见Joint Stock Companies Act 1856, http://www.companieshouse.gov.uk/about/tableA/index.shtml.

21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何建雄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p. 280．

22 详见维基百科Companies Act词条，http://en.wikipedia.org/wiki/Companies_Act.

23 野口悠纪雄：《泡沫经济学》，金洪云译，三联书店，2005，pp. 1-2．

24 Nick Robins, The corpora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luto Press, 2006, p. 218.

25 法案内容详见http://www.indohistory.com/pitt's_india_act.html.

26 Joan Zuckerman, Geoffrey Eley The Birmingham Heritage, Taylor & Francis, 1979, p. 103.

27 Sir Archibald Alison,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Fall of Napoleon, in 1815, to the Accession of Louis Napoleon, in 1852, Vol. 7, W. Blackwood and sons, 1858, p. 132.

28 Richard Miller Devens, Cyclopaedia of Commercial and Business Anecdotes,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65, p. 562.

29 Patrick Thornhill, Railways for Britain, Metheun Reprint edition, 1959, p.

57.

30 K. Hoole, Jack Simmons, Rail 150: the Stockton & Darlington Railway and What Followed, Taylor & Francis, 1975, p. 55.

31 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Reactions and Policies,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2, p. 170.

32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1929年大崩盘》，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p. 47．

33 同上，p. 31．

34 同上，p. 120．

35 Marshall Goldsmith, "The Madness of Crowds", Past and Present, December 16, 2008, http://www.businessweek.com/managing/content/dec2008/ca20081216_263901_page_2.htm.

36 李炜光：《法国大革命的财政原因》，原刊《南风窗》2008年第10期，p. 60．

37 Andrew Dickson White, Fiat Money Inflation in France, Appleton-Century Company, 1933, p. 4.

38 同上，p. 7．

39 G·勒诺特尔：《法国历史轶闻》第二卷，王鹏、陈祚敏译，北京出版社，1985，p. 126

40 Andrew Dickson White, Fiat Money Inflation in France, Appleton-Century Company, 1933, p. 33.

41 同上，pp. 50-51．

42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pp. 141-145．

43 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8，pp. 13-14．

44 埃德温·多兰主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p. 156．

45 Detlev S Schlichter, "Forty Years of Paper Money"，原刊Wall Street Journal, Aug. 15, 2011,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3111903918104576500811399421094.html.

46 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Fox & Wilkes, 1996, p. 257.

结语　从致富到致穷

发生在18世纪初叶的这段经济往事，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然而，今之视昔，类似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的故事，依旧在我们的周遭上演着。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几年前曾在《金融时报》写下一段话："让股票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让人在极度愉悦和极度恐惧之间摇摆。人们的情绪很大程度上被经济事件左右着。根据我的经验，它们不仅仅预示着未来的经济活动，而且是它们的直接原因。"[1]

格林斯潘的这番话见诸报端时，最近一次金融海啸正肆虐全球。这场金融海啸由华尔街投行的倒闭为始，进而波及全球的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从华尔街的银行业到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可以说无一幸免。在金融海啸面前，人们的投资热情也降到最低点，恐惧和不安笼罩在投资者头顶。

不过，就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的几年前，美联储所推行的低利率和政府宽松的金融监管政策为华尔街股市的暴涨创造了理想的条件。那时候，人们对自己购买的股票和金融衍生品充满了信心，就像当年巴黎的投资者信任约翰·劳一样，丝毫没有怀疑过"现代金融炼金术"的可靠性。然而，现实再一次惩罚了贪婪的投资者们。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危机发生的2008年下跌幅度超过33%，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8.5%；纳斯达克指数大跌40.5%。全球股市共蒸发约30万亿美元市值。无论是阅读历史还是今天的现实，我们从中不难读出一个疑问：本该给投资者带来财富的市场，为什么反而频频引发经济灾难，带来贫穷呢？

众所周知，证券市场的建立可以让闲置的资本得到有效利用。恰如经济学家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所说，资本得以形成并运转的方式是通过将没有被消费掉的收入投入到再生产。[2]换言之，人们通过银行信贷系统以及证券市场，将个人储蓄转变为投资，而充足的投资会进一步带动生产，促进商业活动的繁荣。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产品的制造者、投资者和消费者均蒙其利。[3]

于是，资本市场的繁荣与社会经济的繁荣被人画上了等号，人们笃信市场的所谓公正性。正如一位19世纪的学者所写下的：市场中公开发

行的股票，其价格是对真实价值的最佳反映。[4]然而，自证券市场诞生之日以来，一次又一次的金融泡沫又让人们深深感到，股票、债券价格的上涨似乎并不代表真正的繁荣，而仅仅是因为受到市场利好信息的影响。说到底，这一切不过是场浮华而残酷的金钱游戏。

经济学家尤金·法玛（Eugene F. Fama）曾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著名的假说。简言之，这个假说以物理学的基本粒子运动来比照股价的波动，认为股价的波动就像基本粒子运动一样是随机的，没有所谓的规律可循。这就是“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根据“有效市场假说”，人们实际上无法通过分析过去的股价来推知未来股价的变动。[5]左右人们投资的，无非是一些表面的市场信息，因此，股票价格的上涨什么也代表不了，它只是意味着利好消息较多而已。财富，仅仅代表一个虚假的符号。

“有效市场假说”毕竟只是一个经济学假说，它的前提是每个投资者都是理性的投资人。但在现实中，欺诈和骗局一刻也没有从市场消失过。当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受到虚假信息的诱导，事实上已越过理性的边界时，市场的“有效”显然不再适用，它反而会随着人们非理性情绪的增长而呈现出异样的癫狂。当这种依靠集体的疯狂所维系的虚假繁荣难以持续时，灾难也就离人们不远了。历史上发生的历次金融泡沫对此作了最好的诠释。

那么，应该由谁来保护人们在市场中的财富？相信有不少人会回答：市场需要完善的法规和政府的严格监管。如此，投机者和内幕交易者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然而，正如1720年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有时候，政府不仅无法有效监督市场中的欺诈行为，而且还会主动把市场的水搅浑，以便从浑水中摸鱼。也就是说，原本的监管者很可能变成市场的投机者甚至是幕后操纵者。如此，市场就成了权贵者“致富”的市场，但却是普通人“致穷”的市场。

政府成为证券市场参与者的例子数不胜数。除了历史上著名的“南海泡沫”，也不乏近一些的事例。美国总统克林顿执政期间，就曾计划把美国社保基金的一部分用于股市投资。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不堪重负的社保基金在几十年内有破产之虞，亟需“新鲜血液”的注入。增加税收固然是一个解决之道，但容易遭到纳税人的反对。因此，社保基金入市套利成了更可行的选择。这个方法或许会让某些人高兴，但正如一位经济研究者所批评的：如果连政府都可以直接在股市进行投资，那么，这样

的经济体就不应该被称为市场经济体。[6]

这样的批评基于一个理念：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政府只能充当市场的监督者和规则制定者，而不能成为市场的参与者。政府的强大权力会扭曲市场交易活动，并且利用市场达到自己的经济、政治目的。回顾南海泡沫的酿成，根源上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府需要解决大量负债。在经过一番政治博弈后，政府想到的解决方案竟然是利用市场进而对人们的金钱进行“侵占”。当然，这样的“侵占”并不是明目张胆的暴力抢夺，而是一种更为不易被人察觉的巧取豪夺。

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曾将政府的“侵占”归纳为三类：第一是直接对个人财产的使用进行限制；第二是强制人们和政府进行交易；第三是禁止人们进行自由交易。[7]南海公司作为当时一家受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在贸易经营上拥有得天独厚的国家资源，这是其他私人公司难望其项背的。政府为其颁布的“特许状”实际上禁止了其他公司介入南美洲的贸易业务，这无疑是一项侵犯自由贸易原则、具有强制交易性质的规定。此外，由腐败官僚控制的英国议会通过《泡沫法案》变相禁止伦敦其他公司进行股票交易的权力，当然也属于一种对自由交易权的“侵占”。

在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基础上，南海公司与英国政府相互勾结，人为将南海公司股价炒高，使用各种手法诱骗投资者购买股票。那张薄薄的股份凭证在他们的左右手之间来回腾挪，价格一路上涨。于是，股票交易成了一桩“挖东墙补西墙”的勾当：用新入市的投资者的钱，去偿还那些要求兑现的老投资者的钱。由于南海公司不遗余力的宣传，新入市的投资者数量大于要求兑现的人数，泡沫的膨胀因而持续了一段时间，英国人也过上了一段颇为“繁荣”的日子。然而，这样的金融把戏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来，因为“当新的债权人加入的速度比旧的债权人要求被偿付的速度慢时，泡沫就破裂了”[8]。之后发生的事实验证了这句话。

我们不应该抱着读小说的心态来阅读本书讲述的故事，而应该读罢稍微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表面上拥有“民主”制衡体制的英国政府何以能够与企业勾结，从股票市场中圈钱？市场的监管者如何变成了一位市场的操纵者？股票市场又是如何从一个“致富”的市场变成了“致穷”的市场？回顾一下当时弥漫英国乃至欧洲的经济思潮，或许有助于我们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们已经了解到，腐败的政府、愚蠢的投资者以及庞大的公共债务构成了引发南海泡沫的三大因素。[9]而在这三个“硬件”的因素之外，还存

在着“软件”或者说经济思想上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所谓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重商主义思维盛行于15至18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兴盛时期，但这个词多为后世的学者所使用，在17、18世纪的英国，大部分人其实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10]用今天的语言概括，重商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外贸主义。它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尤其是要垄断对外贸易，以各种经济干预手段来追求国际收支的盈余，从而为国家积累财富。换言之，重商主义的“致富”是针对国家层面而言，与普通百姓无关。

早在17世纪，就有英国人批驳重商主义学说，认为政府干预外贸实际上并不能为普通人带来财富，反而是更宽松的经济政策，才会真正使每个国民受益。[11]然而，这样的批评在当时绝对不算是主流。15世纪以来的主流经济思想被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托马斯·孟这样的“重商主义者”所左右着。他们的基本信条是，只要能够实现外贸盈余，为国家积累货币财富，那么国家完全有理由直接干预经济“抢夺”财富。而国家干预经济的体现之一，便是像东印度公司、皇家非洲公司、南海公司等持有政府“特许状”的国有公司。

重商主义的显著特点除了唯外贸论、政府干预经济等等之外，便是产生了“政企不分”的国有股份公司。这些与政府联系紧密的公司获得经营权的方法是凭借皇家颁发的特许状，特许状赋予它们在某一商业领域的专营权（patent）。英文“patent”一词如今指“专利权”，多适用于发明创新方面。但以起源而论，它的意思却是指得到政府认可的独断经营权。透过这些手执政府批文的企业，政府实际上成为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

当政府成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时，应该由谁来对它进行监管呢？答案是，没有人。监管本来就是政府自身的职责，而直接参与经济的政府不可能自己监管自己，就像在球赛中一个人不可能既是球员又是裁判。这种角色的错位，打乱了游戏规则，也使得政府与企业有了在资本市场狼狈为奸、违规操作的可能性。当经济上的动机足够强烈时，政企共同编织金融泡沫之举也就在所必然了。

天真的投资者们信任南海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等具有政治背景的公司，实质上表现出的是他们对国家、政府的信任。但可恶的是，政府及其下属的企业恰恰利用了人们这种廉价的信任、盲从与贪婪，通过公然的欺骗行径掠夺投资者的财富，从而让自己成为最后的获益者。并且，他们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这一切均是为了国家债务或者

说“国家利益”。不难看出，南海泡沫表面上是投资者的贪婪与癫狂酿成的灾难，实则是政府与企业利用市场的不完善联手导演的经济阴谋，而在阴谋背后作祟的，是根深蒂固的重商主义思维。重商主义思维强调国家垄断出口贸易，因此，为了争夺海外贸易权，欧洲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十分频繁，战争形成的巨额负债造成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为了偿债，公债被不受监管的政府和国有企业转移到资本市场，造成了金融泡沫的泛滥，短暂的繁荣假象后，泡沫的破灭最终对经济产生了毁灭性打击，从而带来了贫穷……沿着重商主义的思维，我们清晰地梳理出了这一系列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随着18世纪末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倡导的自由市场理念在欧洲确立，重商主义学说逐渐变得不再流行。今天不少人认为，重商主义仅仅意味着一个历史概念。但实际上，重商主义的思维并没有真正消失，在当代，它依然存在着，其表现为两方面：对外，新重商主义政府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对内，政府的权力大肆扩张，干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德·索托在谈到秘鲁等拉美国家经济受到重商主义传统的影响时，就曾总结说，政府的唯意志论，是重商主义理论在今天的典型特征。它宣称：“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完全是政府主观行动的结果”。[12]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重商主义思维与数百年前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再举一个身边的例子。台湾经济史学家赖建诚在《重商主义的窘境》一书里也谈到台湾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重商主义”思维。并且，赖建诚认为，虽然现代的重商主义思维在台湾多表现为外贸上的“金块主义”，但就普遍情况而言，重商主义通常是和国家主义并行的，而国家主义则会产生管制经济，追逐垄断利润。[13]在管制与垄断的情况下，财富的最终流向不可能是普罗大众。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重商主义四个字都与政府扩张的权力、垄断经营以及对自由经济的干预等等情况有割不断的联系。不过，本书也希望告诉人们，除了以上事实之外，一个受重商主义思维影响的强势政府，也可能在利益驱使下主导市场中的欺诈与骗局。18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证券市场中，出现了政府代理人的身影。他们像普通的经营者和投资者一样进行着商业活动，但却或明或暗地体现着政府的意志；他们表面上有着最好的经营业绩，但实际上整天思考的却是如何打通层层权力关系；他们有时也会受到政府的惩罚，但更多时候获得的却是庇护；他们自私而贪婪，但这些人的私利却被畸形的市场纽带与国家利益绑在了一

起……

只要存在权力与资本的合谋，金融骗局的危险就不会消失，一个“致富”的市场就很可能为“致穷”的市场所替代。我想，在目前的情况下，期待凭空出现一个高效、纯粹、完美的市场无疑是不现实的。但避免出现最坏的市场，避免在权力和资本的合谋之下，市场变成欺诈横行的赌场，这却是可能的。历史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最好，但却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最坏。避免一个“致穷”的市场，这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底线。

孙骁骥

2012年6月24日

注释

1　Roger E. A. Farmer, How the Economy Works: Confidence, Crashes and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10.

2　Fritz Machlup, The Stock Market, Credit and Capital Formation, William Hodge and Company, 1940, p. 27.

3　经济学大师熊彼特也认为证券、信贷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写道：信贷和资本市场“本质上是为了把购买力转移给企业家而进行的购买力的创造……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完全均衡的简单循环流转中实现经济的发展。”详见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叶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p. 135-136．

4　Justin Fox,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Market: A History of Risk, Reward, and Delusion on Wall Street, Harper Business, 2011, p. xiii.

5　Tim Harford, "Don't blame the (mostly) 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原载FT Magazine, April 16, 2011, http://www.ft.com/intl/cms/s/2/d51d6f5c-656d-11e0-b150-00144feab49a.html#axzzlyGHoXCs6.

6　Paul Cwik, "Socialist Stock Market?"，原载The Mises Institute monthly, Vol. 17, No. 5, May, 1999, http://mises.org/freemarket_detail.aspx?control＝27.

7　Murray Rothbard, Man, Economy and State with Power and Market,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9, p. 1058.

8　加雷·加勒特：《压垮世界的泡沫》，译科、杨崇献译，法律出版社，2010，p. 28．

9　Kenneth Morgan, The Oxfor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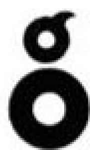
10　Charles Henry Wilson, Mercantilism, Taylor & Francis, 1958, p. 3.

11　Gianni Vaggi, Peter D. Groenewegen, A Concis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From Mercantilism to Monetar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23.

12 德·索托：《另一条道路》，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07, p. 268．

13 赖建诚：《重商主义的窘境》，三民书局，1992, p. 70．



铁 葫 芦

铁肩担道义　葫芦藏好书